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怀广　装帧设计　陶雪华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普里戈金等著/从混沌到有序
拉兹洛著/系统、结构和经验
戈布尔著/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
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麦奎尔等著/大众传播模式论
罗伯茨著/供应学派革命
艾根等著/超循环论
托姆著/突变论:思想和应用
哈肯著/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兰德曼著/哲学人类学
霍夫斯塔特著/心我论:对自我和灵魂的奇思冥想
阿部正雄著/禅与西方思想
耀斯著/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
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林德布洛姆著/决策过程
贝纳西著/市场非均衡经济学
勒高夫等著/新史学
奥辛廷斯基著/未来启示录
阿甘别吉扬编著/经济管理改革:问题与探索
卡特等著/理性预期:八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学
格莱克著/混沌:开创新科学
罗蒂著/后哲学文化
柯廷顿等著/开放经济非均衡宏观经济学
弗拉德著/计量史学方法导论
罗洛夫著/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
阿佩尔著/哲学的改造
弗朗茨著/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
理查德·H戴等著/混沌经济学
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世界现代化进程译丛

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 罗荣渠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罗荣渠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3 字数 335,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7,000 册

ISBN 7-5327-1379-2/F·036

定 价：15.20元

编者的话

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在经济学（确切地说是"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确切地说是"发展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哲学和文化学的领域，有关现代化种种问题的研究与思考都渗透于其中。这是整个中国都处于现代化的热潮之中在理论上的反映。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研究，发展研究，从60年代以来就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并方兴未艾，正在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这是整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现代化大浪潮之中在理论上的反映。

迄今为止，不论是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都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派生物，而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却是处在大变革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即我们常说的欠发达国家）。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Western Centric）理论，一直受到实践的挑战，引起激烈的争论，并在争论中进行自我修正。这

表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本身还处在欠发展状态，并一直处在发展之中。争论中常引起人们反思：到底什么是现代化？能否设置衡量发展的统一的尺度？有没有经济发展的通用理论？甚至有人提出：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到底有无前途？

近年来，国内关于国外现代化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的翻译出版日渐增多，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以及一批以西方经济增长作为典型模式的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这些论著虽颇有名气，但大多数是60年代后期这一领域的著作，作者大多数是美国人。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是，力图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化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除了巴林顿·摩尔以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观点占了上风。至于当时西方学者们对第三世界现实情况的隔膜甚至陌生，就更不用说了。西方主流派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刚一出世，就遭到激进派观点（其中包

括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猛烈批判，于是表现拉丁美洲激进主义思潮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应运而生，它们与现代化思潮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正如一位非洲学者所说，"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心(西方国家)生产，在边缘(第三世界)消费"。这种欠发达状态并不是很快就改变得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被延误了，从而使它们对西方知识产品的受用也延缓了。

70年代初兴起的激进的发展理论只是引发了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古典发展理论的争论，而不可能结束这场争论。到70年代末，整个西方经济的停滞和东亚"四小龙"的异军突起，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学上的保守主义新浪潮，另一方面又引出了对包括依附理论在内的各种发展理论的再认识和对第三世界现代化—工业化道路的再探讨。关于发展理论、战略、政策的研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此项讨论在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日趋深化。理论探索正如后浪推前浪，在实证的检验中不断前进，这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为了了解这些年来国外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与再认识，编者从国外和台湾学术刊物中选择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共

中少数选自专著中的某些章节)，编成此书，为我国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份参考资料。必须说明，本书所选论文均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书所选文章分为四编：

第一编：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再认识。所收文章，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和发展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论、方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些文章试图从激进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代化和发展理论主流派提出批判，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例如阿维内里的《马克思与现代化》和杜德利·西尔斯的《发展的含义》，早就是脍炙人口之作。有的文章是对60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演变作了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的评论，这对我国读者了解战后西方发展思潮的总趋势，是会有帮助的。

第二编：工业化道路与模式的再探讨。工业化被认为是成效显著的发展战略。本编中的探讨是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经验开始的。60年代初，格尔申克隆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东欧早期工业化的特征所作的历史分析，为研究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本编中一些文章，实际上是围绕格尔

申克隆的理论命题展开的。另一些文章则把西欧工业化模式的示范性的讨论扩大到北欧以及东亚地区，以更广阔的视野对欧洲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第三编：政治现代化进程与发展目标。众所周知，在这个领域中，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等长期以来具有巨大的影响。然而，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许多观点近来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亨廷顿自己也在改进其观点。他在新作《发展的目标》中对最近二十年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议题和论点进行了有益的回顾，提出了各项发展目标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假说，并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第四编：东亚发展模式与工业化战略。这可说是近十年来才真正进入现代化和发展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如果70年代的关注焦点是在拉丁美洲，那么80年代的关注焦点显然已移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了。本编的第一篇文章是日本学者对明治维新时代摸索出的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其余几篇文章，包括我国台湾学者的文章在内，都是对战后东亚新兴地区工业化经验的探讨。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众多因素提出

了新的解释，不仅涉及到历史连续性问题、深层次的文化传统问题，而且也越出东亚范围涉及到当前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一些基本思路，可以使人举一反三。

本书收入的各篇文章，多半是从国外和台湾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筛选出来的，一部分选自有关专著，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发表，只有少数几篇选用现成的译文。选收的方针是：一、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有争议的问题兼收不同的学术观点，重在立论持之有据；二、除第一编理论文章外，其余各编都以实证性的研究为主，特别偏重于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因篇幅有限，有关发展的一般哲学理论均未收入，这也是为了突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性质；三、扩大所选文章的作者面，广泛反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者的观点，不仅注意收罗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还特别选收了日本、印度、南朝鲜、埃及、以色列、尼日利亚等国学者富有特色的论文，以便进行必要的比较和鉴别。

由于编者的能力和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重要文章一时未能找到，有些入选文章的质量也未必尽如人意，当然更不可能以一本篇幅有限的选编包括近年新的研究中的全部重要观点。实际情况是，

这个选编只是我们近两年从事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个专题研究的副产品。选编所提供的国外研究状况，只是一鳞半爪，但只要这些研究信息有助于我国读者开阔视野，启迪思路，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信息，请参考我们研究中心编印的《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文参考文献目录选编》。欲了解港台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请参阅我们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一书(北大出版社)。

本书选材大都来自英文和日文书刊，从而涉及译名问题。对于一些专名的译法，目前国内书刊上很不统一。例如，日文的"近代化"一词，在汉语中有按原样写成汉字"近代化"，也有译为"现代化"的。又如，英文的"underdevelopment"一词，在汉语中有译为"不发展(达)"，也有译为"欠发展(达)"的。学术上的"正名"工作早就应该进行。在本书中，日文的"近代化"一律译为"现代化"。"underdevelopment"一般译为"欠发展(达)"或"低度发展(达)"。理由在这里就不详谈了。

参加本书论文翻译的，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梅俊杰同志参加了初稿的校订和编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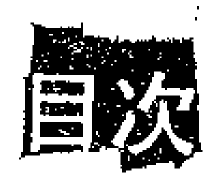
本书原属于我所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之一。在当前学术著作译本出版难的情况下，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志欣然同意将本书列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之中，并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译丛》的名称。我们对这种慷慨的支持，自然是深表赞赏与感谢。

罗荣渠

1902年猴年春节

北京大学世界现

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第一编　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再认识

第二编　工业化道路与模式的再探讨

第三编　政治现代化进程与发展目标

第四编　东亚发展模式与工业化战略

第一编

现代化与发展理论再认识



1 马克思与现代化

[以色列]什洛莫·阿维内里[①]

一

关于非欧洲社会的性质，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独特的理论，这一理论决定了他对非西方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性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个理论非常引人入胜，而且有时还与那些自诩代表马克思主义，堪作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的言论相抵触，但却仍然鲜为人知。马克思在大量的文章和信件中，详尽地对非欧洲世界的性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加以讨论，基于大量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资料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不管是对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还是对于那些研究现代化的人，这一理论都是值得细察的。这个理论本身还有缺陷，但它使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某些最深邃的见解闪耀出迷人的光亮，而且也许还有助于矫正某些流行的现代化模式。

即使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理论知之不多的

人，也都知道在讨论马克思关于这类问题的观点时经常出现的一种二分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作为前提，对历史发展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又反复提醒人们，不要把他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任何一个历史情况。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含有普遍的确实性和适用性。在马克思自己的经验主义方法与苏联和西方对其理论通常所持的理解方法之间，存在着几乎难以想象的差异。马克思在1877年论述俄国现代化的可能性时，曾告诫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接着提出，有必要仔细地对讨论中的每一个特定的社会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经济的分析，并进一步说道：

>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种形式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

所以马克思认为，在下一步的俄国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可能，它的出现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这里所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而近来

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归属于他的那个观点，对照之下简直形同南辕北辙。施莱辛格说：

> 当然，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对未来坚持一种决定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定的原因产生一定的结果，人类正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通过若干预定的阶段，走向单独的一个预定的终点。
>
> 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什么中心命题的话，这个命题是：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③

西里尔·布莱克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对现代化所持的注重实际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它"拒绝强调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多样性，不承认现代化的社会可能采取多样的形式"。④

---

① 什洛莫·阿维内里是以色列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于1968年9月2—7日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美国政治学协会1968年年会上的演讲稿。

② 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1页（原文所引马恩论著，均由译者相应转换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下同）。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论历史的不可测知"，《文汇》（1966年11月），第11页。

④ 西里尔·E·布莱克："革命、现代化与共产主义"，见西里尔·E·布莱克和托马斯·P·桑顿所编：《共产主义与革命》（普林斯顿，1964年），第22页。这正好与马克思自己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所作的论述相反，当时马克思在讨论向社会主义的转化时说道："我们知道，人们必须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度、习俗和传统加以考虑。"引自汉斯·格特编：《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会议记录》（麦迪逊，1958年），第236页。

马克思谨慎的和实证取向的方法与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归属于他的笼统概括之间的这个差距，无疑是产生于这样一种环境，这环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教条性的正统理论，其僵硬性远远超过马克思本人著作中所能预想的程度。不过，上述差距倒也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看法与当今谈论这个问题的著述关系如何的问题。

确实令人吃惊的是，近来讨论现代化的文章，除了偶尔有几句谈及之外，很少提到马克思。大多数作者通常把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写成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观点，认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和决定论的经济增长概念之上的。于是它被当作一种不能为实证性研究所证实、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站不住脚的教条而明显地被弃置一边。

这一点随便举出几个例子便可说明。沃尔特·罗斯托试图提出另一种言之成理的观点去替换关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观点，但他对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却从未成功地作出充分的说明。罗斯托首先假定了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顺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后加以评论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足以概括所有传统性的社会"。①紧接着他又强调，马克思对研究亚洲现代化的问题不感兴趣。然而，罗斯托在自称是完全代表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两个论点上弄错了：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亚洲有什么像"封建主义"那样的制度存在；其次，关于亚洲现代化的问题，他曾在

① 沃尔特·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剑桥，1960年)，第146页。

数十篇文章中有过论述。

同样，在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的第一流的研究著作中，对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观点竟只字未提，只在论述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时提到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涉及其理论本身。最突出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名字竟在此书的索引中未见出现（阿迦汗倒是列入索引的）。[①]勒纳敏锐地发现了中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动员群众支持时所面临的困难，但他把这类困难只归因于阿拉伯社会的现状，而不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勒纳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关于非欧洲世界的观点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②] 派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阐释，虽然至少有三分之一和马克思的观点极其相似，但他对马克思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却从未直接地进行过讨论。[③] 派伊还在其另一著作中，把马克思连同汤面比和施本格勒一并加以排斥，因为他们共同致力于"阐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和衰退的顺序"。[④]与此同时，对孔德、韦伯、特尼斯，甚至对亨利·梅因爵士，却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有时，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没有完全遭到忽视，却往往被人将原来非常复杂的论证以一种歪曲的方式表达出来。斯卡拉皮诺的论述就是一例：

---

①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詹姆斯·科尔曼：《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0年）。爱德华·希尔斯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海牙，1966年）中同样根本不提马克思。

② 丹尼尔·勒纳：《传统性社会的消亡》（格伦科，1958年），特别是301页以后。

③ 卢西恩·W·派伊和悉尼·韦尔巴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5年），第12页。

④ 卢西恩·W·派伊：《政治发展概观》（波士顿，1966年），第67页。

看来很清楚，马克思根据19世纪欧洲的经验作了概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遵循这种特定的欧洲模式，并且认为一定的经济状态定会自动地产生出一定的政治制度，这是错的。①

显然，马克思为了防止误解，特意在上文引述的那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作的明确申述完全被忽略了。

苏联研究现代化的专家同样也忽视了马克思关于成长和发展的理论；这一事实有时给上述的混乱增添了一种有趣的色彩。乌里扬诺夫斯基试图把欧洲封建主义的概念搬到亚洲来运用，可是他失败了。② 还有俄国研究这个问题最为杰出的著作家波特金，也只得生造一个新的范畴"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来指称亚洲特殊的"封建主义"形式。③只要对照一下马克思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就知道他们两人显然都是在瞎说。

二

为了恢复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观点的本来面目，并把它

---

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环境和外来的促成作用：日本"，见沃德和鲁斯托：《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第64页。

② R·A·乌里扬诺夫斯基："近东和中东国家、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农业改革"，见托马斯·P·桑顿：《苏联视野中的第三世界》（普林斯顿，1964年），第21页。

③ I·I·波特金："非洲国家的土地关系"，见桑顿：《苏联视野中的第三世界》，第236页。

们纳入当代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献中去，我打算在本文中先扼要地谈谈马克思关于西方现代化及其原因的论述，然后再讨论马克思关于非欧洲世界以及他所理解的在这些社会中出现的现代化程序。

马克思对于现代化（不过他从未以特定方式使用过这个术语）所持的标准，与当前社会科学文献中广为流行的标准非常相似，那就是突出具有普遍性的、具体的和成就取向的准则，高度的灵活性，以及基于成就的阶级开放体制。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强调人类活动的普遍化与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一项与韦伯十分相似的分析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肯定其社会关系的非神秘化与合理化，并肯定其具有一种把这个新的社会形式推向全球，从而创造出一个“各民族在各方面互相依存”的内在动力。

可是，《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对西方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作出解释，关于这一过程的论述，只有在马克思著作中一部分不甚引人注目的地方才能找到，这或许就是它们遭到忽视的原因之一吧。马克思在详细讨论欧洲现代化的历史性先决条件时，运用了连续与变迁的辩证方法，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派伊的说法，即“发展问题较少意味着大量排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较多意味着发现传统如何能够促成而不是阻碍当前……目标的实现。”②

马克思论述欧洲现代化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欧洲

---

① 见F·X·萨顿，“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载于哈里·埃克斯坦和大卫·阿普特合编，《比较政治学读本》（纽约，1963年），第71页。

② 派伊和韦尔巴合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第19页。

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就像关于马克思的读物那样），而是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所引起的。①

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论述吧。马克思把促进储蓄和投资的社会条件的出现看成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这些条件的出现，是同私有财产逐步从基督教会的规范中分化出来相辅而行的。正是鉴于财产自主权和投资来源的可取性上出现了新的规范，马克思讨论了中世纪晚期那种明显存在的对于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西方历史曾经经历了早期的需求加速增长，但生产发展远不能跟上这种需求，结果只能对实际需求重新来一次再分配，而不是创造一种手段去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出现于中世纪晚期并最终导致资产阶级世界与工业化的兴起的，是一种活动范围的缓慢分化，由此导致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作为自主领域的合法化，从此不再受到封建制度在伦理上、宗教上和政治上种种约束的阻碍。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把这一领域称作“市民社会”。②从社会和历史角度看，经济活动领域不受公共生活中其他各种领域的束缚，是随着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而开始的；这场运动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城市公社运动”，旨在使城市从对主教、贵族以及其他封建领主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

---

① 以下的说明根据《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第1卷。并见1854年7月27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那封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379—384页。

② 《黑格尔的法哲学》，T·M·诺克斯译本（牛津，1942年）第157段：“大学中的市民社会——一个由许多自立的个人组成的联合体，由于其成员是生活自给的，所以只是一种抽象观念。他们之所以要联合，是由于他们的需要，由于法律制度（保证个人和财产安全的手段），还由于为了达到他们个别的和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外在组合。”

来。自12世纪中叶起，这一过程席卷了整个西欧，各个城市及其新兴的市民阶级，竭力使自己摆脱世俗的和宗教的领主，摆脱他们的领主强权加在自由经济活动之上的种种约束。独立自主的城市群体（corporations，又称 caniurationes、universitates、communes）的发展，是和相应的社会行为准则的明确化分不开的，新的行为准则使市民能通过更改传统上反商业的宗教伦理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经济目标。他们由于挣脱了封建的和基督教的传统习俗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伦理和宗教的枷锁，从而能够放开手脚从事经济活动。"高利贷"等一类概念，以及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和封建骑士制度影响下的一般商业活动所留下的污迹，都在洗刷之中。从制度上看来，这显然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宗教领域分化出来的结果。经济活动离开各种道德戒律而中立化，从而能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生产出比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伦理所允许的更多的商品。于是，与经济领域有关的唯一标准只是经济标准了。西欧现代化的根源，在韦伯看来是新教伦理，而马克思则认为是比新教伦理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城市"公社"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这样一种都市化，而是具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自治群体的创立，才是出现"市民社会"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化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即使是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城市市民文化，现代化也是要失败的。葡萄牙就是符合于马克思观点的一例，尽管葡萄牙在16、17世纪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资源，可是在那里并没有出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市民社会"。葡萄牙在中世纪晚期绝未经历过城

市公社的革命，它的城市绝未使自己摆脱王室、封建主或基督教会的宗主权，所以缺乏变革的基础，看不到加速发展的、合理组织的及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事实表明：低地国家的市民文化，对于现代化来说，远比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更为重要。因此，英国、荷兰、莱茵兰地区、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等公社运动最成功的地方成了现代发展的摇篮。三十年战争后，在地方诸侯统治下的德国许多城镇趋于没落，德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落后使它徘徊在现代化进程的边缘。

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情况时，明确地强调说，印度及亚洲的城市只不过是王室的营地而已，它的兴起与败落完全取决于一名君主或一个王朝的命运，因此而有其盛衰变化，而与其经济进步绝无关系。这类城市完全没有以个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构成因素。① 近来，对南美的都市化具有非现代化性质困惑不解的贝利斯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没有采用马克思的标准，却也对拉美称为"前工业结构"的性质作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分析。②

三

马克思关于非欧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的看法，比之简单地说一句整个世界必然要走向工业化远为复杂得多。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告

① 1853年6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53—257页。

② 克劳迪奥·贝利斯：《拉丁美洲变革的障碍》（伦敦，1965年），第2—4页。

诫人们，不要把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论述转化成为设定有许多普遍法则的一般历史哲学，将这些法则不加区别地到处乱用。马克思还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扩张导致了非欧洲世界的“未开化”社会走向现代化。①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认为非欧洲世界按不同标准发展的观点，是与马克思历史哲学中一个主要的模棱说法有联系的。太多数评论家均满足于指出马克思的系列性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模式的三个阶段，即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产阶级三个阶段。但他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所举的这个系列中的阶段，原来指的是四种形式，而不是三种。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②

这个图式的困难之点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上述后三种形式构成一个辩证的系列，在时间的推移中，每一种形式都产生于前一种形式，并为完成自身的转化、让位于后继者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亚细亚形式却独具一格：它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分析术语或历史术语，并且马克思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指述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会转换成其他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马克思自称业已提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哲学，而上述问题却显然使这一论断陷入了两难境地。但在这篇文章

---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55页。“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

里，我只打算说明这种两歧理论对于讨论非欧洲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具有什么意义。

虽然马克思从未就非欧洲世界的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并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我们还得从《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量文章和几封信件中去提取，但把这些零散的片段放在一起，意思还是可以连贯起来的。① 这些论述的零碎性质可以说明即便是那些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忽视的原因。② 在表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人们总是深切地注意到马克思针对亚洲社会的基本特点所发表的意见。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是停滞的、不变的、非辩证发展的、特殊的、有局限性的，并且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他认为，由于这个缘故，亚洲社会虽有政治上的动乱和多次剧变，却一直处于令人不安的延续和僵化状态。这种观点导致了他在 1853 年所发表的惊人言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

---

① 下文论述的主要依据是《资本论》第三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中国纪事"，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45—548页；1853年5月至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45—274页。参考E·霍布斯巴姆编：《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伦敦，1964年）。

② 不过有些例外，最著名的是卡尔·A·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纽黑文，1957年）；乔治·利希泰姆："马克思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圣·安东尼文件》（伦敦，1963年），第14期，第86—112页；约翰·斯特莱奇：《帝国的末日》（伦敦，1964年）；维克多·基尔南："马克思与印度"，《社会主义纪事》（伦敦，1967年），第121—158页。并参见我为内容全面的《马克思论殖民主义与现代化》（加登城，1968年）所写的序言，第1—28页。

在九年之后的1862年，他又说："那些东方帝国总是表现为社会内部结构的停滞不变，而那些追逐政治上层建筑的人和部族却不停地在更替。"

这一看法的结果，导致马克思对欧洲殖民扩张行动作为非欧洲世界现代化和变革，乃至于这样的"历史性"发展的唯一保证给予了辩证的认可。不过在充分讨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对现代化所起作用的惊人见解之前，应该把马克思所认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勾勒出来。以下便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东方社会的主要特征：

(1)不存在土地私有。

(2)国家为土地的最终占有者；在地方一级，土地为村民公有。因此村社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

(3)因此地租和赋税是一回事情。

(4)农业和制造业被纳入一种乡村自足经济的封闭体系。

(5)一个完全不依赖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中央集权国家承担各项公共工程的建筑，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6)这种高度整合的自给自足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相结合的体制，是东方社会性质停滞不前和缺少变化的原因。①

① 很容易看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来源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中关于"东方世界"的一章。见G·W·F·黑格尔：《历史哲学》，J·西布里译，C·J·弗里德里希编（纽约，1956年），第105—106、116、139页。

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与西方世界中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形态完全不同。马克思固然曾经多次指出，部落公有制也曾在西方（在罗马人，条顿人和克尔特人中间）存在过；但它总是向着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生产方式迈进的，而东方的土地公有制，则结合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东方帝国的情况。

马克思还论述了与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并行的认识论和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讨论英国人的入侵给印度的社会及乡村生活造成可怕的瓦解性影响时，对英国人的冷酷无情作了深刻的批评，但同时也警告说，不要把印度人处在所谓原始纯朴状态的生活天真地加以浪漫化。马克思在一篇前所未有的对英国人到来前的印度所作的十分严厉的描述中说道：

> 就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如何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忘记那种未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

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存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牝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地糟踏人了。①

关于非欧洲社会的性质既然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其内部变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在这里，马克思面临着两个可能的问题：一方面，有变革和现代化的潜在力量及在亚洲社会内部起变化作用的内在力量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则有外部的影响，即欧洲势力施加影响于亚洲社会的社会机制问题。

关于内部变化的可能性与先决条件的问题，马克思的答复极为明确：如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从历史上看来是适当的，那么就没有任何内部变化的可能。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创造先决条件的任何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连可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67—68页。

能成为类似条件的因素也没有。教会与国家的二元性、封建制度的契约性、私有财产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持有双重情绪的价值体系，在印度和中国都不存在。由于没有私有财产，因而完全缺乏与私有财产相伴随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辩证性变革的因素。没有私有财产——以及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意味着没有对个人主义的要求，没有渴望实现"市民社会"自治区域的压力，而这正如我们业已见到的，是进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现代化的结果。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一体化只是停留在本地区的水平上，结果便阻碍了具有明确含义的消费兴趣于超越地区的水平上的发展，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观念的产生。所以，东方帝国的政治可以变化，而其社会或经济则始终不变。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本身的力量，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然而，由于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预想是以资本主义的先行普遍化作为前提的，[1] 所以欧洲的殖民扩张现象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便另有一种重要意义：欧洲人向海外的扩张行动是由面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性所引起的，同时它也成了社会获得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一项先决条件。殖民主义也像资本主义一样，是辩证法的必然产物，但必须加以消除。

这样一个论断所引出的必然结论看来是这样的：马克思

[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9—41页；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马恩全集》，第29卷，第346—349页。马克思在信中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为尚未现代化的东方社会这一重负所掮带，他对这一点甚为担心。

对欧洲人入侵亚洲社会所表示的肯定态度是与这种入侵的程度成正比的。如果欧洲人的入侵只是间接、轻微或肤浅的，它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能量破坏"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与印度比较起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不够快速，因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没有伴随着直接的政治控制。① 虽然他很自然地批评了欧洲人挑起鸦片战争的动机是与贪图钱财相联系的，但他毫不含糊地欢迎中国的门户开放，认为那是中国为结束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所应采取的一个虽痛苦而属必要的步骤。黑格尔关于"理智的狡黠"的辩证法对历史人物行动上的主观动机与其行动的客观效果作了区分，这显然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作出此等区分的方法论模式。同样，恩格斯也对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对墨西哥的扩张表示欢迎。② 不过，把殖民主义看成非欧洲世界实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并不是给予殖民主义以道义上的肯定。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可以谴责殖民主义的动机，以及产生这类动机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理解殖民主义的必然性。

---

① 《资本论》，第3卷，第372—373页："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品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双管齐下，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目的是要把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摧毁，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

因此，殖民扩张的主要影响在于其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这里较长地引述一段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段落，似乎可以最恰当地说明马克思预见到的作为英国统治印度的结果的广大范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

> 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之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
>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更新的首要前提。

---

② 恩格斯在1848年1月22日(译者按：原文如此)的《北极星》报上说，“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重要和幸运的事件。”他还在1848年1月23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说，“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可是现在它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见《马恩全集》，第4卷，第513页。”在1851年5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俄国对中亚的扩张发表看法时采取了同样的论旨，“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7卷，285页。一些见识不很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把这些说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的一种倒退”。见贺拉斯·B·戴维斯：“国家、殖民地以及社会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位”，《科学与社会》，第29期(1965年)，第31页。

英国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遭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团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①

对于非欧洲社会自己主动地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很少有这样全盘否定的说法；由此可见现代化不是一个经济手段的运用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具备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习俗的问题。人们会问，马克思对日本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他在文章中几乎没有一次提到过日本，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日本不如印度和中国那么重要。但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人对日本社会的传统因素如何使日本的现代化成为可能进行研究的话，马克思会与之携手，并且很可能也会注意到日本现代化的局部性，以及社会上传统的行为方式与技术上对西方规范的高度采用并行不悖的事实。尽管日本是一个明显的空白，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一处表明，他们曾经想到过土生土长的现代化是切实可行的或可能的。既然马克思认为，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些条件不可能在亚洲重现，那么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恩格斯有一次甚至走得更远，他宣称，随着革命的到来，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将不得不暂时"接收"殖民地，把它们强行纳入现代化的轨道，因为殖民地本身也许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②

---

① 《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0—71页。并参考该书68页："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用当时关于现代化的文献中所用的术语，赞扬了英国在印度的作用，因为它促成了基尔兹的所谓"一体化革命"，以及奥冈斯基的所谓政治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见克利福德·基尔兹，《古代社会与新兴国家》（格伦科，1963年），第105—157页；A·F·K·奥冈斯基，《政治发展的阶段》（纽约，1965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split-up modernization)深表怀疑。③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④但是，他们对非欧洲社会中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split-level modernization)批评得更为尖锐，这一点对于当今关于通过军事统治实行现代化的研究或许会有特殊的好处。恩格斯的意见仍是毫不含糊的，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保持不变，军队就无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因为使军队现代化的能力是以社会准则的先行存在为基础的，这些准则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日常行为中的结构性改变是必不可少的。

恩格斯的这个判断是在讨论1857年波斯军队被少数英国兵和英国人训练的印度兵打败的原因时作出的。波斯军队的败北在欧洲引起巨大震惊，这不仅因为波斯军队人数远远多于对方，而且因为他们以曾受欧洲教官多年训练，并配有充足的新式西方武器而著名。恩格斯在一项可能对类似的中东背景下导致类似结果的较多当代性的军事对抗具有若干适用性的分析中说：

>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

② 1862年9月12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51—354页。

③ 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1966年)，第67—75页。

④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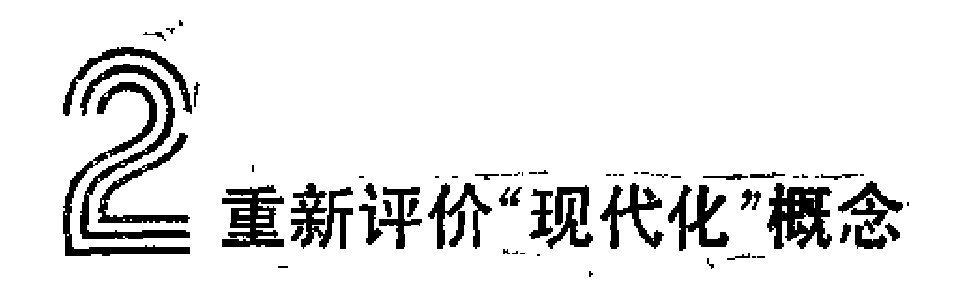
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伐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①

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性质和现代化的这些观点中可能找不到多少安慰，但这个问题已越出本文范围了，同样很明显的是，我们不能指望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有过高的热情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到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去。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具有政治趣味而已。不过就理论上说，马克思对于现代化的看法应当被看成为试图根据西方的经验为现代化的各种条件和界限提供一幅相当精致的图像。

① "波斯和中国"，《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8页。

总而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化的条件是：1. 存在着土地私有制；2. 在下一条件的基础上出现土地商品化；3. 存在着一种个人本位的城市"市民"文化。马克思的论述试图回溯这些条件在其历史背景下汇集起来的情景，而未能从非欧洲社会中找到相同的或类似的条件，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由此所产生的关于殖民主义对现代化的必要性的假设，可能引起马克思主义者或闭目塞听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所以就是对目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提出的一个挑战，并且值得列入当代研究的文献和概念结构。简单地把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斥为"机械论的"、"完全是由欧洲经验所决定的"等等，是没有用处的。

（张景明、尹凤华、赵亚麟、黄艳华译自英文版《政治学评论》，1969年4月号。梅俊杰校）



2 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

[印度]A·R·德赛[①]

出于以下一些理由，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欠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作一个细心的、批判性的再评价：

1. "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广义概念用来取代早先的一些概念，目的在于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根据布莱克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些变化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过去常用的像英国化、欧化、西化、城市化、进化、发展、进步等词，现在不是被"现代化"一词所取代，便是被纳入"现代化"的概念之中。

2. "现代化"概念力图描绘人类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经过这个过渡时期，人类进入一个取得技艺的现代理性阶段，达到主宰自然的新水平，从而将自己的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和合理的基础之上。

3. 应该对"欠发达社会的现代化"加以理解，因为这个术语试图描绘和解释直接涉及占人类三分之二的社会中所发

生的规模巨大的急剧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监护下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始的。

4．在"专门的和普通的"文献中，过去二十年来，"现代化"和"现代性"二词越来越多地不加区别任意运用，以致失去了作为分析问题的有力工具的锋利棱角。正如内特尔和罗伯逊极其正确地指出的，这两个词显露出三个重大缺陷：（1）模糊和混乱；（2）在论述现代化时，习惯的说法和意识形态的偏好表现得很突出。"在这一点上，应注意到的最明显的倾向是那种暗示——有时含蓄有时明显——现代性的典型条件从属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3）与上一种相接近的意识形态偏见是"现代性代表着事物唯一的最后状态，即在一些西方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事物状态'，是每个人都应模仿的，这样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这种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种理想类型或代表一种新的乌托邦的歪曲观点陷入了困境，而从"现代化"一词中涌现出的大量词汇，像"分裂的现代化"(split-modernization)，"现代化的中断"，"后现代"等等，则成为特殊的语义学"烟幕"，用以从困境中逃脱。

现代西方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带有的价值观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语调，对正确理解几十年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过程已经造成某些危险后果。

带着这种特定的亲西方偏见使用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这些学者去观察和分析正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

① 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过程的能力，造成在观察已经实现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各式各样国家的历史阶段时带着某种色彩。它还引起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的错误看法，并往往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政策、措施以及实际做法的处方，由此对这些国家现代化正确进程的产生起了妨碍作用。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导致学者们所主张的措施可能造成"现代化的中断"，在欠发达国家中造成深刻的"危机状态"。出于这种认识，一些学者们醒悟到他们早先在朴素的进化理论基础上对待欠发达国家发展事业的热情，正被浓厚的悲观主义所取代。冈纳·米达尔的杰作《亚洲的戏剧》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

使用现代化概念时所设想的实质过程

在说明为什么要对现代化概念进行再评价时，应该承认，同西方学者在理解社会现代化时所使用的其他概念相比，"现代化"这个概念更能描述近三百年来所发生的社会变化的一些实质过程。这些实质过程是由许多杰出学者设法提出的，他们中间有韦纳、阿普特、勒纳、布莱克、英克尔斯、本迪克斯、玛丽恩·列维、斯梅尔塞、艾森斯塔特、内特尔及其他一些人。

照这些学者看来，"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同城市化、工业化、西方化、欧化相比，现代化描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并意指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形式的同样复杂的产物。这种被称作现代化的过程不局限于社会现实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

我们简要讨论一下被列在现代化标题之下的各种过程。

知识领域的现代化是在“有可能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寻求合理解释”的新意识中显示出来的。这种态度认为，自然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现象都受法则的支配，有规律可寻，具有统一性和因果关系，并能被人们认识，因此，可以由人类的理性来调节和支配。这种理性的态度便是现代化的实质过程①。

这种理性态度成长史的第一阶段的最令人瞩目的标志是：培根的《新工具》，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有影响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象征着通过法国大革命走向现代时期的那个危急中的理性的雕像。理性态度成长的第二阶段表现在三种主要知识潮流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众多的变种；始于笛卡儿、终于黑格尔博大精深的辩证唯心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新大陆主义的理性主义；第三，从黑格尔经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一个认识自然的与社会文化的人类现实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

理性态度成长的历史性发展，以及促进或阻碍这种发展的社会力量，是现时代最迷人的特点。

几乎是逻辑地出自理性态度的其他现代化特点，是同《圣经》观点相反的世俗主义的发展：不同于来世态度的现世态度；“将人与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人文主义）；不轻信任何事物，对任何事物都提出疑问，进行理性的研究；不同于反对变革态度的、趋向变化的向前看的态度。

---

①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哈珀出版公司，1966年），第7、10页。

现代化作为“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使用“社会动员”和“结构变化”这样具有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词汇来表述自己。

“社会动员”意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化与行为的模式”。①

社会结构变化。现代化是对“个人行动与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将个人充当的不同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和政治角色加以区分，并将他们与家族、亲属之间所充当的角色加以区分”，角色区分是指“专长”而不是指“分散”，而角色的征求也不是按固定不变的血统、地缘、种姓或等级的归属来确定，而是以个人的成就为基础的“自由流动”。②

政治变化。现代化包含四个主要特征：

1．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的人民的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

2．不断扩散“政治权力至更广大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结进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

3．“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尤其由于社会的中央权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的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职能的加强。”

4．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什么性质——极权的、官僚的、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将自己的臣民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和授权者”。

---

① 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6年），第41、42页。

② 艾森斯塔特，前引书，第2页。

现代的民主和半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同，在于它们“允许对‘政治制度’作法理学表达的程度”、“公众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①

经济变化：现代化的特点表现如下：(1)非生物性动力如蒸汽、电力和原子能取代了人力、畜力作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2)经济活动与传统环境相分离；(3)“手工工具逐步为机器和技术所取代”；(4)拥有高水平技术必然导致门类繁多的第二产业(工商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长，它们在数量意义上超过第一产业(天然生产业)；(5)“从事生产、消费、市场活动的经济角色和经济单位日益专业化”；(6)“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自立性增长”，至少增长到足以经常地增加生产和消费；最后，(7)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这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性特点。②

在生态领域，现代化以不断前进的都市化程度为特征。

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表现在如下方面：

1. 文化制度的主要因素的日益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的普及；一个以各种知识训练为基础，为培养和提高专门化人才而建立的比较复杂的知识和制度体系。”③

2. 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出现，它以强调进步和完善，强调快乐、能力自由发挥、感情自然流露，强调个性发展的价值观，以及强调效率为特征。

3. 出现一种新的个性取向，显示于以更大的能力去适应日益宽广的社会范围的种种特征和特性；某种自我灵活性；

---

① 艾森斯塔特：前引书，第3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同上。

兴趣范围扩大；增强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关心；增强对自我发展和变动能力的评价，日益重视作为人类存在有意义的短暂一段的现在；日益意识到他人的尊严并日益注意尊重他人；个人日益感觉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可靠的，周围的人和体制是可信赖的，他们会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日益相信科学和技术；日益认识到"报酬应按个人的贡献而不应按非份之想或按同自己贡献无关的特性来分配"。

4．最后，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问题和要求"。艾森斯塔特认为，这么一种灵活性的出现，构成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并形成对现代化的挑战。①

照西方学者看来，以上所说的过程和特征基本上包括了"实质过程"。

从使用人力、畜力转移到使用非生物动力，从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机器作为进行生产活动的基础，就意味着财富增长、技术多样化、分化和专业化，从而导致一种新型的劳动分工，以及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些是作为现代化的特征而被所有的学者接受的。对国家政权的支持者，从超自然的神转为世俗力量；权力日益扩散到更大的居民阶层；法律高于其他调节系统；这些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样，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角色派定，从归属原则转变为按个人的成就与功绩的原则，从质的方面改变了用人的基础，从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这一点也被看作是现代化的特征。社会团结原则的主要转变

---

① J·P·内特尔和罗兰·罗伯逊：《国际体系和社会现代化：民族的目标和态度的形成》，1968年，第38—41页；C·E·布莱克：前引书，第19页。

是：从建立在先定的、分散的、单一因素论基础上的"机械性"团结转变为建立在契约的、专业普遍性基础上的有机性团结，这一点也被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化的特征。学者们还认为，现代化过程意指从信神、注重来世、反对变化的观点转变为世俗的、现世的、向前看拥护变革的观点。学者们还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理性主义、人道主义、适合时宜性，以及改善今世而非来世的人类生活条件的必要性，构成了现代化文化观的标志。

探讨中发生的争论与冲突

介绍了现代化概念所包含的"实质过程"之后，现在我们要考察一下学者们在解释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发展阶段、道路、媒介、内容及其前景时所持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是由于学者们试图将现代化当作一项过程与产物，当作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并逐渐涵盖到全人类的一个历史范畴加以研究，从而有意无意地提出各种重要假说而引起的。这些分歧的产生，也由于学者们在认识和解释变化的性质、评价导致变化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时所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见解，以及他们按各自的社会学假定对社会基本特点所作的不同概括。这些分歧还由于学者们对发达或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与欠发达但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紧张和压迫作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并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法。下面我们将简要地提及这些分歧，并指出他们之间的争执点所在。①

① 约吉达拉·辛格教授将对待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划分为如下四种：进化的—历史的，进化的—组合的，联系的—历史的，联系的—组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大量论述现代化的文献，大致可归为两大学术流派：（1）依据西方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某些假说所产生的主流学派（该派学者对"现代化"概念怀有极大热情）；（2）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中产生的一个流派，他们考察同样的过程，但不只局限于"现代化"标题之下。

以共同假说为依据的第一个学派，又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支派。第一个支派研究现代化的学术成果在50年代曾繁荣一时，另一支派出现于60年代，并渐渐超过第一支派。

在50年代，出现了认为欠发达经济能够通过"起飞"达到发展的朴素渐进论的经济学理论，和主张"传统社会通过'过渡阶段'转变为'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① 这些理论以天真的假定为根据，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适合全世界并将成为全世界的未来结局。这种理论深受一种将发展看成简单而自动的过程的观点之害。照这种观点看来，整个现代化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过一些特定条件的聚合，出现一个充分发展的西化社会，并形成一种模式；到第二阶段，现代化过程发展到所有的国家。尽管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条件不相同，但在发展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同那些现代化国家具有共同特点，促使欠发达国家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舞下通过加快发展而克服落后状况。这种看法使我们回想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类似观点，那时有人设想，当已经具有高度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征服了"野蛮的"殖民地人民，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蹂躏他们的

① 艾森斯塔特，前引书，第5、6页。J·P·内特尔和罗兰·罗伯逊：前引书，第1章。

时候，它们正在帮助他们，并在推行一种文明使命。现在，则有人设想，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援助，正在从事各种利他主义的活动，以帮助传统上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并认为这种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将很快使后者达到起飞阶段，让后者在和谐的现代化道路上开始起飞。

60年代出现的学术成果，形成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支派。这一派对现代化过程的扩展并不采取那种简单的态度，而是试图作更深一步的探索。他们承认现代化问题所造成的高度紧张和压迫。他们不认为现今欠发达的传统社会将会自动地进化入现代化社会。他们认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下，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必然的。照这派学者看来，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着现代化过程中断的巨大危险。事实上，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所具有的灾难性意义造成了“现代化中断”的威胁，就像一个幽灵，严重地困扰着学者们，甚至使他们大为惊慌。艾森斯塔特、阿普特、内特尔、罗伯逊、本迪克斯、冈纳·米尔达尔及其他大批学者已开始在一个更为高级的水平上考察现代化问题。

这些学者还相信，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局限于西欧、美国和说英语的几个自治领，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种从自身内在力量中产生出来的本土现代化发展，传统的社会被改造成为自主的现代社会。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在结构上和文化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各种新型组织的规模较小，许多较为专门目标取向的组织的发展；当时尚受限制的市场与主要体制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的发展；以及‘公共的’即社区代表制或职业代表制所进行的调节和分配占

有相对的优势”。这一现代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强大的、现代的、集中的政治结构的发展，以及迅速发展的趋向于更广大的群体和阶层的政治意向。"①

这些学者认为，属于这一阶段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政治结构，允许和平地和相对渐进地根除它们的局限性，通过社会动员、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方式，进入现代化持续增长的阶段，而后将更广大的社会阶层纳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结构中。因此这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在这个早期阶段中已经获得了一种坚固的中心结构，从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活力来采取下一步的现代化行动，以满足人民大众和各个集团不断增长的愿望，并具有能力生产财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这样，这些国家形成了持续增长的力量，使现代化进程不间断地扩展。至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本质上则是次要的，这种挑战未必会造成现代化的中断。

该派学者认为，世界的其余地区基本上属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现代化国家相比，它们仍然是欠发达的，从历史上说，只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摆脱外国统治，走上积极的现代化道路。

这些现代化的"后进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当年面临的问题有几方面不同。

1. 在争取摆脱外国统治的过程中，有对人民大众进行的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出现了群众冲击中央政治权力的新现象。这种被称为"群众性场面"的群众日益自觉的参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积极进行现代化的欠发达社会

---

① 艾森斯塔特，前引书，第52、53页。

的独特特点，这同早期的现代化的国家不同。

2．步伐日益加快的社会动员"首先以大规模的、多目标的、专门化即非生态和非血缘的群体和社团的成长为特征。其次是以在社会的各制度领域，各种国内市场持续不断的扩大和相互渗透为特征。

3．它以"都市化不断的增长与扩大和大众传播媒介不断的扩大为特征"。①

因此，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中，社会动员是渐进的，对广大社会阶层和现存中央政治结构冲击较小，而后进现代化国家则不同，社会动员的步伐以及新中心建立时对大众的直接、主动的冲击是极其快速和突然的，并且其规模也有质的不同。不仅如此，在各制度领域内的社会动员的步伐，也不同于那些属于第一阶段的社会。在大多数经济极其落后的新近解放的国家中，由于它们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特殊从属关系，"政治、生态、教育领域的分化过程和社会动员过程比在工业和经济领域更强烈"。

后进现代化国家的这种独特特征无情地表现在以下的困境中：尖锐地意识到贫困、艰难和低水平的生活，是群众各种愿望不断增高的一场革命，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央政权提供物质财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这些中央政权却由于虚弱的经济和工业基础以及缺少可行的制度和文化机制，无法增加物力和财力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些学者认为，欠发达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1）构筑在现代化社会的景象之上的新的期待和希望，

---

① 艾森斯塔特：前引书，第53页。

经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强调而变尖锐了。这些新的期待和希望，在无法急速扩大财富来满足需要的状态下，激起了强烈的改革愿望。

（2）在这些传统社会中，大众的匮乏急速变成大众的要求，而“大众媒介的多方面影响”和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则加快了这一觉醒。

（3）由这种新觉醒而产生的要求被鼓吹得越来越激进，结果一方面导致广大居民想摧毁造成匮乏的现存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导致那些欲对此社会结构作某些修改的人的拚死斗争，他们的修改是按照在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中自己所享份额比其他人增加更快的方式进行的。这就产生了对一种合适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强烈需要，指望这种结构能产生出财富来满足不断增大的需求。

属于第二支派的学者感觉到，由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欠发达社会不能将供给增大到“充足水平，以平衡日益扩大的需求，结果使贫穷产生一种辛辣意味和新的意义，成为影响平稳、渐进、和平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一支派像前一支派一样，也以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正在急速地帮助这些欠发达国家进行现代化。但他们不像前一支派那么乐观，不相信欠发达社会会和平、渐进、自动地演化到现代化社会。他们感觉到，欠发达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即“固有的状况”，尽管有这种帮助，也不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速度生产财富。这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烦恼处境，它们不仅仅在自身进行现代化时与发达社会竞赛失利，而且进一步还可能在其国内走向这样一个阶段，即群众日益向中央政权索取财富，由此可能酿成暴乱，从而导致一种可能产

生种种"不由自主"趋向的发展。在这些学者看来，这些贫穷的欠发达的国家拥有的众多人口"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提高基本消费水平，没有余钱去投资"，而人口"爆炸"、都市化和普及教育则加重了这种灾祸，生产中的收益，一经取得便全部花光，而且花费往往比取得还快。

这派学者不像前一派，他们给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设想了一幅暗淡悲观的图景。事实上，他们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挫折极为关切。

但无论这两支派学者在现代化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分歧，标志其方法的假设却是一致的。这些假设使他们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下面我要简要地谈谈这些假设。

1. 这两个支派的学者都将美国和西欧高度发达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将它作为表明现代化的特定组成因素的模式(或参照系)，最终为欠发达社会所效法。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组成因素被假定为现代化的理想型式的必备因素。

2. 这些学者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基本上意在描述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广阔框架内的社会中所发生的转变过程和转变方式，这种资本主义方式有时称为"自由企业经济"或"自由经济"。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社会"一词所带有的污垢，现在已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术语，如："开放社会"、"特殊社会"、"自由社会"、"有活力的社会"、"进取的社会"、"世俗社会"，等等，用来称呼资本主义社会，突出这个社会中的某一过程。很少学者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上所说不同名称的社会的共同基础。

研究现代化过程的学者，无论是以西方高度发达的新资

本主义社会为对象，还是以独立后采取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那部分欠发达社会为对象，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现代化过程从基本上加以概括的。这些学者也试图在有限的研究范围内炮制出普遍规律。俄国十月革命后那些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采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变形的和非常规的形态，从而认为不值得加以考察或分析，或浅尝辄止，或略说几句肤浅的评语便丢在一旁。这种客观存在的漠视态度，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亲西方偏见，甚至是不愿将大陆中国、东欧国家、北朝鲜、北越、古巴等直到不久前还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同其他欠发达国家一样，包括在自己的考察范围（许多人甚至连苏联也不愿考察），这种漠视态度是有重要意义、值得加以注意的。这些国家也在按照性质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进行现代化，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估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的利润，并在社会阶层的划分和财富分配上精心制定一种性质上不同的原则。如果忽视对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进行的从欠发达向发达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作科学分析，不把它们的成就和不足同沿着资本主义路线作同样现代化努力的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较，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将使学者们失去极其重要的丰富的研究领域。

现在是学者们坦率地承认现代化过程有两种路线的时候了。正如彼得·沃斯利正确指出的，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资本家和地

主阶级不再作为主导力量。

我认为根据两条道路划分现代化，将有助于我们区别各个国家进行的实质过程的不同性质，也有助于我们恰当地评价正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紧张和压迫。它还将使我们能够去掉在选择不同单位进行比较时经常出现的谬误。按不同道路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不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简单地进行相互比较。

我将通过讨论如何由于不能或不愿承认两种性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造成的现代化概念的混乱，以阐明我的观点。

这两条道路在某些过程上具有共同性。如：它们都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动员"的过程；两者都试图将社会结构从以赋属型角色为基础转变为以成就型角色为基础；两者都按照基于广泛性和专一性原则的角色专业化原则而进行结构上的区分；两者都力图从以人力、畜力为基础的维持生存型生产经济转变为以蒸汽、电力、原子能等非生物力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两者都精心制定了工业化计划，将第一产业占突出地位的经济转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两者都进行着都市化过程；两者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大规模组织，以协调建立在法律与理性的权威体制上的复杂而又扩大了范围的种种关系；两者都将政治统治权的认可由超世俗的转为现世的，从而转变了传统的政治支系统，使之对人民负责；两者都致力于建立中央机构，为经济增长、都市化、工业化和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提供一个框架；两者都企图树立法律高于其他管理系统的无上权威；两者都懂得知识与科学的作用，承认正规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化过程中极其重要成分的意义。

尽管有以上这些相似之处，但在现代化过程中采取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些截然不同之点。以下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把私人企业家和资本家作为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整个社会结构的轴心；而非资本主义道路现代化正相反，它将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清除，将公有制作为已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轴心。这两种方法在社会组织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

2、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把利润归于“自由企业家”作为生产的中心目标，也采取以机器动力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但是为市场而生产的，通过“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来运作。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则把满足社会的估计的需要作为生产的中心目的，它也采取以机器动力为基础的大量生产，但不是为无名市场，而是按估计的需要制定中央计划而进行生产的。

3．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精心制定社会阶层的划分，其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出卖劳动力的阶级之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并被永久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始终是决定财富分配、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及消闲活动的极为重要、根深蒂固的分层特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以根除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阶级为基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新的分层原则，将各社会群体按技艺的不同转变为各种各样技术工种和非技术工种的阶层。这种分层原则从性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原则。这种关键性的差异时常被忘记，导致现代化研究中的巨大混乱。

4．资本主义路线为了持续增长所采取的基本方略，依靠的是优先给资本家阶级提供刺激，给予积极帮助，制定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措施，以造成适当的气候，使资本家阶级得以加强自身并投资于经济成长过程。政权要努力去创造或维持一个基本上有助于这一阶级成长的法律和社会结构，想方设法控制所有妨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并可能削弱企业家阶级的力量。相反，按非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的国家为持续增长而采用的方略，基本上是靠消灭资本家阶级，依靠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依靠制定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措施；依靠给人口中那部分没有产业、辛勤劳动的人提供刺激，动员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加快资本家阶级及其社会、文化的权力中心的消失。欠发达社会中的这些方略具有强烈而又明显的特点。企图按非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的各个社会的政治当局，将设法创造和巩固一个法律和社会结构来否定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并强行控制所有可能帮助资本家阶级的力量，控制他们所拥有和掌握的生产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无论它采取什么方式，民主的、半民主的、专制的、极权的，还是独裁的，本质上都变为维持以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强制性机构，成为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自觉的代理人。而按非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的社会，其国家政权无论属于何种政体，本质上都成为维护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上的社会秩序的强制性机构，成为消灭资本家阶级、按非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现代化的主要代理人。

我认为，在那些不区分国家性质和政府形式的学者中存在巨大的思想混乱。国家的性质表现在它所支持和发展的财产结构的形式，例如，一个沿资本主义路线发展的国家，它的政

府可以是君主制、寡头制、独裁制、民主制、联邦制或单一制。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台湾①或南朝鲜，政体可能不同，但在国家的实质上，它们都是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作为生产方式的。

5．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把工作、教育、医疗机构及其他一些社会福利设施当作被购买的商品，它们的可行性依赖于公民的购买力和社会的市场状况。虽然国家可以干预这个市场，并设法使这类设施的一部分供消费者免费或按优惠条件享用，无论其购买力如何。但是，由于政府侵犯市场的种种规定，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各种设施基本上仍然是商品。非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则主张工作、教育、医疗机构及其他一些福利设施原本就是社会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而提供给公民享受的。这种对诸如教育、医疗机构和工作的服务所抱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供应这些需求的机构组织的不同类型，也决定了为公民提供的这类服务的范围和性质。

我认为上述例子足以说明，如果我们要避免在现代化研究中出现混乱，那么区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明显的不同是非常紧迫的。这种区分也关系到我们对欠发达社会在进行现代化时所经历的各类紧张与压迫作出恰当的估计。它还将帮助我们正确地估价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企图实现现代化的欠发达社会将会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模式，这取决于它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按类型学对欠发达国家的

---

① 应为我国台湾省，下同。——译者

现代化作更有系统、更有条理、更客观的研究，现在正当其时。

"第三世界"在过去二十二年中试图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来使自己现代化。在50年代对这种发展道路持乐观态度的一批学者，渐渐对此产生了怀疑，并且还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预见到非常暗淡的前景。冈纳·米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范农的《地球上不幸的人》、彼得·沃斯利的《第三世界》、霍罗威茨对第三世界二十年来发展的研究，以及像冈达·弗兰克对拉丁美洲"欠发展的发展"所作调查的结果，像艾森斯塔特等社会学家所作的研究，都表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将它们引向一个特殊的"不由自主的"趋势，也就是"现代化的中断"。沃特海姆教授总结了这一严酷的困境，提出这个重要问题："欠发达国家能自己实现现代化吗？能依靠'与强者打赌'的策略冲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吗？"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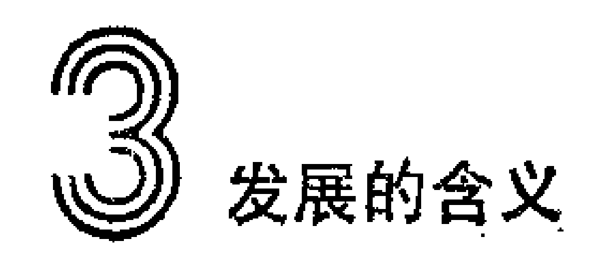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至关重要的难题。

按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不会在欠发达国家导致一步进一步的爆炸性景况吗？学者们难道不应该清楚地区分按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和按非资本主义路线现代化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一番有系统的考察吗？他们难道不应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欠发达社会所遭受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现代化冲击，进行更有系统的检验吗？

（王红生译自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自由出版社，1976年英文版。）

---

① W·F·沃特海姆，《东西平行，探讨现代亚洲的社会学方法》（范赫韦出版公司，1964年），第12章。



发展的含义

[英国]杜德利·西尔斯①

为什么我们把发展同经济增长混为一谈呢?毫无疑问,人们不好仅仅因为一套计划包含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就说它所描述的景况比另一套计划所显示的前景更可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南非比加纳更为发达,或者科威特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旧名。——译者)、或美国比瑞典更为发达呢?

一种解释是:国民收入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指标。政治家们觉得一个单一的综合性标准是有用的,特别是一种至少过时一年的标准。提供给经济学家的是一种可以量化的变项,其变动是可以分析成部门产量、因素份额或开支项目上的种种变化,从而使建立模型成为可能。

我们当然也可以借助于下列假设:国民收入的增长如果足够快速的话,迟早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过去十年的经验使这种信念显得相当幼稚。不少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发生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动乱。更有甚者,我们可以看

到，这些问题不仅折磨了经济停滞的国家，而且也折磨了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国家。事实上，似乎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上的困难，而且某些类型的增长实际上会引起这些困难。

既然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变得日益明显，那么在事实面前，这样继续迷恋于使用单一的综合指标便具有了另外一种形象。它开始显得是宁愿回避现实的发展问题了。

发展的定义

在讨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一词周围的迷雾，并更准确地界定它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设计出富有意义的目标或指标，从而有助于改进国内或国际政策。

出发点是，我们不能回避那些实证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词。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是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这类判断源于何处呢？传统的回答是从政府那里获取我们的价值。对此廷杰本是接受的，并用于他的经济计划系统。但政府必然持有相当短期的观念，在某些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置将来于不顾。更为严重的是，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定义，某些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障碍，而这一点一旦获得承认，那么我们从哪里去找用以衡量政府目标的尺度呢？即使假设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忠实地代表了民意，这些民意也是内源于

①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

发展过程，因而不能提供衡量发展的手段。

另一个方法是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含有将其他国家的现状作为奋斗目标的意思。比如说，从某种国际横截面分析，或者从与某工业国家的经验相符的函数中取得协同因数，此时实际上就是模式建造者在做上述的工作。但现在即使富裕国家在外部世界看来可以真正成为合适的模式，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某些方面，比如它们的消费水平，似乎令人羡慕，但这些方面是同诸如都市无秩序扩张、广告压力、空气污染和长期紧张等弊端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不可分割的。此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便愿意跟踪工业国家的历史，但能否做到绝非显而易见，甚至没有可能。

如果从政治上或历史上找不到评价方法，这是否意味着只能采用我们各人自己的一套评价方法呢？幸好没有这个必要。只要我们问自己：达到普遍接受的目标——实现人类个性潜能，其必要条件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评价方法肯定就在我们面前了。

如果我们问一下评价中绝对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足够的食物。一个人处在某些营养水平以下时，不仅体力不足、健康不佳，甚至不会对食物以外的诸多事物感兴趣。他不可能显著地超越动物的生存状态。儿童营养不良，其结果可能不仅对身体而且还对心理造成持久的损害。

由于食物有价格，所以在任何国家其评价标准都可以用收入水平来表示。这使得我们能够把其他某些最低限度的需求也考虑进去。人们不会把所有的钱（或精力）都花到食物上，不管他们多么贫穷。一个人要能把肚子填饱，他的收入还必

须能解决衣服、鞋袜和住所的基本需要。

不过我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谈论消费需要；我所谈的是购买有形必需品的能力。

彼得·汤森和其他一些支持“相对的”贫困概念的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凡是不能参加各种活动并享有该社会习惯上的生活条件和乐趣的人，就是穷人。对这些活动和习惯，必须根据经验加以描述。它们除了食物和衣着的习惯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比如在英国，包括为儿童举行的生日晚会、夏季假日和夜间外出等事项。这个把社会剥夺当作贫困的概念，意味着贫困的标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提高，而在实际上贫困永远不会消除，除非或许会进行非常平均的收入分配。不过，一个人眼看自己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终身处于身体和心理上的低劣状态，或无钱通过输血来挽救其妻子的生命，这同花不起钱为孩子的晚会买蛋糕或带妻子去看电影相比，无疑是不同类型的一种贫困。

我所断言的是，当一个人达不到在某种意义上为家庭提供“足够”食物的水平时，收入的边际效用要比超过这个水平时大得多。这当然是一个旧观点，且会引起很多概念和衡量上的问题，对此我在下文将再予讨论。但在任何一个存在着严重的贫困状态的地方，对发展采取规范性的研究方法意味着探讨这种通用形式的实际效用。我认为采用这个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工作。称其为基本的必要条件，是因为没有它个性就不能发展。它不一定指有报酬的就业；它可以包括看书学习，在家庭农场劳动，或者操持家务。但若不担当任何这类公认的任务，亦即长期依赖另一个人的生产能

力——即使为了糊口——总是同一个年富力强的成年人的自尊心不能相容的，尤其是对于在学校里，也许是在大学里读书多年准备在经济生活上有所作为的人更是如此。

贫困和失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收入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确凿无疑的。不过，正如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所显示的那样，要减少贫困或失业，即使人均收入的高速度增长也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某些增长过程容易带来或在某种意义上导致失业的增长。①

人均收入和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数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收入的分配。不言自明，如果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来收入集中程度的降低，那么消除贫困的速度就会快得多。不过，在我看来，平等本身应该看作一个目标，看作发展的第三个因素。以任何宗教的或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不平等，特别是在有大量贫困现象的第三世界中所发现的不平等，都应是引起人们反对的。不平等社会中的社会障碍和限制，不但扭曲穷人的个性，同样也扭曲高收入者的个性。口音、语言、服装、习俗等方面的细小差别，带来了一种荒唐的重要性，并且使在社会上缺乏体面的人遭受轻视，尤其是农村居民。由于种族通常同收入紧密关联，所以经济不平等便处于种族紧张关系的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还同其他不平等互相关联，特别是在教育和政治权力方面，后者又加剧了收入的不均。

因此，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

---

① 因此，在特立尼达，1953至1968年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平均每年达5%以上，而显性失业率则持续增长，达到劳动力的10%以上。

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倘若这三个中心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度提高。这方法当然也适用于将来。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①

当然，人类潜能的充分体现，还需要很多难以包括在这些术语之内的条件。我不能详述所有其他的条件，但若对它们一点也不提及，那本文就会显得非常片面了。这些条件包括适当的教育水平（特别是识字），参与政治事务，并属于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真正独立的民族。独立的意思是指别国政府的观点不能广泛地预先决定本国政府的决策。

随着营养不良、失业和不平等现象的减少，这些教育上和政治上的要求便成了日益重要的发展目标。再往后，摆脱压制性的性道德标准，免除噪音和污染的侵袭，便成了主要的目标。②但这些目标不应超越基本经济的优先地位，至少对有大批营养不良儿童的真正穷国来说是如此。如果饥饿、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很显著并且日趋严重，或者即使这些情况并未减少，那么，一个政府就很难仅仅因为扩充其教育制度或建立其

---

① 例如，假设一个远景计划具体规定，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巴西的人均收入翻一番，但在分配或失业比例上没有变化。那么，到本世纪结束时，马托格罗索的一个大地主可以从拥有两辆轿车变为拥有四辆，同时东北部的一个农民每年能吃到的肉从一公斤变为两公斤。他的儿子也许依旧失业。对此我们真的能称之为“发展”吗？

② 即使就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属于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使用国民收入作为一项指标的办法，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比如米申就以忽视环境上的代价为理由而对此提出挑战。

政治秩序，或规定机器噪音的限制，就声称是在"发展"一个国家。确实，即使我们对这种声称初听之下并不认为有什么可疑，我们也会怀疑在上述情形下政治秩序的可靠性；从另一方面说来，某些政治格局很可能同发展是不相容的。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我必须说明，国民收入不能因为它不宜作为发展指标而成为完全没有意义。它作为衡量发展潜力的一种尺度，还是具有若干意义的。假设有两个国家，以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一个十年期，在此十年中，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得比另一个国家快速，但前者的收入增长完全落入富人手里了，同时由于增长的原因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所以失业率没有变化；而在后者，增长速度较慢，但失业率却降低了，因而从中受益的是最贫穷的阶级。这一来，根据我的标准，虽然那个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发展程度最差，事实上根本没有发展，但它获得了以后发展的更大潜力。

首先，可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份额越大，财政制度就能越快带来发展。此外，快速增长率意味着更大的储蓄能力，由此可在将来更容易地带来真正的发展。事实上，增长速度较高的国家很可能已拥有较高的人均投资水平；如果这种投资用在能提高食品生产、提供更多农村就业机会的农业计划项目上，或用于农村的学校，那么对未来而言，真正的发展便已初露端倪了。①

---

① 在一篇有趣的论文"论发展速度的衡量"中，迪瓦夏和巴特根据诸如资本和技术等根本性要素的投入，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发展潜力指标（不过它被令人误解地写成"发展速度"的衡量手段）。这个指标的动向可以预示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印度的指标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显示了比实际的国民收入高一倍的增长率。不过，它当然并不意味着增长的潜力将会释放出来，更不用说发展了。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经济增长对穷国来说是减少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其发展潜力的发挥取决于政策。一个经济增长缓慢或微不足道的国家也许正忙于重建它的政治制度，以便经济增长到来的时候能由此带来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一个目前增长快速，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的国家。例如，比较一下古巴和巴西两国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这段时间内的情况将是很有趣的。

社会科学中优先考虑的现象

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抵制在知识上将国民收入当作发展尺度的强烈诱惑。

大约到1950年，工业国家的重大经济问题大都得到控制。失业现象已降低到历史上很低的水平；绝对贫困，按我使用该词的意义而言，业已基本消灭；税收和教育上的进步已经减少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虽然尚存的不平等现象有许多同种族有关，但在那时种族并不是重大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且基本上为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所忽略。

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已经通过多种途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经受住了它们在19世纪所遇到过的挑战。一个原因当然是它们从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权力中获得了益处——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讨论。但另一个原因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家如布斯、汤特里、博伊德奥、韦伯夫妇、凯恩斯、贝弗里奇和托尼将注意力尖锐地集中到了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上（我希望在选择英国人作例子时不至于显得民族

主义气息太重；这些人名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皮古，都将更大范围的平等看成是一个显然可取的目标。

不过，随着那些重大问题的缓解，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专业技术的创新上。只要他们对时事保持兴趣，他们所关心的就主要是作为整体的民族的进步。国民收入似乎可以用作比较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或编制一个国际名次表的理想标准。此外，国民收入保持了预示就业水平的作用——在经济部门多样化和劳动力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国民收入重大的短期变化便同就业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看到，即使在工业国家，基本的经济问题尚未真正得到解决。它们的社会科学家，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已在重新讨论它们自身的贫困问题。此外，失业率最近已见上升，而不平等现象也很有可能更为严重。

但在第三世界国家，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未见得以消除的端倪。用三大经济标准中任何一个标准来衡量，直到1950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从那以后，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即使其绝对数字并未降低，在比例上肯定有所减少。但弗朗西斯·凯佩尔最近估计，全世界每十名儿童中有七名"患有因蛋白质长期供养不足而引起的典型症状——神情呆滞，转而降低学习潜力"；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印度，此项比例一定高得多。从有数据可查的一些国家来看，失业率似乎已经上升。尽管资料数据少得可怜，但大多数国家中的不平等现象大概并未减少；许多国家还可能变得更严重了。A·J·杰菲就五个拉丁美洲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关于这五个国家的其他类似研究)所写的一篇文章(1969年)总

结说，也许除墨西哥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显示有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有数据可用，我们甚至有可能发现经济增长同失业率的上升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增长同发展就成了负相关的了。即便不是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丝毫不像人们曾经相信的那样简单。

概念上和测量上的问题

对于国民收入有一种辩辞，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指标。然而事实上它包含有很多价值内容：每种产品和服务都经指定具有其特定的加权值（许多为零）。它主要为市场力量所决定，而市场力量则反映国家的收入分配。此外，政府的政策，例如通过控制手段促进进口替代，常常把奢侈品的价格提得比必需品高得多。这些政策的订立，往往有平等主义的理由，但其结果却是荒谬的，因为在估计经济增长率时，奢侈品生产增加所占的份额竟比工业国家高得多。①这种政策的荒谬结果可能是：在一个贫困现象严重的国家里，一辆小汽车值十吨以上的大米。

估算或使用国民收入，还包含着一系列的判断，即所应涵盖的是些什么活动——什么是相对于“中间”产品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在本质上被认为没有价值，生产中间产品的原因仅仅是它们使生产更加合乎需要的其他产品成为可

① 此外，对奢侈品的各种间接税收相对说来是沉重的，因而当市场价格被用作加权值时，这些倾斜就特别严重。

能。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打算最大限度地从事什么活动？——这个问题库兹涅茨曾经提出过，现在又由萨米茨提了出来。① 分配问题也可以用这类提法提出来——专业阶层所用的奢侈品，是为真正居大多数的穷人提高收入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吗？

还有人替国民收入作为一种发展指标的观点争辩说，它至少可以用数量表示。可是所有这些国民收入帐目的庞大报表实际上有什么价值呢？就第三世界而言，应当包括在国民收入统计中的许多内容，实际上却是在官方统计范围之外的。这首先是指家庭食品、甚至是主食品的产量，不要说通常称为"市场园艺"（美国的"蔬菜农业"）的次要作物，也不要说鱼类、山珍等了。第二，我们对乡村中农业社区自身所进行的建筑活动所知甚少；如果我们不仅将建造房屋的费用，而且也将开垦土地、打井挖沟、构筑篱栅等开支都计算进去，那么这项支出数字显然是很大的。第三，关于家务劳动和其他个人劳务，实际上没有基本数据，甚至有酬劳务也没有数字统计。

我在大约二十个国家里考查过工作记录单，无可掩饰的事实真相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计算库存变化和折旧以及对时价数据扣去通货膨胀值的种种困难，那么，就许多国家而言，其所发表的国民收入系列报告是同经济现实几乎毫不相干

① 例如，去工作时的旅行，真的像国民收入估算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项终极产品吗（特别是乘大都市地铁的旅行！）？国民收入未能将环境破坏的代价算进去，即它未能成为本来意义上充分"纯粹"的概念，此情况目前在工业国家里提出了另外的一些问题。

的。①

也许可以这样说，有些称作国民收入系列报告的资料至少还是有用的，尽管其中关于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的数据非常零碎。不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估算可能性方面的基本差别，而是在于对发展所抱的态度。数据收集的类型反映出了优先考虑的事物。统计机关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一部分取决于本国政府的要求，一部分取决于来自联合国各个部门、特别是联合国统计局的建议。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各处统计机关将较少重视国民收入，而较多重视制订合适的社会指标。②

我不否认在发展指标方面也存在着概念上的问题。确定贫困标准，或者甚至确定最低营养标准，其困难是人所共知的。③

但我们不必放弃努力。例如在印度，当一个正式的贫困线被确定之后，据此对收入低于规定贫困线者所占比例作出的估计，不是没有意义的。④ 无论怎样粗糙，这类估计作为衡

---

① 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向上的倾向。官方统计数字所列，包括在国民收入之内的产量数额倾向于上升，其原因一部分是产量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经过了有组织的商行之手，这部分更便于为官方统计所列入；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数据的收集工作普遍地有了改进。

② 联合国统计局的“收入分配、开支和福利统计的补充制度”是个有用的起点。

③ 印度已就贫困线问题开展了许多工作。丰塞卡在《印度以需要为基础的工资收入：计算机估算》中，对印度的各种贫困线作了讨论。

④ 不过，请参阅明哈斯和巴德汉的两篇有趣的论文。它们表明，即便使用同一个贫困标准（1962年由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向计划代表团提出的），人们通过使用消费数据的不同资料、对价格变化的不同补贴，以及不同的插值程序，可以对低于贫困线的比例有何发展趋势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量某一时期发展程度的尺度，还是具有若干意义的——毫无疑问，这种比较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已。

还有其他一些衡量贫困的著名方式，我在这里只能略加提及。一个是婴儿死亡率（不过它特别反映出医疗服务的有效程度，也反映出饮食、住房等条件）。有关蛋白质消费量和营养不良症如佝偻病等的发生率的数据，同儿童的身高和体重一样，是进一步衡量发展的线索。① 不过，它们只是线索，并且，如果用它们来对遗传血统、饮食习惯等迥然不同的民族进行比较，很有可能会将人引入歧途。

在非工业社会中，失业当然是众所周知难以作出定义的。而我们若想弄清任何一个国家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性质，弄清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则需要通过部门、地区、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去了解更多的细节。②

不平等可以用多种方法进行测量——根据规模、种族、地区，或者根据因素份额。所有这些方法各有其适合不同目的的用途，同时当然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个重要方面它们都有

① 可以将几个指标结合在一起，以使我们了解某一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状态的大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已就此在日内瓦进行了试验。事实上，他们已经更进一步，创造出一个试验性的“发展指标”，是各种系列的加权平均数。该研究所对许多社团的调查很有趣，也有所收获。不过，我们不应落入到将该指标当作“规范”的陷阱中（尽管该研究所所长对此提出了告诫，但我们还是可能会陷进去的）。它仅仅是衡量了一个国家在一条道路上的前进程度，这道路是由处于不同进步状态的许多国家的资料所表示的。见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编《研究报告》第2号（1969年7月）。

② 参阅国际劳工组织编写的《走向充分就业》（日内瓦，1970年）。有一个观点认为，对失业的衡量多半取决于某人关心该问题的哪一个方面——失业是作为个人失意、低收入还是产量损失的原因。

局限性，即除收入不同外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根源，不平等还取决于是否能得到比如健康方面的公共服务（这在进行城乡比较时尤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在发展个性的能力上，甚至在发表言论的能力上，政治权力可能极大地影响人们之间的不平等。

甚至收入的集中程度也可以用许多方法进行测量。如果有人想得到单独的一个测量方法，那么源于洛伦兹曲线的基尼系数（显示收款人按渐增比例所得到的比例渐增的收入）大概还是最有用的，无论是对收入还是对财富来说均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的主要是作为贫困原因之一的不平等现象，那么一个更有意义的测量方法也许是表明（比如说）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人口占中间阶层收入的百分比（根据哈罗德·利多尔最近一项研究中的通用方法）。① 说到底，我们对位于收入阶梯上半部分的人内部有何变化，不是十分感兴趣的。

对于教育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指标，我只能简略提一下。就由正规教育制度所提供的教育（人们对此颇有争议）而言，指标的主要来源当然是各级教育上的投入和产出。理查德·乔利已经研究出一种技术，可将投入和产出结合在一张显示某一时期趋势的图表上。

政治目标实现程度的测量，当然要困难得多。可能利用的线索有政治犯或准政治犯的人数，还有议会、企业董事会、高级公务管理部门等机构，以及享受中高等教育者的社会和种族成份。

较为通用的、反映政治和其他影响的福利指标，包括每百

①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推崇的帕里多系数明显地限用于衡量较高收入的分配。

万人中暴力罪、自杀、酗酒和各种类型吸毒行为的发生率。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处理报告内容不同标准所带来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标准，是由定义(如什么人是酗酒者?)有分歧和包括范围(例如警方记录死亡登记等等的完整性)有差异而产生的。解释则更进一步引起问题。因此，农村中的暴力行为是应看作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或忌妒心理的反映呢，还是应看作取得合乎需要的社会变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有关民族独立程度的线索有：交易收据中资金流入的比例、从国外进口的资本货物(或中间产品)供应的比例、外国人所拥有的资产——特别是地下资产所占的比例，以及一个贸易伙伴支配援助和贸易方式的程度。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定性指标，比如外国军事基地和飞越领空权的存在，以及该国听从联合国中某一大国指挥的程度。

指标间的相容性

本节提出衡量和比较不同指标的问题，是个重要的指标问题。要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指明不同指标之间可能产生的某些重大不一致情况以及这些情况的严重性，也许是有用的。

从表面上看来，在三个主要指标之间存在着牢固的互为因果关系。任何一个指标的发展都意味着或有助于另一个或另两个指标的发展，甚至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减少失业便是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当然可以减少贫困，假使其余情况均相同。

但其余情况都是相同的吗?收入集中程度的降低是不是

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增长从长远看来是消灭贫困的一个必要条件。较低的增长速度会妨碍就业前景吗？有一个著名的并且确实是经典性的论点认为，不平等带来储蓄和刺激，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我发现，认为储蓄的需要是不平等的合理依据这个论点，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不能令人信服。恰恰就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里，储蓄倾向从根本上说来是非常弱的。与此相反，在收入集中程度较低的一些工业国家里，储蓄倾向则要强得多。当然，储蓄也要受到绝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但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必须部分地依据一个不平等社会的高消费标准。

此外，大多数国家中的富人往往不仅极度倾向于花钱，而且极度倾向于把钱花在须付许多外汇的商品或服务上，而对外汇奇缺的国家来说，这是对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确实，进口要求可以用行政管理手段加以限制，但这又导致精心创设一套官僚机构，这种机构花钱很多，特别是在有价值的组织能力上；而在有些国家，则官僚机构内部充斥着腐败。事实上，进口控制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一种受到保护并获利很高的当地工业，而它本身却又深切依赖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因此为支付利润、利息、专利权税、许可证费和各种服务费用而将大量金钱汇往国外。① 不管怎样，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储蓄往往流到国外，或用于豪奢的住房和其他对发展或增长较少或没有优先性的投资项目上。

在一个存在着对进步有种族、阶级或种姓障碍的国家，那

① 关于收入高度集中与充分就业的相容性，请参阅国际劳工组织：《走向充分就业》（日内瓦，1970年）。不幸的是，大多数理论著述集中讨论收入分配、储蓄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消费构成所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

种认为只有不平等才能提供必要的刺激的观点，也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然而，我们还不能立刻抛弃这种观点。发挥私人企业家才干的需要，随着不同的经济制度中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差异，但这种需要很低的地方是极少见的。依靠不断增加制成品出口的国家，严重地有赖于有能力打进国际市场的企业家的出现。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进步的农场主的出现。如果没有使平等主义政策作废的大量财政奖赏，这类企业家和农场主会出现吗？在许多国家，公司利润的增高，特别是外国公司，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特征吧？或者我们是在夸大财政刺激的重要性了？其他的非财政奖赏能否部分地取而代之呢？社会刺激能否发展到使人们从事此类任务，而只取得很少或不取个人报酬呢（就像中国和古巴政府试图做到的那样）？

平等的扩大同产量的增加与就业的增多之间的相容性最近因另有一套理由而变得令人生疑了。具有技术专长而为国家所需的那些人，如果其在国内所得仅为国外可得的一个零头，那么他们能否留在国内呢？由于他们的劳动对其他劳动力在工作上具有补足的作用，那么他们的离去将带来多少失业现象？然而如果制止他们离国，对人类福利甚至效率来说，又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严肃的理由对不平等现象同收入与就业机会增多之间的相容性提出疑问。一条理由已暗含在上文对消费构成的讨论中。能否创造出一种制造业以适应一个高度不公正社会中所出现的需求结构（且不考虑这种制造业是否应该创造出来）？如果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有大量财富是代代相传的，因而使那些工资劳动者知道自己的子子孙孙

注定无限期地居于下属地位，那么当政府实行限制工资、并采取其他许多为发展所必需的措施时，它能得到民众的合作吗?或者在减少失业的前景暗淡时，民众会给予合作吗？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能动员民众的力量，并打破那些阻碍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阻碍发展的社会习惯吗？

我并不强自认为，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反映了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比马克思所注意到的严重得多。无论如何，任何答案都必须从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我想说的只是，这类问题在过去常常被忽视了，从而使人们不能理解不平等的破坏性后果。

然而，在短期就业和长期就业之间潜在的矛盾还会产生另一批问题；这一潜在矛盾往往被列成公式，视为就业和增长之间的矛盾。对此最近已有很多讨论。我想说的是，在这里，这矛盾也被夸大了。如果在某一典型性的经济制度中，动员上述一切劳动力而竟不能带来产量的大幅度增长，那毕竟还是令人惊异的。

国际发展

以上所提出的各种标准，在原则上适用于任何一个单位——村庄、省区、国家、洲或世界。让我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简要地论述一下世界发展的指标。有关贫困和就业的同一概念在这里基本上适用，但就不平等而言，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对不同国家的收入进行比较，以此引导富国解决其为对穷国的发展作出贡献而面临的政策问题。

在贫困标准方面业已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自本世纪30年

代以来；世界总人口中低于任何一种生存线的人所占的比例一定已经下降了。但世界上总的显性失业率一定是上升了的。因为第三世界失业现象的出现在数量上一定高于工业国家失业现象的减少。最近几年来，不管怎么说，工业国家的失业率也增高了，因此世界失业率增高的趋势当无疑问（不过把像失业这种具有众多形式的现象所作的全国性统计数字加在一起并没有多少意义）。此外，据西蒙·库兹涅茨和苏伦德拉·帕特尔的论文所说，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富国和穷国之间出现了悬殊的差距；目前规模的不平等完全是个新的现象。

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同一国内部的不平等一样，意味着地位和权力的悬殊，由此毒害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态度。这也在国家一级上意味着种族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这种情况广泛地说来发生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在许多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另外，不平等和消灭贫困之间缺乏相容性，就国际发展来说，比国内发展更为明显。富裕国家的消费习惯，通过许多途径扩散开来，促成了较贫穷国家的失业，也可能减少其经济增长。本来用于富国的技术，转让后带来了相似的结果；现有的技术同世界上的需要变得日益脱钩了。人均收入上不断加大的差距也刺激了“人才外流”，并且使穷国专业技术人员的薪水不断上升。因此，国内和国际的不平等是互相关联的。①

在我们考虑世界局面时，根据上文提出的标准去谈论“发展”是错误的。当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对已经较为富裕的少

① 参见西尔斯：“不平等的转变”（1971年）；及乔利和西尔斯：“人才外流与发展进程”，发表于E·罗宾逊编：《富国和穷国的差距》（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0年）。

数人增长其财富时，我们实际上不能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已经发展了。我以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这个词特别容易使人误解，尤其是在经济不平等和失业现象实际上也许已经加剧的"发展的十年"。("第二个发展的十年"的前景是令人气馁的：60年代的情况再度出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更见严重，这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三方面都是灾难性的，不管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

对国际不平等现象的测量带来了它自身的一系列概念问题。像我这样的平等主义者面对着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如果我们论证说，国民收入对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便削弱了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意义了。然而，我们确实别无选择——要按世界收入分配的规模去表现对贫困的量值，是非常困难的。

更有甚者，在收入的国际比较方面，还存在着特殊的概念问题。生活方式如此不同(除其他情况外，生活方式的不同还影响着由现金交易产生的，因而包括在"收入"范围以内的活动所占的比例)，气候也有差异，在这些情况下，对收入进行比较便没有多大意义。

一个常见的衡量问题是，汇率不宜用作将不同货币形式的收入转换成某种比较标准(例如美元)的手段。有人试图使汇率变得更适合于衡量不同货币的真正购买力，但这些努力遇到了著名的加权问题的阻碍。①

① 尽管此项问题的形式是给一个价格紧缩指数找到正确的支出加权值，但是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却是为量化比较取得价格加权值，而在价格结构如此纷繁多变时(见上文)，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无论何时，要在一个国家的许多地区之间进行比较，都会产生类似的困难(原因在于价格和消费形式上的地理差异)，但严重程度要小得多。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统计学批评得一无是处而掉进人所熟知的陷阱里。有人认为在第一个"发展的十年"中，富国和穷国平均收入的比例从大约12:1上升到15:1，这个论断尽管有种种缺陷（包括另外一个对"富"国下定义的问题），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分析上来说，却都不是毫无内容的。它说明了越来越不恰当的薪金、消费方式和技术对穷国的广泛影响，即加重穷国自身在不平等和失业方面难以处理的问题。

以上评论建议一点，就是需要继续在全世界发展上文所述的次要指标，比如婴儿死亡率、卡路里和蛋白质消费量，以及因贫困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发生率。

国际发展同国内发展一样，当然还有其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即成立了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整个体系。但自那时起，进步是很缓慢的，原因基本上在于富国不愿意限制其主权并接受国际组织的权威。战争的频频爆发有力地说明了缺乏政治进步，这种情况正好解释了整个世界的负发展。

跋：发展的新含义

本文的重新发表，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然而重读此文时，不能不产生一种印象，觉得那是另一个人的手笔。当然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由某个生活在近十年以前的人撰写的，他在多年基本上担任"操作性"的角色之后，最近才重返学术生活。文章的作者对本世纪70年代迅速变化的世界

以及对可能再次改变自己对"发展"所持态度的专业性工作，自然都不曾有先见之明。我将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应该何看待"发展"，从这中间一些岁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其实际意义。

增长与发展

"发展的含义"发表至今似已远不止十年了。发展研究和发展政策制订的共同基础，在1969年时还是非常简单的：为了解决诸如失业之类的社会问题，并取得作为现代国家的体面地位，穷国需要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发展"。事实上，经济增长就是发展：这增长可以借助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援助以及私人资本而加速。如果事实上增长不快，其原因必定在于"障碍"，比如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分配问题通常被撇开在一边："我们在讨论如何分割蛋糕之前，必须把蛋糕做得大些。"为求产生储蓄和提供刺激，不平等(令人遗憾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增长速度足够快，那么收入可以在将来容易地进行重新分配——这确实是会自动发生的。

这个基本上属于新古典主义的范式，在60年代业已开始丧失可信性了。粗略地概括一句："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正在再度出现，人们正在扩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的关注。尽管有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即便在相对的意义上说来，也显然在扩大。即使那些增长速度高的发展中国家，归根到底也没能获得人们所预期和希望的政治地位及社会平等。巴基斯坦是个明显的例子。收入分配显然还是高度集中的，这种情况不

仅发生在非常贫穷的国家，也发生在那些人均收入正接近"欧洲"水平的拉美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手里，并且被用来以越来越严酷的压制手段维护这些好处。即使显性失业率也未下降，而这在政治上是困扰人的，因此人们提出疑问：需要巨大外汇开支的消费方式和伴随着援助和私人投资而来的节省劳力的技术是否合适？

在一些范式已失时效以后，文化上的滞后却保护着它们。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范式相当顽强——事实上它在某些地方依然拥有市场。因为它迎合了许多方面的利益。凡要求掩盖国内种族或社会问题的政府非常愿意接受它。它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援外政策提供了基础（不仅仅在沃尔特·罗斯托手里时是如此）。它给国际和国内机构的计划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并为应被称作"第二个增长的十年"的计划提供了目标。它带来了几乎是难以数计的学术研究项目并刺激了理论家去构造复杂的模型。它对政治立场差异极大的经济主义现代化论者从根本上说来不是不可接受的，包括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范式，它非常简单。

"发展的含义"一文的作者本可以采取这一立场，即认为使用"发展"作为增长的同义语严重贬低了这个词，因而使诚实的人不能再用它，但作者决定提议将这个词重加定义，而不是废弃它，这也许是正确的。"发展"依然包含很多善意和政治力量；此外它已被纳入研究机构及国际国内行政管理部门的名称中去了。所以"发展的含义"一文概括地说，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损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

这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新创的观点。该文应被看成只不过是在专业观点剧烈变化时期的一篇发言。如果它受到了某些注意，部分原因是它提交给了国际开发协会世界大会——而这类会议的一个功能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使非正统的观点合法化。这篇文章似曾显得很惊人：人们一般会问，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再分配与发展

但人们的态度已开始发生变化。在60年代，社会指标的研究工作已经颇具声势。到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根据世界就业计划派出了首批代表团，主要是研究分配问题。随后设计了许多模式，从分配目标中提出政策含义，同时对经济增长和分配或就业目标之间的权衡作了大量的讨论。模式的共同主题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随着增长的再分配”的标题上概括了出来。① 提交报助机构的报告须考虑援助的社会后果，并努力把援助送到最穷的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对计划部门来说，其含义是集中满足限于狭小范围的物质上的“基本需要”；对统计机关来说，则应衡量贫困的影响程度。

然而，上述整个方法已出现了一种不现实的气息。政府（甚至已经接受国际劳工组织综合代表团的那些国家的政府

---

① 牛津，1974年。第一个使用此短语的人为汉斯·辛格。他与理查德·乔利同为赴肯尼亚的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的负责人。该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略被概括成为“从增长到再分配”，后来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和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对此方略作了概述。

——哥伦比亚、斯里兰卡、伊朗、肯尼亚、菲律宾)几乎没有改变分配制度。①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所作的基本设想是:这些国家要这样做,需要有技术上的帮助。另一方面,注重政治利益而不注重技术能力的激进批评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复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像这些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把权力交给别人,特别是交给农村中的穷人呢?②有一些人所了解的含义是:一丘之貉的统治阶级永远将阻碍社会进步,直到这个阶级在适当的时候被一场革命所推翻。

这一来似乎需要有一个更为简单化的政治模式。不过,再分配是否可行的问题仍然使人注意到国内国外的权力来源,而且不仅注意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还注意到文化上的影响。确实,文化的力量显然决定了人们认识其物质需要的方式。特别是精英人物,包括决定和执行政策的那些人,明白决定要享受绝大多数同胞无法企及的消费方式;而建筑师和工程师则几乎同样固执地规定完全不适当的技术。

事实上,"发展的含义"的作者确实谈到了这些文化力量的主要根源。他说(但仅在注释中),人类的需要不纯粹是经济的,"它们包括……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真正独立的国家的公民权"。③他为什么没有看到联系呢?消费模式和生产模

---

① 还有一个赴苏丹的代表团。但现在说它的建议是否也会被束之高阁为时尚早。

② 例如可参阅科林·莱斯的"随增长而进行再分配的政治学"(《发展研究所报告》,第7卷,第2期,1976年),以及理查德·乔利在同一期上所发表的答辩。

③ 同一条注释也指言论自由,同政治独立一样,这也许可列为"基本需要"之一。

式的惯性显然应部分地归因于外部联系。真正的独立不仅仅是内在目标之一，而且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个条件（尽管它本身当然还不是充分条件）。

自力更生和发展

本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确实震撼了传统的范式。它鲜明地揭示了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持续依赖所付出的代价，并强调提出地球在按照旧形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方面能力有限的警告。

对发展的含义进行另一次批判性认识的时机的确成熟了。人们可以——甚至比1969年时更容易地——为“发展”一词被玷污得不能再用的观点作辩护。不过，保留这个词的政治上和体制上的理由依旧适用，而再次使它取得进展的途径则是重新界定它的含义，而不是完全舍弃它。需要补充的核心因素是自力更生——这一点正在被广泛地认识到了。

我们还不太理解自力更生对发展战略的含义是什么。但对经济的某些方面的理解显然是足够了。这些方面包括减少对进口必需品的依赖，特别是基本食品、石油与石油产品、基本设备和专门技术。这不仅涉及有关生产能力的增强，而且还涉及消费方式的改变。收入的再分配是有所帮助的，但也需要用政策来改变既定收入水平上的生活方式——使用税收、价格政策、广告，也许还使用定量供应的方法。在许多国家，自力更生还包括增加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和加强国家控制，特别是对地下资产的控制，并且提高国家同跨国公司谈判的能力。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含义，特别是在文化政策方面。这些

将更多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但作为一条总的准则，我们可以说，除其他方面以外，"发展"现在意味着减少对一个或几个大国的文化依附——即在学校中扩大本国语的使用范围，在电视上播出更多的本地（或邻国）摄制的节目，增加在本国获取高级学位的比例，等等。

根据这一方法，"发展计划"今后将不是把重点放在总体的增长率上，甚或新的分配形式上。关键性的目标将是以下几个方面：（1）主要经济部门的所有制和产量；（2）节约外汇（包括粮油等方面的进口）的消费方式；（3）进行科研和谈判的机构能力；（4）前面提到过的文化目标，依具体的国家而定。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1976年）部分地区反映了这一方法，不过这方法当然已是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发展战略的基础。

当然，把重点放在减少依赖性上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闭关自守。在自力更生的方向上要走多远才是可取或可能的，须看一个国家的大小、位置和自然资源如何；须看它的文化的同质性和它的传统的深厚程度如何；还要看它在经济上为满足作为政治上的最低要求而必须采取的消费方式——至少在短期内——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口外国货物。我所提出的这种发展方略，其关键是不要打破所有的联系，而是要对各类外部影响采取选择性的态度。如果打破所有的联系，那在几乎任何地方都会对社会带来破坏，而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种方略在政治上是否比"随着增长的再分配"更为可行。这种"发展"也会使精英人物失去他们认为对跻身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的大量商品和服务。那么在此过程中，他们仍会愿意合作吗？从根本上说来，对此问题的答案是：

这样一个计划可能在许多国家引起一种似乎比社会道德心更为强大的力量，即民族主义。从许多国家的战时经验看来，民族主义的力量也许更有可能胜过短期的物质利益。

此外，由于再分配政策激起各种抗衡力量，从而往往形成迂回局面，所以朝向自力更生的行动可能成为积累性的。①文化上渐增独立的趋势不仅仅具有直接的经济影响，面且还能使政治领导人有更强烈的动机进一步减少依附性并削弱反对自力更生的内部力量。

发展研究在地理上的扩展

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如果现在"发展"不是基本上同人均收入有关，而且也同分配有关，同时甚至更多地涉及国家同跨国公司进行谈判和处理其技术发明和文化影响的能力，那么，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它。

这个重点转移确实具有关键意义。它使生活在"发达"国家（姑且用这个日益令人误解的联合国术语）的我们去掉家长作风。我们必须停止给别人解决问题的态度；相反，根据这个定义，"发展"把我们所有研究解决共同的世界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却又自相矛盾地牢牢记住国家利益（当然是指长远利益）的人都牵连进去了。此外，把"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大门是要打开的。这一可能性在"发展的

---

① 除非受到外部军事干涉的阻碍（对这一可能性应始终提高警惕，同时需要有足够的防务开支，以使这类干涉付出沉重代价）。

含义"一文中仅仅作了暗示。这一点非常明显地将对欧洲边缘国家如葡萄牙和希腊有好处，而且也差不多显而易见地对意大利和英国有好处。后两个国家正显现出种种"欠发达"国家的典型症状：长期的失业伴随着长期的通货膨胀，因而它们抵制凯恩斯的或货币主义的救治办法。①

用这方法对发展重新定义的简单步骤，因此绝不是纯粹属于语义学的：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个看法。就绝大多数专业研究的目的来说，谈论"第三世界"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和原先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依旧有一些活力，从而使得第三世界的概念还有几年的生命。②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新定义得到公认之前的文化滞后时间似乎特别长。这个新定义除了对并非不起作用的一个政治联盟和巨大的商业利益提出挑战以外，还威胁到"发展研究"这块舒适的学术领地。此外它还更难为援助机构的官员(及院外游说援助的人)所接受。它暗示：他们能够改善世界的主要途径不是增加援助(尽管援助仍是某些国家所需要的)，或者甚至也不是将援助送到社会需要最大的人们手中，而是控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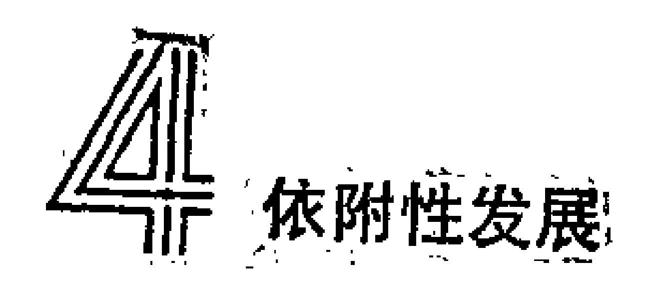
① 参见"北海石油：发展理论的应用"(《发展研究所通讯》第121期，1977年)。这篇文章由苏塞克斯大学1975—1977年硕士、博士生课程的部分师生所撰写。并参见"回到象牙之塔？发展研究的专业化及其向欧洲的扩展"(《发展研究所报告》第9卷，第2期)及《欠发达的欧洲：核心与边缘关系研究》，D·西尔斯、M·L·基尔袭能和B·B·B·夏弗编(哈维斯特出版社，1978年)。

② 参见"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新思考"(《发展研究所报告》，第7卷，第4期，1976年)。一篇修改稿将以"依附的形式"为标题发表于J·维拉米尔所编的《跨国资本主义和民族发展，依附理论研究》一书(哈维斯特出版社，1978年)。

跨国公司的力量，并限制文化上的压力，而跨国公司本身即为文化压力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在这里表述的一些思想，在某些读者看来，可能显得比“发展的含义”一文还要惊人。许多人，特别是老一代的人，将觉得含蓄地怀疑人道主义动机的力量和明显地支持民族主义令人不快（这里包括支持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它不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成了发展的一部分实质）。不过，这个新定义丝毫不会同国际发展协会已经准备就绪的值得称赞的改革相抵触。

（李宏军节译自戴维·莱曼编：《发展理论：四项批评性研究》，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公司，1979年。）



依附性发展

[埃及]盖拉尔·A·阿明[①]

一、消除"差距"

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后称《联合国宣言》）在其开始的一段中

> 庄严宣告，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新秩序将纠正不平等现象，改变现存的不公正状况，使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拉大的差距成为可能，并向现在一代人和今后几代人保证稳步加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和平与正义。……

由此，《联合国宣言》不适当地坚持了把消除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作为第三世界最后目标的那种过于一般化的构想。这样的坚持是不适当的，至少有四点理由。

(1)这样的构想坚持了那种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的观点，即认为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欠发达"国家——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行，把它们之间的差异视为可以化成本质上属于量的区别，而这些区别，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无遗憾地消除。这个观点不言而喻地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型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它还"要求这样的价值观前提，即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欠发达国家树为模式，并当作一个目标而加以接受"(泽尔斯特拉：《援助还是发展？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之问题的意义》，1975年)。

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的倡导者们不同意这样确定欠发达国家的目标，认为那是虚假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相反，他们从多年来由西蒙·库兹涅茨等人和各种形式的发展"阶段论"的批评者们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的前提出发，认为从先进国家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找出一点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可说是恰好相当的情况；即使可能从发展中国家找到某些共同的特点，也不能认为这些特点与发达国家的那些特点具有相关性质。不能认为第三世界只不过是处于一种"低劣"状态，可以用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理解、说明或处理。欠发达状态的历史根源可以参照西方的发展进程来作解释，但没有

① 埃及艾因·舍姆斯大学法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科威特)经济顾问。

理由非要这样来确定其发展目标不可。

（2）对发展中国家的目标认定为消除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认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怀有种种在偶然接触之际不易明见的期望与抱负。第三世界的确存在一种赶上西方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愿望，但它不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大多数人的愿望很少超出清洁的饮用水、更充足的食物与更宽敞的住所。确实希望消除差距的人仅占城市居民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收入水平以及与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使他们能够现实地抱有这样的期望。《联合国宣言》就是这样把小部分人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愿望变成了全体居民的愿望，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要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差距的存在，要么由于他们的需求简单得多，觉得这种差距的存在与自己毫不相干。

（3）为欠发达国家确定的这种目标，如果反复提出坚持不变，必将转移这些国家的注意力，使它们不去追求其他较遥慎然而确有价值的目标；而事实上这种情况看来已经发生了。那些被认为可使差距缩小的措施未必就最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第三世界较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真正改善，可能倒是一点也不会反映到差距的消除上的。不用说所有的再分配措施就属于此类，因为它们对国民收入的数字可能没有任何影响。同样，教育制度中的变化，譬如使学校课程与乡村福利的要求更趋协调，可能不会反映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之中，甚至还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欠发达国家与较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可是，这一变化与单纯的学校入学人数的增加相比，可以更加有益于社会福利，尽管后者是“消除差距”的倡导者们格外垂青的。

（4）最后，将发展中国家的目标确定为消除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就是要发展中国家承担一个它们不可能实现的指标，或者说指标与当前现实相距太远，无法知道该取何种途径才能达到它。

一些作者最近就工业发达国家与欠工业化国家之间生活水准方面的差距作了估算，表述为时间差是：非洲超过两百年，亚洲非共产党国家超过一百五十年。按照1953—1965年的增长率，这两类国家要达到西方现在的发展水平，据说需要一百十年。然而，西方并非在原地踏步，于是差距将继续增大，而用于消除差距的时间因此就必须不断修改了。例如在60年代，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加了约40美元，而工业国则增加了650美元，这样就使欠发达国家的目标推远了610美元。西尔沃于1972年曾作估算，依据欠发达国家的增长情况（主要是在1958—1965年间），假定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那么像印度和突尼斯这类国家，消除其与美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需两百多年；就乌干达、马来西亚和秘鲁来说，需四百多年；而巴基斯坦则不少于一千七百六十年。①

如果选择某种在我们向它前进时它却不断后退的东西作为目标，那确实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假如欠发达国家满足于把自己的目标定为赶上工业国现在的生活水准，那么它们现在的焦虑便可去掉一部分了。又假如它们现在或近期的增长率不是与当代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相比，而是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最初的数十年中所达到的增长率相比，那么欠发达国家

① 就非洲和拉丁美洲两个大陆各自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58—1965年间其人均收入增长率不足3%，所以给出的答案是"没有解决办法"。

现在的惊惧大多也将烟消云散。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47—1972年这段时期内取得了超过3%的平均年增长率，而与此相比，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早期从未有过连续多年的时期获得这样一个增长率；在1900—1950年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达到过3%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便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它们在此期间所获得的平均增长率也不超过3—4%。

但一旦我们摆脱"赶上"发达国家这一目标，似乎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把它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或者它们任何其他时间的收入，当作我们发展方针的指针了。因为，对某些国家来说，似乎只有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生活才算开始，而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全部或人均的产量增长也许还不如修正已有产品的构成或分配来得紧迫。

不过，如果我们不把增加社会福利定为发展战略的目标，那么，提出"消除差距"的口号便不会像上面评论所暗示的那样，显得缺乏意义了。假使坦率地承认该项目标仅仅是要让第三世界结合到国际经济体系，那么这个口号将有意义得多。虽然差距的消除对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但假如目标所在简单地是使他们"西化"，那么这一口号倒是非常中用的。只要第三世界人民尚未完全结合到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该口号便始终有助于培养推进这个结合过程所必需的不满情绪，就像工业国家为促使越来越多的轻信者服从西方消费社会的价值观而培养竞争精神。为了使发展中国家始终羁绊于国际经济竞赛的规则，叫它们瞄准一个足够遥远的目标——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益遥远的目标，也是有用处的。相反，若容许它们独立于西方的理想之外而自

已决定发展目标，那就有失去它们作为国际体系有用附庸的危险。

二、外国援助

根据《联合国宣言》，作为经济秩序的基础的诸原则中，有两条与外国援助有关。其中一条是"由整个国际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的或军事的条件"；另一条是保证"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目标之一将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促进实际资源向它们充分流动。"

《宣言》谈到外国援助必须不附带政治和军事条件，但未谈经济条件，这可以被理解为：《宣言》的起草者们没有以他们关心军事和政治依附的同等程度关心经济依附。然而，不谈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事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外援有一大部分规定须购买施援国的产品，而且这种有制约的援助其比例经常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发展援助评论》中估计，在1966—1968年间，成员国的双边援助总额中，多达75%为有制约的援助，比1964年增长10%。联合王国（英国）对外援助中有2/3的钱花在英国。一份美国官方出版物指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有93%直接花在美国。"联邦德国全部官方援助和日本官方双边贷款的相应比例大约是80%。但是，由于工业国没有努力使自己的出口产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故而这种经济援助上的制约办法势必在应用于受援国的技术的选择上出现偏斜。

《宣言》确实谈到了"由整个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这

或许意味着优先考虑多边援助，而且可以认为，多边援助与双边援助相比，对受援国的经济及政治自由所构成的威胁较小。可是，在一个国际经济关系日益为跨国公司所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可能怀疑，多边援助的增长是否会对受援国应享经济自由在程度上造成很大差异。诚然，多边经济援助与双边援助不同，不会在法律上有在某个特定国家购买货物的制约。但这对跨国公司的商人们无大妨碍——他们控制着遍及全球的子公司网，不管让这家还是那家子公司来交付订货，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区别。

总之，即使外援摆脱了必须用于购买某一国产品的合同义务从而使某些工业国比其他工业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欠发达国家还是会发现，如果光是被允许在一个工业国与另一个工业国的产品之间作选择，那么它们在决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所享经济自由就不会有什么增加，技术上的偏斜也不可能矫正。在一项不合国情的日本技术(容于日本出口产品的)与一项同样不合国情的美国技术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同样，如果美国和德国的消费品都是用以改变第三世界消费者的口味，使之适应西方口味的，那么这两者之间也没有多少差异可言。

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多边援助带有迫使受援国接受一定的技术模式和特定的发展方略的更大危险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用"意向书"向请求援助的政府下达指示，指明该政府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其中几乎一成不变地包含有使贸易和外汇体制自由化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总是极力主张经济稳定与自由贸易，也不管他人有寻求较为均衡的增长和较少不平均分配的要求，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

更加依赖于工业国的生产技术和消费品，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最终在非必要的进口产品上所花的钱竟超出了它们所得到的援助数额。

不利于本土技术发展的偏斜，不仅存在于物质资源转让的关系上，也存在于外国技术援助的关系上。外国专家，不管是计划工作者、工程设计师、可行性研究主持人，还是顾问工程师，他所熟悉的技术自然只是现代西方技术。不管他如何笼统地热衷于提出极为中肯的建议，他总不可能提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况且，他也不大可能长期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问题所在，因此，正当他开始能够提供恰当的建议时，他就被调往另一个国家去了。同时，属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一些专家又受到任意差遣，以至一位埃及的经济学家可能被国际组织派去印度，提供计划咨询，而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则被派去告知埃及政府"意向书"中包含什么内容，两者对于受咨询国家实际上有哪些经济问题都不清楚。

过分地依赖外国援助也会引起经济上与社会上的失衡，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不可能从国外进口一切东西。依仗外国援助，漂亮的校舍可以配备上最为现代化的设备，但国家不可能进口具备下列这种能力的教师——能像该国同胞那样，以该国自己的语言，以对该国历史和文化同等亲切的了解，或以同等程度的忠心，来进行思想交流。教育的扩展如果是靠外国的援助，而不是由本国工业或农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促成的，结果很可能造成人才外流，或引起失业。

过分依赖外援的一个最坏方面是；如果外援持续时间太长，就会使受援国放松动员大量储蓄的工作，遂使该国以自身努力进行发展的能力受到削弱，而外国援助则成了它获取增

长的一个永久性条件。60年代埃及的外援经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1962年埃及国民宪章宣布，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同时提高消费和投资”。这个“难解的等式”——当时人们对此问题这样称谓——事实上自1956年以来由于纳赛尔取得巨额援助成功而轻易地“解决”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埃及政府似乎相信：增强国家获取更多援助的能力不会影响自己增加储蓄的能力，因此如果外援再也不能筹得，所需做的无非就是依赖自己的储蓄。可出现的局面却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事情已经明了：偿还外国贷款本息已经严重地拖累了收支平衡，再不能听之任之；同时外国援助又可能大幅度削减；而政府却已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与社会气候——几乎不可能再去依赖人民或政府自身的储蓄能力了。特权集团的力量已经发展得很强大，到了不得不容许他们的消费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步；劳工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少做工作而多得工资；国家的发展潜力弄到被视为一种国际政治问题，其中秘密只有总统一人才知道。于是埃及别无选择，只得降低其投资率，使之与国家的低储蓄能力相符合。本特·汉森称此过程为“迄今为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经济上最为暗淡的征象”。因此，1956年后出现的高速增长到1963年以后再也不能维持了。1963年衰退开始，到1966—1967年，经济增长率已经大大低于人口的增长率（阿明：

《贫困的现代化：关于九个阿拉伯国家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974年)。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即使能使增长速度加快，也往往扭曲受援国的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使该国更加难以调动自己的资源或者寻得自己的发展道路。提倡以增加外援作为第三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就等于提倡"用较好的两条拐棍治疗脊椎变形"(门德：《从援助到再殖民化：失败的教训》，1973年)。

外国援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使欠发达国家能够发展，而是要使它们的发展做到保证它们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保证它们按工业国的发展需要，持久地参与国际分工。如果抛开对外援作用的这种看法，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施援国凭借其物质和科学方面的实力，没有能够以比金融转输远为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欠发达国家。例如，为什么几乎没有给它们一点援助，用以降低出生率；用以扶持它们内部的经济协调；用以消除邻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从而削减军费；用以制止人才外流；甚或用以削弱那些事实上不能处理发展问题的本地掌权人物的控制？要是真正提供了这类帮助，那么所谓外国援助就有很大一部分将是多余的了，同时施援者的负担也会变得轻一些。

自力更生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倡导到拒绝接受任何数量及任何形式的外来援助。不过，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发展战略服从于可得外援的形式和数量。外援的利用，只应用以填补本国资源的某些欠缺，并应严格地符合本国的先后取舍次序，符合本国在投资分配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最佳选择。尤为重要的是，

在制订国家发展战略时，应考虑逐渐地免除外国援助，而不是将它变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项永久性特征。

三、外国投资与发展战略

欠发达国家现被号召参加的新的国际分工，是与跨国公司日益扩大的作用紧密相联的。可以预料，从现在起不出二十年，大约400—500家跨国公司所创的收益将超过全球所有国家国民收入总和的一半，并将拥有不低于三分之二的全球固定资产。美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系，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国内经济。它们的生产一直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着，即为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在欠发达国家，1966年所有制成品产量中将近三分之一来自外国公司，几乎为此前十年中此项产量增长的一半。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国家间的贸易和资本与人员的国际性流动很快就将变成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内部流动"。

因此，弄清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将使欠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这些公司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战略很可能会强加给这些国家的政府。

自力更生的战略当然不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这种战略的出发点是满足人口中大多数的基本需要。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大多与跨国公司的特殊优势无关，因为它们既不需要先进技术，又不需要高超的管理技能，也不需要大批进口机器。

以进口替代为基础，在欠发达国家制造高级的资本密集型生产资料的发展战略，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也不特别具有吸

引力，因为这种领域恰恰最适合于工业国本身具备各种生产要素的情况。

跨国公司乐意在欠发达国家建立的制造业，主要是那些生产消费品的工业。这些工业较为复杂（因此需要进口技术与管理制度），但又完全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由此使其在这些国家里的生产比在工业国更加有利可图。这类产品受其性质的决定，其需求主要来自高等和中等收入的群体，这些群体一般不超过欠发达国家人口的20%。如果东道国的本地需求量太小，不足以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牟取大规模生产的厚利，那么，子公司就向其他一些国家出口——这些国家需求量或成本条件不利于专门建立为当地供贷的机构——以此补足其收益。由于这个原因，基于促进出口和一个放宽进口与外汇政策的工业化战略就受到了鼓励，因为跨国公司借此可以按低价获得其所需要的机器与零部件，出口剩余产品转移其利润、输回其资金。

跨国公司因此成了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国际分工的首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现在按此分工，不仅出口初级产品，而且也可以出口简单的制成品。

然而，光靠这一变化能否对阻止贸易地位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的趋势有显著效用，还是有疑问的。汉斯·辛格在他的一篇早期重要文章（"投资国与借债国间的赢利分配"，1950年）的续篇中曾指出，在利益分配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贸易商品的物质属性，而是特定种类的技术知识集中于富国手中，而且在这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那种简单

> 的制成品，也具有许多(在我的早期文章里)赋予初级产品的那些特征。……进口替代变换了制造厂的地理位置，但是，由技术进步的片面分布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技术依赖将保证现实的贸易条件继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居间输入的先进国家。

随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而流入的外国投资，对这些国家收支平衡的最初影响显然是积极的，但不能保证它会继续如此。有许多例子表明，向国外汇出的利润与利息和对外国输入货物的付款，比流入的纯资本数额大出好几倍。我们还应仔细区分东道国外汇收入的两类不同的增加，一类是由该国生产力增强所取得的，另一类是由于消耗其自然资源，或仅仅由于跨国公司接收本地资产所造成的。从跨国公司增加该国外汇收入所占的份额中，还应减去那些非必需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或部分价值)——这些非必需的货物与服务是从外国进口的，但假如东道国没有实行跨国公司所要求的自由外汇政策，它们就不会进口。另外，还应减去子公司进口货物的人为加价。价格之所以人为增加，是因为子公司实行了"转移定价"，即将从另一子公司进口货物的价格定得比成本高，以此将利润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

说到跨国公司对发展速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对东道国资本资源所作的净贡献往往远小于它们总投资规模可能使人想见的。这是因为，子公司在为自己的投资筹措资金时，可以依靠当地的财力，而它们的投资或许是以当地公司的衰落为代价的。子公司由于有母公司的实力作支撑，能够成功地展开与当地产业的竞争，以争取稀缺的信贷、熟练的劳动

力和当地的技术人员，结果是许多形似国家实力的增加，其实不过是原有民族工业被外国工业替代了而已。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所作最大贡献是在科技领域。根据联合国那份关于跨国公司的著名报告，跨国公司"有能力将不同种类的经久知识融化为在商业上具有生命力的工序与产品"。①森克尔（"批评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在世界发展中的报告"，1974年）说得好，如果这是跨国公司的善行，那它同样是它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借此

> 把各种资源从最为急需、然而商业上无利可图的地方吸到了最不需要、但在商业上最可能获利的地方——而这些获利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公司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融合的）不同种类的经久知识（并没有被转让与欠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所得到的是）新产品与新工序，而不是开发新产品与新工序的能力。

欠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从跨国公司获得许多东西以发展自己经营企业的能力。它们也许确实能使自己的国民受到新技术的训练，或被派担任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某些要职，但这和让他们获得制订战略决策的经验是两码事——制订战略决策乃是企业管理的精髓所在，可只有总部才有权作此决定。事实上，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与跨国公司的交往表明，跨国公司往往将当地工业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吸收进新的管

---

① 联合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发展中》，纽约，第40页。

理阶层，同时只留下一些次要的活动给独立的企业家去干。

不过，不管我们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所起的作用上有何苛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对增长率所起的作用可能还是积极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外国投资的输入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实际上比增长率与外国援助之间的相关性重要得多①。因此，当我们指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时，我们真正的根据不是它们没有或者不能导致更高的增长率，而是它们往往加强经济与社会的二元性②。

四、跨国公司与收入分配

正如我们已在上文所见，跨国公司对那些能应用由它操纵的技术的工业表现出最强的兴趣。因此，它很不可能涉足那些大部分群众所从事的、并由此获取衣食的活动，例如维持生计的农业、零售业、传统手工业，以及主要使用本地材料的小规模工业。

虽然跨国公司乐于经营的制造工业和加工工业，若与它们在工业国内的活动范围相比，相对来说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但从欠发达国家自身的生产要素具备条件来看，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活动采取资本密集型的方式，仍然远过于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程度。其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是，跨国公司通

---

① G·鲁伯及同事：《发展中的外国私人投资》。

② 或者，如汉斯·辛格(《国际发展的战略：有关落后的经济学论文》，1975年)所言："增长的发动机实际上可能是有效力的，可是车子却被拉到不合要求的方向，或许是朝着悬崖和灾难驶去。"

过其与母公司的关系，能够利用以高度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大量技术研究、专门技能和专利权。另一原因是，跨国公司企图尽可能减少因雇佣一支庞大的外籍劳动大军而带来的政治危险与问题。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投资支出所给予的税收优惠也助长了过度的资本密集。

外国公司实行高度资本密集的做法，带来了远远超出一般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和高于其余经济部门数倍的工资。因此，外国公司能够把东道国的熟练工人、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吸引过来。然而，由于应用技术的性质所限，外国公司对整个就业问题的贡献必然始终是小的。于是，就算总产值每年增长7—8%，就业率也只会增加2—2.5%，但由于人口的增长率经常高于这个数字，所以失业人数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往往上升。巴西、波多黎各、肯尼亚、菲律宾等国家的经历为上述分析的可靠性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

除了由外国公司雇佣的那个小小的精英群体之外，剩余的人口对于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来说简直就毫无用处，只有那收入足以使其成为跨国公司顾客的大约10—20%的人口是例外。虽然在全部消费者中这个比数看起来很小，似乎不足以吸引跨国公司，但应指出，欠发达国家中极为典型的情况是，最上层的10%人口大约获取全部收入的30—40%；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内，即使是这么小的比做也会提供一个相当大的市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与文化上的重大意义的，是要尽量迅速地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消费习惯，以求保证高等和中等收入群体每提高一次收入就有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花在它们的产品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跨国公司能从欠发达国家收入不均的

加剧中捞到好处；还说明了为什么为吸引跨国公司而作出了最大努力的那些国家同时也经历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现象和文化二元性的最强烈趋向。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就巴西在这方西的经历所提供的证词值得援引：

> 巴西的工业生产在历经七年(1961—1967年)相对停滞的时期之后，于这五年(1968—1972年)取得了高速的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的取得，得益于政府的一项成功的政策，即力图吸引跨国公司，并帮助国内已有的跨国公司扩展其分支机构。为了创造一个最能吸引跨国公司的需求形象，政府一直以各种手段引导收入分配过程。其结果，那只试图再现富裕国家消费模式的消费品篮子，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迅速地增大了。

经济学家在讨论收入分配与产品的关系时，一般都过多地注意分配如何影响产量的多少和产品的构成，而较少注意产品的性质如何影响收入的分配。但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那些条件下，特别是在它们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的背景下时，恰恰是跨国公司更为重要。经济学家一般避免对这种关系作认真调查，这往往是因为该课题不能仅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讨，但不能以此为经济学家开脱。不过，若不研究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其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操纵分配，借以确保其产品有足够广大的市场，那就不可能理解在与跨国公司关系密切的欠发达国家中，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变得如此不均。

当涉及就业问题时，经济学家往往这样进行讨论，即为了

生产某一产品，是用资本密集型的方法还是用劳动密集型的方法。当泛泛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时，则含蓄地认为那块“饼”，可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来分切，不管是什么饼。然而，事实却是，收入分配和就业程度基本上是由所产物品的性质预先决定的，因此，产品的构成一经确定，对于如何分配它，其选择范围就十分有限了。说明这种事实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货物与服务根据其所在位置预先决定了它们的消费者是谁。如果你在首都建筑一条道路，那么你在同时就把那些绝不涉足于首都的人全部排除在使用此路者之外了。医疗、住房和教育服务，以及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都属这一类。

另有一些产品与服务，由于缺少消费时所必需的某些辅助性物资，因而将一大批消费者排除在外。例如，所有电器对于无法得到电力供应的农村人口来说一无用处。还有一批产品与服务，因为是适合于满足某些爱好的，需要消费者具有最低限度的教育水平或某种类型的教育，或者干脆有悖于消费者的习俗和传统，也可能把若干消费者排除在外。

所有这一切，适用于消费性物资，也适用于生产性物资——只是对后者倾注更大的力量，因为社会对生产性物资所承担的责任花钱更多，并更持久，因此更难以改变。例如，为通过外贸换取电视机而生产长绒棉，不是一项生产与贸易的单纯行为，它是一项也会使分配发生偏斜的行为。但建造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工厂则对同类的分配偏斜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同样，为对付由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精神紧张而培训精神病医生、或者就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中的种种问题教育一个非洲经济学家，这些都涉及不利于国内大多数人的分配偏斜。当然，对于为了研究一小部分人的问题而花掉的经费，也

可以这样说。

但是，产品类型使分配发生偏斜的最重要途径，是在于要求有个最低限度的收入水平。如果一方面允许跨国公司生产诸如私人小汽车等产品，而漠视公共交通，或者投资于豪华饭店和旅游名胜，而无视农村住房，另一方面却在谈论为照顾低收入群体而有必要重新分配收入，这一切言论不过是空谈。一旦允许这类物品实行生产，则收入分配一定会适应对这些物品的消费。如果那些已经富裕者的需求尚不足吸收这些产品，那么或者将是把价格降下来，或者将对收入再作有利于那些潜在消费者的重新分配。

让我们设想一种局面：从西方输入欠发达国家的进口货物只有食品和最低标准的制成品如简单的服装、鞋类，以及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当地的“精英分子”有何等强烈的欲望想超出其他居民，他们这样做的企图只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种类的足够精美的物品来允许这种出人头地。为使收入不均和社会二元性得以发展，必须使豪华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获取，从而使急于提供这类商品和服务的商人与急于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本地潜在权要人物之间的利益协调得以产生上述结果。

关键不在于这类物品的供用，使这种阶级区分成为可能，而在于这个供用本身就可能是造成这种区分的最重要原因。这类奢侈品受其性质决定，不可能被广泛消费，因为它们需要一个比人均收入高得多的收入水平。它们的广泛消费还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这在穷国从总体上说来通常是不具备的。如果一定要消费这类东西，那就得发展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对于有些人来说，为了取得可能由跨国公司的活动带来的更高增长速度，显著的收入不均和社会与文化的二元性，也许像是应付的一份小小的代价。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份代价可能显得太高了。例如，有人也许认为，“检验发展的真正标准是使得一个国家的落后部分与先进部分相关联相结合的能力，而不是最高人均收入的取得”。

此外，人们可以不赞成以一个国家法律上或地理上的边界作为制订发展战略恰当的参考标架（这正是我们的观点）。因为，假如我们所关注的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看到：几乎每一个欠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不止一个“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人均收入、价值观念和各种期望。因此，人们可以在国内的结合未完成之前，拒绝追求跨国的结合。人们看到人口中一小部分享受着西方文明的成果，确实不会感到满意，甚至会以吃惊态度对待这个过程，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的不是发展，而仅仅是一个日益西化的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乃是当今最强有力的动因。

五、社会福利与第三世界的西化

上述种种，我一直试图说明：（1）穷国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必然在它的社会中导致经济与社会二元性的加剧；（2）选定“消除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作为贫穷社会的目标，只会助长同样的结果；（3）在世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其实际功能乃是将穷国纳入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

现在我想说明，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可以给第三世界国家

带来显著的福利增长的说法，是大有疑问的，即使那些最能承受西方消费水平的国家也是如此。我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一个贫穷社会踏上西化的道路越迟，其内部二元性的危险就越大，其福利的获得，即使是其较高收入的群体所得的，也愈加微不足道，而它在此过程中丧失自身文化特征的危险则更大。

随着发达国家进一步地提高其生产能力，它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越来越琐细，可是价格并未减少，即使对发达国家自己的消费者也是如此。生产日益琐细的趋势，或生产"过失"产品的趋势，就其对分配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说，在发达国家内部可能没有像在穷国那样有害。因为这类产品出自发达国家，其价格通常与这些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较为相称。在这些国家里，借助于一些劝说和推销活动，这类产品不管多么琐细，总可找到足够广阔的市场，虽然也有进一步加剧分配不均的巨大危险。然而，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这类产品的价格与国家的平均收入不成比例，而且基本上缺乏那种适合这类产品消费的文化环境，所以这类产品若是顺利地获得销售，就必然造成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严重的文化二元性。再者，不管这类产品多么琐细，凡与产品的出产同属一个文化环境的消费者，或许能比"欠发达"的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得较大的满足（也许应将因使用这类产品作为地位象征而得到的满足除外）。如果在富裕社会里，提供像电动剃须刀和电动牙刷、防水防震手表、一次成像相机、速溶咖啡以及生日卡、午间报纸或晚间新闻简报等产品与服务，看来可能不过是浪费一点资源的话（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更有益的产品与服务的），那么，一个贫穷社会在尚未满足必要的需求之前，就将这

类产品与服务引进来，这不是被视为滑稽可笑，就是被视为惨无人道。

另有一些产品，在其出产国中可能会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在贫穷社会里，却是什么有益功能都发挥不了的。明显的例子是：电脑引进到一个既没有充分可靠的数据要处理，又甚至不需要什么高度精确的信息的社会；可行性研究用以评估一些凭简单的常识就足以判断其是显有必要还是根本没用的计划项目；在没有仗要打时设置一支以大量经费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

还有其他一些产品，尽管通常被认为是最终消费品，实际上却是富裕社会中生活费用的一部分。例如高速汽车，若车主每天上下班必须驾驶很长的路途，那就属于这一类；再如某些节省劳动力的家用器皿，往往为家庭主妇在外面谋取职业创造条件，也属于这一类。而这些产品对于一个贫穷社会来说却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在那里一个人必须要走的路往往很短，大多数家庭主妇也没有搞什么职业。

富裕社会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既不是消费性物品，也不是生产性物品，而只是一种消费工具。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不仅在生产上，而且也在消费上变得越来越"绕圈子"，很大一部分广告与推销活动都企图使消费者相信这些物品的确是消费上所必需的。电动去皮机和五花八门的厨房小玩意儿、打火机、户外提供饮食及服务、电视、餐盘，等等，都是说明有些产品与服务并不满足新的需求，而仅仅是满足旧需求的新方法的例子——除非我们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求取任何物品的欲望与人的真正满足等同起来。难怪获得这些物品的乐趣在得到后往往立即丧失殆尽。

所以，只有在一个已变得与现代西方社会同样地非常强调个体、惯于放纵、富有竞争性的社会里，许多西方的新奇物品方可成为获取满足的来源。比如，假使一个社会十分看重坚强的家族纽带，看重维护祖父母辈、子女辈和孙儿女辈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大需要用于为年轻人提供单独住宅、或用于减轻他们寂寞感的种种物品与服务。同样，在一个并非惯于放纵的社会里，其成员要求满足每个怪念头与欲望的压力不大，社会也不接受"凡你喜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个信条，因此，这里既不需要、也不期望那些投合每一种奇思遐想的许许多多物品。另外，也不是每个社会都很看重快速的变化或高速的运动；稳定、持续及缓慢的生活节奏，或许在某个社会的价值尺度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因此，除非该社会的价值体系本身有了相应的改变，不然，式样的不断翻新和高速运输工具的引进可能不会对其社会福利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甚至还会减少其福利。要能够"享受"这些物品，该社会必须放弃它既定的价值观念与传统。而如果在这些价值观念尚未放弃之时即引进这些物品，则会加速社会瓦解的过程。

对于许多物品与服务为具有不同价值与看法的两类社会所带来的不同福利效果，我们也可作同样的考虑。不同的价值与看法涉及这些方面：物质的占有、安全感与社会地位的来源、对人与上帝和自然间的关系的态度、教育孩子的"正当"方法；或者涉及：相对地看重及时行乐还是看重先苦后甜，是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还是减轻机械文明所造成的心理紧张。

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对于它认为人类按其自身利益所能进行的消费没有止境的"错误"设想，对于它在实际上将"更多"等同于"更好"，以及对于那种将可能的事物视

为必然可取的倾向，已经有了许多尖锐的批评了。然而，此刻我所要论证的，不是说这些批评有道理（虽然我相信它们是有道理的），而只是说接受这些价值观、设想和思想态度（尽管其有用性和正确性尚可怀疑）乃是“享受”许多西方物质产品的前提条件。但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就没有办法说明，西化中的社会是否由于接受了西方式的物质产品和价值体系而在福利上有了实际的提高。而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把握，那么，花这么大力气试图实现这种转换，就似乎是一项极为“不经济”的活动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一方面认为就个人之间进行福利比较是不合理的，从而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即可以判断收入重新分配后某个人的福利损失是大于还是小于另一个人的福利所得；可另一方面却随时准备建议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去取用一批割裂其整个生活方式的西方商品，想当然地以为该国的福利将因此而得到增加。这里的谬误当然在于忽略了这一事实：西化中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正在改变着其“口味”，而改变口味一经允许，也就无法确定“新”的社会是否境况更好些。

六、发展还是西化？

联合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谈到了“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事业而有集中其全部资源的必要”。然而，我一直在试图表明，《宣言》号召第三世界国家消除它们与工业化国之间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并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而在试图“监督并管理”跨国公司的同时，实际上并不是在要

求第三世界更快的发展，而是在要求它们更快的西化。但我也试图论证，在西化进程中，非西方贫穷社会由于西方商品与价值观大规模的侵入，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的二元性的加剧，总体福利的增加则微不足道，甚至值得怀疑。这看来确实是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出现的情况。将这种情况称为"发展"，把正在这样做的国家指称为"发展中"国家是在荒谬绝伦地误用语言；而对那些抗御强迫性西化的侮辱行为的国家，或者不够迅速地从事这个不足取的任务的国家，竟以"欠发达"国家这个贬义词加以指称，乃是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西方的发展概念就如西方的效率观念一样狭隘和丑恶。若把发展狭隘地定义为产量的增长，是忽视了产量增长的过程，事实上必定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因而不能保证最终结果是良好的。特别是如果产品和增加产品的方法都来源于外国文化的话，则更是如此。所以，建议贫穷社会按西方的样式增加产品，而不考虑必然会产生的社会上与文化上的副作用，其有害性犹如治病时使用某种能治愈这个特定疾病的药物，但在同时又造成新的疾病。在这两种病例上，如果只把效率狭隘地定义为仅指治疗所针对的那个目的，那疗法可以说都是"有效的"。同样道理，如果不考虑到后果上的心理紧张或环境污染，那就可以认为，飞机飞得越快就越有效率，工厂成本越低，而产量越高，也就越有效率。将发展等同于产量的增长，这过错也许起始于"物质"或"经济福利"这个奇怪概念的发明，这个概念后来逐渐等同于"总"福利了。可以打个比方，"经济福利"的概念与"蛋白质健康"一样别扭和容易误解，两个概念都暗示着要割裂某种不可割裂的东西，好在营养学家从未想到引用"蛋白质健康"来指称"身体健康"。

如果"发展"一词按照一般的愿望那样，表达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它就应该用来指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了无可置疑的增加，而不是指产量，也不是指社会中极狭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所发生的情况只是增加社会上层人物消费物质的生产，引起其余人的羡慕心理，甚至在"幸运"的上层人物中也养成不满情绪，给予社会以大批非必需的物品，摧毁历史悠久的传统，又因此种种而摧毁自尊感情，在给予的同时又加以剥夺；而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情况是由于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强制行动而发生，那么，"发展"就不成其为发展，就该换用其他名称了。

用一个大概不那么有奉承意味的名称"现代化"来称呼它，也还是恭维得太多了，因为这个名称必然赋予现代西方的特定经历以一种普遍意义，而这是它所不该得到的。第三世界中业已出现的情况，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即使撞击的后果对被侵入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侵入的文明受其种族中心主义与优越感的驱使，仍用诸如"发展"和"现代化"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后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就被侵入社会本身来说，依从这种习惯用法是可悲的，因为这在道义上完全是个投降的标志。

为表明西化是一种不可取的追求，没有必要否认西方文明有不少可取之处。如果西方文明无一可取，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值得考虑的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衣食所需，为了获得对世界的充分而不是过分的知识，为了抵抗疾病而又不酿成新病，我们的社会是否真的一定要如此大规模地城市化和

污染环境，拥有如此压制性的官僚机构，如此高速地行进，或沉溺于如此多余而无谓的知识之中。

当然，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社会如果听其自处有可能为解决自身问题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另有一部分社会大概做不到。不论怎么说，这一点已成为无关紧要的推测。现在有关紧要的问题是，现行的西化程度即便以前是可取的，继续推进它是否仍然可取；同时，某些真正创新的宝贵机会是否并没有连续错过。

非西方世界在今天提出这些问题，适值西方世界自己正在进行痛苦的反省，并在开始怀疑其自身的优越性、普遍性，甚至怀疑它惯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许多东西是否还有效，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即使在这个事例上像其他许多事例一样，我们依旧在踩西方的脚印，我们唯一可希望的是，这事例将是最后一个事例。

七、结论

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反对当时正在鼓吹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他教导德国人说，不平等的双方在经济交往中一定使一方受益，而使另一方受害。这种"合作"的确可以有利于一个叫做"世界经济"的抽象存在，但不利于这个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

现在《联合国宣言》不问各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如何，又在为所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大唱赞歌了：

发达国家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再也不能彼此

分离了，……在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而且……整个国际社会的繁荣有赖于其各组成部分的繁荣。以发展为目标的国际性合作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和共同职责。

我们认为，这里又是向穷国家不断讲授不相干与不成熟的课程的一个新例子。就如在它们尚未感到劳动力稀缺之前便向它们讲授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重要性，或远在出生率未能降低之前便向它们讲授降低死亡率的技术一样，现在在它们还没有实现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完善之前，却在给它们讲授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了。

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尽管这个劝告在那些过分习惯于国际主义语言的人听来可能感到震惊；而这种语言至今仍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沃尔特·白哲特写道："一切伟大国家都是在私下里秘密筹划起来的。它们是在注意力不受一点分散的情况下构成的。"① 英国和德国这两个较早的例子给人以启示：

正当斯密和关税同盟的早期支持者们建立理论，认为一个对英国开放的自由的世界市场和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内部市场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的国民经济，当时他们的见解是很正确的。可是当今的发展学说

① 见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1947年，第224页。

引述这些早期例子时，或者没有提到，或者没有看到英国和德国在那时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前工业化成熟期了。当时它们城市兴旺、格局已立、身份已定、大学兴盛、经济繁荣……。但由于德意志诸国比英国晚半个世纪达到其前工业化成熟期，它们建立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同样是晚了半个世纪，此时它们才寻求更大的市场，不是因为此时英国已能对付自由贸易的竞争挑战，而是因为它们自己已经到了足够成熟的地步(科尔：《没有援助的发展》,1973年)。

但即使在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业已经历了成功地进行工业化的阶段，而这些阶段并不在于采取自由政策的时候，却是在因形势所迫而处于孤立时期。像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经历就是这样，许多拉美国家的经历，如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和两次大战之间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也是如此。这些国家成功地实行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依赖外国进口或外国援助，这些在当时几乎都是不可能获得的。可以指出，这段时间不是"发达国家的繁荣期"，而是西方经济困难时期与大萧条时期。

我的主要论点，并不是说在这些用作例证的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市场，而不是对外贸易，尽管这也是事实，而是要说，当快速增长并不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时，发展就更加均衡、更少失调。

而如果在过去是这样，那么在现在和将来大概更是这样，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开始争取均衡和合理的发展以及文化复兴在时间上越晚，就越有必要经历一个经济孤立的时期。其

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储蓄和投资由于"示范效应"的缘故而更加难以汇集，而且是因为不同社会间收入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差距越大，要求较贫困社会采取二元性发展模式的压力也越大。对于一个开始提高其平均收入较晚的国家，单纯增加产量可能是较易筹划的，这已由第三世界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中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避免增长的失衡、分配的不均和文化的解体现已变得十分困难，除非这个国家与外国的压力绝缘。

经济孤立当然不是指永久性的孤立，而是指暂时的孤立，即使这一时期拉得很长也是暂时性的，可以持续到这个国家能与协调较好的社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竞争为止。有关初创新兴产业的论点确实不仅应该适用于整个经济领域，而且同样应该适用于文化生活。这个方针也没有意味着完全抵制对外贸易，而只是要扭转国际贸易与发展战略之间现有的关系．恰如我们就外国援助所作的建议，由此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发展目标去决定对外贸易的方式，而不是让外贸方式决定发展目标。

《联合国宣言》谈到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价格与它们的进口品价格之间建立"公正和合理的关系"，"目的在于给它们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贸易条件带来持续的改善，并使世界经济得到发展"，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只有当我们的目标不大，因而使我们满足于交易条件的小小改善时，这才是值得欢迎的；而建立这种条件的本身却是应予反对的。

因此，可以将国际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真正差异看成不过是贱卖与贵卖之间的差异。对那些拒绝整个买卖交易、视之为不但不公正而且有害于经济活动的人来说，不管开

出什么价格，都没有多大关系。再打个比方来说，新旧差异就如两场不同的赛跑：一场是不公正地要求不平等的竞赛双方从同一起跑点起跑，另一场是给较弱的一方以一点便宜，让他在前头几步处起跑，两场的差别无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赛跑使较弱的一方浪费精力在一项不足取的追求之中，因此倾向于拒绝整个比赛。

（梅俊杰节译自印度《抉择》杂志，1976年第2期，冯 棠校）



“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

[日本]富永健一[①]

一、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现论”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著作。……这一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究竟是以什么为主题，是说明什么的理论呢？众所周知，在世界史上，由西欧最先开始的近代化，亦即与西方史上的古代和中世纪相对而言的现代化，对今天来说已成过去。现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相继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是一种文化史的思考方法。这一时期的西欧，其先进部分在政治和经济上处在绝对王权的统治之下，其后进部分则处在封建土地阶级的贵族统治之下。由于这一时期自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革命”尚未开始，从工业化的角度看，这种思考方法似乎过早地确定了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派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

即民主化；另一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这种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众所周知，市民革命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如果把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作为市民革命的高潮，那么，18世纪后半叶就是现代化的中心时期，这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又是一致的。因此，"现代化理论"所着眼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于西方的以18世纪为高峰的、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

对上述观点似乎没有特别的异议，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来说，现代化过程已经成了历史。但是，以美国为中心舞台的"现代化理论"之类的东西，在60年代为什么又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了呢？很清楚，人们关心的决不是史学课题，而是由对现在事件的兴趣所产生的理论建构。我们决不能认为，"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在60年代成了美国关心的焦点，仅仅因为赋予历史现象以现实意义是一种特殊的国民兴趣，这里还有更多的原由。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书提供了对这一问题饶有兴味的启发性分析。简单地说，美国作为"最初的新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中起着英国在17、18世纪中所起的相同作用"（帕森斯）。从世界史角度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①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为紧密。

借用帕森斯的三阶段图式，加上以下说明，无疑是有意义的。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那么就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60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源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从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开始，经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观，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都是与帕森斯所说的在“西北欧”（英国和法国）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理论”——只是当时没有这种提法而已。而滕尼斯将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社会学的商品分析所建立起来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发展图式，以及被马克斯·韦伯归结为合理化和科层制化的现代社会认识论，就是与帕森斯所说的波及“东北欧”（德国）的第二阶段现代化相适应的又一“现代化理论”。今天在固有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战后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美国为主导，与远远超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第三阶段现代化相适应而产生的理论。

以上考察使我们看到，进入现代化范围的，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西方（西欧及其延伸），已把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但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国家，甚至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了进去。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现代化的普遍意义的基础之上的。

问题在于，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将是以下考察的主题。

二、从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到作为普遍概念的现代化

滕尼斯在《村社与社会》一书中关于法理社会的考察对象，是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社会。他对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这一巨大社会变动作了理论上的抽象，并以一般命题的形式进行了论述。但是，他的理论无非是把从西欧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经验加以一般化。必须说明，滕尼斯本人只考虑了西欧社会，而并没有注意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其他社会。因此，滕尼斯的“理论”实际上只停留在对18、19世纪西欧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上。

与滕尼斯不同，马克斯·韦伯则很重视西欧以外的社会，他吸收了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儒教和道教》以及《印度教和佛教》。这些著作成为韦伯庞大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一部分，其主题是说明“给行动以实践的动力”的宗教伦理是如何决定人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作为其形态之一的经济行动的。韦伯认为，经济行动的最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统治方式（现代科层制）、合理化的知识（科学、技术）和合理化的艺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诸要素组成的。因此，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以及法社会学和权威社会学仍然处在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的地位上。当然，以这一思想为出发点的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内容，无疑要比滕尼斯广泛得多。正因如此，韦伯经常在对西

方社会进行比较时注意东方社会，并反复尝试将他从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有关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命题运用于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的东方社会。但是，韦伯从这些尝试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归结为一系列"只有西方……"的命题。他说，"我们今天承认的达到'普遍适当的'发展阶段的'科学'，只存在于西方"。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论题是不可能一般化到非西方世界的，是西方所特有的。实际上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是自发产生现代的科学技术、专业人员以及资本主义和科层制组织的。日本也不可能自发产生，日本是通过文化传播而成功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的。但在韦伯时代，日本正处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推动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在第三阶段的"现代化理论"中，即使在分析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时必须以先进国家的历史为对象，已经不能像滕尼斯和韦伯那样，把现代化概念作为固定于欧洲的历史概念来考虑，而应该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概念。当然，现实中的许多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则又作别论。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课题在于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作出提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与上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为了考察这一时期社会学上的"现代化理论"的思考方法，我们引用具有代表性的W·穆尔和M·J·列维的著作来说明。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因此，他把工业化作为这一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始发原因；反之，也可以说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穆尔把工业化得以产生的条件归纳为四个方面：(1) 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2) 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促进流通的商品交换系统；(3) 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4)在个人的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穆尔还从经济组织、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列举了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现象或后果，即现代社会的特点：(1) 在经济组织方面，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相互依存的组织结构；(2) 在人口结构方面，首先是由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死亡率降低所引起的人口爆炸，继而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普及了家庭计划，实行人口控制、过渡到了低出生—低死亡—老龄型的人口结构；(3)最后，在社会结构方面，其特点是亲属群体和家庭的功能的缩小和解体，个人主义化的进一步加强，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控制的减弱等。

列维也分析了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他比较了"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并把两者

的差别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1)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等诸单位的专业化程度高，而非现代化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则比较低；(2)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诸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亲属群体和近邻共同体的自足性比较强，缺少功能的分化；(3)在现代化社会，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而在非现代化社会，由于家庭、亲属的社会关系比较密切，伦理具有个别的性质；(4)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是集权但不是专制，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权力如同封建制一样，即使在权力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其性质也仍然是专制的；(5)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传统的、个别的、功能无限和具有感情色彩的；(6)现代化社会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而在非现代化社会，交换媒介和市场尚未发展起来；(7)现代化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而在非现代化社会，即使有科层制组织也是建立在个别的社会关系之上的；(8)现代化社会的家庭是向小家庭发展，其功能也正在缩小，而非现代化社会的家庭结构是多样化的，家庭功能也是多重的。

穆尔和列维关于产业化、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的概念化，仍然没有超出“产生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论点，但它们是在为更普遍化的“现代化理论”鸣锣开道。也就是说，如果能对这一命题体系加以适当的完善，就为正在推行现代化政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提供了预测的依据。因此，“现代化理论”能够成为普遍可行的分析工具。

如果某一国家对其中的任一条件都不能予以满足，那么

就可以得知，这一国家连踏上现代化的起跑线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某一国家满足了其中的某些条件，但尚未满足的条件还有很多，那么就可以预料，这一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但在中途很可能要遇到“中断”。现代化的“中断”(breakdowns)一词，自从艾森斯塔特在他的论文题目中用过以后，经常被人提起，其意义指的是如在20世纪前半叶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所见到的那样，一度开始的现代化改革停留在初期阶段而未能持续发展，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艾森斯塔特关于现代化中断的分析，虽然缺乏穆尔四条件图式那样广阔的视野，但是，它为以分析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变动为中心内容的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提示了将现代化概念普遍化的方向。因此，70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分解为两支，一支是继承60年代的理论，试图从构筑普遍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现代化；一支是与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理代化的看法相汇合，试图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并提出新的理论。

三、先进国家的现代化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

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版序言)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提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格尔申克隆援用凡勃伦的“借用技术”这一概念，他认为，后进国家无须自己建立技术，而可以利用“借用技术”；因此，后进国家应当有可能比先进国家更快遍地实现工业化并赶上先进国家。许多后进国家之所以未

能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是因为存在着缺少资源或缺少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制度条件等障碍，而且不能克服这些障碍。由于不能克服这些障碍，后进国家就有必要走与先进国家不同的道路。例如，后进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丰富，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为达到初步产业化所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都是很少的，这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化的蜀道。如果后进国家能够利用"借用技术"，即成功地大规模引进先进国家的最尖端、最有效的技术，那么，让先进国家的长处在本国再生，就可以克服工业化的障碍。因为技术是劳动的节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钢铁业为中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就是其中一例。

格尔申克隆的理论，虽然在经济史学家中广为知晓，但现代化论者并未将这一思想吸收到他们的理论中去。我认为，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是不同的，这一着眼点是"现代化理论"在考察西方先进国家之外的国家的现代化时所必须大力研究的，只是格尔申克隆的理论的说明对象，是在19世纪的欧洲相对落后的"后进国家"德国，这对于不同于经济史理论的、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最感兴趣的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来说，是必须注意的。德国是欧洲国家，从欧洲文明这一大范围来说，从英国开始的工业文明对德国来说并非"外来文明"。而对包括日本的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来说，工业文明已经是"异质"的东西，因此，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是以"西方化"开始的，这一点与欧洲的后进国家不同。

进入70年代以后，通过作为与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对应物出现的依附理论及与其迥异但在理论上有联系的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认为发展中国家今日的现代化所面临

的问题与先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主张。这里以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为例，对他们所提出的论题作若干探讨。

弗兰克认为，以往的"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态作为相当于先进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来认识的这种理论方法；还在于认为现在的先进国家都曾经有过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样状态。弗兰克认为这种理论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按照弗兰克的理解，现在的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整体的构成要素而存在着。弗兰克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依附和并存关系类比为外围与中心的关系。

弗兰克的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为一体、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与出身于匈牙利的杰出的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大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的世界体系概念有某些合拍的地方。帕森斯提出了"整体"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民国家"形成以后，事实上已经基本满足了"国民国家"作为整体社会的条件，并承认了通常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较社会学分析。与此相反，沃勒斯坦第一次明确地宣称，近代以后的自足系统只有"现代世界体系"一个，主权国家和国民社会不是自足的社会系统。这就阐明了一个概念，即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以国民经济为单位的自主经济形成的，而是以最初的贸易和国际分工为前提形成的。

在前两节中，我们探索了自60年代到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困难最终在于通过现代化概念的一般化，把非西方后发展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在面向现代化之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西方先进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我们看到，格尔申克隆的理论为解决"现代化理论"的难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格尔申克隆的理论，是以作为工业化的后进国家的德国通过迅速工业化赶上了先进国家的事例为材料的、从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过渡的理论；而弗兰克的理论，则是试图以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水平的拉丁美洲诸国的事例为材料、阐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脱离低发展状态的理论。弗兰克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等同于先进国家曾经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摆脱中心和外围关系的束缚，就永远达不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沃勒斯坦的理论原则上也从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得出了相同结论。这些理论起初是为了论证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现代化的命题而构想出来的。事实上，展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可能性的理论并未建立。

那么，假定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出发，找到了说明例如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原因，情况又会如何呢？要论述日本现代化的命题，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那样，只着眼于与外部关系的方式是不够的，必须有关于日本国内的各种社会状况的系统论述。

四、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条件

在人类的发展阶段史上，由狩猎采集阶段向定居农耕阶段过渡之际的农业革命，是在相互独立的世界诸文明中心独立地进行的。但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下将三者合称为现代化革命），用韦伯的话来说，是"只在西方"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

现代科学、现代产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只要是与现代相关联的，一切都产生于西方，一提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其意即指在一定的时间差之后，通过文化传播而接受这些现代化革命的产物。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究竟为什么"只在西方"产生而东方不能自发产生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此不可能作出回答。

现代化革命是产生于西方的事件，对"现代化理论"的考察当然也是由西方人首先开始的，只要现代化还是"属于西方人的、由西方人进行的并为西方人服务的事业"，考察"现代化理论"的势必只能是西方人。但是，一旦通过文化传播使西方现代文明成为与西方以外的人们所共有，这个时候，"现代化理论"便同时成了非西方人的关心对象。如果采用第一节中"现代化理论"三阶段的划分，那么，在前两个阶段，日本还只处在工业化之前的阶段（第一阶段）和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日本人尚未对"现代化理论"发生兴趣。到了第三阶段，日本正值高度经济成长的最盛期，对日本人来说，现代化成了前所未有的关心课题，日本开始了对"现代化理论"的真正关心。但是不难感到，此时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刚刚传入日本，它看待"现代化理论"的方法同现代化作为自身产生过程的西方是不同的。对于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人们来说，接受和适应这种异质的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这一问题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没有的。

人们重复熟识的东西是不需特别的动机的，但是，有意从外部接纳异质的东西就必须有相应的动机。文化传播并非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现象，而是由具有意志的人所进行的一种行

动，没有足够使大多数人理解的动机是不可能进行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接受外来物，遇到诸如改变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等一切原来的东西的国民决策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内部对立。也就是说，试图推动现代化的领导者必须使国民理解对自己所熟悉的传统的东西进行省察的必要性，赋予国民以动机，并且还必须有能力对付和处理可能在此时产生的内部对立。所有这些，使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比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要困难得多。

以下想把这些情况整理为命题的形式，并将非西方后发展社会产生出现代化的条件定型化。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定义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条件，无非就是使现代化得以突破西方—非西方界限的条件定型化。现在还不知道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这一界限，只是应当清楚，在考察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理论的时候，能够为这种理论提供经验材料的，目前只有一个，这就是日本。因此，在以下的考察中，我试图作这样一种努力，即向日本寻找直接的例证素材，但并非仅仅只研究日本，而是在展望比西方较迟开始现代化过程的非西方社会——更直接的是把在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与日本相对接近的中国、台湾、南朝鲜等作为理论的适用对象来考虑——的同时，尽可能探求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第一命题：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

自对本国的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后发展国之所以成为后发展国，是因为其内部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因此，后发展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输入这种原动力，否则，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产生。然而这一输入过程就是对本国传统社会的破坏过程，传统社会一旦遭到破坏，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即使勇于作出这样的牺牲，如果没有非破坏传统社会不可的强烈的革新动机，这一过程也不会开始。众所周知，在日本，维新的动机源于幕府、诸藩的财政困难和国防上的危机意识，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财政困难不解决，国防也就不可能强化。

第二命题：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所承担的工业文明的输入和稳定

由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只能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

在日本，初期的明治政府存在着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现代派与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传统派的对立。现代派于1871年参加了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先进国家进行为期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在先进国家的国际动向中观察日本，从推行现代化政策的角度考察日本的内政。传统派没有参加使节团而留在国内，代表了企图恢复传统社会的怀有不满的士族的意见。

明治政府在危机中贯彻防止国内分裂、培植工业的方针，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与军阀

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工业化未能进展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朝灭亡后的中国，虽然第一命题得以满足，但第二命题未能得到满足，这导致日本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决定性分离。

第三命题：出现使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三个条件，是出现学会了外来的工业技术并将作为外来文明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承担者；再加上掌握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另外还必须具备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掌握熟练技术的人；在市场上以工业产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以及对企业家活动的广泛的支持者等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条件可以被视为趋于工业化的内在成熟。

对于作为现代化一环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来说，如果只有政府对工业的援助而国民中却缺乏大量的工业活动的承担者，工业化也不可能开始。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工业化的直接承担者，但这充其量只能是设置官办工厂或将其下放于民间。官办工厂的作用仅仅是过渡，而且多亏损。日本的工业化在短期内得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从旧武士、农民、市民等各个阶层中毫无例外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实业家。

第四命题：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之间对立的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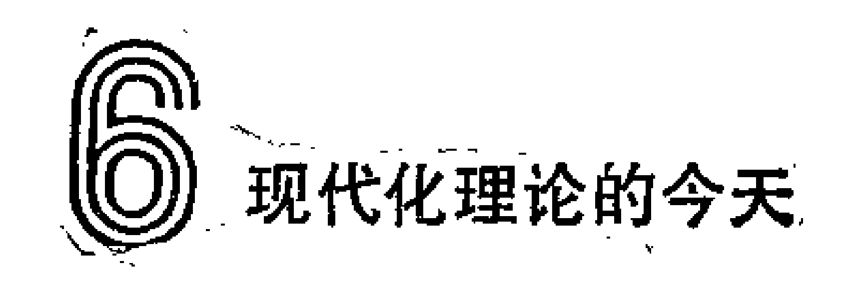
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这种二重结构的对立也存在于德国

和美国这样的欧美先进国家，但是在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尤其不可避免。因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国粹主义的反感。只要这种对立的二重结构不消除，就不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

在日本，现代派与传统派的对立从幕末维新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现代派的领袖大多成为暴力行动的对象(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大久保利通都遭暗杀)就是这种对立的结果。现代派，即西方倾向派，尤其是亲英美派，大多存在于大都市、大企业和知识分子中间。而传统派，也即国粹倾向派、反西方主义派，大多存在于农村、私营企业和非知识分子阶层。传统派后来形成了昭和前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鸣盘。特别是"寄生地主制"下的农民贫困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高额的地租，狭小的耕地和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贫困的佃农得不到工业化的一点好处，农村成了反工业主义、反西方主义和反知识主义的温床。来源于贫困农村的陆军，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支柱。日本这种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的二重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始终未能消除，最终导致日本的全面战争以及战争的失败。战争的失败及战后的改革，终于消除了这种二重结构。很明显，战后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以及以此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成功，在社会结构意义上完全是战败和战后改革的产物。对日本来说，这真是侥幸的历史偶然。但是，对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来说，这却是一个普遍的结构性事实。因此，对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中心问题是第四命题和第三命题，即二重结构不消除，现代化就不可能走上

稳定的轨道；现代化必须有趋于工业化的内在成熟条件。以日本以外的最近事件为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伊朗的霍梅尼革命都是由于没有趋于现代化的内在成熟情况下的现代化促进派与国粹派的对立，都以权力斗争为特征，如果不克服这种斗争，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

（严立贤节译自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6 现代化理论的今天

[日本]蒺野佑三

一、现代化理论的构成

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在这个时候，现代化理论的一员主将阿普特发表了一篇富有挑战意义的论文："我的回顾：发展研究的过时"，他意味深长地指出：现代化理论已经过时了。

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许多以现代化为题的出版物纷纷出台。如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学》、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整理的发展理论研究系列等。然而，进入70年代后，这些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起"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例如阿普特写出《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写出《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特写出《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计划也推出了一系列专著，如《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

义上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了政治危机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普特所讲的“发展研究的过时”，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关心的重点从发展问题向危机问题转移，乐观主义的态度被一种不安的意识所取代。在本文中，我想着重谈谈这种大转变的由来以及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内部构成。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现代化理论架构的划定；第二，现代化理论发生转变的因素和过程。但在此之前，首先应当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握现代化理论的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其方法论是行为主义的，这种方法论的流行，始于50年代，盛于60年代；它应用于现代化理论，就是将现代化理论跨越到其他各学科。

例如，经济发展问题专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他希望指明，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

那么，按照阿普特的“过时”说，上述统一现象又是如何分散的呢？看来总结一下这个分散状况，正好可以说明“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这里，我们先来看看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特点。

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按照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先提示一下历史观的基本类型。

一般来说，人们的历史观基本上是这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本身是发展的。这种历史观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市民社会，就是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它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同时，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序列，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因此先进社会这一事实被归结为“好”这样一种判断。

与这种单线的历史观不同，德意志历史主义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具有其作为历史的个体而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说，落后性本身也有其价值，绝不能被先进性所否定。

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在以下的关系上充分表现了其“原理的强点和弱点”。自然主义历史观认为，落后的社会和先进的社会在时间轴上保持着同一的历史方向，处于一前一后的关系。因此自然主义可以提出先进社会比落后社会好这样一种判断。历史主义历史观则首先承认落后社会本身也有存在的理由，主张一切社会都可以作为其个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它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也容易设想，通过观点的改变可以扭转它们一强一弱的特性。即在自然主义中被否定的落后社会，在历史主义中可以承认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历史观来抽象出某些类型，以便利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理解。这就是说，一方面，在自然主义类型当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处在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在历史主义的类型当中，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彼此隔断的关系。我们把这两种关系称作“连续模式”和“隔断模式”。

我们通过经济学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例如“连续模式”认为，第三世界要想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而“隔断模式”则指出，发达国家搞资本积累，完全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为条件的，因此这一模式最后归结为批判帝国主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两种结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前者认为是他们自己不努力，后者则认为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剥削。

那么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究竟偏向哪一种模式呢？恐怕“连续模式”是占主导地位的。其大体情况已如众所周知，当时的现代化目标被人们定为美国的发展水平，而成功的范例则归结为日本和土耳其。这个“连续模式”的基本线索是：美国构成其顶点，按照美国那样的自由主义体制进行分档，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排出了一个发展程度的序列。为此，就有必要制定一些表明发展阶段特征的具体指标，于是人们便列出了识字率、城市化、大众传播普及率等，根据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测定现代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为了显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连续”关系，也有必要提出一种与其历史观相适应的方法论，诸如规定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未分化、社会系统的自我增殖等社会组织体的自我成长程度。这一观点认为，现代化的产生源于社会组织的和平增长，而不像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是革命的结果。这种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援用了以生物体自我增殖为原理的系统论概念和重视组织的分化过程的结构-功能主义。这些自50年代流行的各种方法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连续模式”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学科中的表现方式。探讨这些方式也正是体现了如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状况；而为

了把握这一状况，有必要专门论述一下60年代的发展方向。

首先，在经济学领域，W·W·罗斯托开现代化理论的先河，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则是其集大成之作。正如这本著作的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它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而是给整个现代化理论奠定思想基础的。他的基本框架是：传统社会→起飞准备期→起飞→向成熟过渡→高额大众消费时代。在这里，从传统社会向高额大众消费社会转变，最重要的时期是"起飞"阶段，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却被突出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起飞"的实质在于，不经过共产主义化而脱离传统社会，其课题则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实现起飞——包括从国内政策到接受外援政策等很宽的范围。当然也有不少人批判罗斯托的观点，但我们应当理解，罗斯托理论的精髓在于，他把由传统社会向高额大众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置于历史发展的连续线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图式来看，确实是由古代到现代的连续，但它却提示了另一种状态，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矛盾激化（如阶级斗争），历史不得不发生某些转变，就是连续的中断现象。而罗斯托的图式所强调的，不过是在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连续性，而且实际上经济成长也未必都是积极的连续状态，当一定的经济成长反过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时，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观点未必都像罗斯托那样对连续性抱有乐观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学。与经济学相比，社会学在以下两个方面所取角度不同，一是方法论不同，二是对连续的处理方式不同。

在方法论方面，前面已经提到，50年代流行的方法论也为

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提供了保障。社会学的主要分析方法，是"同型异质"概念的展开，如同型的结构分析和对结构的各个要素所具有功能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来概括：如果说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唯一主线的话，那么社会学的武器当是更加精确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经济学强调"起飞"，社会学则强调结构功能的"分化"，即只有"分化"才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众所周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奠基人是E·涂尔干。他在分析社会发展的时候，采用了这种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二分法——"有机的结合"和"机械的结合"。这一方法由M·J·列维和T·帕森斯等社会学家构筑成了统一的科学方法，成为60年代现代化分析的主要手段。例如帕森斯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二分法设定了五组模式变项，即传统社会要迈向现代社会，它们有必要向价值中立转移。列维认为，随着这些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各种功能就要进行分化，即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家庭会发生各种功能性变化，如作用分化、统一性、经济分配、政治分配、社会整合等。社会学关于结构和功能分化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一条连续线上展开的：这就是说，社会学的"分化"概念是积极的，它被置于形而上学的前提之下；分化所产生的各种摩擦，将会由更大的分化力加以中和——这是一幅连续的图式。社会学的"连续模式"，其色彩比经济学更加浓重，更加鲜明。

那么，社会学对连续性的处理方式与经济学有什么不同呢？功能的分化，未必一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一般地说，功能主义不能分析社会的倒退和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求稳守常的保守主义理论。然而，事实上功能的分化往往产生"逆功能"，对功能和逆功能的提示，就意味着对由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单线图式的否定。也就是说，它告诉人们，社会稳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次性的直线方式。例如在经济学上，衡量经济发展可以看GNP的数量增长，GNP提高两倍就可以说现代化提高了两倍；而在社会学上，则不一定可以作同等对比，结构功能分化了两倍，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程度也提高了两倍，因为其中还有一个逆功能的问题。但是事实上，社会学是在彻底的、以自然主义历史观为前提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超越了逆功能的存在，认为到最后更大的历史潮流可以吸收掉这种逆功能，从而朝着"分化"的方向前进。涂尔干曾强调指出，分工(用我们的话即"分化")的扩大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我们看看政治学的情况。从政治学的特殊角度出发，一是方法论，二是其对"连续模式"的理解方式值得注意。

从方法论上来看，以伊斯顿为代表的政治体系理论占有主要地位。政治体系论源于系统论，其特点是以生物体的自我增殖原理为前提，或许可以说这个原理保证了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即传统社会通过自我增殖走向现代社会的模式。伊斯顿在他的《政治体系》一书中，划定了一个政治体系图式，而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一书中，则把布须曼社会(南非)和美国社会都设定在政治体系的连续线上。以自我增殖为关键环节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分析特殊现代化的时候所设定的概念是"动员"，这与社会学的"分化"概念恰好处在同一轨迹上，后来由多伊彻发展为一种固定模式。这一概念的意思是：通过由传统的价值意识向现代的价值意识的转变，增大了人们对政治社会的承诺(commitment)，"动员"主要即分析这个过程。例如，当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也需要促进劳动力

的转移(例如城市化),而推进劳动力的转移,就需要政治组织对国民的动员。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和社会流动的扩大就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动员"概念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理论的主线。后来,这一概念和"社会流动"一起超出了政治学的范畴,成为整个现代化理论的术语。

我们再来看看连续性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下,可以说在经济学上,现代化主要表现于物质层面;在社会学上,主要表现于客观层面;而在政治学上,则主要表现于心理层面。政治学的心理层面比其他两个领域更加突出,因此从客观上对现代化进行衡量就更加困难。例如,政治学并不能简单地采用两倍GNP那样的计算方法,按照R·K·马顿的"集团理论"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理论的特质。一个GNP达到两倍的社会,也许会要求自己继续朝更高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越是发达,就越容易在内部产生过分期待,同时伴之而来的是对政治自由化(参政)的更高要求,而这种过分期待往往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以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为标准来计算相对独立的政治现代化(即政治稳定的扩大)的程度,还是大可怀疑的。S·P·亨廷顿的"差距假说"总结了这种现象,表现了政治现代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就是说,经济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稳定(或政治现代化)。由此也可看出,"连续模式"中的连续性,在这里比之社会现代化受到更大的制约。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政治现代化理论受到很大的制约,但它最终仍然是将传统和现代置于同一条线上的。

二、现代化理论的今天

"连续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它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放在发展的连续线上。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我们不应忽视，那就是在这个二分法当中，关心的重点在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又把现代社会看作是通向乌托邦的途径。众所周知，当现代社会被看作是通向乌托邦之路的时候，凯恩斯革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然而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内，经济学的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对发达社会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对抗。例如，凯恩斯和罗斯托的观点如果算是乐观主义的话，那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则是悲观主义的，它们描绘了发达社会的暗淡前景。按照经济学的这两条线索来看，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以乐观态度去看待发达的社会，而70年代则人们就开始悲观了。作为其转变的外因，有越南战争和美元危机以及石油冲击等一连串的美国式危机，最后归结为"美国世纪"的结束。这一连串危机促使人们从仅仅关心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开始转向注意分析发达社会的病理现象，这标志着现代化理论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正是把握我们现在要谈的"现代化的今天"。现在仍按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进行论述。

经济学。可以这样说，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比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转变(由"连续"向"隔断"的转变)更加深刻。经过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发达社会面临着经济危机，典型的是"滞胀"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或者可以说是终结，这就是说，经济现代化

理论的支柱——各种理论体系开始受到批判，如拉迪卡尔经济学的抬头和对市场模式的一系列批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支撑"连续模式"的方法论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作为"隔断模式"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又兴盛起来。

对"连续模式"的反思，引出了分析对象的分化，一方面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病理，另一方面把研究的重点挪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新的二分法认为，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差距问题，先进社会也有它本身所遇到的新问题，发达国家不再是发展中国家所应追赶的理想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摸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里，"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应运而生。这些新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以下两个理由可以证明它们的落后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落后。一是已经没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发达国家也有新的问题产生)，二是它们的现代化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因此，就有必要创造一些新的理论。以A·G·弗兰克为首的"依附论"者认为，发达社会的发展是它们剥削殖民地的结果，即便在今天，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越多，其剥削就越重，而这不是发展。"中心—边缘理论"认为，资本有一种向中心地区集中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中心与边缘双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目前现代化理论的情况，以方法论方面的反思为起点，朝着如下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对以时间差为核心内容的"连续模式"的超越，即先进归先进、落后归落后，人们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焦点开始分化了。另一个方向更加重要，即不是把发达和落后的国家放在时间的早迟上加以考虑，而是把落后国家的出现看作是发达国家发展的结果，这就与"隔

断模式"联系起来。另外，主张先进与落后存在的同时性的历史观也开始成为必要。可以说，在经济学领域，"现代化理论的今天"意味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二是对先进与落后关心的分化（即偏向"隔断模式"），三是以"隔断模式"为杠杆的先进与落后同时性的历史观的出现。

社会学。社会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关键是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它一直是乐观主义的，但实际上"分化"也遇到了新的异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及其连续理论已经失去了前提。从方法论上来看，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但却无法用来有效地分析社会意识的问题。例如，帕森斯一直把社会学当作行为理论加以设定，然而自从《社会系统论》问世以后，人们便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从行为的层面转向了结构的层面。一般对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多半集中在它对社会意识的无能为力方面；但当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处于积极状态时，这些批评也未必能有多么有力的作用。不过，当"分化"遇到新的异化时，悲观主义便占了上风，人们开始问道："社会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例如对主张上层建筑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再评价，韦伯学派关于社会动机理论的重新崛起，以及现象学和相互象征主义的登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放弃了讨论意义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遭到了厄运。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二分法及其"分化"概念的失势，由此"连续模式"本身也开始受到批判。所以说，社会学一方面困惑于发达社会的异化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变成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学。正如经济学的转变一样，社会学所着重的不再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分法的时间差问题，而是开始研究现代社会的病理现象，同时

注重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化。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所关心的领域正在扩大，由此也能发现，它正在从"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转变。

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放弃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同时也实现了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转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彻底的转变，那就是历史观的展开，即它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韦伯的资本主义论、特别是他的资本主义精神复兴的理论中把握到。这一转变显示，以分化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及其连续图式已不再为人所重视，人们开始通过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是核心）和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的过程，来尝试传统与现代二元共存的"现代"概念的对比研究。归根结底，正是历史观的转变构成了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彻底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面临着以下三个课题：一是方法论上对功能主义的批判，二是向"隔断模式"的转向，即对先进与落后关心的分化，三是对先进与落后的同时代性的理解。

政治学。政治学同社会学一样，也出现了方法论上的反思和对"连续模式"的批判。政治学中"连续模式"的支柱是系统论，其中心概念是"动员"。本来，系统论方法产生于生物学，简单地说，它的基本原理是把生物的成长类推为系统的扩大。我们举过伊斯顿的例子，他把布须曼的蒙昧社会和美国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连续组合了起来。通过延长自我增殖的动态过程来说明"连续模式"，恐怕有些过于简单，这里我们有必要把着眼点具体地放到"动员"的概念上。所谓"动员"，是指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发动人民，这一概念与系统论处于表里一体的关系。政治体系论中的体系概念，是以构成体系

的所有要素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的，这种作用被描述成为具有积极的色彩。这就是说，它并不是以体系的破坏为前提的，于是受到了批评，被指责为保守主义。大体上说，政治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政治体系的目的），人口移动和资源分配两者被很有效地动员起来。即使出现了亨廷顿所设想的政治衰败（即现代化的一时停滞），只要动员增加效能，那么现代化仍将继续下去。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指向现代化目标的人口移动和资源分配并未得到很好的运作，这情况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同样存在。在发达国家，我们看到它们正处在一个低增长阶段——财富的扩大增殖已不可能，因为面临滞胀问题，而亨廷顿曾强调的正是要以扩大、动员政治性财富的手段来克服政治衰败。在这里，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政治性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由此，政治学开始追求政治性财富的再分配方式，关心的重点开始转向了政治参与问题。于是，多元论和集团主义理论开始成了热门话题。就这样，政治学经历了其方法论上的“隔断”，放弃了政治体系论，尤其是“动员”的概念。

这种方法论上的“隔断”直接联系到其“连续模式”的失败，就是说，“动员”的概念只能提示一个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连续图式，而这时政治学所关注的，却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的研究。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已如前述，人们开始采用多元论和集团主义的看法；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课题，是如何赋予新财富再分配方式（即利益媒体及方式）以权威的正统性问题。而正统性问题即统治能力问题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第三世界同样也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新的权威主义体制问题，并不在于设定一个现代化目标

再加上动员，而是赋予那个现代化目标本身以权威的正统性——意识形态的问题。尽管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同样都要处理这个正统性的问题，但并不是说它们共同处在一条时间差的线段上，它们双方各有各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学已由"连续模式"转向了"隔断模式"。

另一方面，向"隔断模式"的转变又联系着一种历史观的转变，即把现代政治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看。如经济学上的"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直接转变成了政治学上的帝国主义理论，它产生了两个认识，一是先进与落后的同时代共存，二是把这个同时代性看作是历史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何理解第三世界的崛起引起国际体系改组的问题，集中地说明了上述情况。总而言之，政治学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对政治体系理论方法的反思；二是对先进与落后各领域关心的分化("隔断模式")；三是对先进与落后同时代性的理解。关于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的转变，请参阅下图。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变化

	60年代			70年代		
	模　式	方　法	历史观	模　式	方　法	历史观
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	连续模式	数量 结构-功能主义 系统论	单线	隔断模式	依附论等 行为理论等 多元论 集团主义	非单线（新的历史观）

（王小平译自薮野祐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第5章，1984年。）

7 依附论的主要欠缺

[美国]约翰·W·斯隆

依附论是近年出现的解释拉美发展的“秘诀”。依附论者声称，他们的模式能够解释拉美的发展问题，并且还能够准确无误地开出一整套治疗该地区弊病的政策方子。虽然依附论的著述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的支持者们大大夸大了这种理论解释问题的能力。而且他们在支持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完全被宗教狂热般的感情所控制，所以不能发现这种模式的欠缺。本文目的主要是探讨依附论的不足之处。

应该承认，依附论的支持者为拉美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他们迫使拉美研究冲破学院式的清规戒律，这些清规戒律有碍于对拉美的理解。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了，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如此等等。其次，依附论者还向我们指出，在拉美，区分国内事件与国际事件的界限是多么困难。自从美国渐渐成了拉美权力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任何在国内实现现代化的努

力，都势必产生国际磨擦。因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渗透到了拉美各国社会，所以，拉美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第三，依附论者迫使研究拉美的学者注意美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和多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而不只是动机)。第四，依附论者还使学者和决策者不仅对经济生产问题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也很敏感。简要地说，同50年代的研究相比，依附论者迫使研究拉美的学者涉及多得多的问题。

但是，这一理论和它的支持者也有些值得磋商的地方。首先，该理论的某些创立者对于他们的结论的相信程度超出了社会科学家应有的程度。虽然该理论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但是许多人却怀着一种宗教狂热接受了这种模式。有些接受依附论的美国学者把自己弄得像是为他们的国家在越南、古巴、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犯罪行请罪的僧侣。这样的学者忘记了社会科学家的作用就是怀疑，忘记了怀疑的态度是获取更高真实所必需的，忘记了社会科学家永远不能使人们相信，他或她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理。

依附论者的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容不得其他学者。在他们生活的分化为两个极端的世界上，谁不接受依附论模式，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劳苦大众，为帝国主义效劳。这种判断对于动员政治积极分子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家却是有害的，社会科学家要准备发现以至搜寻可能与他们的理论或基本信仰相抵触的材料。由于依附论者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的社会理论与他们的基本信仰完全一致，人们怀疑他们像是要谴责任何检验他们的理论并发现不足之处的人。依附论者已经发展了的这种理论，是值得检验、再检验的。

第二，依附论者所以应受批评，还因为他们夸大了他们的模式解释问题的能力。正如威伦所说："用个别特征来描述整个文化，尤其是不同起源的极为复杂的文化，是近乎幼稚和不负责任的。"就用依附论这一把钥匙，便能同时打开理解海地和巴西、危地马拉和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秘鲁、乌拉圭及墨西哥的大门，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模式因不能被检验而进一步削弱了它解释问题的能力。用迈耶的话说："可检性的标准是在陈述某一主张时必须能让别人证明它可能是错误的。更具体地说，这一主张必须划出一个经验的数据资料范围，这些数据资料是与该主张水火不相容的，一经发现便会否定这一主张或使它走向反面。"社会科学家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时常论及的概念不易加以实施或测定。但是，依附论者主要陈述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可以测定的，而且尚未统计研究以证实他们的理论。

已有两项统计研究表明依附论解释问题的能力有限。卡普兰发现美援在拉美的分配(1946—1973年)与人口多少有密切关系。与依附论者的预言不同，卡普兰发现美援和美国的直接投资之间"极少或没有联系"。考夫曼、盖勒和切诺斯基确实发现了依附性(用贸易和资金的数据来测定)和收入不均以及民众参政的低水准有明确的联系。但这些作者"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相互间的联系"与依附论的预言明显地背道而驰。用我们设计的许多方法测定，依附性较强的经济增长较快而不是较慢，它们的土地占有制度是较为公平而不是相反；按照我们对资金依附的测定，它们有更稳定的宪法，而较少黩武主义"。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依附性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和有

意义的相关性(全部实例，除两例外，相关系数均在40%至61%之间)，与弗兰克和博登海姆尔的论断完全相反……要说还有其他什么意义的话，这些发现似乎最有力地支持了'传统的'经济学家的'反论'，即事实上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能有良好的经济后果；这些发现还表明卡多索、雅夸里伯和森克尔(他们知道在依附性结构中经济增长是可能的)等依附论者的著作比他们的同事们有明显的改善。就后者坚持依附不仅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而且产生消极的经济影响而言，我们的数据认为这个以不适当的形式炮制出来的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依附论者解释问题的能力还因一个明显的偏见而削弱了。他们在对美国在危地马拉、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强烈愤怒的同时，却闭口不谈苏联对东欧的干涉。而且，他们也不批评古巴在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模式的主要缺点，照雷伊所说，或许是"依附论者在形成依附和非依附的概念时，不是将它们作为连续的渐变的状态，而是作为对立的、突变的状态……这个模式的支持者持这一观点，其意思显然是非依附是可能达到的，尽管他们努力不给非依附下明确的定义，也不认真考虑不依附的经济是怎样的"。根据这种对立的概念，拉美国家被分成两种类型：古巴是自主型的一个成员，其他国家都是依附性的成员。于是，依附论者将这第二种类型当作一个整体对待，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他们认为都是因依附性的欠发展而引起的问题。他们从第二类型的国家中精心挑选了一些事例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没有努力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

这两类国家。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尺度，巴西的国债增长受到了谴责，而古巴的国债增长却未被提及。许多国家长久地依赖原料出口被强调，而古巴继续不断地依赖糖的出口却被忽视了。许多拉美国家年复一年的收支问题成了依附性发展无出路的证据，然而对古巴被同样的困难所折磨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

显而易见，依附论者将独立于美国和(或)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外的好处看得太多了。依附论者因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拉美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包括那些社会主义革命后似乎仍存在并妨碍发展的问题。如同社会主义的古巴一直依赖食糖出口一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危地马拉也会依赖咖啡出口的。这里，我们必须弄清两个经济上的基本事实。第一，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国家越小就越要依赖出口商品。概言之，人口的多少和外贸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成反比。第二，一个国家只能出口其他国家想买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上，每个国家都要认真地、抱有希望地对专业化程度作出合理的选择。用雷伊的话说："那么任何需要出口的国家都必须按世界市场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经济结构，而不管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还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活动。按照多斯·桑托斯使用的、并为博登海姆尔所接受的定义，一个欠发展的国家，在根据外国需要确定其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变成依附性的了。那么，按照这一定义，所有欠发展国家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依附性的。这也就是说，非欠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

现在我们进入对依附论的著述的第三项主要的批评，即对一个或许是不正确的假设的探讨。事实上，所有依附论者

都声称，现在"美国对（拉美的）经济和政治的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这一假设是依附论者的思想实质，因为他们谴责美国阻止古巴革命在整个拉美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依附是一种连续的、渐变的状态，我们就能测定每一个拉美国家依附的程度。此外，由于依附明显地是一个多维概念，所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国家有较大的依附性，而从另一些方面看，则有较大的自主性。依附论者只是一味地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不顾检验其理论，以致避开了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拉美的依附性是否越来越严重了？如同一些实证的调查显示墨索里尼未能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一样，对美洲关系的研究也可能暴露类似的概念错误。

由于没有将依附的特征概念化，我们不能回答上面的那个问题。但是有些证据表明——不是证实——至少从某些方面看，一些国家的自主性是加强了。首先，拉美各国制定了许多与依附的模式很不一致的政策。例如，古巴表示愿意派出数千名士兵开赴安哥拉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与此相比，在拉美只有一个国家——哥伦比亚，愿意出兵支持在朝鲜的美国军队，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对越（南）政策。大多数拉美国家在领土纠纷和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中激怒了美国。1965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抵制了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拉美和平部队的计划。更有意义的或许是，无论文官政府或军人政府都将美国在拉美的数十亿财产国有化了，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委内瑞拉的全部石油企业。所有这些事实表明，许多拉美政府正在追求本国的利益，对美国的独立性要比依附论者所认为的更强些。

根据统计资料，许多来自拉美的消息不是令人鼓舞的。大

多数拉美国家外债不断增长，通货膨胀率很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农业生产不足，失业队伍庞大。但是也有材料表明，他们在减轻对美国依附的努力中正取得某些成绩。作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结果，拉美国家已经降低了进口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的比例(这是衡量对外脆弱性的重要标准)，从大萧条前的约25%降至1970年的10%。拉美在出口产品多样化和贸易对象多样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50—1970年之间，有13个国家降低了输往美国的产品(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这个指数只在6个国家中是上升的。同样，在1960—1970年，两种主要出口物的外汇收入在全部出口物的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有13个国家降低，6个国家提高。此外，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拉美的产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例从1960—1961年的约12.5%发展到1970—1971年的18.1%"。1975年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拉美输出了价值95亿美元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一是巴西的。最后，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秘书处在最近的一项普查中发现，截至1974年12月31日，在它的11个成员国及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共有555家银行机构，其中325家为本国私人银行，159家为国营或合营银行，71家为外国银行。在全部存款中，49.7%在本国私人银行，43.5%在国营合营银行，6.7%在外国银行。这些数字表明外国银行并不像依附论者声称的那样强有力。

列举以上数据，并非为了给拉美描绘一幅令人乐观的景象。我个人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搞得不是很好。但是这些数据确实可以表明，拉美国家的政府并非如依附论的著述所形容的那样是套着枷锁的奴隶。它们不断地从美国那里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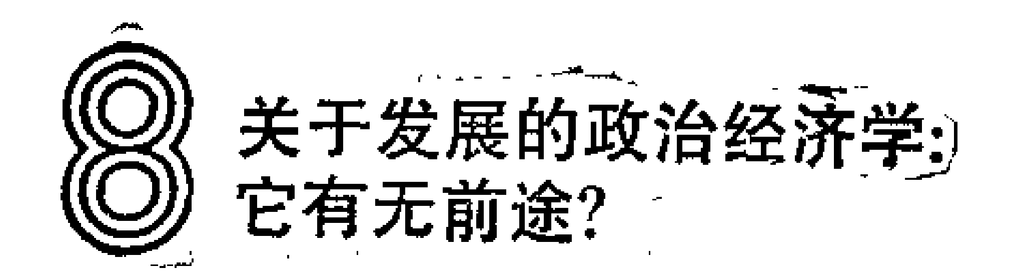
某种程度的独立，在取得这种独立的同时，它们对发展政策的成败也越来越负有责任。

我们对依附论者的第四点批判是他们对拉美资产阶级和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态度。依附论认为，虽然拉美各国受依附关系的限制，资产阶级却一直自由自在地利用这种关系为他们个人(不是为民族)谋利。依附论者的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是：拉美社会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因为改革需要依靠"卖国的"资产阶级。博登海姆尔分析说："……如经验所示，建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或者'民族资本主义的'、或者更近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努力，最终都必将失败，因为这些方案所依赖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本身受到他们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限制……他们只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将继续依靠外国投资，并且必将在本质上迎合外国利益，与他们妥协。"

依附论者认为拉美的资产阶级没有带来现代化，而只产生了依附、停滞和边际化(marginalization)。在他们看来，因为拉美的资产阶级不能像美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发挥促进发展的作用(许多非依附论学者也这样认为)，所以实现现代化的选择就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正如19世纪日本和德国所证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所开辟的道路之外，还有其他现代化道路，拉美也可以像它过去曾做的那样，撇开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意识，推进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道路，无论变好或变坏，可能会导致各阶级的合作。伯利兹的论断或许倒是比依附论者的更为正确："向美国霸权主义的挑战可能不会来自极左派，而是在广大城市人口的支持下来自国家本身。从拉美情况来看，这很像日本入侵前夜时的新加坡的堡

垒，所有的枪炮都对准海上，而对陆上的进攻却毫无准备。"既然过去各国以不同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也就有理由假设在今后也可能这样。简言之，我们要避免陷入以下两个假设的泥潭：（1）现代化是自动的，（2）"在当代"只有一条发展道路。

（李建国摘译自美国《泛美经济事务》，第31卷，第3期。）



8 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它有无前途？

[尼日利亚]克劳德·阿克[①]

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下文简称“发展政治经济学”——译者）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不是无所谓而发的；从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来看，它就是没有前途。发展政治经济学，从开头起就得不到重视，现在已经到了快要消亡的地步。在历史的每个转折点上，它都惨遭嘲弄，对要求它给予解释的问题，它表现得无能为力。它的活力似乎已丧失殆尽。由于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脱节，它未能从后者吸取营养。再说它又是政治的俘虏。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可以把发展政治经济学按照各个派别的研究方式分为两大类：即新古典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它们并不互相排斥，但却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本文的目的是有用的。

新古典主义的研究途径

这一类包括有：现代化理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的发展经济学。

最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以不发达的初始状态作为出发点，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造这种状态。它假定进步的空间的地区分布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借助于地理上的邻近和相互作用，社会经济进步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并且反过来改造这个空间范围。

我认为，现代化理论已经让几位批评家（其中包括弗兰克、阿明、罗克斯伯罗、基尔比、勒费尔贝、泰勒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它最多不过是启发式的探索。除了少数例外，这个流派的理论过于一般化也过于含糊，就是用社会科学界比较宽松的标准来衡量，也难以认真对待。由于它实际上只是美化西方的成就，因此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切实联系。它把西方社会当作理想，把发展过程看成是西方化的过程。而每逢这种理论同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它便力求使后者变得与西方的社会结构同型（isomorphic）；每逢这种理论遭到文化上的抵制，它便宣称人们的态度需要现代化。这一套理论与第三世界的历史特点南辕北辙，根本说不到一起。

就其整体而言，新古典主义各学派的文献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进程所作的解释，可以说是制造混乱有余而无助于增进科学的理解。这并不是说其中全部具体概念和理论都没有科学价值。例如，当然不能说凯恩斯的理论、哈罗德—多马的理论、卡尔多—米尔雷斯模型、波拉克—布瓦松努特模型、汉森

---

① 克劳德·阿克，尼日利亚政治学家，现任哈尔科特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的长期停滞理论或李嘉图学派的理论等等没有科学价值。它们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都有严重的缺陷，但是它们都无愧于科学的称号，都是有科学价值的。

问题在于，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些理论本身并非争论的焦点，在于必须把这些理论本身同每每是牵强附会、把它们套用于第三世界的企图区别开来，而这些理论没有一种是针对第三世界情况建立的。把它们强行套用于第三世界，有时简直不管其有无可置信之处的，并非这些理论的创始者而是他人；原作者原来并无把它们运用到这种场合的打算，因而不能根据这种运用来评价这些理论的价值。这种牵强附会的运用，使得这些理论看来比实际上还要糟。

这里有一个问题，与探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否适用于第三世界的问题有关：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或者甚至说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中，简直没有哪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从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个论断肯定完全正确。第三世界未能吸引西方的伟大思想家和学者，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未能形成科学理论上的突破，未产生按西方经济学标准可以算作里程碑的著作，甚至于也没有产生真正饶有兴味的谬误。从这里我们学到的教训应当早就是了如指掌的，即对任何社会来说，科学进步发生在那个社会最为关切的领域，发生在最有权威的社会集团所关注的领域。从这个论断可以作出一条推论：第三世界对西方无足轻重。

表明这个情况的一个迹象是，除了出身第三世界的人之外，美国的大学很难吸引博士生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工作。的确，学术界对试图建立以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

支的努力，有的持怀疑态度，有的嘲讽交加，有的预言它将夭折。60年代以来，人们曾经正确地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创造性思想和理论创新突然中止"。由此可见，60年代以前还出现过独到的新思想和理论创新。

欠发达国家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无足轻重，但它们还是吸引了西方的注意，只不过并没有唤起真正理解落后国家问题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同西方不尊重欠发达国家、对它们没有信心有关。于是西方学者可以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也就可以同样地了解它们，认为他们用于了解自己的理论工具也适用于或必然适用于它们。

由于否认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特点或历史特性，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什么理论都同它们有关，但是又没有哪一种理论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于是西方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日益呈现无政府状态：理论上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由于不全面不完整，脱离了具体条件和背景，应用的方式和目的并非总是很明确，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不容比较，这就使理论及其应用成为无的放矢、毫无意义。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理论已被证伪，什么理论得到证实，情况如何，道理何在。我们落入了一个矛盾百出的世界，而调解矛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情况真是够糟的，人们用来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纯粹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衍生物，应用起来又是生搬硬套，照章办事；也就是说，更糟的是应用时全然不讲结合实际变通行事。很少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人愿意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把西方科学的衍生物及其运用来一番再造，因为除了少数例外，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毫无尊重可言。发

展中国家的经验，除非涉及西方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当作自己的利益予以关注——西方学者对之是不会特别重视或感到兴趣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时期当人人都认识到发展第三世界的必要性时，世界大国之间掀起了冷战，世界上充满意识形态对立气氛。在这个历史关头，处在变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被敌对双方当成互相争夺、对之垂涎三尺的战利品。第三世界国家面对两个敌对阵营，采取或被迫采取哪一边的世界观来为某一方辩解呢？这是问题所在，而且的确是个重大问题。

上述状况妨碍了把西方的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按照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对西方科学的普遍意义投以怀疑眼光，也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投以怀疑眼光，而冷战的目的恰恰正是要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因此西方的发展科学和实践就依然占上风，最好它们能够适应当地情况；如果不适应的话，那就削足适履来适应。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上述情况还不明显，那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还有相当的创新味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学者们愿意对西方理论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和研究方式提出异议。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假象：这个新领域反映的不过是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中占上风的风尚，即凯恩斯经济学的抬头和结构主义正步步压倒古典主义经济学。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来也没有同西方的研究方向彻底决裂，或者试图努力适应欠发达国家的独特经验。

在整个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停滞不前，激发了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浪潮。在这种压力下，结构主义开始走下坡路，古典

主义再度抬头，与此同时，西方的发展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足以证明我们的上述论点。本文后面还要说明，尽管这种理论和实践上趋向保守的转变一再证明并不适应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目标，理论趋势还是发生了180°的转变。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西方某种理论观点的倡导者不愿意把他们使用的理论工具加以改造，或发明新的理论，来迎接第三世界的挑战，还在于如何调整理论以适应已经发生的变化。即使从西方发展实践的客观性质和实践所必需的条件来看，调整和适应原也是必要的。

何以见得如此？举例来说，在应当追求经济增长还是应当追求发展的辩论中，学术界对于使用人均收入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是否合适已一再提出疑问。就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学术性争论，或者仅仅是用对人的关切来缓和一下资本主义弊端的问题。因为这些欠发达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以后，都为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共同要求所驱使，要求实现某些价值，这些价值标准总是在关于追求经济增长还是发展的辩论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些价值包括从愚昧无知、贫困、疾病的压迫下求得解放，享有公民的自由权和政治权利，还有公平地分配收入和承担公民责任。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关心有时候成为十分紧迫而且实际的问题，涉及一个国家能否继续经营管理乃至能否继续生存这样的大是大非。

甚至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学派，也已以种种方式重新界定发展的内涵，以求纳入这些价值，例如包括吸收群众参与的发展，包括利益合理分配的发展，包括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等等。学术界为制定非货币参数的发展指标，已经进行了大量

的工作。然而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指标仍然很伤脑筋，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对各种非货币指标的取舍以及怎样确定特定参数的值等问题意见不一致；对于人均收入增长最终决定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概念之是否可信，也意见不一。

同时，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特别是那些可以在严肃意义上称之为科学的发展理论，都是经济主义的，如哈罗德-多马理论，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和汉森的"经济成熟"（或"长期停滞"）理论，它们都无法把那些与发展的定义有联系的新的非货币的和定性的参数加以整合。所以，尽管对发展及其定性参数议论很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毫无例外地仍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和人均实际收入的逐渐提高。

这就可以开始了解为什么新古典主义观点只能走进死胡同。创造新古典主义各种理论的历史环境和目的与当代第三世界所处的状况以及要解决的问题迥异，所以这些理论与第三世界是否沾得上边都大成问题，更不要说有效地加以应用了。同时，所有试图把这些理论加以修正以适应第三世界的历史特点的一切努力都遭到抑制。实际上这些理论都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尽管它们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是所发生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当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式遭到历史条件的重压、需要质的飞跃时，它的反应是宣告退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的发展理论思考，更多地倾向于凯恩斯而非古典经济学传统。到50年代末，结构主义占了上风，其突出特点是不信任价格机制，对若干综合变量和国家的干预作用有兴趣。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是國家如何采取措施以促进国民收入增长，以及怎样操纵综合变量，这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尤其突出。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

家，如努斯克，把发展和增长主要当作工业化。有些经济学家对工业化与发展不会或故意不加区别；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罗斯托，又把工业化与发展混同于西方化。人们对社会整体的运动比对个人的福利更为关切。

在70年代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里，结构主义受到压力。只关心经济的运动而不关心个人福利这一条终于受到了批评，人们说它经济主义色彩太浓，批评它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批评者还指出结构主义忽视贫困与失业（后一指责理由有欠充分）等社会问题。鉴于这些批评，西方的发展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失业、增长对分配的影响、基本生活需要、生活质量等等问题。联合国组织把70年代宣布为收入分配和就业十年，集中体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

其实这种表面文章意义不大，因为尽管人们对失业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叫喊响彻云霄，到处听到应当关切人的呼声，究其实际，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归结为人均收入的逐渐增长的观念仍然占着上风。纵观西方发展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从古典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到后结构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新古典综合派中的各个流派从一开始就显出不中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它解决不了问题。它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过对科学的重视（即重点不是放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即实际上能否促进发展——而是放在西方的做法和价值观上）；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压倒了科学的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综合派表现出没有自我校正或发展的能力，于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发展理论走进了死胡同。但是我们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呢？

非洲的危机

这个问题得以澄清，不是通过理论著作或各种理论是否有效的争论，而是靠社会实践。求发展的努力，记录暗淡，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几乎都经常陷于经济危机之中。50年代发展中国家似乎干得不错；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4.7%。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正如某些学者所担心的，发展通常伴随着收入不平等，失业现象持续存在。

从6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经济走下坡路，终于陷入深刻的危机，特别是非洲。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年增长率在1960—1965年期间为8.5%，1980—1981年下降为3.6%，1982—1983年进一步跌落到0.4%。采矿业的年增长率在1960—1965年期间为18.5%，1981—1982年下降为负增长－13.2%，1982—1983年更跌落为－24.6%。农业的年增长率由1960—1965年期间的1.4%，下降到1982—1983年的0.4%。虽说此前有一个显得不错的时期：1971—1980年期间全世界的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年增长率为3%。但粮食方面，增长率由1960—1965年期间的1.6%下降为1982—1983年的0.2%。70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达2.8%，而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仅为1.5%。粮食自给率由60年代的98%下降到1980年的86%。1980—1984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9%，而粮食的年增长率仅为1%，导致粮食自给率进一步恶化。

由于商品价格下跌而负债增加，危机进一步加深。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主要商品综合指标表明，以美元或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跌24%（以1979—1981年物价指数为100），非洲商品价格跌落到近五十年来的最低点。1986年商品输出总额为4500万美元，比1985年的6400万美元下降了29%。非洲的经济危机因沉重不堪的债务负担而加剧。据非洲统一组织估计，从1974到1985年，非洲各国的外债总额，包括短期债务和累积起来的未偿还外债总和增加了6倍多，1985年超过1750亿美元。

偿债能力日益下降：许多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与债务偿付义务之比已接近50%，如果把全部债务偿付义务（即连同业已到期而未付的债务）一并包括计算，则有许多国家的偿付能力将成为负数，到了无法承担的地步。

债务负担使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更为恶化，这就是非洲资金外流。1986年的资金外流净值据估计超过300亿美元。从经济上看，二十年来非洲经济的总面貌可以说是一个吃不饱饭甚至忍饥挨饿的大陆，让无力偿还的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步履蹒跚，根本产生不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发展的努力是明显可见的，不可能有多少人会怀疑它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奉行这一流派的某种发展战略。尽管非洲国家作出了努力，它们还是大都未能减少对前殖民地宗主国的依赖，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股活跃的力量，特别是在经济生活领域；新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最为薄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最大。非洲国家不仅仅接受西方援助，引进西方技术，吸收西方投资，他们也吸收西方的

经济思想。另一个因素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各国经济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危机愈深刻，它们的影响愈大。自60年代以来，对非洲各国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古典综合派，其影响要胜过其他流派很多。由于同样理由，从非洲各国经济的状况来看，就有充分根据驳斥新古典综合派的效力，或者至少也要对它提出严重的怀疑，并且应当引发人们重新考虑发展模式和改变政策。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随着非洲各国经济的削弱，西方对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加强了，鉴于非洲各国经济与各自的前宗主国的经济趋于一体化，这个情况自属意料之中。非洲独立已经二十五年，也曾致力于与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交往，但这些极少改变非洲各国经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对后者依赖的一体化的状况，所取得的微小成就不过如下：非洲各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来微不足道的贸易额略有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依赖的趋于多元化略有进展，即不仅限于依赖原来的宗主国；还有就是非洲国家更多地是作为一个集体而依赖西方，不仅是某些非洲国家各自对特定西方国家的双边依赖。

促进依赖关系的多元化和集体化的机制有：西方各国首脑讨论经济的会议，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一些强有力的为西方所控制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非洲各国经济在危机的深渊中愈陷愈深，随着它们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信心的下降，它们对西方的依赖只能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延续下去。每一桩经济灾难都带来更多的依赖，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严重损害了生产能力和自力更生的前景，并且促使非洲国家谋求外援；实行保护主义的

西方市场和进口物资的高昂代价，都妨碍工业化进展，并诱发对进口的依赖和继续初级生产；贷款的高利率和巨额债务限制了经济发展，引发更多的借贷，甚至终于导致反向的资本转移；农业政策上的失败促使依赖粮食进口，如此等等。危机加深了第三世界对西方的从属关系。在这方面表露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的新作用，这两个机构作为西方资本的集体代言人，足以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它们关于如何应付危机的观点以及结构调整的一整套措施，都属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一种倒退变种，其特点是把市场法则的陈旧神圣教条抱着不放。

这些情况的意义如何？把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一套看来已经信誉扫地，在这样的时候，西方却继续把这一套强加给非洲各国，更加来劲，更加君临一切。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在不顾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正确性或有效性的问题似乎没有人提出质疑。在把这一套强加给非洲的同时，西方学术界对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极为贫乏：没有新的理论问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死亡，这样说并不过分。

但是尽管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兴趣已经消亡，以新古典综合派的一些最正统的流派的主张作为依据而制订的政策，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西方的援外和发展机构中却依然如故，很吃得开。就好像理论与科学工作一旦止步，政治和政策就干脆取而代之，就好像是西方知道靠科学道理说不服人，干脆决定凭实力我行我素，而新古典综合派的倡导者们则似乎已经承认他们拿不出什么新货色来。

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途径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萨米尔·阿明和龚德尔·弗兰克等，他们论证道，由于它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不可能保证充分就业、平等或任何有意义的发展。这个论点也是一个有关资本主义成长过程及其含义的理论，然而是一个否定的理论。它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既处于边缘地位，资本主义在这里便不可能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途径同样失之于联系实际不够，因而最终归于失败。这个问题要追溯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它是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矛盾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提出来的，它也同资本主义有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是否定资本主义的阴暗面，马克思主义关于另一条发展道路和另一种社会的观点大部分是隐含的，不很具体的。

马克思未曾研究过在世界落后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注意力限于西欧正在成熟的资本主义。诚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全球性的现象，并且是这样对待它的。资本主义发展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是顺便提到，有关论点散见各处。

这一情况也绝非巧合。对落后的(农民)社会的冷漠和不屑一顾，这宗遗产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农民被当作反动力量，农民社会被看成拖历史进步的后腿。这反映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几种生产方式没有连续性。它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没有它特定的

发展辩证法。至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分析各种生产方式，却根本没有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态度无助于对落后国家的认真研究，也无助于研究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影响。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资本-殖民主义的破坏作用很清楚，但是他直到最后还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落后国家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这一态度无助于激发对落后国家的研究兴趣：既然认为资本主义的影响于它们有利，正如对其他国家有利一样，于是乎也就没有必要仔细研究这一影响了。

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再提出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不幸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1905年的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党国际团结的垮台、资本主义在增加实际工资方面的惊人能力等等，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了。希弗亭的《金融资本》、卢森堡的《论资本积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接踵问世，都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有所建树。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当中没有一位仔细研究过遭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落后国家。无论如何，他们所作的假设是：落后国家发生的事，主要被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发生的事所左右，于是乎需要着重研究的和理解的是中心。

6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流派的注意焦点，是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发展是否现实，是否可取。有一系列影响很大的著作问世，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这些著作论证说，在落后国家，资本

主义的发展既不可能也没有进步作用。第一部开创性的重要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和研究中心还有：龚德尔·弗兰克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欠发达状态》和《发展的社会学与社社会学的欠发展》；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特别是普雷维什时期）以及设在智利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

这些著作对落后国家问题的研究，表面文章多于深入实质。除了拉美经济委员会主持进行的研究工作以外，所发表的著作或者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或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探讨。他们对落后国家的兴趣是附带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些著作不是对落后国家发展的具体研究。例如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便不是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经济的论著，而是一部涉及影响经济上的剩余价值的大小及其利用的各种因素的理论著作。

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作中，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在第三世界发展资本主义是否可取和可行。近来发表的著作的特点，是理论观点又复归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发展是可行的、进步的。新的论著大都对依附论、欠发达和世界体系规范进行批判。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批判明显地缺乏具体性，几乎没有什么著作可以同列宁在《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的严谨的具体分析相比。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事实：大部分著作，例如吉朋、奈俄科斯摩斯、巴纳基、泰勒、伯恩斯坦、拉克劳和菲利普等人的著作，关切的是某些著作是否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证说若干从依赖世界体系和欠发达观点撰写的著作不够马克思主

义。论证的语言繁琐啰嗦；从来没有见过学术界的争论是如此激烈，而又对它所试图阐明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

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途径就说到这里。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又怎样呢？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况又怎样呢？科学社会主义总可以提供一种发展理论吧，无论如何总可以提供一个研究途径吧？至关重要的是，不可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同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本文所进行的批判，主要适用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发展理论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对发展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必要根据我们的一般论点对这一方法所处的地位作必要的说明。要进行恰当的论述，就必需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很仔细而繁复的、因此就必然是冗长的分析，本文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不使全文失去平衡。所以我们只能扼要地讨论几个要点，对一般趋势作一些说明。

一开头就得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落后国家的发展理论是一个问题。有一种明确而且有力的发展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它认为来自社会存在的矛盾、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上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当这些矛盾成熟之时，就会发生改造现有生产方式的革命。在这个矛盾和通过革命解决矛盾的循环不已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经过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各种社会和历史上各个阶段以基本上相同的方式发生。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被看作是使发展普遍化的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扩张趋势，在资本主义囊括全世界、渗透到最落后的国家并迫使它们为

自己服务以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落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被改造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因其内在矛盾而终于导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对落后国家来说是一段痛苦和残酷的经历，但它把它们吸引到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并把它们引上进步之路。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拥有全球发展的普遍理论，其中也包括落后国家发展的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有用，因为这种理论还很初级，因为它属于把普遍原理运用到具体情况——这里指的是原来的理论只感到边际兴趣的具体情况——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虽然科学社会主义断定会发生全球革命，它的注意焦点仍然是工业化国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运动才是推动全球革命的原动力，这种全球革命并不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

把马克思关于发展的学说用于分析当代第三世界的社会形态并指导行动，我们发现还有重要的漏洞需要填补；而且，有可能作任意解释的余地太大。在进行这种填补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并不总是好事，因为会弄不清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现存理论的扩充或修正，或者所运用的已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再者，不论扩充或修正，总要回归到原来那个理论中认为重要的论点上去，尽管这些论点从修正原有理论的观点看，或从所探讨的现象经验看，并不一定最有助于阐明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当代第三世界社会形态的分析，似乎都搁浅于资本主义在欠发达国家中能否发展、是否可取的问题。一个与此相关、不断被提起并造成很大混乱的问题是：欠发达国家当前是否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以求达到“真正的”目标，即发展社会主义？

运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存在漏洞，为填补这些漏洞又会遇到问题。就此而论，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能否当作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看待，就不是那么清楚的了。

把这一点只看作弱点，是不妥当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力量，正是与此有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并不热衷于绘制世界应当如何的蓝图，毋宁说它更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重视行动的独特作用；它不仅仅要求直接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而且也要求再创造借以指导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的重要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勾画运动的一般道路的发展规律，而让阶级斗争的实践去决定事物的未来面貌。

最后，科学社会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理论，不如说是阐明了革命斗争——一场为结束剥削、为发展人的潜力而进行的斗争——的理论根据和模式。这一阐述并非没有缺点，但不必在此纠缠不休。我们只想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变革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却很难把它看成是当代边缘地区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论。

前景

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死亡，必须放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才能正确理解。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诞生在冷战开始的年代，刚出世就成了政治的俘虏。互相争权夺利的大国知道，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在它们夺取世界资源和争霸的斗争

中，有可能在维护它们各自的价值观上发挥重要作用，是一笔资本。于是它们纷纷推出"正确道路"，把各自的意识形态代表作权当关于发展的科学来兜售。由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条件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便立即成为政治棋子，此后再也没有多少机会取信于人。

在70年代后期，由于一股新的政治保守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情况更加恶化。保守势力的这一攻势在思想理论上并不高明，但是在政治上举足轻重，他们决心以极少的代价使第三世界摆脱激进思想的影响。事实证明他们很容易就办到了。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为深刻而且长期的经济危机所削弱，陷入了对国际资本过分依赖的境地，表现得很驯服。西方于是得以坚持它的一套做法，由一批国际发展机构出面主持，把各式各样的结构调整方案强加在第三世界业已多病的经济上，而不管这些方案是否真正解决问题。西方国家在敦促落后国家接受它们那一套计划时，似乎连科学客观性的伪装都用不着了。这种情况使社会科学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更加衰落，特别是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变得几乎完全不切实际。

各门社会科学的处境，以及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处境也很不利。我们的时代很难说是什么社会科学的黄金时代。除了心理学和人类学之外，简直说不上有什么生气或激动人心之处，而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活跃则像是得益于自我怀疑。各门社会科学的现状与西方保守倾向占上风不无关系，这种保守倾向复活了意识形态无所谓的心态，造成一种对现存社会秩序沾沾自喜、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认为自己的社会问题无关紧要，只需要作一些小调整就可以解决。

这种心态无助于刺激社会科学，无助于提出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问题，它引导社会科学只去探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即使社会科学更富于创新精神，更为激动人心，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未必会得到很多好处，因为它割断了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联系。这种割断联系是几种矛盾的集中表现：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心(西方国家)生产，在边缘(第三世界)消费；西方学术界接受的社会科学与落后国家社会的需要脱节；西方学术界接受的社会科学——它主要是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科学——所宣扬的保守价值观与关于发展的社会科学——它必须是进行激烈变革的科学——的需要之间发生矛盾。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认真严肃地关心发展问题才能取得进展，但西方对落后国家的关切，往最好处说也是暧昧的。

从我列举的种种理由来看，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已陷于萎缩状态。很不幸，这种明显的萎缩发生在欠发达的危机已严重无比、促进发展至为迫切的时刻。第三世界许多地方收入停滞不前或下跌；有些国家收入水平还不如十年前。大多数国家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到崩溃程度，使初级产品的生产者无力促进经济增长。除了少数例外，第三世界国家在沉重的债务负担的压迫之下步履蹒跚，而这种债务负担还在与日俱增。技术差距在扩大，有把世界的先进部分同落后部分完全隔开的危险。由于落后国家的十足落后，它们将与先进技术绝缘。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人物个人贪得无厌，对人民滥施政治压迫，实际上已丧尽人心，这就不能不损害这些国家以本国为中心而求发展的前景。领袖人物疏离追随者，国家极端贫困；为争取剩余(价值)的斗争更加激化——这些情况绝不能为知识的生产或制订促进发展的战略创造有利条

件。

前景如何？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改善。因为，债务庞大；商品价格下跌；北—北投资和北—北贸易的倾向加重；外贸条件恶化，工业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激化，并在实施超过国力许可的发展战略。

国际环境看来也对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愿望不利。由于它们处于近乎绝望的贫困状态，这些落后国家已对先进国家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先进国家转为彼此打交道（投资、贸易）。有种种迹象表明，先进国家已放弃为了安抚穷国而促进发展并与它们结成伙伴关系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对发展不利、对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取得进展不利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很可能只剩下外生的与实际斗争脱节的一种，对于贫困的国家即使有关，也很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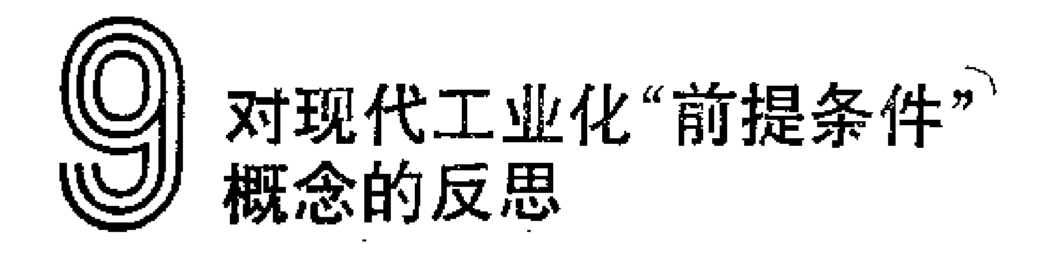
（杜琦译自《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



第二编

工业化道路与模式的再探讨





9 对现代工业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

[美国]格尔申克隆

现代工业化的历史性前提条件是一个相当难以理解的概念。在工业化可以开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碍必须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则必须创造出来。从正反两个方面说，这个概念如果不是意味着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至少也是意味着工业化必须依某种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工业化或多或少地要经过某些各自独立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发展的一致性的观念，意思就是任何一种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必须根植于同样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种为建立某个工厂需要具备某些极具体事物的常识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长期的历史性变化。

一

前提条件的概念虽然看似有相当确定的内涵，但是作为构成前提条件的各个因素则界定得较为含糊。这种分析往往

采取一种古怪的程序。人们首先研究前工业化经济"理想模式"的问题，如14世纪时西欧的中世纪经济，同时强调一种严格限制发展机会的社会结构。接着，就像摄影机换镜头那样，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现代工业经济。景象的变化自然是令人吃惊的。经济进步的范围与内容是巨大的：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化的广大地区；一个保证个人权利和有效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技术知识的大量积累；农业上由于取消了露地耕作制和分配了公共牧场而有可能提高生产力；有可能提供属于各种技艺的劳动力；一个愿意并能够从事测算和创新的企业经营群体；资金有可能进行长期投放；不复存在行会的种种限制；广阔而有吸引力的市场；如此等等。

随后，笔锋轻轻一转，所有这些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就被宣布为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了。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种做法的意义无疑是消极的。在它们能够踏上工业化进程之前，它们在实际上是否必须创造出这些条件呢？显然，上面所谈到的某些因素根本就不是什么前提条件，而不过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而已。此外，在某些历史事件中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前提条件的事物，在另一些事件中可以自然得多地看作是工业化的后果。什么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什么是对工业发展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界线看来是很灵活的。也许可以提出某些规律，据此可以在这条界线的这边或那边发现相关的现象。

工业发展具有某些基本前提条件的思想包含着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发展的特点既有高度的普遍性，又有特殊的间断性。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类型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前提条件中抽出"资本有效性"这一条，并以此为例，较为详细地探讨一下前

提条件这个概念的性质、确切性以及实用性。

当资本有效性转变成为一个前提条件时，它就表现为"资本原始积累"这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里，亚当·斯密针对厂商生产过程所用的预先积累（previous accumulation）的概念，由非常实际而又非常短期的概念，变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普遍性原则。它指的是持续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大概经历了数个世纪的一种资本积累，直到有那么一天，工业革命的警钟把它召唤到了工业建设的战场。

据大量的文献所载，这个概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后微弱的回声，大概是凯恩斯把德雷克掠夺所得的赃物指称为英国海外投资的源泉。①

但是，现代的研究对马克思的某些以经验为根据的发现提出了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对他关于16世纪时英国圈地运动的估价。原始积累的那些所谓来源——海盗掠夺和战争、殖民地的开发、贸易、圈地运动、城市的房租、贵金属的流入——的相对重要性与我们的研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当然有一点基本事实应当除外：不否定原始积累这个概念的实质，就不能把工业利润看作是原始积累的来源。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我们暂时从分析的而不是历史的角度来看原始积累，并且试着把这个概念作为工业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有关的问题就是这样：发展为什么一定要按这个模式进行呢？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为什么一定要先于迅

① 约翰·M·凯恩斯：《货币论》（伦敦，1936年），第2卷，第156—157页。

速的工业化呢?正在积累中的资本为什么不投资于工业企业,使工业增长和资本积累得以同步进行呢?至此,马克思的积累的"原始性"可以还原为斯密的朴素的"预先性"了。换句话说,专属于马克思的概念不复留下什么意义了。所以,要捍卫马克思的概念,就必须排除掉渐变的工业化的可能性,并且依据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认定工业化或者是突然发生的,或者根本就不会发生。在发展过程上必须有某种特殊的非连续性,这样才有可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一过程的开端。

根据近年来的讨论,提出造成"突然发生或者什么也不发生"状况的条件并不困难。比如说,人们可以通过考虑各个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必需的最低限度资金和技术上需要投入的其他企业产品的可行性,从工业化经济上最低限度资金需要的观点出发,在技术上进行论证。这种不可分性和互补性表现在供给方面,在达尔曼的发展障碍的概念中表现得十分明晰和精巧。人们也可以单独地或者综合地从需求方面进行论证,假定广泛的工业发展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工业经济的不同分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相互需要彼此的产品而产生了许多新的企业。如果工业化是突然的飞跃,它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个工业化是根植于"前工业"时期庞大的资本积累之上的。在这个突然的飞跃中,这种积累基本上表现为对经常性产出的要求,并使资财有可能从消费转向投资,而这里的投资数额须足以维持工业的高速增长,所以是很巨大的。这可称为自给自足观点,即认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在逻辑上确实是联系起来的。

另一方面,成功的工业化必需由多种不同因素的结合的观点的根据是一个明显关联却有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比方

说，只要绝大多数人口还被严酷的农奴制度束缚着不能为工业所雇佣，工业化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这种制度的突然废除确实预示着工业发展的开端。这个开端有很明确的标志。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为理由而认为这样一种工业发展的资本需求量一定极高。我们为说明这一个道理，还必须引用其他一些论证手段。农奴制度的废除可能释放出一些潜在的企业才能，一些被压抑的需求，等等。但是，这一类的非连续性现象并非源自工业化过程的本质。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有关前工业时期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结果之间的基本联系的任何明确论述都是徒劳的。奇怪的是，唯一提到的解释是封建制度束缚的消除，也就是说，只是提到一种偶然现象。然而，这一点并不重要。严格地说，不能否认原始积累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这色彩放射着马克思直观才能的光辉。

此外，这种直观不仅仅是分析性的，而且也是历史性的。关于现在的一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性质，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能肯定：大多数工业发展都是在一个准备阶段之后，採取巨大的飞跃方式来实现的，其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的进度异常快速。我们无论考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或意大利的现代工业化的历史，都可以发现这种工业产品增长的浪潮。当然，实际的历史状况不可能与假定的分析模式精确地完全吻合。只能有保留地认为工业化的这些飞跃可以真正看作是“发轫”。不过，考虑到那些必要的条件，还是有理由说，欧洲大部分重要的工业化或多或少都是从强烈的工业革命开始的。

对这个引起争议的术语说几句话，也许是适宜的。在英

因，"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常常受到批评。实际情况很多属于惠辛加所称的"历史概念膨胀"的性质。就像"文艺复兴"的概念一样，起初完全认定其时代在16世纪，后来改变了，推移到以前数个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始也从18世纪被推移到17世纪以至更早的阶段。在这变动的过程中，原先的含义消失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尊重历史连续性的号召下作出的。对某些作者来说，历史连续性过去是、现在也许仍然是一个时髦的概念。在目前，历史连续性的运用至少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显得很混乱。连续性可以指一个既定现象的历史根源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然，作为一般的命题，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它还是所有历史著作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可是，关于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它没有说明什么，特别是没有说明这个过程究竟是革命性的还是演化性的。举一个政治史上的例子来说：俄国伟大的经济史学家彼得·司徒鲁威曾经认为，这个世纪的俄国政治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1730年女皇安妮撕碎了由一群高级贵族呈送给她签字的一份宪法草案①。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权且不论，假定它是正确的，那么，一个事件的根源非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事实上也并不一定说明它是演化性质的。就革命的发生来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确是革命性质的。同时，连续性的概念还被用来表示在广大的历史范围之内事件的周期性重复发生。在此种意义上，我们使用（不论是对还是错）像新重商主义那样的概念，特别是如李普森所说，当这个概念意味着回归于"计划的正常状态"的时候，即如旋风循着其旋转路线完成其自然形

① 《俄国社会和经济史》（巴黎，1952年），第314页。

式①。最后，连续性还用以表示逐渐的改变，其渐变幅度是不易察觉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采用的那条格言"natura non facit saltus"（大自然不作飞跃）的意思。现在，人们也许憎恶革命和任何剧烈的变革；可是另一方面，人们也许觉得没有革命的历史乏味得令人难受。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个人的好恶，也不仅仅在于查明正确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速度和速度的变化都是任意性的概念。就我们所谈论的可量度的现象来说，那些概念有赖于决定速率和加速率时所使用的特定的平均技术，有赖于所选取的时期的长短。而这些选择则又必须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的要求。从一种意义上说来是一场革命，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来也许可以看作是十分缓慢的渐变。一个概念实际上等于可以因它的帮助而发现的事物。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所理解的"革命"只不过是工业生产增长率上一个突然的上升变化，又如果由于工业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往往随着速度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异，所以我们所认定的那种加速运动可以看作是增长过程中的独立因素，那么，经济史学家们就不能断然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事实上，西欧长期工业产量指数中许多迫使历史学家们局促不安的革命现象是不容否认的，恰恰因为工业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是同早期工业化的这些巨大飞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问题就说到此处为止吧。就原始积累这个概念来说，也许说得不够充分。确实，迅速增长发轫阶段的存在，看来是有利于说明这个概念的。如果不能确定这类阶段，那么这个概

---

① E·李普森：《计划经济或自由企业》（伦敦，1948年）。

念也就不可能成立了。既然可确定，那么进一步的探讨是合适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是：实际上，是否可以认为原始积累在有关国家迅速发展工业的阶段给了它们物质上的重大帮助。

二

在触及问题的这个关键方面之前，我们可以简要地谈一下与原始积累概念有关的几个特殊难点。同时，这个概念还受到"膨胀风"的影响，这一过程的起点越移越远，一直移到近代时期最初的起点，而在某些著作家笔下，甚至更远溯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

为支持这一概念面大量收集起来的历史材料以实际意义表明，在某些更早的历史时期，某些人竭力谋求成为巨富。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财富不仅被创造，而且也被毁灭。富格尔家族获得了巨大财富，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宗财富大部分是依靠家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而取得的，后来又因这种关系而毁灭。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南部德意志的财富积累在欧洲经济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南部德意志输出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模式影响了极为广大的地区。这些活动打破了前一时期促使欧洲经济停滞的紧缩通货的压力。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对原始积累的概念提供合理解释。富格尔家族的财富浪费在权力政治和战争费用上，化成了无数战场上的硝烟，又在西班牙的经济破产案中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就算桑巴特把城市房租作为中世纪财富一个来源的理论

是对的，我们仍不得不问："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仍然有责任去探究那些财富的历史，直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化巨大浪潮兴起的时候。当然，没有人曾想做这项工作，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设想，不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也可以知道答案将是什么。换句话说，原始积累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概括；我们为接受这个概括，必须就类似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等同样重大的事件进行抽象工作，按照这个意义来说，这个概念过于重要了。

因此，根据历史上为工业突进作准备的漫长时期进行思考，是否能有完美的历史意义，是个极为可疑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把原始积累的时期大大地缩短，其他的困难仍然存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可以较易进行迅速的工业化，这样说说是容易的。作为一种抽象的表述，这个命题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历史的现实中，财富原始的可用性若要对工业化有所贡献的话，它就必须集中在某些人的手中，这些人或者自己愿意投资于工业企业，或者愿意并且能够按某种方式把财富转交于直接从事工业化的那些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财富都必须按某种直接的方式，或者通过某种金融上的转移手续，能够进行这种转送。人们可以想到许多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财富即使在潜力上说来是可用的，而且按适当方式可以取得，但事实上并不能到达工业企业家手里。一种积习很深的囤积传统就足以形成有力的障碍。土地所有者阶级唯恐工业发展使他们失去社会上的显赫地位，这种担心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拥有大量可以自由处置的流动资金的商人们，也不愿把自己的资金用于工业冒险，因为这种冒险会破坏与他们有密切而又重要的利害关系的放债制度。简言之，根本保证不了先前积

累起来的财富可在事实上用作工业投资。

然而，与其对"原始积累"的概念作进一步的证明，不如就拿它作为近代工业化的一项历史性的前提条件吧。应当弄清楚，这个概念，即使在合理地规定其性质并去除其原先的重要性之后，在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下，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发展真正的前提条件，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很难或者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认为它具有重大的意义。与这个问题相衔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工业发展前提条件概念含义的第二点：即工业化发展过程一致性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无论在地球上哪个部分出现了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都得重复早先一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过程的全部基本特征。看来这样一个假设会引出从整体上把工业化过程看得过于简单的观点，特别是对其发轫阶段来说是如此。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再一次唤出历史上"独特的和个别的"幽灵。上文对于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模式而不是反对众多的模式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再者，应当明确一点，工业发展的统一模式是完全合理的。无论在何处，工业化都意味着增加固定资本数量；意味着在技术上、组织规模上、农业劳力和小手艺工人向工厂工人转化上的种种变革；意味着愿意并且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的出现。

有一种建立在从英国经济史中搜集的经验资料上的通用模式，常常被用来描述欧洲的工业发展。这种做法并非完全不对。所有的工业化活动确实有一些共同之处，英国的经验过去有、现在仍有若干说明以至预见价值。对于某些论题，强调工业化的这些一般原则可能是很有益处的。但在另一方面，问题是同样确实的：一般原则总是位于很高的层次，随着研究

的深入，人们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必然要碰到不合于通用模式的种种事物。这时，如果历史学家们不否认这些不愉快的不正规情况，就得面对两种选择：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例外来处理，或者把这些偏离原始模式的事物纳入一个新的、但必然较为复杂的模式。这在经济史上并不是特异的现象；相反，这是一切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凡是研究大量重要事件的历史学家，大概对这个问题都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懂得，在原则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要改变一切后来事件的途径。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同样举动，都对后来所有的工业化进程发生了影响。

本文作者有时觉得，如果我们不是运用一个无所区别的工业化统一模式，而是联系到有关地区在其工业化大突进前夕的落后程度考虑工业发展的进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深入考察，并获得更深刻的了解。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它可能把个别地区工业演进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其落后程度范围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般进程上的特殊形式、畸形状态或例外。这样的观点对前工业时期的积累问题和一般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问题具有直接意义。

在这里，没有必要对这个通用概念在可能的简单介绍之外再作详细的论述了，读者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较为充分的阐释。① 但也可从两个有关的论点略谈一下。任何解释性的工作，都会遇到什么是"可理解的研究范围"的问题。可理解的事物自然必须根据手边的问题确定其可理解性。西蒙·库茨涅兹曾经详述理由，说明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国家，在研究经

---

① 见《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4、7、8各章。

济发展时应当被视为基本的考察单位。他指出不论是一国内部的某些地区，或者数国结合而成的集团，都不能成为更有意义的单位。他谈到按照"各国"取得数据通常是可行的，同时他坚持他的论点，说一个国家提供了充分的"大量历史经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如果我们把工业发展当作孤立现象来看的话，我们不可能了解任何国家的工业发展。落后当然只是一个相对意义的词语，它是以假定有较先进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此外，只有就几个国家在不同的落后水平上比较其工业化过程，我们才可能希望分辨出什么是某个工业演进阶段偶然出现的现象和什么是可以合理地归属于某一国家发展上的历史性的差距。最后，也仅仅是因为落后国家是包括一些较发达国家在内的广大区域的一部分，所以那种历史性的差距大概可以用一种明确可以理解的方式加以克服。

另一个论点指的是落后的可计量性。这是一个运算项吗？如果人口的平均产值或人均收入可以作为落后程度的合适尺度的话，那么离问题的满意解决也就相距不远了。实际上，我们仍是未能越出数据的可得与确实以及指数问题的范围。虽然如此，严肃的计量问题还是一定要遇到的。拿不同国家的产值与一个特定国家的价格体系相比，就会造成国家间的极不同的地位，这是由于使用不同国家的价格体系进行比较的结果。在实践上，只有最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可在国家群中选用，因为较落后国家在产值和相应的可用价格数据上有较多的局限性。

可是，按照人均产值来下结论就行了吗？显然，人均产值的水平也许是不利的气候条件或者是贫乏的自然资源所造成

的。既然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那么，通过自然资源和良好气候条件的相互作用来计量产量数值实际上是要不得的。而且，这些决定前工业时期经济部门产量高低的条件，在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革和工业化业已开始之后，在某些限度内还或多或少地发生影响和作用。

最后，不论如何计量，产值能否就是衡量落后程度完全满意的量尺，还是不能确定。人们或许要求用较多动态的方法来断定落后程度。这就涉及探究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为其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何种程度的前提条件。假定甲乙两国在人均产值和自然资源方面是相同的，但乙国现有人口中文盲的比重相当大，这就为迅速获取工业技术制造了障碍；或者假定乙国人民由于宗教上的原因，认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对上帝的不敬，因而安土重迁，而甲国的居民则没有这种感情，却是广泛地追求金钱的刺激。这样，如果在落后程度的概念中不包括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意义的因素，能够说得通吗？显然不可能。由完全不同类的因素结合而成共同准则的权衡方法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不可能确定这些可以加以衡量的有关因素的准确数量。尽管不情愿，人们还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落后程度"难作精确的计量。不过，这类性质的结论仅仅是令人泄气吗？重要的在于，得出这个结论为的是防止引人误入歧途的观念和虚妄的希望。另一方面，这个结论距离历史分析方法所要求的高度准确性也还是很远的。

历史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把历史过程中的某些差异与有关经济制度上某些特征的存在与否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完全是互不关联的，而且各个个别因素总的说来趋向于一个共同的方向，那么，我们可以希望，不必求取任

何精确的计量，就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材料，由此取得有意义的、而且也不是完全不重要的答案。而且说实在话，在我们观察19世纪欧洲的经济景象时，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纪中叶的话，那么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德国在经济上落后于法国；奥地利落后于德国；意大利落后于奥地利；而俄国则比上述任何一国都落后。同样，很少有人会否认，英国在那个时代居于最发达国家的地位。无论我们是否考虑产值水平，技术进步所达到的程度，整个人口的技能，居民的识字程度，诚实的水平和企业家的时代视野，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因素，我们都能得出大致一致的答案。在实际上，我们能够根据各国的落后程度来给它们排队，甚至将落后程度相似的国家进行分组。

我们可以就如此排队的国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飞跃一旦开始就越猛烈。此外，与倾向于大规模工厂和企业的强大潮流相联系的落后程度越高，成立各种级别的垄断性协议也就越容易。最后，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按某种有组织的指挥前进；根据落后的程度不同，这种指挥的方位可以见于投资银行，见于在国家管辖或在官僚机构控制下行事的投资银行。这样看来，欧洲的工业史似乎并不是"早期"工业化一系列简单的重复，而是对那时的工业化有条理的逐渐偏离。

三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要问题，看看在一个远非一致的世界里，一般对工业发展一致性前提条件的概念看法如何？

特别是对前工业时期资本积累的概念看法如何？我们已在上文谈到，使前工业时期资本积累具有潜在意义的是工业发展的非连续性。我们还认为：落后程度越高，工业发展大概也越不连续。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越落后，其先前积累起来的财富就越重要呢？如果我们认为，在19世纪欧洲，资本产出比率趋于上升，因此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越靠后，在其工业化大浪潮中发展速度就越高，而在产量方面，每增加一个百分数，其所需资本量也就越大，那么，上述结论是否更为有力了呢？

事实上，相反情况的出现似乎无可置疑。英国工厂的建立，无疑是极大地受益于多种渠道的私人财富的存在。英国工业发展的诸多特征之一，就是在先前形成的巨大进步的环境中，有许多人愿意投资于工业。但是，在欧洲大陆较为落后的国家，无论是先前积累的规模，还是对工业发展的赞同，都未能与推迟了的工业化事业更大量的资本需求相适应。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提供资本的主要任务就不能依靠任何原始积累，而必须依靠银行制度方面的信贷政策了。确实，银行也吸收现款储蓄和某些先期存在的财产转放与企业家，由此也可应付现期产量的要求，但它的意义并不大。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更为落后的地区，这里的工业化飞跃不仅更晚而且还更多使用暴力，例如19世纪最后十年的俄国，此时我们将再一次发现，把工业化主要归因于任何前工业时期的资本积累是困难的。在这里，必须把国家的预算政策视为资本供给的战略因素。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预算政策就是俄国工业化的唯一资本来源。资本的输入量是巨大的。前工业时期的财富也起了一部分作用。即使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也不能完全否认利润再投资的重要性。对于19世纪俄

国资本的形成，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与新的和正在成长的工业企业预算财务的作用相比较，所有其他资本来源都变得黯然失色而无多大意义了。如果可以稍稍笼统地说一句，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此，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概念，看来已经没有许多问题须解决了。首先，这个概念在时间上必须限制其合理使用的长度，所以其内容就得缩小。其次，在其使用的空间范围上，这个概念还得进一步缩小其内涵。人们也许要求这样推断：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地方的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对每一种情况都必须作独立的研究。然而，如果用这种消极推断拒绝对这个问题的比较研究，那将是不幸的。上文所勾勒的框架似乎可以开辟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对一个较落后的国家，断定其落后程度的一个依据正好是它缺乏那些在较先进国家被作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因素。因此，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探求在落后情况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用什么东西或什么模式来替代其所缺少的因素。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文盲众多与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培训技术工人和有能力的工程师方面的困难，通过从较先进国家移民和运用这些国家的培训设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克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技术知识的储备，同样也可以从国外引进。然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落后国家有着先进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一项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此外，国外资金富裕地区的存在，与原始积累问

题有某种关联。在资本可以从国外引进的状况下，先前积累的国内财富的重要性就相应下降了。不过事实上，资本引进的程度从未十分巨大。根据作者的计算，即使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在为工业化目的而运用的全部资本中，引进资本也只占了一个较小的部分；即使在那个时期为计算全部资本构成而假定很低的资本产量比率，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资本引进不同于转移先前创造的财富到现期产量名下，它意味着进行投资而不降低现期消费率的可能性；同样，如果从国外进口的资本货物是由落后国家原有的积累金银来调度支付的，也可避免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是银行的信贷政策和政府的消费税政策都不能做到的。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以开发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财源，如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那是另外一回事。

然而，这一类考虑没有开始详细论述一系列可能的替换模式。中欧那些不太落后的地区在银行的支持下进行了工业化，再往东一些的较落后地区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了工业化；其原因至少部分地区可以根据某些前提条件的存在与否而得到回答。在19世纪的俄国，有力地阻止银行进行工业投资的，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在一个商业信用标准极低、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与欺诈行为被视为孪生兄弟的国家里，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长期银行信贷制度。在这里，"卖出就是欺骗"成了民俗智慧中经济方面的箴言。精心安排的和反复的破产被视作走向富裕道路近乎正常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甚至认为不得不颁布专门的禁令，以禁止银行从事长期的信贷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俄国政府的活动有力地弥补了以商业

信用上最起码的可接受标准作为前提条件的欠缺。拥有这个前提条件的中欧国家，则因此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大幅度分权类型的工业化财政措施。但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例如在德国和俄国那样商业信用标准不同的原因。这个问题肯定会有许多答案。例如，俄国农奴解放极晚，就一定与这个现象有很大关系。劳役制度培养了说谎和欺骗行为。农奴中间人有许多极妙的理由来欺骗农奴主。法律上对农民财产权的规定不明确，这就很难教育大众有尊重契约义务的精神。不过也许同样重要的是俄国缺乏城市自主的传统。关于经济信用问题的社会学著作还有待人们去撰写，但毫无疑问，欧洲大部分地区手工业行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它们对提高和保持质量与信誉标准所作的努力，对于形成社会中的商业道德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人们可能会论证说，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作为历史上有手工业行会这样的训练学校，就可能用效率较高的银行政策、而不是用效率很低且代价昂贵的官僚控制来替代原始积累作为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在17世纪，有一个眼光敏锐的对外观察家尤里·克里扎尼奇曾经慎重考虑了改变俄国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懒惰与不诚实风气的方法和手段，他认为采用手工业行会是最自然的补救措施。①后来在彼得大帝时代，曾由政府用法令创建行会，但没有获得如同西欧行会自发产生的那样积极的结果。因此，人们可能会说，在俄国，政府的工业化政策还必须起到替代所缺少的手工业行会经验这个前提条件的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在讨论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进步的关系

---

① 《17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国家》(莫斯科，1859年)，第28页。

时，常常把原因和结果混淆在一起。不过，工业进步得到了18世纪时英国农业产量增长的极大帮助，则是很清楚的。但在这里，尽管不那么令人愉快，政府的行动可以再一次被看作是增加食物供应的前提条件的替代。可以肯定，把俄国南部的原始草原转变为可耕地在若干程度上扩大了食物基础。然而，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工业飞跃时期的出现，还是在农业的大危机中。在某种程度上，这危机是由筹措工业化资金而引起的。此项资产的筹措，以及为使粮食得以供应城市并供应出口等事项，采取了没收农民的收入和一定限度地剥夺农民资金的办法。不消说，事实上所有这些办法比之后来苏联政府的土地政策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更无法同苏联政府对农民的无情剥削相提并论。不过，苏联的情况是十分特殊的，而根据许多理由，革命前的俄国则似乎为讨论工业化过程中特殊的替代模式提供了"正常"得多的范例。

食物供应增长的同时，为了满足新生工业的需要而增加劳动力的供应也常常作为对土地改革赋予前提条件特性的因素而被提到。通过19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过程以及后来的一些措施，俄国农村公社得到了刻意的保护乃至加强，这肯定有碍于工业劳动大军在俄国的形成。农民对土地分配权利的永久放弃，造成了财产上的极大损失；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村公社成员随时可被村社召回；到城里去工作必须得到村社当局和家长的允许，如是达数十年。所有这一切，严重地阻碍了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克服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惰性的运动（指工业化运动——译者）。

像无地劳工从易北河东部的庄园迁到鲁尔河流域那样的结局，在俄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永久听从工厂召唤的劳动

队伍，增长得远比其他方面缓慢。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俄国工厂在投资的分量和性质上所作的特殊的企业决策弥补了这个缺陷。许多工业部门使用了节省劳动力的设备，由此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创立可靠而稳定的劳动队伍的困难。同时，在另一些工业部门，引进较为现代化的机器减少了大量的劳动力欠缺，由于操作简便，必要的学习时间也较短，从而预期的雇佣时间也较为合理。按照这个方式，集中力量在技术进步的最新领域上，由此利用落后的特殊有利性，这种被称为落后国家基本倾向的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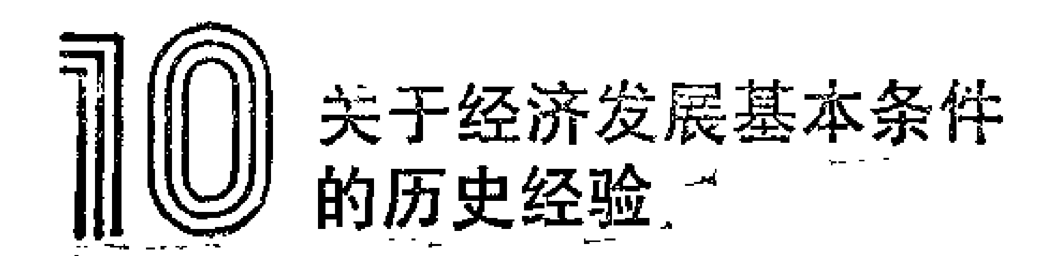
四

上述种种，目的并不在于提出一批例证，也不是要证明或详尽论述所提及的一些关系，而是要通过历史经验来指出：工业化过程是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的。缺乏可视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普遍"原则的某些因素，似乎并不一定减损前提条件这个概念的启发价值。正是从这个概念出发，并努力探索某个特定国家如何在缺乏某些前提条件情况下设法开始其工业化进程，我们才能对在不同落后程度的条件下实行工业化的活动得到某种既有区分而仍一致的看法。当我们研究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时，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可能起了前提条件作用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工业化"原因"的因素，在另一个国家则似乎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个看法对于加强和完善当前的工业化研究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延迟了的"正常化"的发展过程，如果联系到有关地区的落后程度，大概还可以理解得更为清楚。

当然，在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缺乏某些"前提条件"无论如何都应看作是"落后的有利性"。多半由于这种有利性的存在，所以有可能克服缺乏经济进步前提条件的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法则，发展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上文关于多种替代形式的讨论，涉及了对困难、倾向和代价的探索以至衡量和比较，这将是研究工作上的一项富有成果的任务。那种完全蔑视人的价值的替代形式，也许就是大约三十年来苏联工业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

同时，不管怎样，可以有理由提出，过去的历史经验显然可以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一般前景提供积极的借鉴。这意思不是单纯地指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巨大缺陷和障碍。考察历史记录，人们不能不对落后国家在解决其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问题时所表现的机敏、创新和灵活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没有任何先验性的理由来设想，今天站在自己工业化门槛上的欠发达国家，在弥补它们所缺乏的那些在较幸运国家被称为工业迅速增长的最初飞跃的"前提条件"时，会表现出缺乏创造性的适应能力。人们只能希望，在设计它们自己的工业进步的蓝图时，这些欠发达国家将急切地从人类的福利和幸福的角度，选择那些使他们能够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果的道路。

（刘建同译自亚·格尔申克隆：《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英文版，第二章，1979年。）



10 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

[英国]H·J·哈巴库克

我要研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西欧(包括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1914年以前的历史经验，有理由认定这一批国家在以往一百或一百五十年间的某一时期，其总产量都有过显著的加速增长。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尽管这种看法尚有争议)，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上的变化，农业的进展大可视为对工业变化的反应。因而本文主要探讨这些地区有利于工业化的种种条件。

使欧洲成为经济发展摇篮的最重要条件，也许可以追溯到它很久以前的历史。自中世纪初期以来，欧洲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据我们所知在其他大陆尚未发生的经济进步。若按过去两百年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经济进步是迟缓的，仅仅影响到经济体系的小部门，而就长时期来说则是停滞的或倒退的。但这种经济进步，确实是别处所没有的有利条件。这样，到18世纪初，欧洲许多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了那些有利条件；而当今的落后地区经济不发展，人们往往以为就是不具备这

些条件所致；信贷、分配和运输设施、较熟练劳动力的供应、牟利精神，在英国、德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均可见到。这些有利条件虽说并不充分，但企业家们无须像今天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们那样，白手起家地创造它们。

亚当·斯密对这类经济发展的机制所作的论述，仍是最有道理的：由于资质或能力在最初即有种种差异，人类经营贸易的爱好可以扩大市场，促进劳动分工更细；这直接提高了劳动效率，也有利于机器的发明与改进。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两点：（1）由于社会借此更加富裕，所以有能力提供更多的长期使用的设备，这些设备的资本投入，与其年收益相比是大量的；在我们所探讨的社会里，这主要是指改善了的运输设施。（2）总需求的增长和需求的转移，使有可能改进的生产部门涌现并冒尖，有时还产生某些商品供应的短缺，从而刺激人们探求新的方法。工业革命时期大部分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发明理当归因于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而不应归因于人类发明本能的随机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或熊彼得所说的革新家（只是在较为晚近的时期，革新家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机制具有自主性，尽管其作用可因宗教信仰的变化提高了物质成就的价值而加快速度，或因科学知识的获取而加快速度。在没有破坏性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有伸缩性，则发展的趋势就将持续下去，当然其进度不一定是一致的。发展有赖于市场的规模，但发展本身也促进市场的扩大；每一次发展都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并且确实是积极地刺激进一步发展；生产问题每一次成功的解决，都增加了人类总体的知识与经验，借此又可进一

步解决生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技术与态度便发展起来了。

按照上述极粗浅的概括，我以为这就是一直到18世纪时最适合于欧洲发展的模式。在这种缓慢的累积性增长中，当代欠发达国家在致力于工业化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并未出现。发展是在经济体系的许多部门中逐渐产生的——18世纪英国有许许多多活动领域采用新的方法，这很引人注目——这样，经济发展便有助于提供其自身的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力图通过政策建立的各种工业的互补关系，在英国是自发性增长的产物。

经济发展的增殖力是由贸易提供的，拿不断进步的欧洲经济史同其他各洲相比，得出的最终解释是，地理上的简单事实——河流成网、滨临大海、在较小区域内自然优势的巨大差异——这些都特别有利于贸易，有利于市场的一步步扩大。18世纪晚期经济变化的加速，主要是前两个世纪海外贸易大规模扩张的结果，对于这一个老观点，说来话长。

英国工业领先的条件

现在我转而试图对英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加以较详尽的论述，那种发展是与冶铁和棉纺业，与蒸汽动力的发展连在一起的。这些变化在最终加以采纳的欧洲各地并不同时发生；它们是在英国一国若干小地域内实行，然后传播开来的。原因何在呢？

英国商业，无论内外贸易，都大大得益于地理环境，较之大陆国家更少受到破坏性的战争、动乱和政局不稳的阻碍；经

济机制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运转得更有效率，英国经济在工业大变革前的一个世纪中能比其他国家在总体上具有更大的势头，其关键性的原因盖出于此。

再提一个原因，就是在英国，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对任何给定范围内经济机会的利用，其所设的障碍，都比其他国家小得多。

(a)几乎每一个大陆国家都力图依自身利益对经济生活细加管辖——由于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既存体制，所以这种管辖不利于自发的变革。在这种格局中，经济发展只限于免除管辖的、由国家倡导并由国家资助的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国家管辖这种方法并不是促进工业增长的成功方法——政治上的考虑决定了该给谁以特许权，而被给予者则因其特权地位而免受竞争的刺激。一个在很多方面与此类似的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的英国曾经存在，但内战把它摧毁了。与大陆不同，英国政府没有行使其权力去保护有利于产生较高利润者的旧体制。

(b)在英国，社会流动性大得多。在大陆的许多地区，农民仍隶属于形形色色的农奴制度，行会仍是关键性机构。大部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弃农经商是不自由的。由于这两个原因，在英国出身寒微而思想开明又有企业精神的人，发挥能力的范围就广大得多了。

在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发展机制外部条件的那些因素，对这个机制的运行特别有利。发展机制赖以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市场的规模与性质，也特别有利。英国制造商可资利用的市场，其地理范围是广阔的，运输费用低廉，销售设施优良，内地税、通行税等等施行于大多数大陆国家的税种，在英

国也不存在。

英国市场的性质，亦即构成市场的个人的购买力与嗜好，也较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当许多产品因运输费用而在地理市场上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依靠代价低廉的生产，迅速取得了非常广大的市场，这在18世纪的工业地区是办不到的。

(a)首先，当时英国人均收入高于大陆。具有超过最低生活水平而消费工业品能力的人为数众多。推动单个工业扩展的诱因，因此未受现代世界较穷国家的工业所面临的那种毫无弹性的需求所阻碍。

(b)其次，英国消费公众更倾向于充分利用其支配商品能力的一切增加，而不是积聚钱财，也不是消磨其新增闲暇。18世纪有大量文献论述了那些因素，因其阻碍了新的商品需求的流行，从而剥夺了它的刺激作用。一般最害怕的阻力是懒惰：人们不是利用他们增长了的生产能力去购买更多新旧商品，从而进一步刺激发展，而是投闲置散，致使发展丧失动力。这种情况无疑在英国发生过，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也曾经发生过。但在英国社会，力求闲暇的人大概比其他国家少些。英国社会有很大一部分都愿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获取越来越多的商品。

英国市场这两个特征主要原因在于中等收入集团居于重要地位。17世纪末期的英国社会不同于大陆社会，它的大部分国民收入流入中等收入者的手中——根据格雷戈里·金的说法，多达国民收入的一半。这个中等集团相对的重要地位的形成，部分是由于存在已久的社会原因，部分是由于税制的差异。英国的各中等收入集团比较庞大，其原因与前工业时

期所有大贸易中心中等收入集团庞大的原因是一样的。其次，大陆国家的捐税不仅较重，而且为了极小一部分人的利益实行大幅度累进税制，同时向广大人口征税。

(c)此外，这广大的中等市场是个需要纯属大批量商品而不是精致商品的市场，就是说，只需要适宜于机器生产的那种商品的市场。

很显然，上文所述的发展机制在有利条件下可使经济活动出现飞跃，而18世纪末叶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初期的冶铁工业和棉纺工业都强烈要求发明和采用新方法：冶铁工业方面，木材短缺，因而军火的很大一部分即熟铁依赖国外进口；棉纺工业方面，纺纱与织布两部门不得平衡。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比较低成本进行极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而且由此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整个势头。

我以为这些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例如法国的主要原因。这或许与当时英国人把资本投入运输设施有关，但除此之外，我并不认为，工业革命之首先发生于英国可以归因于他们有较雄厚的资本可以利用，同时就运输设施来说，那也是对先已发展的工业的一种反应，而且可以设想，即使资本更为缺乏，运输设施迟早是要建成的。更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的优势。一旦经济发展获得了动量，它就不再受劳动力供应多少的拘束；关于资本的问题，我将于下文再加述及。

进行有成效"模仿"的条件

当时对英国工业革命所发生的反响，大体上有两种。

1．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英国出口竞争的刺激，某些国家直接模仿。新技术主要是一种英国产品（当然也不是没有别国的），故而其他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一般都是接过这种新技术。

2．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则是为英国进口需求的增长所刺激起来的。由于这种需求是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所以其经济增长多半没有采取迅速工业化的形式。在某些国家，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反倒可能阻碍了工业化；例如瑞典，可能直到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还是扩大传统的木材和铁的生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国内市场的扩大，可能有助于造成可能工业化的基础。

我想只探讨一些模仿者，有几点概括性的评述分列如下。

(a)模仿国家不同于英国的地方，在于它们可以从英国接过大量的新技术。但这方面的差异不是原则性的。一个国家最常用的工业化模式是照搬他国业已采用的各种技术，开始生产一直靠进口的商品，并赢得其国内市场。英国的工业化在若干方面符合这一模式。它是从在英国建立其他国家早已具有的产业和技术开始的。

(b)英国吸取外国技术为时很长，而大陆各国接过英国技术，按现代标准看，也都不迅速。同当今不发达地区计划实现的那种工业化相比，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是缓慢的。

(c)成功地接受新技术的地区，在开始时都拥有熟练的手艺工人的供应，有一个具备开创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核心；相对于其人口来说，它们的自然资源都是丰富的；就连俄国的人均收入也大大超过现代印度的水平。它们当中大多数有纺织和初级冶铁工业，其组织和发展水平与18世纪末经济发展前的

英国同类行业相比无大差异。除俄国以外，技术水平都很高，足以在模仿英国时没有多少技术困难，文化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小。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的经验对于当代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能有多大借鉴意义，是令人怀疑的。

现在我要研究为何有些国家的模仿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这种尝试碰到一个大难题，因为尽管有可能说明某些最低限度的经济成就和熟练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的相对比率时，要估量出超过这些最低限度的种种差异的重要性却是困难的。

模仿国的要素配备

新技术引进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回报，这是差异的一个来源。新技术中最重要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煤，凡是煤贵木炭贱的地方，例如法国，因引进新技术而降低成本的幅度大概很小。煤贵所造成的后果，在法国经济上是随处可见的。在初级冶铁工业中，用焦炭取代木炭很缓慢，所以这项工业没有获得进一步专业化的机会，尽管地理上的集中本来是可以办到这一点的。因为缺少这种工业的集中，建立工业的刺激因素便少了。蒸汽动力引进缓慢，是法国缺乏金属加工和机器工业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更快引进新的技术，显然将对整个法国经济有利，但是无法弄清引进新技术的行业在那个时期究竟是否获益——而这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问题。煤炭价贵对法国经济发展影响如何无法精确估价，但是仍然必须说明法国采用新技术太慢，落后于其天然经济优势所能保证的速度。同样，大陆广大地区效率工资很低，因此现

在弄不清楚企业家们引进新技术能否获益，而引进新技术有个主要好处是节省劳动力。不过，我这里还是接受一般人的观点，即对最重要的差异不能这样解释。

创业精神的力量

还有一些明显的社会条件，对工业化像新技术一样至关紧要，但除了美国以外，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而且只能凭国家的力量来建立。这些国家中的每一国，其国家权力都强大得足以对社会结构进行必要的猛烈改造，例如普鲁士废除农奴制和俄国废除农奴制及农村公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项基本条件。而后还须有大批潜在的本地企业家。虽然在俄国、日本和德国，由国家创始发展某些工业，而且虽然这样的创始动力具有重大作用，但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否足以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却是很值得怀疑的。况且，英国企业尽管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起过重要作用，但在1914年以前，在外国企业的基础上实现较大范围工业化的例子却从未有过。企业的国际性活动力看来还很低。因此某种源于本土的创业精神便成了一个基本条件，人们常常认为某些国家由于民族性格、文化背景、风俗制度种种原因，拥有更多具备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这是社会、政治态度，亦即非经济的原因。故而同印度、中国相比，日本的迅速工业化常常归因于武士阶层（而不是归因于日本有一个准备发动经济变革的政府）。武士阶层是"一个具有威望和自信心的统治阶层"，但"与其他部分人民并未截然划开……其观点亦不保守"。日本与印度的对比，确实得加以解释，因为印度具备许多工业化

的基本条件——有商人阶级、银行业、运输设施、相当规模的面向市场的生产事业——而在这一问题上，两国本土企业家在性格与品质上的不同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

19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缓慢，有人把这归因于法国企业家的社会态度。带有特色的企业都是清一色的家庭企业；家庭的动机不是尽量发财，而是要保持地位，就连最有进取精神的企业也持这种态度。这一论点，有时得到下述断言的支持，即认为军队和政府吸引了大量的企业经营才干。对比之下，德国由于普鲁士军政制度的排他倾向，潜在企业人才的损失就比较小。还有人认为，由于跟两国的经济禀赋全然无关的原因，典型的德国企业家比法国企业家受过更好的教育，因而有更开阔的眼界。

要想知道这个因素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是极端困难的，因为除按取得的成就外，不可能考察企业经营的能力，而这样做又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这一因素为何有时不成为主要因素，还没有顺理成章的原因。但在我们已经详加论述的法国问题上，似乎企业的特征首先是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因为在法国的外国商行基本上也依照法国的方式行事，而大公司则大致依照家庭企业的方式行事。而且，家庭企业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在其他方面，家庭企业事实上不仅没有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悖逆，而且还是它的主要催化剂。

市场的性质

国内市场条件有几项重要差异在于(a)所需商品的种类，(b)市场同质性的程度，以及(c)市场对新商品可获性所起反

应的特性。在美国，所有这三方面的条件都特别有利。

(a) 主要因为新的土地是以有利于土地所有权广泛分配的方式开发的，所以有一个适于销售大批量简单商品的广大市场，而这种商品是适宜于标准化机器生产的。(在南美洲，当时没有发展一个广大的中等地产所有主阶级，因为在早期，土地被大庄园占有了，自然资源并不缺乏的地区却不见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原因。)

(b) 没有那种地区性和社会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爱好，而这在欧洲，对于整个经济体系中为进行竞争而被迫采用新方法和新设备的效能较高的企业，是妨碍其进行竞争的。

(c) 没有积聚钱财的欲望，贪图安逸为世人所轻视。

在18世纪，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都为社会与财政布局所苦，这种布局使它们的农业地区成为批量的简单商品的劣等市场，并使工业发展方向偏离到满足上层阶级狭小市场的奢侈需要上。在俄国，这种布局一直保留到19世纪，即使在法国，大革命虽已废除了这种布局，但它们还在工业上留下印迹——法国工业的特有优势往往就在奢侈品行业上。可是，或许除了俄国，这些国家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似已高到足以为批量工业产品提供市场。工业家们已不是面临着由于极端贫困而完全无弹性的需求了。

不过这些市场是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性和社会性爱好的不同质市场。我倾向于认为，正是这些市场不完备的阻力，而不是在旧式工业中工作的工人忍受日益增长的苦难的能力，成为大陆上大多数国家新技术传播缓慢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纺织业中，并成为确实采用了新技术的那些企业不能取得更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样，在整个东方，特别是在中国，爱

好的固定与僵化，即对新爱好的保守态度，使西方商人在选取出口商品时大伤脑筋。这种保守态度是限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它们所服务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是导致了兰德斯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法国工业上由少数企业垄断市场的格局。那么为什么在德国这样一个也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阻碍却似乎不这么大呢？对这个问题我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也可能是因为，在法国铁路建设以前，法国工业结构就已确立了由少数企业霸占市场的模式，其力量之大，足以抵抗运输费用降低所造成的压力；而在德国，工业发展较晚而铁路建设较早，这种模式便没有机会确立起来。很显然，欧洲大陆农民社会积聚钱财的现象，无论比英国或美国都盛行，可能在工业化早期，勉力以求的商品需要是伸缩性较低的。而只要有这样两个条件占上风，这些国家的工业商品市场就不能像它们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潜力所允许的那样迅速扩展。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例证可以供人就这一点对各个大陆国家进行比较。

还有一个市场条件可加考察。工业化伴随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在早期，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在于收入人数的增长，而不在于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是在扩大而不是在深入。这虽然并非增长的基本条件，却肯定使企业家较易完成其工作。

资本供应

资本和财政匮乏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势头呢？一项显著的事实是，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积蓄很少，

资本积累的过程看来却并未造成消费降低。虽然对我们此刻在考察的这个时期无可靠数据可用，但从国外借款取得资金的额度大概是少量的。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借款额度同它们总的资本构成相比，非常有限。其原因——当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同样重要的——在于：(a)在工业化以前，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大量的家庭式工业，(b) 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是渐进的，因而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它们自身资本设备的很大一部分，还能以它们国内的资源满足因投资所创收入而产生的新增需求。就是说，它们无需用庞大的外国贷款弥补流通帐目上的亏空。(就日本来说，由于生丝出口增长，其对外国贷款的需求进一步降低，不过这是偶然现象。) 这同后来移民居住地区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移民地区最初阶段大多无力生产它们自己的资本设备，它们的消费商品大量依赖进口，但发展却非常迅速。这些地区大多数严重依赖外资——例如加拿大，在1900年至1910年十年间，净投资总额差不多一半来自国外——但是1914年以前的工业化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俄国是例外，其铁、钢、石油的资本有80—90%为外国所有。

资本形成没有招致消费水平的降低，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在资本形成过程的开始，存在着增加少量追加资本便可应用的生产能力储备，未曾用远低于现有水平的技术开发过的土地，以及隐蔽性的农业失业。因为有这些储备，资本投入的源泉便不仅来自投资的成果，而且也来自因需求增加的刺激而增加的产量(主要是农业产量)。这个论点当然并不包括这些未用资源需要再加投资的问题；但看来只须稍添资本，便可以获得每英亩产量和有效地亩的大量增加。

投资反应的速度和分量不仅有赖于未用资源可用的程

度，而且有赖于耕地结构、现有运输和市场设施等等。美国得天独厚，不仅因为有广大的土地供应，还因为这些土地的开发首先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故而美国农业对任何需求的增长，都能迅速作出反应。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地位最有利，其原因主要不在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而在于英国的土地所有制。地主一佃农制远比小农制更能适合于农业性质的改变和农业产量的增加。小农制相对说来反应迟钝，而且部分地因为这个缘故，工业化工作往往引起小农群众有意的破坏。凡在反应迟缓而扩张力量却很强大的地方，我们可以预料通货膨胀的发生，并可能出现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情况：可以想见，进一步调查必将证明反应上的差异确实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然而我的印象是，可能除了俄国之外，投资反应足能达到其他制约因素所允许的增长率。

凡在人口增长将增产产量全部吸收的地方，当然没有任何财力可以再作资本投入，在有些社会里，显然情况正是如此。的确，在巴尔干半岛诸国，看来需求的增长尽管刺激了农业产量的增长，却也刺激了在比例上说来更大的人口增长，结果人均收入就下降了。但在西欧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无一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在德国，要不是因为往外移民，或许也会发生类似现象。

早期阶段一经过去，实际收入本身的迅速增长就提供了资本；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英国，1890年后的德国，战争间歇时期的日本，都证明能有极高的储蓄率。

鉴于上述理由，我的结论是，实际取得的资本投入率并不招致消费下降。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解决下述问题——资金融通不足是否使资本投入减速？是否曾有企业家原来积极要

求承办，但由于获得资金的要价条件所限而无法承办的大量计划项目呢?这个问题可能无法准确回答。没有留下什么因缺乏资金而完全失败的企业家的例子，尽管一时碰到财政困难的著名产业界人物有许多案件可供引用，但这些案件的重要性如何却很难说，此外，尽管一级债券的利率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但要获得有关不同国家利率结构的资料却极端困难。一级债券的利率，在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之间差异不够大，这可以设想其对投资水平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在不同地区之间，贷款者对工业借款者所冒风险的估计却可以有巨大而有影响的差异。不过我的总印象是，金融对增长率并不产生重大影响。我这样想法的理由是：

（Ⅰ）工业化初期，企业家用其私人积蓄和亲戚朋友的积蓄兴办工业项目，并用企业所赢利润资助以后的增长，是比较容易的。他能这样做的两个条件是：

(a)生产技术现状。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最小投资单位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潜在企业家的积蓄相比，在金额上为数微小。很明显，这一点在创始国家较之模仿国家更为属实，创始国家经历若干阶段才能完成的设计，模仿国家有机会一步就接受过来。但是我却倾向于认为，19世纪欧洲的模仿国家没有一国在技术上比创始国家落后得太远，而形成非常重大的差距。我这个概括是把俄国和日本除外的。

(b)高利润率。有人认为，自投资利润的迅速积累的一个条件是在物价上涨时保持工资不变。高利润率也可能与新企业的进入迟级有关(迟缓的原因与资本无关)，这使领先企业在一个时期内可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由于这两个原因，企业家不太需要从外部获取资金。

(c)除了俄国，所有这些地区都有贷款市场，同19世纪晚期的贷款市场相比，当然尚欠完备，但同现代的印度和中东的贷款市场相比，却是高度发达的了。凡能提出可靠担保的借款者都可按其广大地区近乎一致的利率借款；由于上述(a)与(b)两个原因，企业家颇易积累资产，企业家遇到用以自投资的利润不足时，可用这笔资产作为可靠的担保借到款项。

有一项带有工业化初期特征的建设项目是铁路，在某些国家，上述这些资金来源显然不足，于是国家介入：或者部分地从税收中抽出资金来兴建铁路，或者担保私人企业家的贷款获利。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早采取这个必要的行动，而时间上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率显然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就是说，德国先于法国十年拥有铁路系统，这一点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但若金融匮乏影响到了政府，通常要加速而不是减慢国家的干预。

(Ⅱ)在工业化晚期，出现某种倾向(其力量大小在产业与产业之间当然大不相同)，它使工业化的最小实行单位随着单独一个企业家能从上述财源获得资金而成为大单位。既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由于资金融通不足，减慢或挫折富有成果的发展的可能性便增加了。自动调度资金的家族企业继续风行于欧洲许多工业领域——包括一些增长最迅速的工业，这个事实可以同时作为同意和反对把这个可能性估计得这样高的证据，它可以用作一个标志，或者表明旧有财源的充足，或者表明其他任何财源的不足。两可性较小的证据是，当有机可乘而资金非常短缺时，人们就表现出巨大的智慧和发明才能，改建或设计种种机构制度，为企业家提供资金；创设优先股份，发展银行业(特别是德国的实业银行)，改建合股组

织形式，以及在日本发挥财阀的作用。当然，在这些发展和触动发展的需求之间，或许在时间上有相当长的迟延，这些措施最终被采用，不能证明经济增长没有因缺少这些措施而长期被耽搁。但总的看来，适应的速度是惊人的。

因此，我想就19世纪的工业化的经历提出两点请加讨论：（1）凡其他条件都有利的社会，通常都能设计出适当的金融机构；（2）凡农业部门能对需求增长作出反应的地方，用于投资的真实资源并不涉及紧缩消费。

劳动力供应

获得劳动力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势头？可以说某种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吗？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增长是阻碍积累的主要内在力量，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食品供应不能适应。实际上这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1）人口对需求的增长反应如何？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是自然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扩充食品生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一部分是社会结构、农作物性质、继承法等方面的问题。

（2）在什么条件下可使人口的增长适用于工业？这主要是一个法律上和社会上对人口移动的障碍问题。

所有这些国家，除法国外，工业化都伴随着人口的迅速自然增长。当前引起争议的，是在每一个地区和时期，这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a)医药改进对死亡率的影响，(b)提高生活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c)提高劳动力的需求对出生率的影

响（主要通过提高结婚率的作用）。但是可能有个一致的看法，就是认为人口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所引起的，而不是相反；同时在劳动力尚未出现地区流动以前的时期，一部分人口反应是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观点同认定劳动力缺乏对18世纪英国节省劳动力的各种发明和对19世纪美国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装备都是一种刺激的观点并无矛盾。）

人口反应变化很大，不仅由于食品供应的伸缩性，而且还依据通行文化模式、结婚年龄、继承习惯等等。美国人口增长特别迅速。唯有法国增长微弱，因为在法国，财产的广泛分布加上继承权的平均分摊强烈地诱使人们推迟婚姻。从这一点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基本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对人口移动所加阻力的大小。欧洲大陆上财产所有权的广泛分布使各地劳动力不易流动。这在德国阻力较小，因为易北河以东解放农奴的结果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俄国对劳动力流动阻碍最大，甚至在农奴解放以后，差不多存在到1914年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负责征税制还是使经常性的劳动力流动非常困难。工业化早期这种不流动现象的主要影响，大概是造成劳动力在受雇于工厂与受雇于家庭工业之间条件大有不同。俄法两国，尤其是俄国，以较高代价吸引长期劳动力到工业区，是工厂无力在竞争中将旧式工业搞垮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我没有什么证据足以断定，与上文探讨过的市场的不完备情况相比，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有多大。

熟练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基本条件呢？最难办的短缺是制造和维修新式机器的技术的短缺，但是还有操作新式机器所需半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除俄国

外）原有许多锁匠式的熟练手工工人，但在工业化初期一直实行对技术的高额奖金。解决这个问题，部分是通过直接培训劳动力（在德国，是搬用行会学徒制的规则和实行各种形式的技术教育），部分是通过调整机器以适应劳动队伍的能力（美国在早期发展极简单的大规模生产机器，因为该国的手工技术工人不如欧洲多）。就这一点而论，工业化的创始国家与模仿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后来的机械化更为迅速，因而要求有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熟练手工工人脱离自己的行业去参加工厂工作更为容易了。另外模仿者利用英国的熟练劳动力资源，以减轻其特别严重的劳动力缺乏。19世纪的工业化不仅在培训技术上，而且在使劳动力适应工厂工作的紧急要求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从性质上来看，技术与新的工作态度的获得是个缓慢的过程，而劳动力的不足比起资金短缺来，则是个更为重要的阻碍因素。

（冯棠译自S·N·艾森斯塔特编：《社会变迁比较观》，波士顿，1968年，朱代强校）

11 发展理论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19世纪的欧洲与第三世界工业化模式的比较

[瑞典]克里斯特·冈纳森①

引言

说近几年来我们对所谓欠发达现象的认识已有很大的进步，未免有点像老生常谈了。过去三四十年中有关发展问题的大量著作，无疑加深了我们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对欠发达问题的性质和起因的理解。但现在看来，许多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工作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欠发达理论，似乎已不足以作为分析七八十年代第三世界问题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足为奇。随着世界的变化，人们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和理解也跟着改变。发展理论不应该因其不可预测而受到责备，尽管有人认为它是可以预测的。

已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也许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出现。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当前的发展理论并不能正确论述这个过程的性质和起因。我不打算提出另一种理论或

作出普遍适用的解释，而是要指出，尽管第三世界工业化可能被说成是与过去的工业化形式有着不同特点的事物，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仍可以作为我们寻求解释时的依据。

目前，我们似乎很难确定发达或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正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样一个时期，即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五十年来最严重危机、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又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没有吸引力的时候，无疑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失败主义情绪。

关于第三世界的概念当然就更加混乱了。一方面，很多国家（也许是大多数）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日益加深的贫困，它们要在不久的将来取得长足进展的前景看来是极其暗淡的。另一方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实行了工业化，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已开始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制度指导下的工业化。工业化似乎成了成效最卓着的发展战略。因此，历史的经验同主要的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预测是背道而驰的。

工业化与发展

那么，把工业化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看法是否正确呢？当然，像发展和欠发达这样的概念众说纷纭，不能下绝对化的定义。然而，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发展意味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而这是商品的生产与消费

---

① 克里斯特·冈纳森是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史讲师。

以及劳务的增长所造成的。工业化既不是取得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能手段，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然而，当我们谈到今天的发达国家时，我们都是指工业化国家，这就是说，工业社会是现代发达社会的原型。

历史所提出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型，当然是19世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模型。任何人都不会完全否认，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前西方经济的特征也是发达经济的特征。不论其后果如何，近几十年来，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已取得资本主义型的经济发展。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各国可能采取各种不同战略，但经济发展肯定还是采取"传统的"形式，即经过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当务之急似乎是应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确已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在另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前景却仍旧那样渺茫。

发展理论的危机

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出现，无疑已使发展理论的基础发生了动摇。长期以来，这样一种过程似乎被认为是很不可能的，至少大部分有关发展问题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不存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是分析欠发达问题的共同出发点。发展理论的任务，是找出阻碍这一过程的因素。新古典理论或现代化理论认为，这些障碍存在于所谓的传统社会内部，而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学派理论则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欠发达问题还可以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同一理论来解释。中心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剥削外围体系的基础上。第三世界处于从属、依附和经济

社会欠发达的状态，这体现在那些因生产初级产品而很难有机会发展本国制造业的穷国同富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上。

近年来，发展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着深刻危机的时期。关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的统一概念和对欠发达问题的一般性解释，已受到第三世界中"奇迹般"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挑战。其实，"奇迹般"这个词本身只不过是对近年来发展理论缺乏分析价值的承认。顾名思义，奇迹的发生不需要任何直接的原因，它们不可能通过逻辑推理来理解。其实，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根本就不成其为奇迹。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一种历史逻辑可以阻止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当然，障碍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由必然的逻辑所造成，而是由历史环境所造成，而历史环境很少或从不会老是保持不变。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因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即只承认欠发达问题的逻辑，而没有找出它的历史起因及其变化的可能性，因而完全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国家会出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发展理论的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依附论观点的危机。的确，依附论在许多方面是很有用的。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可能解释发展与欠发达问题的本质，它的另一贡献是使人们改变了那种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观点。后一贡献在鼓励第三世界历史学家进行实验研究和重写他们本国历史方面特别有用。然而，大量事实表明，依附论的观点不能预测欠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当第三世界的新兴工业已成为明显的事实时，有人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来为依附论辩护。他们维护这种旧框框的一个方法是争辩说，一些数据使人们对欠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

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据说，制造业生产增长率被官方统计数字夸大了，其实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仍像过去那样不景气。然而，尽管第三世界的统计数字存在着某些缺点，但我们没什么理由认为那些数字实际上过高估计了生产增长率。历史研究表明，19世纪欧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往往被官方的统计资料低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是那样呢？今天，尽管还有人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工业发展是一种偶然现象，但已没有人会坚持认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只不过是一种统计上的虚构了。

为依附论辩护的另一种论点可能认为，工业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有点不同。尽管工业可能会出现增长，但只要第三世界仍处于依附地位，它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根据这种推理，依附地位就不仅是欠发达的原因，而且实际上也是欠发达的定义。这样一来，发展就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毫不相干了。就发达国家而言，没有人会否认这些因素与发展的共同特征之间的关系。既然从定义上来说，发展与欠发达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那就很难设想可以用不同的原则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经济。

发展理论的新趋势

不容否认的事实已逐渐使人们抛弃依附论所持的立场。在今天，我们不能认为第三世界的社会没有取得工业或经济发展。然而，至今尚未建立起一种理论来填补依附论“被推翻”后所留下的空白。一般说来，当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解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有一种理论认为，工业化的起因应

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去寻找。中心体系资本积累先决条件的改变，已使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成为可能。这些新条件包括现代生产技术、资本国际化和中心体系利润率的下降。另一种理论认为，可以从外围体系本身找到变化的起因。这种理论提出诸如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政治独立、国家起主导作用、以及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样一些因素来进行解释。

人们公认，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化进展的某些重要方面也被指出来。我个人的意见是，应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去寻找变化的首要原因。然而，强调内部因素并不等于否定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发展成为可能的，正是内、外部因素的结合。不过，上述理论引起非议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它强调什么，而在于它把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过程看成是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他们把导致第三世界发生工业化的因素看得如此独特，以致认为这在过去决不可能出现。因此，他们反对将当前的工业化同欧洲的工业化过程进行比较。

在大辩论中提出的这些意见，大部分建立在由依附论的继承者所建立的理论基础上。现将一些较重要的和流行的关于工业化特征的传统说法归纳如下：

——工业生产主要集中于出口工业区；

——工业增长建立在剥削廉价和不熟练劳动力的基础上；

——工业生产主要面向出口；

——工业结构的特点是消费品工业，短缺资本货物工业；

——工业因容易获得跨国资本而得以取得进展。

总之，这给人的印象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一种外向的过程，其增长的动力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积累的来源和生产技术。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由那些赞成所谓世界体系分析的人提出来的，但在其他传统理论中也可部分地找到这种观点。

工业发展是从外国引进的，只出现在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一些“飞地”里，并且是建立在不需要或几乎不需要培训劳动力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因此，这种工业化不能同欧洲先前的那种工业化过程相比拟。况且，那些奇迹也不可能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重复出现。

显而易见，这种关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概念是错误的。工业生产重新定位是国际新分工的特点之一，但并不是说，可以这样来解释工业化过程。例如，出口加工区在就业和生产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工业生产很少设在收入很低的国家。那些所谓新兴工业国的工资水平比第三世界的一般工资水平离得多。此外，他们没有注意到国内市场的扩大，而把轻工业看成是生产的特点也是错误的。

人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从来就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19世纪欧洲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与之毫不相干的发展模式。要是将欧洲历史同现今不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被看成是历史宿命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历史是不会机械地重复的。19世纪的发展模式很难丝毫不差地在今天重演。一切变化过程都有它们自己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因国而异和因时而异。那种认为第三世界工业化可能是19世纪欧洲（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工业化的精确复制品的看法当然是荒谬的。

历史比较的价值

这样说了以后，又认为进行历史比较既有用又有必要，也许会使人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发展研究是对长期变化过程的研究，因此，对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就是对历史或经济史的研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研究那些基本情况可能相似的其他历史过程。那种认为对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工业化过程进行比较没有用处，以及先验地认为现在的工业化在本质上都不同于过去一切工业化的观点，是很危险的。为了确定变化过程的因果模式，我们往往需要一种赖以参照的依据，而历史比较能提供这种依据。没有历史的观点，我们就很可能会提出一系列错误的问题，并拿出错误的可变因素来进行分析。

忽视历史观点也许是发展理论最大的特点。的确，欠发达问题的研究表面上也很重视历史的作用。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的来说一直被程式化地看成是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直线式或戏剧性的过程。对第三世界来说，采取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是不行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人类学者和其他学者已雄辩地证明，第三世界社会的情况很复杂，远非简单的增长模式所能解决。这就是当前发展经济学的危机。然而，19世纪的欧洲社会又怎样呢？这些社会可以用这种生硬的方法来分析吗？事实上，发展研究很少怀疑简单而抽象的欧洲模式的有效性。相反，这些欧洲模式被广泛地用来表示19世纪工业化过程的特征。这导致了在解释欧洲工业化的起源和本质方面的严重错误。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工业化根源

的传统说法是如此广泛地流传，以致除了经济史学家外，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奇怪的是，那些对纠正有关亚、非、拉历史的古老说法作出很多贡献的发展研究，竟然也会接受那只不过是一种旧框框的欧洲工业化概念。欧洲工业发展过程被认为一直是自给自足独立经济的一种相当协调的过程。对欧洲的工业化有了这样一种印象之后，当然就很容易认为，第三世界决不能出现同样的过程。但这种印象首先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工业化过程的无知。

发展绝不是所有部分都均衡前进、以及任何人都无须为其付出代价的一个平稳而顺利的过程。它包含着对旧社会结构的破坏，它意味着人们正被赶出原来的社会环境，意味着旧的社会文化准则已逐渐被人们抛弃并被现代的社会准则所取代。那种认为欧洲的发展过程是在不出现混乱局面和无须作出牺牲的情况下完成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

发展理论家之所以会得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遵循着完全不同于欧洲工业化的模式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的观点。唯一真正的例外是比尔·沃伦，他声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一种与欧洲工业化有着相同特点的十分"标准"的过程。对此，沃伦重申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般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新兴工业国现在正沿着发达国家指引的道路去做。

然而，更确切地说，它无疑代表着另一种误解。它假设只存在着一种类型的工业化。因此可以说，欧洲的工业化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且，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也只好被解释为

只是各种导致现代发达国家变化的因素的再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机械搬用是应当抛弃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它同它的理论对手一样缺乏历史观点。

欧洲的经验不被用来作为比较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有点罗斯托式的味道。正是这个提出不同阶段工业化与经济进步的起飞模式的罗斯托败坏了比较历史的名声。罗斯托的模式是仅从英国这一个例子总结出来的，它描绘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罗斯托声称它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形式的发展。其实，罗斯托的模式总的来说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非常相似。它基本上能恰当地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它当然是很不足的。罗斯托对增长的障碍和条件的认识非常公式化。而且，这个模式假设，不论历史背景如何，一切社会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创造这些条件。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推翻罗斯托关于工业化的论点方面是成功的。显而易见，与欧洲相比，这些地区在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欠发达，其历史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罗斯托对欧洲工业化的描绘尽管备受欧洲经济史学家的批评，却从未受到发展理论家的非议。实际上，它被看成是欧洲式或“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概念。其实，罗斯托曲解了欧洲国家走向工业社会的变化过程。因此，把这个模式（或马克思的模式）一成不变地套用于欧洲历史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都是不妥当的。

然而，马克思和罗斯托对增长过程的认识都是正确的。增长的先决条件总是一样的：资本积累、愿意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和市场。缺少这些先决条件的任何一项，资本主义发展就

不可能发生。一般来说，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如何创造这些条件，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历史环境既可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也可能对其设置障碍。因此，更确切地说，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单一模式。19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单一的发展模式。

那么，是否就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一般的解释呢？我们是否就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发展模式面前毫无作为呢？不，因为那将是回避理论的概括和无视建立理论的可能性。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对实际观察资料的概括。实际上，发展过程的不同特点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这些貌似不同的过程中找出总的趋势、"法则"，或规律。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历史规律以及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工业化总模式。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没有规律的事多得无法对它们进行理论概括。我们应该采取的是介于承认存在大量不同特性和存在历史普遍规律之间的立场。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时必须防止：(1)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模式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变化过程；(2)把个别国家的经验看成普遍规律。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发展过程的独特性(从而防止教条主义)，但为了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不应让这种独特性成为对变化过程的解释，尽管它有可能成为这种解释。

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使历史过程的独特性和历史总趋势结合起来的办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已被证明在作为研究发展问题的出发点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这些观

点更多地是从较广义的角度来谈及历史发展的，而作为分析每个具体事件的工具，它们就显得太广泛和太一般化了。另一方面，我们选用的分析工具又不能抛开一般理论。我们采用的工具，必须能把对独特历史过程的描述同一般理论解释结合起来。

工业化过程类型学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可用来指导经验研究，同时又可作为进行解释的一般理论模式的依据。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已建立了这样一种类型学。他的类型学是用来分析19世纪欧洲工业化特征的一种工具。这种类型学将工业化分成一系列的对子(对应类型)。根据格尔申克隆的观点,欧洲的工业化可分为：

1. 本地型或者引进型；
2. 被迫型或者自主型；
3. 侧重生产资料的生产或者侧重消费资料的生产；
4. 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或者在币值稳定的环境下进行；
5. 只涉及数量变化或者还涉及结构性变化；
6. 持续进行的或者不持续进行的；
7. 在农业进展或者在农业停滞的情况下进行；
8. 出于经济动机或者出于政治动机。

这8个对子包含了关于欧洲工业化的争论的大部分重要论题。然而,这一系列的对应类型是不能任意选择的。格尔申克隆是下面这种观点较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发展研究应把各国经验的不同点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的经验研究集中于俄国问题,俄国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与英国或西欧的不同。但格尔申克隆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而不只是简单地描述俄国工业

化的特殊性。实际上，他通过这面"俄国镜子"观察欧洲工业化，从而建立了一般的发展理论。格尔申克隆认为，一切工业化过程都不同于马克思或罗斯托提出的理想模式。先决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格尔申克隆认为，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将决定其偏离理想模式的程度。因此，落后完全规定了历史的变化模式。根据落后的程度，国家应在缺乏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力量的情况下充当增长的工具。在极端落后的国家中，工业化过程将是被迫型的、侧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迅速而不持续、和发生在农业停滞的情况下的，而它的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变化过程将取决于政治动机。

格尔申克隆的概括不是没有错误的。用落后程度来作为一种"分类原则"或"决定因素"，看来有点同义反复。既然落后性被解释为缺乏市场力量，那么认为在落后国家里，国家应为开始工业化过程而代替市场力量，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看来，格尔申克隆在总结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时，很可能过于相信俄国的例子了。

然而，不同意格尔申克隆的结论不等于否定类型学对于研究工业化过程的作用。下面，我将试图表明，类型学如何不仅可以作为描述不同过程的手段，而且可以用来作为对工业化理论进行分类研究的准则。

我认为格尔申克隆分类法中的第1、2、3、7和第8个对子似乎比其他对子更重要。这些对子合在一起，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因素，即建立市场以及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创造这些因素的不同先决条件，将在后面谈到这5对因素时提出来。此外，每个对子各代表一种彼此相互冲突的理论解释。本

文以下各部分旨在讨论不同理论观点在解释第三世界工业化方面的作用。

本地型工业化或者引进型工业化

本地型工业化与引进型工业化的区别，基本上也是工业化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区别。在本地型工业化中，国家是分析的自然单位，而国内市场或其他本地因素的增长，则是工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在现代术语中，“本地”这个词可以看成发展理论家经常使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这个词的同义词。引进型工业化是这样一种过程：一国经济与某个较大或较先进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以及这个过程的时间选择和特征取决于这种外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就是促进因素。在发展理论著作中，“依附性”工业化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这种外向性以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时被看成不适于作为分析单位，而被“地区”或“世界经济”所取代。

格尔申克隆断言，欧洲的工业化基本上属本地型，而引进型工业化只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丹麦的工业化。在当前关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讨论中，人们往往这样假设，当前工业化的类型基本上属于引进型或依附型。新兴工业国的发展一直依赖于欧洲和北美的出口市场。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家都举出了许多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例子。东亚和东南亚的经验看来特别像是引进型工业化的原型。

因此，用内向型和外向型经济来区分两种类型的工业化，即欧洲工业化属内向型，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基本上属外向

型，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发展理论完全可以抛弃这种结论，无论是欧洲工业化的概念还是外向型工业化的现代理论，都未必是正确的。至少可以提出三点反驳的意见。第一，我们必须承认，格尔申克隆关于欧洲工业化的概念不符合大部分经济史研究所提出的关于欧洲工业化的典型概念。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是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较小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人们认为，像挪威、丹麦、瑞典、比利时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业化都严重依赖出口工业的发展。如果这种概念是正确的，那么像瑞典和南朝鲜这两类国家在本地型或引进型工业化方面的差别就微乎其微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很难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一切小国都必须依赖于国外市场，这是由其国内市场先天不足造成的，假如其工业化发展迅速，情况就更是如此。

第二，虽然出口导向型工业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决不是任何国家工业化的捷径。引进型工业化需要有一定水平的发展，这就是说，经济必须能够对向较先进国家提供出口机会所产生的刺激作出反应。必须采用和实行新的生产方法，工人必须受到充分训练和掌握很熟练的技能，以便适应新技术的要求。现代的发展学著作往往认为，现代的生产技术已使传统的工艺失去存在的必要性。然而，亚洲出口加工区的事实表明，采用传统工艺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虽然决不会由于提供市场机会而自动发生，但一个国家或国家中的某些集团对这些机会作出反应的能力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上就有许多丧失这种机会的例子。

第三，格尔申克隆关于欧洲工业化属于本地型的观点也

许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对第三世界工业化进行同样的假设呢？其实，把欧洲小国的工业化解释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更多地是基于理论的演绎，而不是基于经验研究。例如，经济学家总是对19世纪下半叶瑞典经济表面上的突然起飞感到迷惑不解。一个人口少、购买力低的欧洲最穷国，怎么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变成一个工业社会呢？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增长才能引起积累的增长，提高收入水平，从面导致国内市场的扩大。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非议。人们认为国内市场的规模一直被低估了。要衡量工业化以前社会或过渡性社会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极其困难的，面为官方统计资料几乎从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农业人口的消费水平。如果有资料表明农业人口的消费水平高于过去一些研究所假设的水平，我们就可以认为瑞典人并不很像我们原以为的那样穷。这样一来，瑞典的工业化就不会使人觉得那么突然和不可思议了。而且，出口工业作为领先部门的作用也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出了。

我不打算在这场争论中站在任何人的一边。我只是指出，出口问题比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复杂。然而，国内市场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增长方而的作用很可能已被低估了，我们知道，国内市场的发展，在像印度和巴西这样一些较大国家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样的事物为什么就不能应用于较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呢？大量有关这些国家的著作都谈到第三世界制造业出口国的成功事例，以及它们的政策朝向鼓励出口的转变。这种观点除了可能过分强调改变政策的效果外，当然还低估了国内市场和那种能对国外市场机会作出反应的经济结构的作用。在60年代以前，大多数新兴

工业国就已拥有相当扎实的工业部门和高于第三世界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准。从这个角度上说，成功的工业化政策似乎并不起多大的决定作用，现代化的过程也似乎并不那么神奇了。

然而，如果不谈资本积累的来源，关于本地型与引进型工业化的讨论就会不够全面。有的发展学著作认为，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国际化。当然，与欧洲工业化相比，跨国大企业的出现是一种崭新的事物。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才能认识到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经营活动的长期效果。然而，我很怀疑资本国际化是否真能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对资本积累极为重要呢？资本输入很重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今天大部分向第三世界输入的资本都是采取贷款的形式。其实在过去十年中，直接投资的相对重要性似乎在逐渐减弱。其次，资本国际化并不一定像人们经常设想的那样，是中心体系积累条件改变的结果。它也许只不过是在外围体系创造新的先决条件，使直接投资在新的领域里变得有利可图。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国际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就应该被看成是本地型工业化的过程。

第三，资本促进经济普遍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但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体现。资本的积累是这样进行的：通过剥削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并在市场上实现这种价值。因此，积累是既涉及生产又涉及流通的过程。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总是流向具有市场和劳动力的地区。如

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认为，不论资本的外部来源如何，本地的增长因素是决定性的。

被迫型工业化或者自主型工业化

第二个对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工业化过程能否看成仅仅是对市场力量作用的反应呢？或者，国家的介入是否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呢？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误解：国家没有积极参与欧洲的工业化。两种观点都认为国家的参与是从生产力的变动演绎出来的。政府政策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给予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这种欧洲工业化的概念往往同第三世界工业化的概念形成对照，在后一个概念中，国家似乎起着支配和决定的作用。

然而，欧洲的例子难以证明这样的假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在某种情况下，国家的介入对一切类型的发展都是很必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全世界所有国家，而只发生在民族国家里，因为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司法权，能对发展进行限制或向其提供机会。在分析发展问题时不考虑国家的作用，就等于无视现实的重要方面。然而，要确定国家介入和市场力量两者中哪一种是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极其困难的。国家总是有办法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如果国家采取反资本主义或者反工业的态度，它就总是有可能(至少在短期内)阻止市场力量起作用。这样一些阻碍增长的因素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然而，真正需要分析的问题是设法表明，国家促进发展的积极措施对工业化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可以用来促

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有两种：一，国家的介入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这样一来，因改变立法而得到实施的制度改革便会使现有的市场力量释放出来。正如萨普尔所指出的，这种国家介入在19世纪取得工业大发展的一切欧洲国家中是很普遍的。

二，国家可以直接介入增长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只是调节着市场力量，而且本身就作为市场上的一种力量，或起着代替市场的作用。当国家不直接介入就不可能有积累过程的发展时，就出现这种介入。只有这第二种介入，才能称之为被迫型的工业化。根据格尔申克隆的观点，被迫型工业化在欧洲工业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沙皇俄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人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都属于被迫型，并把这看成是一种毫无例外的规律。在大多数新兴工业国里，国家已直接介入工业企业。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实行自由型的工业化是很不可能的。

格尔申克隆谈到了欧洲国家的落后程度、国家介入的程度、工业化的不连续性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联系。落后程度决定国家是否有必要介入和积极参与工业的发展。那么，由于第三世界仍很落后，它们的国家当然会广泛地介入其工业化了。然而，这是一种没有分析的简单化做法。而且，格尔申克隆的定义似乎太广泛和一般化。如果落后等于市场机制不发达，那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论：一个政府如果在发展主义思想指导下试图促进工业的进展，就必须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国家介入是有效的呢？众所周知，制订计划比实施计划容易。在什么情况下国家介入才可以成为工业化过程的有效手段呢？而且，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国

家代替市场力量会比其他类型的发展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呢？如果在国家介入之前，市场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那就可以设想，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国家采取措施来释放市场力量时来得慢。格尔申克隆自己如此回答这些问题：

> 在那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工厂和企业的规模、侧重于生产资料（而不是与之相对的消费资料）的生产、随之而来对人们消费水平的压力、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以及利用特殊措施来影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在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分配），以满足新兴工业对资本的需求。

这些特点似乎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在这些国家中，国家一直是发展的代理人。然而，把这种工业化的代替形式作为欠发达国家的典型是有危险的。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这些措施无疑能产生很高的增长率，或者用格尔申克隆的话来说，能引起制造业产量的急剧增长。然而，肯定存在这样的危险：只强调国家介入的一个部门的这种分析方法所作出的结论，正是产生于对模式的假设。格尔申克隆认为，落后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而且停滞不前，这意味着国内市场不能促进工业的增长。然而他指出，制造业部门的产量是由于国家起着消费者和主要投资者的作用才得到提高，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落后国家里，国家的介入是必要的。这样分析出来的结论非常值得怀疑。指出国家介入对俄国早期的工业化很重要，这是一码事，然而说这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又是另一码事；如果把这个结论设想为

适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就尤其如此。而且，关于国内需求不足的假设是根据根不可靠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而作出的。对农业人口或过渡性社会居民的购买力的新估计，可能会使人们进一步看清所谓国家替代型工业化必不可少这个问题。

此外，格尔申克隆还认为，一旦工业发展得到巩固，国家就会不再介入。工业的起飞产生了富裕的家庭和资本市场，从而能使落后国家实行一种较接近西方型的工业进展。有些作者怀疑，这种假设即使用于俄国也未必合适，而用于第三世界，看来就更不可信了。在大多数实行工业化的国家里，国家的介入看来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增加的。

为了总结关于国家介入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引用格尔申克隆下面这段话是有启发意义的。

> 一旦我们这样来看待欧洲的工业发展，它就的确像是一个统一体，但不是像发展阶段理论家所认为的那种过于简单化的同类统一体……而是一种复杂、分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欠发达地区的落后程度是决定业已存在的替代的性质的主导因素。

他的这段话可以用来驳斥关于欧洲工业化单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极少介入工业化）的过分简单化的观点，但另一方面，落后程度并不足以解释国家介入的问题；鉴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公营企业存在不同等级，看来更不可能得出单一因素起决定作用这样的结论。在我们作出国家必须介入现代工业化过程的结论之前，有必要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国家

的作用进行仔细的研究。我将在后面谈到有关动机的问题。

侧重生产资料的生产或者侧重消费资料的生产

格尔申克隆认为，欧洲较落后的国家比较侧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个论点很符合他的关于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国内需求不足的一般概念，这种概念又是国家介入的一种原因。然而，俄国的例子很可能是欧洲工业化总趋势的一个极端的例外。很难找到这样一些国家的例子，即在这些国家中，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决定了它们的工业化道路。

在关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争论中，人们经常把一种相反的情况(强调消费资料的生产)说成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它主要被用来表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属于依附型。第三世界国家起着向发达国家市场提供消费物资的作用，或者实行消费物资的进口替代政策。另一方面，它们必须依靠中央体系进口生产资料，因而，第三世界的工业是受中央体系控制的。

这个论点有两个方面应该加以评论。第一，第三世界的确历来强调轻工业，这基本上是消费资料的生产。看来，进口替代政策已将这种趋势推进了一步。然而，近几十年来，对重工业(基本上制造生产资料)的重视已有所增加。实际上，自1955年以来，重工业在制造业生产中的比重一直急剧上升。今天，重工业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这种情况在工业较先进的拉美国家特别明显，而对所有实行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个趋势也大同小异。这当然同这样的观点背

道而驰：第三世界主要是通过加工和出口轻工业制成品来增加它们在世界产量中所占的比重。而且，上述情况还违背格尔申克隆的这样一种观点：在落后、国内需求不足和强调生产资料等生产诸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如同国家的介入那样，第三世界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强调往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加强。

第二，第三世界工业化早期阶段对轻工业的强调几乎无助于依附型工业化的论点。当然，生产汽车需要有工作母机，如果不需要汽车，也就不需要工作母机了。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不可能创造对自己的需求（虽然这可能由国家的介入来创造），但它却依赖于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根据闭关自守经济的理论，对于经济制度的重建来说，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工业都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对于实际的外贸和国际资本来说，这种假设是不妥当的。其实，从发达国家进口机器的可能性可以被看成新兴工业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因为它们不必承担沉重的研制经费。

农业发展或者农业停滞

农业的作用问题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同劳动力供应和国内需求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常常认为，在欧洲，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在第三世界，尽管工业已取得进展，农业仍停滞不前。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格尔申克隆认为，"关于农业部门同工业平行发展的观点是对实际历史过程的歪曲。在某些国家，尤其是俄国，对农民的过分剥削与工业的发展同时进行着。

那种认为农业发展对工业化过程很有必要的观点，基本上属于平行发展的观点。为了向不断增多的劳动力提供粮食，农业产量必须提高或者至少保持稳定。鉴于工业劳动力来自农村，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增加产量。农业现代化对增进国内需求来说是更有必要的，因为农业被认为是工业产品的市场。这种论点很符合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的观点以及刘易斯或罗斯托的发展模式。

然而，这基本上只不过是由逻辑演绎而来的理论简单化，是持续增长或积累的一种理想模式。如果我们假设农业实际上在工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不是一种不可争辩的假设），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这种作用。第一，农业现代化可以采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可以引进规模经济和提高生产率。这将导致生产的集中，从而形成较大的土地占有。不断提高生产率将导致相对价格的降低，而且，那些未能采用新生产技术的小土地占有者只能获得较低的实际收入，并最终被迫陷于破产。结果就形成了一支工人的后备大军。另一方面，遗留农业人口购买力的提高在短期内将不足以造成国内需求的大增长。因此，工业化主要必须依赖于出口市场。这可以称为“分化模式”。

第二，农业现代化可能涉及一切部门的人，也许只有无地者除外。由于实行土地改革，各种有利于采用生产新技术的土地占有形式可能会使生产率提高。这样一来，农业人口的购买力将提高，而有地农民的人数则保持不变。农民的购买力虽然不会平均地提高，但这种提高足以使农业部门起着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工业的发展不必那么依赖于出口模式。这可以称为“差异模式”。

实际上，19世纪欧洲农业人口的购买力是经济史上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问题。那些认为出口导向是工业化的推动因素的人往往低估了农业提高国内需求的作用。农业一向被看成是劳动力的供应基地。那些认为国内市场是工业化决定因素的人很重视农业的作用，并把农业现代化视为工业化的根基，他们往往不强调农业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

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来看，农业产量显然不能与工业产量同步增长。因此，农业现代化看来还没有走在工业现代化的前面，或者还没有和工业化同时出现。这很符合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国内需求对工业化起的作用不大，生产是外向型的。关于出口模式的谬误，已在前面谈过。然而，根据国内市场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重要因素这样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我们还须对农业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在南朝鲜和台湾这两个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里，农业现代化都先于工业化。这种做法对工业发展是否很有必要还很难说，但这样做确实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和其他许多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一样，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国内市场，其作用不应被低估，尽管它们可能被说成是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典型。然而，总的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特点似乎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致力于各种“绿色革命”。经验研究的结果有力地证明，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已对小土地占有者的购买力产生消极影响。

鉴于大量事实表明，小土地占有者已日益贫困化，所以也许很难设想农业人口的购买力会有所增长，以及国内需求足以促进工业发展。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农民虽然穷，但其人数多得足以形成相当高水平的国内需求。这

种假设主要适用于像巴基斯坦、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另一种也许更有道理的解释可能是：农业技术革命已导致农业人口的两极分化。在马来西亚，高产橡胶品种的引进已给大、中土地占有者带来好处。尽管那些只拥有几英亩土地的小生产者已日益贫困化，农村的需求可能已由于出现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阶层而有所提高。

如果有人想要对人们普遍赞同的第三世界出口导向工业化提出质疑，他就应该考虑到农业在促进国内工业品需求方面的作用。因此，为了分析工业化的过程，我们不能忽视对这种变化的研究。目前，我们还远远谈不上对这个过程和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经济动机或者政治动机

最后一个对于涉及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另一个作用，即国家介入的动机问题。如上所述，国家可以说已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过程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两种工业化过程中，国家介入的动机是否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形式的国家介入都出于政治动机。但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实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政府干预可以达到加强统治阶级权力的目的。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统治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因为国家政权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国家介入可以是直接的（投资于生产部门），也可以是间接的（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等部门），但一切努力都是根据统治国家的阶级（即资本家阶

级)的利益而作出的。然而，历史考察并不能证实这种假设。资本家阶级不可能在工业化出现之前就控制了政府。资本家阶级统治权的出现更可能是工业化的结果。虽然国家的介入往往有利于资本家阶级(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介入都不利于私营企业)，但更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国家的介入最初是为了保护除资本家以外的其他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工业资产阶级的缺陷。国家虽然不受资本家阶级控制，但代表着贵族、技术官员或官僚的利益。格尔申克隆在研究俄国问题时发现，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政府有必要介入工业。在第三世界中，本地的资本积累有时被说成只起次要的作用。技术官员或官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促使国家依赖于同外国资本的合作。国际资本与第三世界政府之间的共存关系往往被看成是现代工业化的重要特征。有时，人们认为这种资本国际化使国家有必要介入工业。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非资本家阶级会在工业化问题上抱着要资本家的看法。

第三，国家介入可能是出自外国施加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的。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是欧洲历史的里程碑。没有一个欧洲政府不受到英国工业发展的挑战。一方面，工业发展被看成是防止依赖性的需要，因此，工业化势必成为一种民族企业。另一方面，英国的例子能起示范的作用。各国政府纷纷派遣代表团到英国学习现代化生产技术，英国的工程师也被派到各国去帮助实行新技术。

就俄国而言，沙皇专制政权不可能对那个包含俄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单独采取行动。它必须考虑到战略上或军事上的问题，以及俄国这个工业化前社会在现代化环境中所处的脆弱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以及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反对派的出现，对沙皇政权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实行现代化就变得很迫切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介入是工业发展的需要。它的含义是：政府之所以要促进工业发展，是为了维护前资本主义类型的专制政权。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可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国家直接介入积累过程并不是由于其落后程度或资本国际化而有必要这样做，而是由于它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权。在当今的世界上，实行现代化的需求肯定比19世纪的俄国还要迫切。

在某些情况下，直接的军事威胁也可以成为国家通过促进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日本，外部威胁似乎是它在1868年以后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在今天的南朝鲜和台湾，上述动机看来是它们所实行的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我们很难这样认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与国家的介入形成一个整体，即一个可以与国家处于消极状态的欧洲工业化模式形成对照的统一体。其实，在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是起着积极作用的。不过，虽然第三世界私营企业的作用有时会被低估，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看来还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些关于国家的介入对形成工业化过程特征没有影响的例子。

因此，分析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必然要强调国家的作用。这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介入是工业化的绝对必要条件。在理

论上，我们很可能想象出一种国家在其中起着次要作用的积累方式。然而，实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提供的历史事例表明，它们所选择的工业化形式已使国家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今天，工业化已在第三世界的议事日程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它们推行现代化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工业化似乎已势在必行，因此它们越来越需要进行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已开始的过程也许直接介入，加以管制，也许是对之进行调节。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历史所提供的工业化先决条件来分析国家介入的作用和动机。在欧洲，国家介入的性质和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英国和俄国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可以设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方面的巨大差别。

结论

我想在本文中阐明的问题是：发展理论普遍缺乏历史根据。这使发展理论家产生这样的看法：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经验完全没有进行比较的价值。欧洲工业化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模式，而第三世界工业化则被看成在本质上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去甚远。然而，历史考察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欧洲各国工业化的性质和起因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我认为应该把工业化过程看成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把一切国家的发展运动加在一起，就形成了19世纪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同样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三世界工业化浪潮也形成了一个实体。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处在上述这种国际环境中，这种国际环境对发展起着限制或促

进的作用。

然而，我们不应该试图把一切工业化过程生硬地归结为一个外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总模式。欧洲的例子已表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可以沿着各种不同道路进行。毫无疑问，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也存在着各种不同道路。然而，把这些差别归因于诸如依附性、落后程度或资本国际化这样一些单一的因素，是极其错误的。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而研究发展的实际过程就必须考虑引起发展的不同历史环境。如果不借助于纯粹的经验主义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发展研究必将发生一次大跃进。

（谣谷译自《南洋资料译丛》，1986年，第2期，原载英国《现代亚洲杂志》第15卷，1985年。柳明校）

12 欧洲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对发展问题的过去与前景的考察

[德国]迪特尔·森哈斯

多年来，发展研究一直缺乏深刻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①而且总的说来，没有把欧洲单个的国家发展史的研究作为普通发展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多数发展研究集中于第三世界的问题上，而且经济史学家专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诸国家历史的分散研究仍未得到注意，仍未加以利用。

多年以前，我们从第三世界发展研究中归纳出大约40个相关问题，但其导向是对欧洲发展有可能进行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② 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目前的发展争论可以从这项研究中吸取某些正面或反面的教训。③ 这项研究规模关系到小规模出口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潜力的一些结果。④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把我们的考察集中于那些小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受到世界市场的沉重压力，特别是面临一个不同等级的世界经济所特有的各种能力差距。本文则是要集中考察那些

人口稠密的国家，概述我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问题在于能否把关于出口经济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所得的发现应用到其他事例上。⑤

在本文末尾，我们将对当前的发展争论作出一些结论。⑥

关于人口稠密国家和社会的研究结果

关于因地域广大而对外贸易只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小部分的人口高密度国家的各种研究表明，从出口经济比较分析所得的结果确实可以推广应用。这些国家发展的成败——像出口经济的情况一样——也依赖于早先广泛有效的农业现代化，以及与此相应的一个工业化过程。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和速度同工业化的类型之间，有个紧密关系，这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1. 持续的生存农业同工业化通常是相互排斥的。虽有低效率的生存农业继续存在，凡在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就会同

---

① 见我们在“发展研究转向的情况”一文中的论述，载《法律和国家》，1977年，第16卷，第107—122页。

② （与U·门泽尔合著）“无视国际能力差异的自主性发展”，载《经济学》，1980年，第21卷，第7—35页。

③ 这个研究方法的范式性观点，是因我们“重新发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研究与发展问题有关而引起的。见我们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载《经济学》，1977年，第15卷，第78—93页。

④ 参见D·森哈斯：“导向出口的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各种因素”，载《经济学》，1982年，第26卷，第7—17页。

⑤ 关于特殊事例的主要发现及经验性细节的详尽陈述和对有关文献的评论，可以见于D·森哈斯的《欧洲的经验：对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利明顿·斯帕（英国）和多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985年版。

⑥ 这些结论在U·门泽尔和D·森哈斯的以下著作中有详尽的阐述：《欧洲的发展与第三世界》，法兰克福，1986年版。

时出现典型的外围征象（例如巴尔干半岛诸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2．与这种(反面的)极端例子形成对照，在具有高效率农业的社会中，可以看到特别有力的工业化过程(这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移民殖民地的情况)。

3．如果在农业发展同工业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那么早期而又强烈的农业现代化就应该转化为特殊的早期而又强烈的工业化。在此情形下，极易发生特别激烈的社会分裂。这种关系首先可在英国发展史中见到，那是与其他大型社会的发展史迥然不同的。在某些大型社会(如法国)，缓慢而平稳的农业现代化同缓慢而平稳的工业化携手并进。此处所说的情况，即经济史学家们为著名的罗斯托起飞阶段致力探索而未得结果的那些情况。

4．农业现代化的开始，若是以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坚实的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那时工业的发展就特别地平稳并循序渐进(例如丹麦的情况)。

5．在人口高密度的国家，西为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都不是在全部领土上同时进行的，而是两种过程都局限于某些地区，所以有可能在个别地区寻找上述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并不缺乏，证据中也包括这样的有趣事例，即就整个社会来说仍处于低度发展的社会，在其个别地区则有自主性农业与工业核心的发展(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意大利的北部，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等)。

6．那些在过时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人为性粗放农业增长的事例，可以被认为特别成问题：那种较高的产量是由于农业人口增加的压力所致。其目的在于用传统方法和加强劳动

负荷而不增加任何生产投资来获取更多的产品。这种农业资源的广泛动员通常伴随着人民大众贫困范围的扩大，却不产生任何刺激以引发创始性的工业化。即使工业化实现了，那也像在旧结构上嫁接一个外来物体（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希腊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

自然，农业效率的提高，无论在哪里，即使在高密度人口的各国，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十分重要的是，在所谓"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期间，上述社会的此项要素与商品市场先期实行商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不在于能否证实在农村的商品生产一方面与相应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贸易活动之间，另一方面与后来的工业化之间，有个不成问题的过渡——这情况决不是个通例；重要的是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有助于摧毁过时的封建结构。

国家机器在创立规范化的法律系统和法律的一贯与可靠统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确立个体公司所不能驾驭的基础措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基本上是得到明确承认的。

识字率同社会现代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引人注目（斯堪的纳维亚与伊比利亚半岛适成对照）。

只有在上述条件下，小规模企业家阶级才有可能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出现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获得政治地位。这批社会的"中场队员"成了支撑独立发展的基础之一。这个初始结构的明确性越差，发展就越需要人为的"发动"。能起这个作用的，通常只有一种权力，即各国的政府机构，只要它可以独立行动。发展问题的研究早先把注意

力集中于在社会内部先决条件不利于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对发展推动的加强。今天第三世界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发展社会"及其居于统治地位的"掌权阶级"是一些变种，其先辈特别在高密度人口的专制式发展社会中可以找到（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即使在那时，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某些国家也比在另一些国家更有利：比如日本，那里有高度的农业现代化、广泛的社会商业化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响而重新出现的——这些都是鼓励独立发展战略的有利因素。在这些因素并不随时可得并且没有成为系统性改革政策的目标的情况下，就是在过时的社会结构尚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即使其政策取向于总体经济必要事项的掌权阶级作出最大努力于发展也是徒劳。发展政策在相应的社会结构不存在的情况下所遇到的困难，可以用埃及19世纪前半叶穆罕默德·阿里的"发展试验"加以证明，它不仅受到国外列强的重大压迫，也受到进行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活动的典型反对者，即地方性农业寡头的攻击。同样的试验也在其他许多地方推行（土耳其、中国、罗马尼亚等等），它们基本上也被传统制度的规定和集中起来的传统性政治反对势力所挫败。这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被挫败的发展尝试，也为今天关于发展的讨论提供了启示性的教训。

后期在有问题的出发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常常是"钢铁战略"多于"纺织品战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求把重工业基础扩展成为武器生产的基础，国家兴办的集中在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充当了比它在早期工业化国家里远为重要的角色。这样的发展方针必然导致不平衡增长——这过程后来甚至在社会主义发展政策的名目下还可看到，在此这方针也

导致种种机能失调的后果。

批评家们对以往论述自主性发展的文章提出批评时正确地指出，在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里，发展过程总是以巨大的不平衡为特征；又指出，逐步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品及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的想法，是与现实不相符的。按照这些批评家们的看法，平衡增长状态乃是一个漫长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

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人口高密度的后起现代化国家，诸如德国和日本，也在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发展了几十年——更不必说其他如沙皇俄国、意大利以及更晚发展的一些国家了。特别是在日本和德国，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推行的社会改革，才为真正广阔有效地开发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有活力的增长直到那时方才来临；这种增长加强了同质化过程，并且导向大众消费品市场的广泛动员。美国的发展动力，即早期从国内市场基础广阔的开发中产生的增长冲力，迟至此时才又出现。

根据出口经济的比较分析，在美国和欧洲人口高密度的各社会之间，发展节奏可以容易地用普通的二重性原则加以区别：以仍占较大比重的传统部门为背景的人为性的工业化，限制了发展的活力。迟发工业化国家的情况说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能得到显著的高速工业增长率。不过，其结果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另一方面，一些具有高效农业并有很快被耗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的人口高密度社会，却显然因在早期开发了国内市场，从而拥有增长的势头。

因此，把关于人口高密度社会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动力的

争论同资本积累和增长是在平衡条件还是不平衡条件下更容易实现的问题联结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两种极端情况和多种多样的复合形式都可以见到。不过，从发展政策(因此又是规范性的)观点看，有趣的事实是，对人口高密度的社会和大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和第三世界各大型社会）所作的比较分析证实了出口经济比较分析的一个主要结论：即作为增长基础的分配结构同广泛有效的发展前景从一开始就有紧密的联系。

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和美国的发展比起来，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再同沙皇俄国作个比较——开始于一个相对有利的起点，德国的条件比日本更有利。在这两个国家里，甚至直到本世纪初期，在顽固地残留着的传统性职业部门，仍有数量惊人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它对发展动力具有一种障碍作用。这种内部阻塞的克服，作为因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改革政策和1945年以后的经济重建的一个结果，大大地加快了这两个业已高度工业化了的社会的“成熟过程”，并且归根到底使相对同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结构有可能自我巩固。在其他目前业已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国内经济生产的最后同质化① 直到1945年以后方才发生，这多半是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率的一种反射性反应。

作为总的结论，我们可以陈述如下：在各种情况下——各种成功的发展战略与各种不良发展的情况一样——增长动力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结构条件——积累的社会结构——是根本

---

①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见于U·门泽尔和D·森哈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界定”，载《经济学》，1984年，第30卷，第103—128页。

的决定因素。

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讨论应该从发展史的这一新发现中汲取教训。

有关一般发展理论的若干推论

上文种种论述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初始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制度框架对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这些论述可以根据发展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社会政治基本格局的类型体系，对此我们只能约略地阐述如下：

1．在社会政治格局未受封建主义影响的条件下的发展（例如四个移民殖民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社会政治格局由以下诸因素形成其特点：农场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而且其农场具有突出的高效率；一批小规模的企业家为竞争环境所迫而进行生产性投资，并逐渐发展成为工业资产阶级；一支在早期就获得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劳动队伍；一个实行因发展重点的激发而订立的有目的的基础结构政策、并依靠适当的对外贸易措施（李斯特式的幼稚工业关税等）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发展地盘的国家行政系统。这种格局是少有的，因为它只能在没有历史性“残疾”的社会中看到。在其他带有历史性残疾的社会中只能经过长期而极度痛苦的冲突才能取得的发展，在这个格局里则是作为不相干的事物看待的。

2．在逐步地并最终成功地非封建化的条件下的发展。

在长时期内，这个过程导致一个类似上述格局的格局。这个非封建化的过程，在每个国家中为经常变动的各联盟之

间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所决定，即取决于中央王朝、贵族、农民、商业资本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忠诚或斗争落在何处。仅有少数社会成功地取得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相对渐进的转变，而没有经过深刻的甚至摧毁性的革命变化的局面。

3．在农业寡头集团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占优势（原先有或者没有殖民地历史）的条件下的发展。

无论在欧洲或欧洲之外（后者主要是在独立战争以后的拉丁美洲），这种格局典型地为日益增长的边缘出口经济的出现构成了基础。传统上的农业寡头集团和商业资本在这里占有统治地位，农业寡头集团的政治地位往往由于世界市场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有利的出口机会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有一定的工业化冲动（指简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地方，通常都形成社会政治冲突的局面，弱小的工业资产阶级人数很少，在农业寡头和商业资本的既得利益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只有到替代进口的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比例并获得一定的冲力时，一定程度的权力转移才成为可能；这种情况往往体现于民粹主义政权。

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这个社会政治格局一部分的那些外部势力，它们作为本国农业寡头集团和商业资本的贸易伙伴，在进出口的顺利运营中具有既得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商业资本的角色常常全部为外国利益所扮演。即便不是如此，占统治地位的各本地阶级也经常扮演大都会利益的地方桥头堡的角色。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能低估地方势力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他们作为食物和原料生产者而进

入世界经济的既得利益，这种与世界市场的整合，原先就是极为有利可图的，这类生产者的贸易条件在19世纪中日趋有利，所以显然是诱人的。

4．殖民地的局面。

这一格局以在各自"母国"的殖民政府统治下各殖民地社会被迫屈服为标志，每个殖民政府结构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同。但是在通常进行得相当快速的实际殖民化阶段，以及在殖民统治以后的维持中，地方首领集团与新的殖民势力的勾结比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更重要。没有这个勾结，殖民政府难免早已垮台；当考虑到较小的政府和较低的军费开支同这些地区的规模和必须加以"安抚"的人口之间的差距时，这一点更显得特别清楚。1945年以后殖民统治的迅速崩溃清楚地说明，如果当初就遇到正面的反抗，殖民事业将是怎样的无望。

没有例外，殖民时期导致各殖民地社会单一作物的飞地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又是培育异质结构的温床。

5．处于执政阶级正在出现条件下的发展。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它导致许多大不相同的发展过程，视其如何着重处理各项细节而定。如果一个中心权力，例如一个国家行政机关，成功地取得与守旧势力相对立的自主的行动自由，并把自己的发展计划有力地付诸实践，其结果可以成功地达到预期的发展水平（如1860年和1945年以后的日本，1950年以后的南朝鲜和台湾的例子所示）。执政阶级不能获得自身充分的行动自由的格局却是较为多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各种社团主义的专制的军事的发展专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发展的事例，也体现了发展专政。在这

类事例中，统一的党扮演了执政阶级的角色。不过，在许多官僚主义的发展中社会里，执政阶级的目的不是发展而是个人的发财致富。他们经常依靠偏袒追随者的政策来维持对自己的支持，这种政策把社会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盘授予追随者，以示政治上的宠信。

在当前的发展问题讨论中，对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观点常常提出的一个反驳意见是：今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发展趋势与这个观点正好相反。例如，特别是世界范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存，资本与劳动力的日益国际化，国际交通通讯的改善以及高度发达社会对发展中社会在赶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大示范作用，这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变化过程确实重要，虽然人们必然常要问一问它们是否确确实实总是"上升"、"增长"或"加速"——不论是全部一起地或者是分别地起的变化。但若把这过程作这样的设想，那么所有的社会都将同样地受它们的影响了。用这种世界市场观点不能掌握到所有发展中社会彼此之间日益明显的差别——至少不能全部掌握。可能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即某个社会没有自己的意愿，仅仅成为世界经济外生变化过程的一个转运站。而且，握于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优势极点的种种制约，对处于争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来说，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若是忽略了由内在原因造成的行动自由在程度上的差异，也会误入歧途。因此，在以后探索有关原因的发展研究中，必须特别注意对各种社会政治格局的分析，这种分析现在刚刚开始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可以在国际分工的总模式中，如同在世界体系方法中那样，对各个社会，并对表征各个社会特性的各种社会政治结构，有效地帮助改正其含糊不清

的功能主义的角色分配。不过在今天，我们必须预先对这种功能主义的角色分配方式提出告诫。

近来对欧洲不同部分之间发展差别的研究，已经成功而近似合理地解释了在中世纪晚期作为公开斗争的结果，对以后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各种根本性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因此，按照这些研究，一个国家在国际化世界经济中参与国际分工所采取的方式，大概是各自的阶级斗争结果的表现，而不是对这个国家的角色和功能（即中心、半边缘或边缘）的分配；不管怎么说，难以想象由世界体系所导致的这种角色分配如何能够发生。

因此，正好在西欧进一步实行非封建化的时候东欧出现再封建化，决不是反映出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上必然的、预先注定的角色分配，而是通过不同道路的政治斗争的不同结果；那就是传统的封建势力在欧洲东部日益加强和这些势力在欧洲西北部日益削弱。必须先搞清楚这个背景情况，然后才能理解欧洲各个部分以后的发展突破和边缘化过程。

不同的社会政治势力格局对于发展战略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在成功的移民殖民地和边缘化出口经济的事例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说明。

在世界体系方法中所假设的角色分配，最接近于符合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历史。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压迫的结果，这些依附性国家工具化和功能化了。生存经济，无论它有无明显的对外贸易成分，都成为服从于大城市经济需要的单一作物的飞地经济。同现今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所设想的相反，这类需要长时期内在商品范围和质量要求两方面都受到极度的限制。仅仅在小范围的产品上有利可图。唯一的例外是原

棉的大量进口，虽然欧洲纺织业加工的棉花大多数来自美国南方各州。尤其在整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在粮食和原料供应方面高度自给自足，这是只有有限的单一作物出现在欧洲遍及世界的经济边缘区的原因之一。假若欧洲当时对粮食和原料在广泛范围上有利可图，各殖民地国家就可能由于这样的需要而有一个基础广阔的早期繁荣了。可是，同一般的看法相反，这样的要求没有产生，1914年以前关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的所有有关统计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然而，即使是作为殖民主义的结果而发生的角色分配，也能够作为非殖民化的结果面得到放松，并可能得到改变，须看新的掌权阶级和发展工作行政当局如何执行而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只要它们继续服从其传统的角色分配，世界体系方法的观点就仍然适用；如果它们走向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例如在东亚），其有关经济体制就能够摆脱旧角色而获得新的动力比较优势。这个过程是它们自己的重大努力的结果。这不是世界体系的逻辑所产生的效果，这种逻辑允许少数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流动性——例如在临界国家和半边缘地区（新兴工业国）——面同时判定其他社会的下降流动性。这两个不同的过程，作为各个社会不同的转变能力和革新能力的表现，是很容易理解的。

出于这样一种观点的研究工作，说到底，也会给世界体系观点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证明；它可能会导致改正那些作为目前的世界体系方法的特征而败坏其信誉的含糊的因果推断。如果我们无视成问题的因果关系推断，世界体系方法论就由于它靠推广依附原则唤起人们注意世界经济格局中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心、半边缘、边缘），从而比现代化理论的许多方面

都更具有持久的优势。这意味着，凡在通常用笼统的假设作为现代化理论的观点进行论证的场合，具体的发展结构和发展战略的个性特征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的持久成就，在于以社会控制论的方法理解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特别地体现于它对源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引起的政治后果的论述。正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变化不能自动地转化为政治制度的开放，即民主和参与的扩大，所以，社会的民主化在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成功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这种社会控制论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十分重要。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坚持一切规范性观点所带来的持久的认识论成果，而抛弃经不起严格分析的推测。

多中心的世界经济是发展的新前景吗？

1. 现代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动力的起点，是两百多年前随着英国的农业和工业革命而来的一个重心的出现。这个重心在19世纪巩固了自身并成为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的基础。同前此的贸易资本主义诸中心不一样，这个霸权不是产生于成功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实际行动；英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其经济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优越生产能力上的：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率、新的主导工业部门（如纺织品生产工业、钢铁利用工业和煤矿）以及在国内和国际都成功地运行着的服务业，这些使英国经济有可能在19世纪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无论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世界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接近过这样单一中心的结构。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具有一种辐射广远的造型力量；它的霸权

地位造成一种趋向国际化的外贸政策。在此基础上，英国就有能力起到一个世界强国维持秩序的作用。

2．这种在单一中心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优越地位，对世界上其余的社会来说，既有机会也有危险。机会在于连接上世界经济的"增长火车头"，并参与一项工农业创新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出口经济)；危险则在于通过开放的出口导向成为这个增长火车头的一块飞地，或者换句话说，成为边缘性的出口经济。两种情况都是有吸引力的选择，至少在国际（最初主要是英国）的需求居高时是如此。凡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使用非经济力量取得成功的地方，则没有这样的选择。

3．由于一些新的中心的发展，19世纪英国经济所建立的重心地位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受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新重心的出现，是类似英国发展的各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农业-工业革命以及技术和组织的革新成为同世界经济相关联的一些新的主导部门的基础。标志着本世纪上半叶特征的霸权争夺，最终导致美国的胜利，它在1945年以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

四十年以后，美国仍在世界经济中充当主角，但它的地位由于西欧力量的重新强大以及由于日本和东亚新近出现重心而正在削弱。其中日本人的挑战仍是遵循着早先的模式：那就是由革新引出新的主导部门，从而导致激烈的赶超竞争，不仅针对那些依附的"边缘"社会，而且也针对那些老的工业化社会。

只要新的重心还未成为发展明确霸权的起点（同时是否长期如此在今天尚属疑问），我们就可以假设一个多中心的世

界经济体系：美国、西欧和日本是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各极。

4.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从单一中心到双中心或多中心世界经济的转变，导致这些中心之间关系的强化（例如以前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等级结构中的第二或第三等级中出现了发展新型出口经济的新机遇。如何利用这些机会，迄今天仍然取决于各个社会内部如何处理来自外部的刺激。

各边缘经济之间关系的相对缺乏，继续与上述各中心之间关系的相对集中相适应。

5. 这些重心及其所属的世界经济的那些部分的发展，经历着由周期性起落所引起的交替阶段：高涨和繁荣阶段之后是下降和萧条阶段。这种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动态中包含有一个全体系的模式抑或仅仅为某些主导经济的模式，是当前不断争论的主题。经验分析较多倾向于表明，在各重心中存在着对世界经济具有相应影响的次级系统交替阶段，即整个世界经济没有全体系的模式。显然，高涨和繁荣阶段普遍地比下降和萧条阶段受欢迎。不过，对下降和萧条所起的反应，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差异：在成功的出口经济中，恰是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由于它们自己机械工程部门的促动，有其农业-工业结构的一个质的巩固；这个阶段的正在边缘化的出口经济，或者采取种种主动行动走向替代进口的工业化，或者出现社会经济的倒退，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这样一些显著的区别，可以从各社会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所作的反应中特别清楚地看到。并且在今日，面向当前诸重心的出口经济，也有大不相同的反应。有些国家较多致力于发展，

早先替代进口的措施为新的措施所取代；尽管在世界经济中有种种不利条件，还是想方设法拓宽出口多样化的范围。另有一些国家则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减弱转而陷入灾难性的长期危机。在今天，后一类情况无疑地比前一类更为常见。

6. 在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在遵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针力图跟上发展的社会里，也出现一些独立的工业核心。这里也有新的重心，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不过，由于实力系统的关系，这些国家不能被看作具有影响世界经济辐射力量的重心。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是自给自足的对抗中心，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再生产即使有意义，那意义也是很小的。此外，它们在试图与结构上同质的社会取得经济联系已有很大的困难，更不用说与后者整合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的低水平结合，以及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谋求较高水平结合的讨论，证明了这些论断。

那些再次力求赶上发展的发展中社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下几点因素特别应该引起注意：

1. 世界经济当前正在经历的下降阶段，正在新老各重心引起旨在推动新的革新浪潮的种种强化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同时，各大工业化社会为分占世界市场而继续进行国际贸易竞争，各种不同的"贸易战"正在打个不休，大部分注意力都落在哪个主要的工业化社会将在若干新技术上领先的问题上。因为这些技术可以成为新的主导部门，将在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留下其印记，事实上还将组织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构。

这一过程对发展中社会具有二重性的影响。一方面，世

界上领先的经济体系和大多数发展中社会之间的技术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这样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旧有的工业从工业化社会向第三世界更普遍地进行转移。如果具备了适当的内部条件，一种新的"东亚效应"就可能出现，即如果具备了相应的国内经济条件，就可以成功地利用到各种新的出口机会。

这样一种技术转让在世界经济高涨的条件下是否发生，尚不能完全肯定，因为日趋明显的是，新技术也可以有一种同转让过程反向而行的效果。目前也难以看清哪一些发展中社会处于利用新机会的地位，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具有"东亚内部结构"，即高水平的行政和企业管理能力，推进革新而只造成轻度分配不均的各种制度。因此，如果需求来自占支配地位的重心国家，对发展又没有广泛的实际影响，则其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还是大于重复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不过，这样的重复不应视为在原则上不宜考虑，因为国内情况可能变化或被改变。

2. 尽管世界经济各重心的进一步发展已成事实，但在第三世界本身的广阔地域内能否出现增长中心，这些中心将可能在第三世界内部为新的出口导向战略开辟出发点的中心，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发展的视域上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个新的日本，对其邻国连带产生适当的影响，正像最近在东亚所发生的那样呢？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和阿根廷长期属于创立这样一个中心的候选者行列；在偶然的情况下，像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巴基斯坦那样的国家，也属于这个行列。

在目前，看来巴西是能够成为这类增长中心的唯一值得

重视的候选者，从长远看有可能长期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心。上述其他各国，虽然具有创建工业中心的人口密度和充足资源，却不具备创建这类增长中心所需要的工业潜力或能力水平。因此，在第三世界范围内，把注意力集中在创建新的增长中心，这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不大可能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这一点也为基本统计数字所说明。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的份额），自1960年以来只上升了大约1％。而且，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个比率在近期会有很大的提高。

3．无论未来的世界经济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多中心，或者与某个新的世界经济大国甚或世界政治霸权大国（日本？美国再次称霸？）相结合——在未来，无论世界经济条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只有在国家自己内部的发展潜力在广泛有效的基础上动员起来的时候，才会见到发展。这就要求——今天同过去一样——有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作为与某种工业化形式的交换基地，在工业发展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动力之前，这种工业化最初与农业是很接近的——不过需要有效率的农业作为背景。这个选择显然适合各大型社会，小型社会也不应对此不作尝试，尤其是如果在目前或在长期内别无其他由它们支配的有吸引力的出口导向发展办法的话。

4．最有实效的发展援助将是使发展过程按照这个方向运动。因为现实中没有其他任何更具吸引力的办法，上述考虑导致争取按分离方式取向的发展政策。分离（脱钩或拆开）的程度将随情况而异；然而，各国自己为取得发展过程的成功所必需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大概都是类似的。以上的分析暗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同所有的预料相反，而且可能重新出

现一次世界经济重新高涨，这样就会出现对内部发展过程有利的更好的全面的外部条件，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因为这么一来，为有效处理外部新机会的内部基础就会被建立起来。

（尹保云译自德国《经济学》第34卷，1986年。）

13 欧洲工业革命是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模式吗？

〔德国〕鲁道夫·哈曼

1. 有关现代化现论的问题

“当代发展援助的问题激起社会史学家、注重历史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注目于他们本国的历史，并考察那些激发和维持‘工业革命’的力量。当然，这项工作不能在观点上利用匆忙做出的类推作为基础，借以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相反，正是有关我们欧洲的工业化及其多种多样地方性、地区性以及民族性的表现形式的历史知识，防止得出错误的类比，同时防止制订出不现实的以及过去那样机械性的工业发展模式。”1966年，经济史学家博恰德在其担任曼海姆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欧洲经济史是否可以给发展中国家作为模式的问题。他最重要的结论如下：

——土生土长的一次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格兰。这是第一次以事实说明在不受农业支配的格局内有可

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一项直至那时为止未受东西方一切文化影响的成就。这一推动为大陆欧洲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管各个国家在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德国仿效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并输入英国的技术效率。通过使用当时仿制的英国式机器，训练了未来的"工业骨干"，从而弥合了与英国在技术上的差距。德国商品上的"德国制造"字样，原是英国人用来诋毁其经济对手所具品质的，却迅速变成了质量可靠的标志。

——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变化。西方文化的共同遗产大大有助于各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相互渗透。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是人口出生率的管理，那是按结婚次数和夫妇年龄决定的，有助于根据人们的身份地位而保证其营养。

即使是这样概括性的描述，也使博恰德得以表明，历史是不会照原样重现的。当今发展中国家拉下的技术差距，较之18、19世纪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便大得不成比例了。而工业革命后在欧洲出现的人口爆炸，又使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陷于广泛的停滞状态。

我们可以从欧洲经济史中学到哪些与第三世界相关的教训呢？经济史学家博恰德对此提供的答案是非常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历史可能"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问题，提出恰当的疑

问，以及形成含义动人的答案。有些糟糕的方法是寻找构成假说的灵感而不是观察历史"。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寻求自己的解答的创造性任务，照博恰德的恰当说法，是一项历史不能使各门社会科学与它脱离的任务。

当然，社会科学家只在特殊事例中采取了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而且通常只强调一个变项，利用欧洲历史作为他们现代化战略的蓝本。既然工业革命由此被赋予模式的地位，则现代化研究就"面临着确立此项过程的历史独特性和系统性两方面的困难任务"。因此毫不足怪，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变化的完整理论，但最佳的结果可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式和解释纲要，在这里纳入了各种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变项，是在经验性概括和理想化抽象的基础上探查这个基本变化的原因的。

在大多数所谓"单因素理论"中，人们喜欢用一种变项来解释现代化进程。本文将用举例说明的方法讨论其中两项最着名的理论，以揭示这些解释的弱点来自直接排列，对历史的和系统的分析的简单罗列。

代表一种经济因素的方法，最著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人物，无疑是分阶段描述通向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的罗斯托。据罗斯托所述，每个社会通向工业化必须经历五个阶段，我们只对其中两个感兴趣：一是助跑阶段，具有根本性的经济增长前提条件，二是起飞阶段。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罗斯托列有现代科学发现在工农业中的利用、食品产量的提高、敢冒风险进行投资的新型企业家的出现，以及中央统治的国家政权的发展。过渡时期历时长短，多半取决于"国家自有的人才、能源和商品供应，在对国内工业的服务中，可以相对于其他可

能有的全国性目标而加以利用的程度。这样引导活动方向必须成为政治领导人的主要责任……”。

起飞阶段是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生产方法被更换了，持续增长的前途日益明朗。在这个阶段，有效投资和储蓄的份额从国民收入的5%上升到10%或更多。新兴工业的增长伴随着对新的劳动力和服务迅速增长的需求。“经济推进的起点通常可以归因于某种特别强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可以采取政治革命的形式，由此直接影响社会上现存的社会均衡和价值观、经济制度的性质、收入分配、投资方式以及实际上已有发明的比例。”

虽然罗斯托并未以描述方式处理通向现代化的各个阶段，而是把它们用作一种有力的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他的模式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完整的。一方面，他以分阶段模式区分和勾勒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未达到预定目标；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假定发展是自动进行的，从而忽略了不同国家历史上的特殊条件。库兹涅茨和格尔申克隆曾作论证，认为罗斯托用来支持其论点的各国统计数字，并不显示出投资定额或经济增长的突然上升，而且认为，不同国家往往是沿着多种多样大不相同的道路赢得现代化的。

罗斯托当然看出了总体的社会价值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并未在他的分析中列作独立的变项。把宗教作用立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这个隐含巨大吸引力的尝试是由帕森斯的学生贝拉提出的，他分析了传统的价值观在日本通向现代性的途径上所起的作用。据贝拉的见解，1868年明治维新后，存在于德川统治年代的某些宗教形态助长了一种思想体系的发展，由此推动政府引导的经济变革走

向工业化。这种新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就是武士阶层，他们虽然在德川时代丧失了军事贵族的地位，却仍然恪守传统的武士道，而这种道德在1868年之后对成就取向的发展特别有利，并被接受为普遍的价值观。因此，19世纪的日本从那种与新生结构条件协调的传统价值观中发展出一种本质上属于新型的经济取向，由此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贝拉的方法是将马克斯·韦伯的加尔文教义加资本主义的理论转用于唯一成功地推行了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并力图寻见新教伦理的功能性等价物的一种尝试。然而，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著作表明，他的兴趣不在于就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一种积极关系，而在于揭示其他宗教缺乏新教伦理。不过，韦伯为解释经济变化而研制出来的特殊方法，不能作为一种在现代化研究中具有预示能力的通用模式没有限制地加以使用。贝拉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用一种对具有独特的动机和制度成分、类似新教运动的宗教运动加以鉴定的观点，对亚洲进行研究，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新教改革在韦伯整个著作中是社会和文化结构根本变革的一个象征性代表，具有最激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很明显，对亚洲的合适类比，不应是这种或那种动机或制度成分，而应是改革本身。"

当然，这并未阻止将韦伯的论点运用于各种非基督教宗教的进一步尝试。这样将韦伯运用于现代化理论，却又进一步证明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关系脆弱，对此大都未考虑到。韦伯有兴趣将向现代性的突破作为一项独特的事件，而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这事件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如果把'现代性'看成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假想

模式，在西北欧精心制作，并在不断拓展的范围上加以贯彻的一个可由其他社会效法的模式，那么它对这些社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是可以估价的。然而，如果它被一般化为一个不变的社会结构现象，由此不再服从于社会变化，那么它就变成一种老生常谈的神话，一种推行合法化的'陈腐教条'：'现代性'就成为人类发展的终点了。"在对19世纪欧洲和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时，有必要考察一下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

2. 从方法论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

作为方法论的问题，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充分阐明。正如莱普西乌斯一度指出的，这两门学科都具有需要从外部得到关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解释的特征。这种解释性功能说明了历史学在19世纪大为流行的原因，当时它将哲学从人文学科的领袖位置上排挤出去了。作为启蒙时代哲学的遗产，历史学被看作不断向人性进步的一种目的论过程，而各种历史性过程具有内在意义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20世纪，历史学中的发展概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方法：与历史哲学合作，而不设法阻止后者从后门溜出，不闯入别的学科而闯入社会学，在那里它完成了将社会作为整体解释其各种发展现象的作用。

在今天的社会学上，我们可以区别柯尼希称为"社会学的理论"和"社会的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社会学的理论涉及可以互相区别的各个问题，可以引伸或驳斥现存知识的问题；

社会的理论涉及解释社会思想的全体。"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实证科学，力求构成具有时空的解释价值的理论，因而是非历史的，其发现潜力非常小，特别是在所得的知识引伸到小集体关系范围之外的时候。第二个范畴是提供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面解释系统的，是哲学遗产的一项成果，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虽然德国社会学的吸引力往往远远超出其解释能力，但它为解释社会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意识形态背景。弗雷耶关于当今时代的理论，盖伦论技术时代的精神，或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第四种人的理论，都是典型地运用历史哲学作解释的尝试，在这里，技术的发展被描述为在历史发展后面的决定性动力和历史进步的量尺。

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和非确定性，关于社会的许多理论公开宣布其意图为确认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历史和社会哲学的前提，对此可以用下列四点特征加以说明。这些特征是现象学的，因为它们主要根据直觉，所以缺乏主体意识的控制；它们宣称有一个无所不包的解释目标，但其解释大多归结于一个变项；它们是历史目的论的，因为它们预言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并且由于这个终极阶段符合拟定的理想社会，所以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道德特性。所有这些标准都适用于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因而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将这些有关社会变化的理论作为历史哲学加以发展。"现代世界历史学家与他们的先辈不同，并不预言什么必然会发生或什么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发生。寻找根本规律的任务已被放弃——这种规律不可变更地和独一无二地决定历史进程，犹如自然规律决定行星的运转。在历史进程中，不容变更的必然性的概念不再是合理的了。"

社会变化并不遵守合理性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尽管人们可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框架内创造历史，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偶然性的作用或个人的行动是能够决定性地影响社会变化的方向和强度的。在另一方面，结构-功能理论往往将社会变化理解为与增长过程相类似。行为能力的积累性增长，社会增强了的控制自身事务的能力，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以及规则和功能的明确说明，都是典型的概念。犹如形态分类在斯宾塞的进化理论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那样，一种确认了发展和复杂性即结构差异的理论，结合了环境适应性和功能互相依赖性作为社会的重要发展原则。

然而，发展是一个具有目的取向的概念，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规范性的。根据许多现代化理论家的假设，工业社会是发展的样板，而工业革命则是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的方法就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一句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任何偏离这条道路上的做法都被理解为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由此忽视了或排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上不同的历史条件。

社会学家经常冒着这样的风险，即将历史首先看作为一个采石场，从这里提取合适的材料，为他们的理论准备实证基础。然而，另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被他们忽略了，即"从过去时代的巨大仓库里提取明智的问题，即那种可以引向主题材料的问题"。鉴于历史不仅使人们自己的社会处于过去时代，而且还处于其他文化之中，所以历史学家能够指出其中蕴藏着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格局。"历史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人类存在中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织形式，以供更密切的检

查，由此引伸出一批参考事物，使我们得以审查和判断现在。"

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本身能够发生根本的改变，社会学也是对这个发现的一种反应。而作为对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反应，社会学首先将自身视为一门批判性对立的科学，其目的是解释和改变社会结构。不过，从方法论的立足点来说，早期社会学家的综合性历史概念是妨碍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包袱。从孔德到马克思等许多思想家，试图把过去纳入一张令人信服的透视图，此举显然使社会学建立于历史哲学之上了。他们所创造的关于世界的一些概念，在韦伯论证价值判断取得成功之后，失去了其正确性。"减少经典的世界理论的可信性的，是马克斯·韦伯在他论客观性的文章末尾所说的那种感觉，即觉得伟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投射得更远了。从这些理论的根本设想来认识未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从过去推知未来的努力不再令人信服了。"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一点看来，关于社会进程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概念必然还是多半属于推测性质的。社会学不再是幸福未来的指引者了。

非常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发现即"价值自主"和"中程"理论，其理论含义，在现代化理论中不曾得到回响。进步的信念和历史哲学的种种假设，披着进化论概念的外衣从后门溜了进来，同时发达的工业社会，因其为发展中国家起了模式作用，其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价值。

将工业化和现代性非历史地加以等同，不仅意味着欧洲的工业革命作为独一无二的发展过程的高潮这一点被忽略了，而且还意味着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变化次要的负面效应也被全部排除了。此外，它更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只有积

极的一面。韦伯对铁的樊笼的悲观态度，在现代化理论中被转化成了毫无疑义的乐观信念。

按狭义理解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作为无数技术发明成果的生产方法的革命，对提供了工业革命的经典性解释的马克思和韦伯来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对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1760—1860年这一百年间的技术变革，而是新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最初局限于小型群体，到启蒙运动为群众接受后就遍及各地了。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期以来，技术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只在遇到演进的特殊挑战存在的领域才有效力，例如武器技术。在持久的基础上武装自己以对抗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的必要性，导致了武器技术不断的改进与发明。

在管理制度保证按人们的身份或地位提供食物的情况下，这个必要性并不存在于工作领域，只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在积累性的、但又各自相异的演变过程撤除了大体普遍的制度之后，技术才渗透到工作领域。为新教工作道德所激发的少数人启动了社会-经济变革。但在18世纪，当对待经济-技术革新的态度有了根本上的变化，而发明节省劳力的机器不再有任何阻碍时，那种新的行为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了。新的技术不仅是效率的产物，而且反过来又产生效率。“世界非神秘化”的过程既出现在上述过程之前，又与之相伴随。当效率原则支配了工作领域，因而又支配了人的自我形象之后，西方世界当时存在的有组织社会受到了强制性的改变。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哈特维尔曾经编录了工业革命文献中提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所有因素，分成五组变项列述如下：

1. 资本积累

——农业生产率

——商业中增长的储蓄

——增长工业利润的再投资

——低利率

2. 创新

——新式机器

——新能源

——工业上的组织变革

3. 天赋有利因素

——煤铁供应

——短途运输

——大量的劳动力供应

——经营企业和创新人材的储备

4. 放任主义

——现世主义

——理性主义

——经济个人主义

5. 市场扩张

——持续扩张

——人口增长

——需求增长

对工业革命的完整理解，必须考虑上列所有因素，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当马克思和韦伯力求对过渡

到现代性提出更精确的说明，在其用心集中注意于分析现实和理想因素的相互关系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熟知工业革命复杂的前提条件，也都知道欧洲在实现向现代阶段的突破之前，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他们两人都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社会学家。

3. 作为后继者的发展中国家

大量的发展理论将现代化视为在适应和引导自己事务的能力方面的一种积累性增长，假定正在现代化的社会所采纳的目的和道路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在他们就向现代性过渡的分析中，现代化理论家通常对发生在英国的首次历史性过渡的特征、欧洲过渡的特征、以及每一次过渡的特征之间的特征没有加以区别。此外，效率原则被视为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压制了或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

然而，历史的回顾表明，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决定论的进化论并不与历史真实相符合。过去只是可能实现的许多客观可能性中的一个可能性。具体事件总是特定的构造条件和人类的决定共同产生的结果。社会过程只能在特定的限度内按照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的意义加以预测。偶然性的作用，不曾预见的事件，各国传统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这些都能够给予社会变化的方向、速度和激进程度以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可选择的发展模式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几年来，这要求一直与要求分离的计划在一起，其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范围内促进生产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停滞的原因，在这些现代化战

略的拥护者们看来，是在工业国家都市化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边缘性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不相对称的分工。后者有以下一些结构性缺陷的特性：

——农业部门出口导向的生产力日益上升，导致本国人民食品供应的匮乏；

——为少数上层阶级生产的奢侈品挤掉了大众消费品的生产；

——由于技术上依赖工业国家，无法发展一个独立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

尽管工业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逐步得到发展，并使其社会-经济结构规范化，发展中国家却以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异质性为特征。然而，结构异质性不能像现代化理论家所提出的那样，解释为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由外因决定的一种发展的结果。作为加速工业化手段的现代技术转让，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第三世界的大量失业和大批人口脱离社会发展进程，其原因只不过是这种方式的现代化不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的结果。

自主性发展的宗旨，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国内市场和满足人民大众基本需要，以避免边缘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自主性发展被看作是延长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各方面决定过程的结果。求助于工业国家的历史经验，只有"在具有一种自身原有的能力，能批判地加工运用这经验，即尽可能没有盲目模仿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这种现代化战略的一个决定性要点，是几项过程同时起动。

——第一产业增加食品生产；

——调动和利用本地资源；

——工业部门的发展趋向于生产工具的生产；

——进一步发展和发明适用的技术；

——大众消费品的工业生产。

重要的是逐渐但是稳步地在农业部门将农业和乡村工业与技术相结合，同时将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轻重工业与经济区的发展相结合。经济动员需要在居民中作对应的政治动员。大众参与被视为抵制过度的官僚统治的经常威胁的纠正手段，而这种威胁是有学问的上层政治人物指导下的现代化进程常见的一部分。除了确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掌握社会上的种种变化之外，虽有各种独立经营的意图，却必须保证与世界市场相结合。这是通过选择性的专业分工而获得的，由此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竞争力，日本在1868年以后分阶段结合到世界市场的方法被视为样板。

据森哈斯所说，现代化只有在如下所有变项能同时受到检验时才能成功。“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上，不是只有单独的一个例子说明自主性发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如果互相配合便有成效：1. 个人、集体和整个政治文化的特性都得到顺利的发展。2.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自律及自我引导能力增强。3. 在所有主要部门中生产资源的分头发展：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技术的发明和提供、大众消费品工业、私人和公共服务行业。4. 与境外社会单位之间互惠交换，最初设法按严格的集体方式进行，以求在日后的发展阶段能有更大的扩展。”

独立经营论者所强调的各种发展过程的互相依赖是有启示作用的，但在实践上不能实现，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其所具条件与那些工业国家在起步时的条件

不相同。由于东西方冲突日益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所以看来要发展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与新的国际军事秩序相抵触，这一点已由森哈斯在其书中另一处地方作了广泛的研究。对军队在第三世界所起作用的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仿效欧洲的发展过程，其结果大不相同。

4. 军队在第三世界的作用

军队一直是其所在国主权的象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要通过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强调其独立性。然而，它们的技术落后意味着必须依赖工业国的武器供应，结果由它们自身的军事力量所证明的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独立了。1975年输送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武器第一次超过500亿西德马克；因此，如今有可能谈论第三世界中军事对政治系统的渗透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文职上层缺乏成功地应付危机的能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军队不是自己把持权力，就是控制文职政府。文职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始终以政治为第一，这是欧洲国家的特点，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则是闻所未闻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军事化，在社会科学文献中称为“军事执政官制”(praetorianism)。军事执政官制用以指称缺乏大众普遍接受的权力结构的现象，是政治衰败的一种典型特征。军事执政官制差不多总是发生在试图转变至欧洲法制模式而告失败的时候。一般而言，这种转变过程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关联的，而发展

中国家则正缺乏这类条件，例如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化。军事人员不可避免地卷入未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争议，并被文职利益集团奉为有吸引力的伙伴。这些集团受到实际事务的影响愈深，若有需求，其需求满足愈少，那么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愈大。珀尔穆特指出，军人执政有两种类型：摄政者和独裁者。军人若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与文职上层人物一起演出各种各样的共生戏，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合作利益而不是擅自为他们担负责任；作为摄政者，则不能满足于控制权力，而是在实际上行使权力。

60年代初，社会科学曾较多地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现象，那时一般意见都同情派伊对军队在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积极评价，这是他于1957年在圣莫尼卡由兰德公司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观点。据派伊所说，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完全模仿西方范式，表现出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那种现代组织形式。军队领导组织所需的管理职能，是系统地进行传授的，同时，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状况特别敏感。据派伊说，在发展中国家，军队组织有三点比其他组织有利之处：

1. 随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迫使他们跟上技术创新，并把眼光放到国界以外。
2. 为使装备尽可能具有效率，而这在和平时期又是个无法用数量表示的因素，所以军队必须比其他组织少作让步。
3. 军队部分地参与社会，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适应工业国家的规范，胜过适应自己国家的疑难

问题。

派伊得出结论说："这使我们断定：欠发达国家的军方能对从根本上加强行政管理功能作出重大贡献。"

在卡默洛特争议之后，紧接着美国社会学重定方向，特别是詹诺维茨尖锐地批判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军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作用的乐观评价，并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发展水平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据他所见，这些军队是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兵队伍的模式组织的，其所获得的技能，只属于中等管理水平，不足以应用于大规模的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有效行使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其他长处，如谈判技巧、交际能力、随机让步的本领——所有这些技能，军官在其特殊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中都未曾学到。相反，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的极度不信任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反政治倾向是军人专家政治思想的一种表现，作为军人，他们倾向于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取得一个简单直接的解决办法。"

这些理解的矛盾性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军队职能的两面性。作为赋有用武力强制执行的垄断权的机构，军队原本可以在危机时期承担权力，但又很明显地不宜因其特殊的职业社会化而行使权力。由于军队行动的倾向只是在压制而不是化解社会上的各种冲突或者根据一套既定的规则处理这些冲突，所以那些穿制服的独裁者所保证的稳定局面不过是虚幻而已。这种发展非常靠不住，因为军事统治一般只能由军队加以推翻，或者，在由文官集团策划推翻的场合他们也依靠军人集团的支持，就像1973年的泰国和一年后希腊发生的事变所显示的那样。

军官集团作为一批相对同质的上层分子，只能在传统尚未分化的社会里，在命令和服从的基础上施行统治。这类社会恰恰就是缺乏现代化基础条件的社会。在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化的过渡社会里，军事权力往往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没有为协调、管理和解决冲突及问题的中央政治机构——而军人政府又往往采取行动取得控制权力，以解散政党、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军方就自动地变成许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了。

作为整个组织的范例，军方可以起动技术和组织技能，以应付危机和促进现代化，这种能力是以减少复杂性作为代价的。军队的技术能力，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应用到了民用事业的发展上：筑路、灌溉工程、以及其他用以改进基础结构的种种措施。其中也包括全面的训练计划，例如对新兵通过周密的学校教育推行文化运动以及对他们进行使用武器和机器的训练。第三世界的士兵训练趋向于产生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也可应用于平民生活中。

军人统治能更快地作出决策，而他们机动动作的余地显然比文官当局大得多，这都是毫无疑问的。1966年加纳实施的紧缩政策，巴基斯坦和秘鲁的土地改革，巴西对通货膨胀的严酷战斗，都是军方在危机时刻作出决断的结果。这样一种决断排除了文官政府所用繁琐的制衡制度，以贯彻只对极少数人不方便的办法。

另一方面，运用这类无可置疑的能力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军人把政治首先看作一项组织问题，但作为一个官僚组织，其本身是不能革新的，而是要求一套独立的政治系统。特别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意识形态，军人不能调动大批政党取

得自身的合法性和制度化。由于军人知道文官政府所执行的人民主权原则，所以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应无可回避地证实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因为文官政府就是在这首要一点上的失败导致了政变。事实上，军方在许多事例中未得成功，这是因为军人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和没有政治全局概念，加上以敌友分类作指导的军事哲学思想，把政治理解为一场你胜我负的赌赛，并相信一定有简单的办法解决一切问题。如果预期中的成功没有成为现实，军人政权就必须估计到将面临往昔被压制者的反对，由此又引起军人一方面的压迫。"具有决断力的独裁主义政权结构上的优势，由于政治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很大一部分结构允许利益可以明确提出，可以进行积累，并可以得到满足，结果造成潜在冲突，这样就成了功能上的劣势。"如勒纳简明地指出的："搞暴力的专家"可以驱逐"搞买卖的专家"，但是不能代替他们。军事执政官制综合症意味着军队的干预成为可能。如果穿制服的上层人物不欲永久卷入政治，那么他们就应当除去军事执政官制的根源，这样一种努力按照规律总是会大大增强其力量的。

从东西方之间军事对抗的全球观点来说，第三世界的军事冲突并不是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孤立事件，而是几乎自然地牵涉到联盟大国的国际冲突，在这里明白地存在着某种类似国际军事秩序的情况。"按照这个与新的经济秩序的结构相对立的、新的国际军事秩序说来，在边缘地区要求选择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要求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国家的独立，而不予军事部门以适当的选择，不发展一种独创性的学说。因为，根据传统来说，威胁不仅对于创建现代化武器系统是一种

刺激，而且提供了一种非常容易操纵的辩护工具，以便在政治上为维持现存经济制度而贯彻社会控制的必要机制。”因此，现代化战略如果除去军人，就注定要失败。

5．“迟到的现代化”问题

因此，独立发展看来正像简单模仿欧洲工业化一样，无助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条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8、19世纪的欧洲。下列是四个最重要的因素：

1．第三世界各国的国际纠葛意味着他们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对这些年轻国家的自我意识和身份地位来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难困境。在发展中国家、或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每次发生政治危机，总有一条长长的阴影——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由此逃避——因殖民地的过去和目前的冲突而投射到北半球上。

2．第二个因素可以称为非同时性问题的同时性。这意思是：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在工业化国家是前后相继地发生的，因而容易把握。例如：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在今天，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以及人的尊严和民主，当然是作为具有同等地位的价值进行宣传了，可是没有坦率地指出的是：为使这些原则发挥功效，不能把专属于西方的一套标准直接移植到其他国家。英国试图强加议会民主制于过去的一些殖民地而告失败，就是很好的例子。这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轰轰烈烈如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其有关国家社会政治的不安定，作为对危机的反应，这种变革必然引发一种比民主更有魅力的领导力量，而这种领导力量的持久存在具有风险。

3．第三个因素是民族自决权的削弱使日益增大的技术差距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迟到的现代化”的假说得到最清晰的证明。当年的欧洲国家要弥合与英国蒸汽机的差距，比起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要适应电子计算机时代来，是容易得多了。从这一点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落伍的国家，他们所处落后的位置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日甚一日地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工业国家的技术转让。特别是生产技术被大型跨国公司所垄断，它们凭着复杂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决定性地影响着当前世界市场的发展，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困难的窘境。一方面，它们无力发明合适的技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并不面向大众消费品；另一方面，第三世界中先进国家是否对适宜的技术感兴趣，抑或这种兴趣只是出于维护声誉的动机，还是有疑问的，如巴西对现代技术的权利要求所提示的那样。国家主权和自治权作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可能因为依赖外国技术而遭到破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至少一百五十年前所说的评语可以恰当地在这里加以引用：“自从特洛伊人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一匹木马的时候起，某些国家接受其他国家礼物的事就变得不可靠了。”

4．第四个因素是自主性的削弱，其特征可以见于发展目标的表面设计。科学家和政治家都毫无疑问地臆断，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前景是成为工业化国家。这个被工业国家所宣

扬而为第三世界所接受的目标所伴随的实现方案，充其量不过是对欧洲经济史上运转有效的各种变项功能上的等值物的探究。然而，由于工业社会的危险信号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以及军备竞赛等日益紧迫，必须允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否有权将我们的发展方式强加于那些国家，这种强加在许多方面相当于第二次文化上的殖民化。谁赋予我们权力去决定具有许多世纪传统的外国文化的前途，并将它们送上未经质疑的进步观念的祭坛呢？此外，伊朗的一些事态表明，现代化和工业化必须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上扎根，如果计划中的社会变革不欲制造无法预见其后果的认同危机的话。

6. 历史学在比较社会研究中的作用

对欧洲和第三世界不同条件的对比研究引导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历史学能在比较社会研究的领域上对社会学作出什么贡献？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历史学能在下列三方面发挥作用。

1. 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可以提供有关传统的灵活性的信息。现代化理论在比较的意义上运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分概念，这里使用"传统的"这个术语，或者是作为残余种类，意思是"非现代"，或者是作为统计变项，其中没有社会变化的意思。这意味着有关传统社会和过渡社会不同发展潜力的问题被先验地排除了。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允许对过去的主导价值和规范系统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它们在危机时期的稳定功能进行分析，而这一切都是

不可避免地与向现代性的过渡相关联的。伊朗的历史是最好的例子。很明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复兴是一次认同危机造成的，而此次认同危机则导源于近来这些年操之过急的现代化。伊斯兰教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思想基础这个热门问题，是遭到法国社会学家和东方学家罗丹松否定的，因为宗教把中心问题从人类所争取的最高价值转移到来世去了，由此就无法提供社会行为的基础模式。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个宗教在阿拉伯国家所起的保护和稳定权力的作用。许多与现代化相抵触的传统，并不一定是穆罕默德传下来的，只不过为伊斯兰教所圣化了。伊朗现代化的溃败猛然使我们注意到，传统在决定社会行为作为文化价值的场合，在社会变革的理论中起到主要变项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从历史本身观察到。

2. 在原则上，比较社会研究有如下三个方法。历史的相对研究：由于规定时空条件而减少了理论的适用性，这意味着实际上有效地阻塞了通向更复杂的解释的路径。分析的相对研究：改变某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以迄于所有社会现实都得到解释，此时那理论就失去其经验主义的意义而变成累赘的事。结构的相对研究：提供经验上可证实的条件，从而可以出现社会现实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个方法在今天受到青睐，因为它设法避免其他两种方法——就是目前称为历史决定论和趋同论的缺点。

具体地说，这里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问题是：同样的制度是否能完成不同的功能？或者，是否必需用其他制度完成这些同样的功能，即所谓功能等值物？在这里，对于获得现代化成功的各种不同的道路，工业化世界提供了充分的

经验证明。

如果把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视为长期的积累性过程的结果，那么个体特性的作用往往就被过分忽略了。俗语说的"人创造历史"，当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但是把社会变化作为自律过程的观念也是如此。当然，历史变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它对社会变化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问的。哥策在他对古巴、加纳和印度尼西亚出现具有魅力的领导人所作的比较研究中表明，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两种前后不同的政治体制，两者均有制度性缺陷的特点。

3．信念领域相对自主性的发现与社会生活的结构方面相比较，使我们想到社会学和历史学合作的第三种可能性。文化上的解释不能合法地成为价值无涉论，但它却是独立于其他文化的价值系统之外的，不过，为了避免错误解释的危险，要求有高度的自我反省。与社会科学家相反，历史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他们对外国文化历史的印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学概括。社会变化的理论假如没有历史层面，就是空虚的，但对第三世界发展进程的历史的重新解释、意味着重新考虑我们欧洲的经验，我们的研究从这里取得了许许多多尚未意识到的和意识到的东西。为了减少我们可能提出的不恰当问题的数量，现在我们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正在利用社会学史以传统的工具分析过去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问，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能在工业化的方向上有任何真实的发展机会？或者，它们过去的社会文化是否提供了其他存在形式，而我们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来，认为这是陈旧的，或者是对现代性的障碍，因而加以拒绝？传统社会也能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发生改

变，并且发展出特殊的稳定机制作为过渡社会，而未达到现代化理论所设想的终极阶段，如泰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否定了趋同理论的基本前提。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设法解释向现代性突破的现象。他们研究的主题和取得新发现的兴趣，是与一个可以认知的价值体系相关联的。问题在于那些价值是否仍然决定我们社会的自我形象，并且因之决定社会科学。在马克斯·韦伯论客观性的文章接近末尾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句最常被引用的话，乍看似乎平庸，但却已明确地认识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投射得更远些，“那么科学就准备改变它的位置和概念架构，并从哲学抽象的无上高度俯瞰纷纭事物。科学追随着那些能对它的工作赋予意义和目标的星座”。就研究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变位置和概念架构的时候确实已经到了。

（李喻喻译自德国《经济学》杂志英文版第27卷，1983年。）

14 论第四代工业化——对格尔申克隆与希施曼模式的反思

〔韩国〕金泳镐①

前言

“格尔申克隆模式”是指格尔申克隆在总结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的高速增长过程时所提出的“追赶(Catching up)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对19世纪后期欧洲德、意等国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后来又由罗索夫斯基和大川一司等人通过对日本工业化过程的分析加以印证，广泛地运用于对日本经济的分析。日本的渡边利夫运用这一假说分析了韩国经济，进而提出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理论，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这一模式还被经常地用来分析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等的发展战略问题。

“格尔申克隆模式”概括了德、意、日、韩国、中国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情况，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一个理论框架，这在理论的合理周期渐趋缩短的情况下确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事实上，在近、现代经济史中，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只日本一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目前，尽管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运动正在展开，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如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甚至正在扩大，债务积累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正在恶化。在这样的格局当中推广格尔申克隆的假说，似乎很容易招来"掩盖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的非议。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已取得了成功，但它的模式与欧洲后发国家有所不同，与日本的工业化模式也大相径庭。问题的核心正是这些工业化模式的差异。格尔申克隆本人很重视这些差异，他的"追赶模式"正是在一个所谓"替代模式"(pattern of substitution)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恰恰是这个差异问题引来了不少批评。希施曼针对这个问题，将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化模式加以区别，把前者界定为"后来者"(late comers)，而把后者界定为"后后来者"(late late comers)，如拉丁美洲诸国。

在此，笔者试图重点探讨工业化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各国的工业化模式在各种国际国内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问题，进而提出一种有关工业化的"代际理论"。在这一框架中，将通过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以及印度等处于第四代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的性质分析和动态考察，来重新探讨格尔申克隆与希施曼模式。

---

①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

一、格尔申克隆与希施曼模式

格尔申克隆模式也曾被称为"大冲刺（great spurts)假说"或"后发性利益假说"，是由对19世纪的德、意、俄等欧洲后发国家的经验分析中推导出来的。格尔申克隆首先设定了以下8个对比类型：

1．土著型——诱发型

2．强压型——自发型

3．生产资料中心型——消费资料中心型

4．通货膨胀型——通货稳定型

5．数量变化型——结构变化型

6．连续型——断续型

7．农业发展型——农业停滞型

8．经济动机型——政治目的型

在这8项对比类型当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按照公式划分，可得出以下6种形态：

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工业化的起步就越是缺乏连续性，往往呈突然的大冲刺形态；

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倾向就越是明显；

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它就越是强调生产性产品而非消费性产品；

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对新生工业增加资金供给及提供较为集中和较为高深的企业指导

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就越是显著；

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压力就越是沉重；

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在为成长中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展的工业市场方面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工业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这里，用来表述以上6种倾向的独立变量，是所谓"落后的程度"，据此再决定"冲刺"的程度。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可能利用的技术的储备水平。罗索夫斯基在总结格尔申克隆模式时指出："在落后的经济当中，可利用技术的储备水平越高时，其工业化就越有希望。那种认为在落后国家里劳动力廉价而资本高价的见解是错误的，因为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实际上反而更加稀缺，而资本则相对说来是廉价的。" 由此可见，这个技术条件可能是对上述6种倾向发生强烈影响的重要因素。总之，在技术的自由贸易背景下，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提供技术的伸缩性是比较高的，而这正是"追赶"的一个重要前提。

有关落后程度的阶段性分析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按照格尔申克隆的分析，落后的程度分为：

1．在大冲刺之前落后性最小的先进地区；

2．中间地区；

3．落后性高的地区。

与此相对应，他提出了一个工业化主体被替代的所谓"替代模式"。按笔者的理解，此模式应如表一所示。

表一　替代模式

	先进地区	中间地区	后进地区
第一局面	公　　司	银　　行	国　　家
第二局面		公　　司	银　　行
第三局面			公　　司

在"第一局面"(即"大冲刺")中，先进地区的资本由民间公司自动调节；在中等发达地区，则由于民间公司尚不具备，故由长期信用银行等制度性机构负责提供资本；而在中等发达地区的"第二局面"中，民间企业才得以独立；在落后地区，国家在"第一局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导致在"第二局面"中银行的作用提高，接着，在"第三局面"中民间企业应运而生。这就是说，在民间企业发展较迟的地区，国家和银行起了替代性的作用。

格尔申克隆强调历史假说是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命题，但是作为比较经济史上的类型化尝试，某种程度的例外仍然是难以避免的。格尔申克隆模式后来经哥穆尔卡的发展，引伸出"哥穆尔卡模式"，即：

$$\alpha=\sum_{i=1}^{5} e_i d_i$$

其中，α:某一后发国家的技术变化

e_i:i 要素对总技术储备的相关指标

d_1:资本和劳动力向技术方面的转移

d_2:工人的日常性学习实践

d_3:引进专利及特许所带来的技术推广

d_4:科技情报的自由交换及其自然性推广

d_5:技术化资本和中间资料的技术推广

(d_1、d_2 为国内因素,d_3、d_4、d_5 为国际因素。)

那么,这种格尔申克隆—哥穆尔卡模式可否直接照搬到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19世纪的后发国家,在当时与那些先发国家并不同处于一个文明圈,也就是说,前者具有为后者充当"代理人"的性质,这表明当时主要的矛盾关系并不是先发国家同后发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它们共同与正在扩大的广大殖民地区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在"先发——后发"和"支配——从属"这种现象当中,格尔申克隆—哥穆尔卡模式只是适用于"先发——后发"关系的一种假说。

希施曼指出,格尔申克隆的6个命题符合19世纪欧洲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特征,但却不能说明诸如拉美那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特征。希施曼把前者叫作"工业化的后来者",而把后者则叫作"工业化的后后来者"以示区别。他认为,在格尔申克隆的6个命题当中,除了第6种倾向(即国家越落后其农业的作用就越小)外,其他5种倾向对那些"后后来者"来说,那变化几乎是相反的,因为拉美国家在当时国际市场萧条的背景下采取了消费资料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希施曼一方面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后来者"与"后后来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把拉美的工业化模式作为一种新模式加以总结,从而摒弃了格尔申克隆的"后来者模式"。

库尔思很重视希施曼的假说,尤其在挖掘"后来的工业化"与"后后来的工业化"之间的差异问题上独具匠心。他注意

格尔申克隆模式中那些后发国家工业化漠式之间的差异，将意大利、"拉丁欧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美各国归为一类模式，同属于"后后来的工业化"。他一方面指出，在国营企业、跨国公司和私人企业中，"后后来的工业化"国家更加依赖于其前两类企业，另一方面对非耐用消费资料、中间资料和资本和耐用消费资料的"生产局面"与传统的权威主义（寡头制）、平民主义和官僚权威主义的"政治形态"的分别对应态势，对工业化与政治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希施曼和库尔思对"后来者"与"后后来者"的区别所作的分析，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理论界对于他们将意大利那样的19世纪后发国家与拉美国家作同质比较的作法，仍有不少的疑问。诚然，意大利、日本、俄国在19世纪的后发国家当中，确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迟到者，但它们是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尚未形成时就已经开始其工业化，并在使其外缘地区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谋求本国发展的。把这种情况同非欧洲的、经济上被置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按同一模式来处理，显然是牵强的。当然，拉美国家的确早在19世纪末以前就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并从20世纪初便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从时间上看，它们与"拉丁欧洲"相差无几；但与亚洲国家相比，则可以说差距甚大。由此我们说，希施曼的所谓"后后来者"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等的情况。

总起来说，希施曼—库尔思的模式虽然鲜明地指出了19世纪中叶的法国、德国模式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俄国、日本以及部分拉美国家的模式之间的差异，但是对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所行模式的历史性差异来

说，这一理论还有很多地方暧昧不清，甚至有重大的遗漏。

二、有关第四代工业化问题的理论框架

以上通过对格尔申克隆—希施曼模式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工业化的历史性差异问题。在这里，拟再就差异问题作些理论性的思考，进而提出一种关于工业化的时代划分的“代际理论”以供研讨。所谓“代际理论”，并非一般性的阶段论，而是重点考察因时代的推移而引起的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中工业化的动态发展及其模式的差异问题。同时，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在同一时代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各个地区也有各类不同的形态；并且，在不属于同一时代的国家当中，也往往存在着同样的类型。至于已实现了工业化的那些稳定的地区，时代性差异将会迅速减少的情况当然也是不可否认的。

划分工业化的时代，有以下5种标准：

第一，将市民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三个范畴相结合，以其不同的组合方式作为分代的基本标准。

第一代工业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国实现的，这个过程是由市民革命先行，然后在市民社会的秩序中实现了工业化，最后导致转变成帝国主义。这是所谓的“古典工业化模式”。第二代工业化是19世纪中叶在法、德等国开始的，它们受到了英国的影响。在那里，仍然是市民革命先行（当然法、德之间未必一样），而后是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并行。这时的帝国主义，是作为工业化的工具应运而生的。第三代工业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俄、日等国，首先是工业

化与帝国主义并行，而后是不彻底的市民革命。到这一时期为止，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实现了其自身的帝国主义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与此同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四代工业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是那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南亚诸国、墨西哥、巴西以及南斯拉夫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除去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说这一代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背景之下实现的，伴随着依附性的发展，不彻底的市民革命最后到来。

第二，以工业化主体的替代类型为基准，辅之以"依附论"的观点，进行代际划分。

第一代工业化的主体是民间资产阶级，他们完成了市民革命，在经济领域里呈上升趋势，其代表是英国的民间企业（中小企业）。第二代工业化的主体是法、德等国的银行（像长期信用银行那样的非营利企业）及受其支持的民间企业。第三代工业化的主体是俄国和日本的国家，然后是银行，再后是民间企业（主要是大企业）。在这些国家里，大企业资本基本上是民族资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资本与国家的结合所实现的工业化，也许是这一代工业化的最后例子。日本就是依靠民族资本实现了工业化的，这可能也是世界史上的最后一个例子。第四代工业化基本上是在民族资本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依靠国家与外资的结合来实现的。在这种结合模式中，大企业应运而生，形成了一种国家——外资——大企业的统治联盟；作为其对立面，则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者的被统治联盟。这时所出现的外资作为工业化的承担者

加入进来的事实，是与第一种代际划分的标准，即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工业化现象相对应的。即便是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其所依靠的也不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式的连续积累，而是70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引进外资使然。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没有外资就没有第四代工业化（当然外资与新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另外的问题）。

第三，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划分工业化的时代（我们把"中心——半外缘——外缘"的框架改为"中心——半中心——半外缘——外缘"的结构来加以分析）。

第一代工业化（英国）是中心型工业化，同时也是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重新组合过程。第二代工业化（法国、德国、美国）是半中心型工业化，表现为在英国的霸权体制下，这些国家一面制造出本国外围的边缘性部分，一面又对英国的霸权体制提出挑战。第三代工业化（日本、意大利）同时受到来自中心和半中心的许多影响，被迫形成了依附型工业化的边缘部；但又将被排斥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朝鲜、台湾、满洲①等外围纳入自己的边缘部，从而使自己上升为"半外缘国家"。第四代工业化须同时接受中心、半中心甚至半外缘的许多影响，无法逃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因而被迫沦为依附型发展的外缘型工业化。这与第一种的帝国主义条件和第二种的外资主体的工业化时代背景恰相对应。

第四，按工业化的内容和国际分工形态的差异来划分工业化的代际。

第一代工业化的实现，依靠的仅仅是日用消费资料工业，

① 指我国的东北地区。——译者

而第二代工业化则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到了第三代工业化时，又加上了化工、精密机械、汽车、电器等耐用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一代工业国的国际分工模式，以本国消费资料工业的专门化为中心而展开，同时强迫后发国家负责非消费资料工业即第一产业的专门生产；第二代工业国除了消费资料外，在生产资料工业发展的条件下，也开始允许别国不仅在非工业部门，也在消费资料工业部门进行某种程度的专门化生产。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固定化，是在制造业中生产资料工业的广泛增加、作为新产业的耐用消费资料的生产获得了发展后才开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工业化乃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以展开的。至于第四代工业化，由于先发国家在高技术及信息业和服务业等新产业方面的发展使其向生产资料工业的参与成为可能，所以必须开始应付先发国家技术本身的高度化和战略化问题。由此看来，国际分工的范围拓宽了，形式多样化了，依附与发展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化了，新的依附类型即技术和金融方面的依附问题就带来了新的矛盾。

第五，按照"康德拉捷夫的周期论"来划分工业化的代际。

在第一次景气周期（1790年到1844年—1851年）兴起了第一代工业化，第二次景气周期（1844年—1851年到1890年—1896年）为第二代工业化，第三次景气周期（1890年—1896年到1948年）为第三代工业化，第四次景气周期（1948年到20世纪后半期）为第四代工业化，至于这次工业化是不是阿根廷从第三代工业化中落伍的重演，据此尚难逆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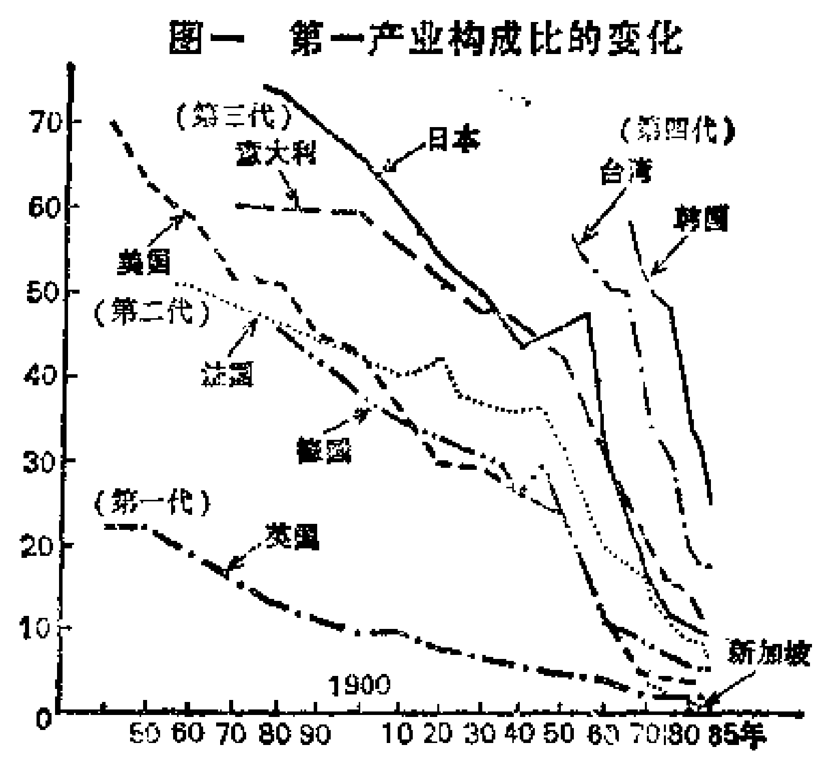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工业化的各个时代的特征及其判定标准。

三、第四代工业化的发展与变化

下面，我们将用统计学的、实证的方法来对第四代工业化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在这里，我们运用7项统计标准逐一说明其发展和变化。

第一，关于第一产业构成比的变化(参见图一)。19世纪初以来，在第一代工业化中的英国，这一比值长期处于下降趋势；19世纪中叶以后，在第二代工业化中的法国、美国和德国，这一比值仍处下降趋势；19世纪末以后，在意大利和日本，也出现了持续的猛烈下降。到20世纪后半叶，处在第四代工业化过程中的台湾和韩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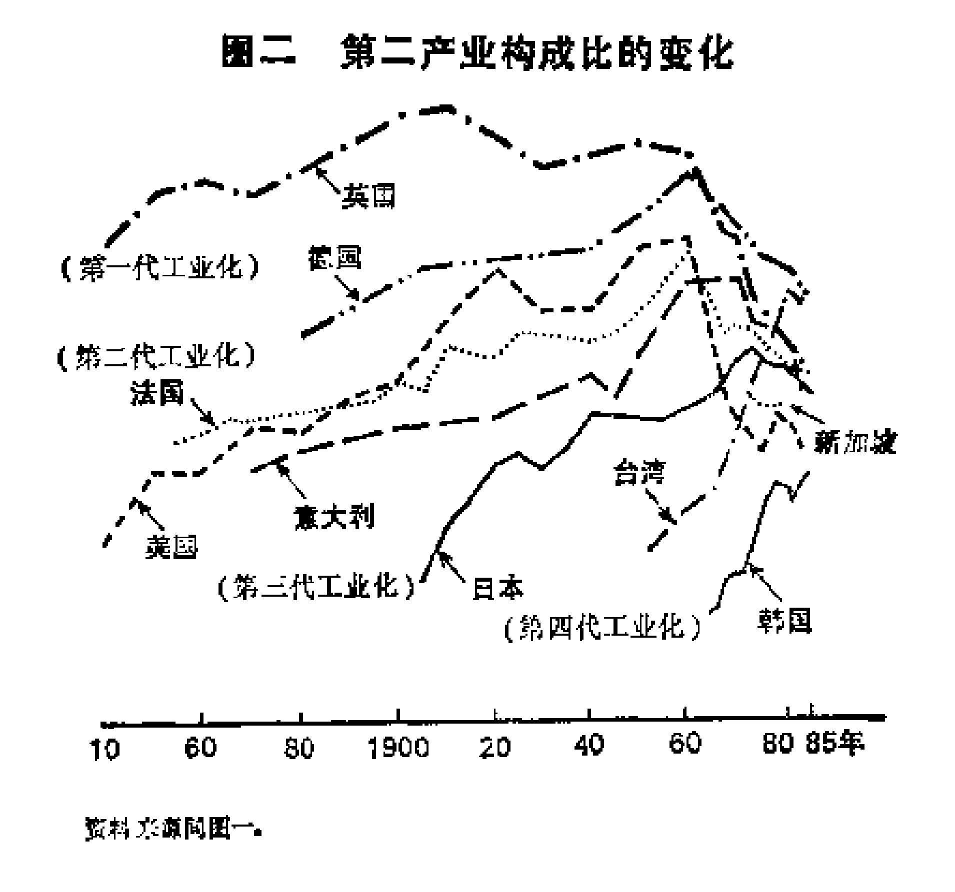
图一　第一产业构成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B·R·米歇尔：《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麦克米伦公司，1978年。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国际比较统计》；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

第二，关于第二产业构成比的变化(参见图二)。与第一种情况恰好相反，作为19世纪初期的第一代工业化现象，英国的第二产业呈持续上升趋势；第二代的法、美、德和第三代的意、日也是如此。在20世纪后半期的第四代工业化过程中，结束了殖民地时代的台湾和韩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在第四代中的这种陡然上升的趋势，与前三代中相对平稳的上升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出台湾、韩国等作为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超工业化相反的一极所具有的特殊的工业化现象。

图二　第二产业构成比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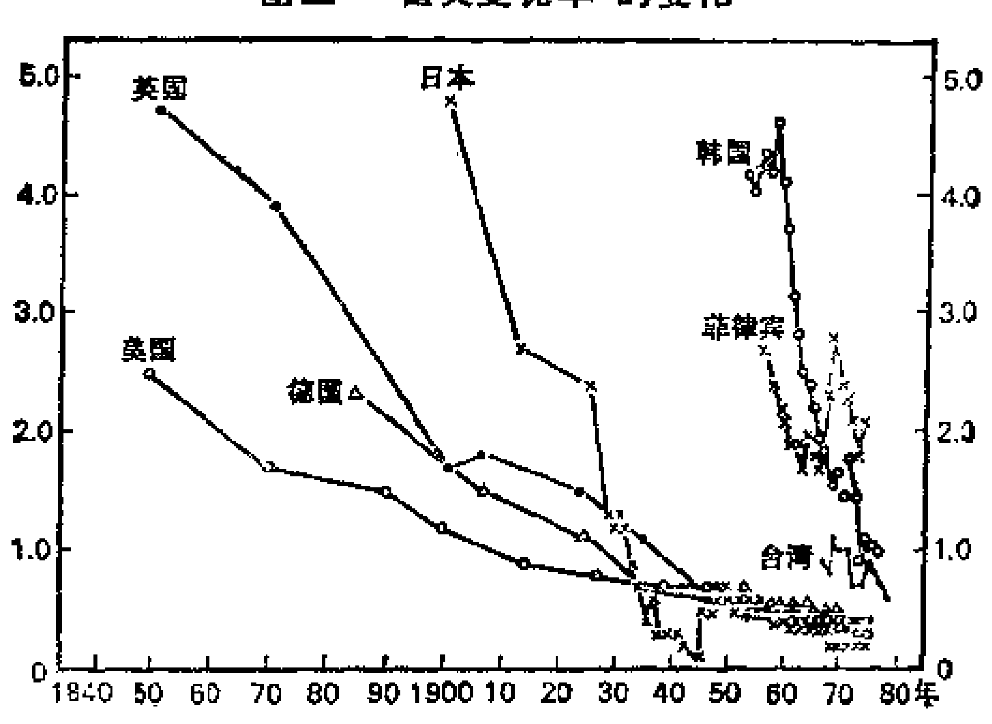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同图一。

第三，关于第二产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率(霍夫曼比率)的变化(参见图三)。在第二代工业化的美国和德国，这一比率较第一代的英国为低，这是因为第二代工业国与英国不同，它们没有停留在消费资料工业的发展上，而

是迫不得已地也发展了其生产资料工业。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日本的“霍夫曼比率”的急剧下降，台湾、韩国等地也随之开始了持续性的猛降。这一点也可说明第四代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特点。

图三 “霍夫曼比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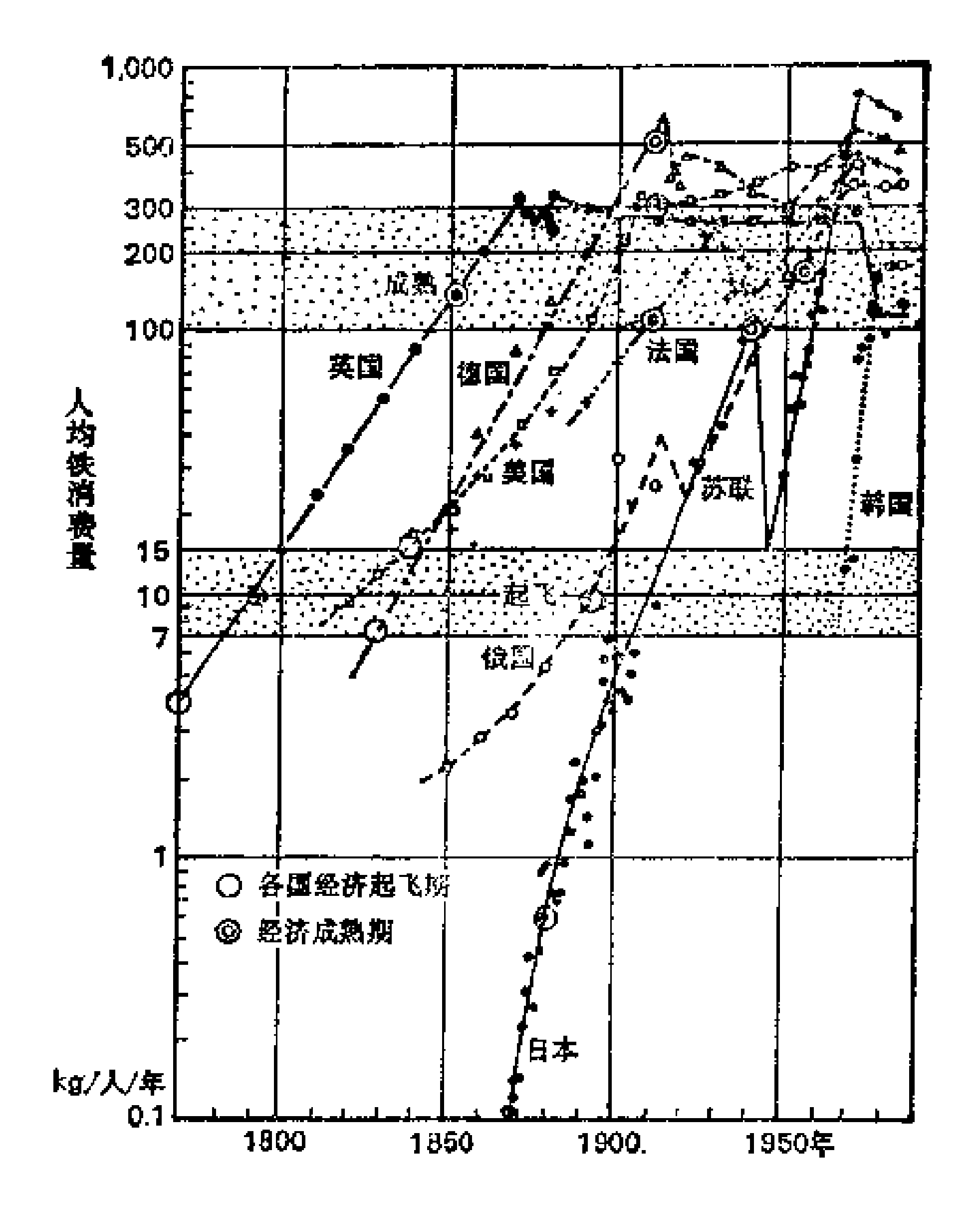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渡边利夫：《现代韩国经济分析》，劲草书房，1982年，第21页。

第四，关于各国人均铁产量的变化(参见图四)。到目前为止，铁的产量可以说是制成品的最重要的代表性材料。纵观四个时代的工业化过程，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每一代工业化在这方面都是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一特点也可展示各代工业化的过程。

第五，关于资本的竞争力指数(参见图五)。图中的起点设定为1899年，在当时，英国的这一指数已开始急剧下降，而美国则处在较高的水平上。第四代的韩国和台湾其指数急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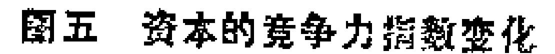
图四　各国人均铁产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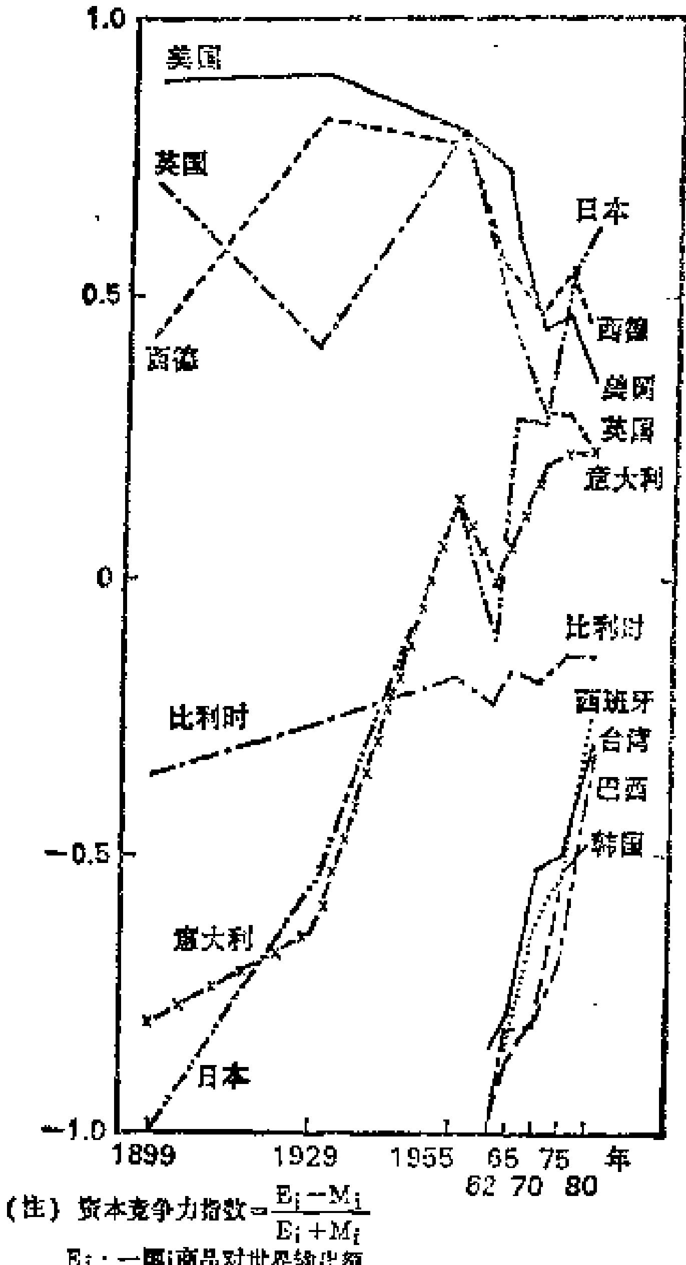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POSCO

上升，与第一、二代的下降形成对比，而与第三代则成正比关系，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关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R & D)的比率的变化(参见图六)。在形成第三代工业化的格局之前，它们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还不明显，并且由于当时的技术基本上



图五 资本的竞争力指数变化



(注) 资本竞争力指数 $=\dfrac{E_i-M_i}{E_i+M_i}$

E_i：一国i商品对世界输出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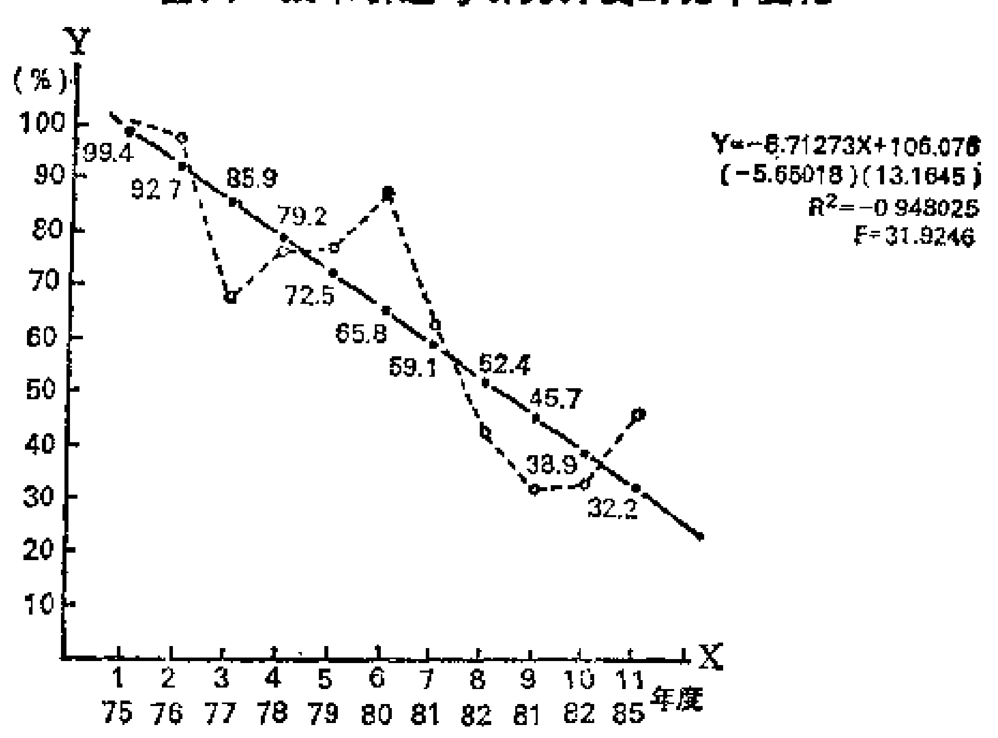
M_i：一国i商品对世界输入额

资料来源：堀原弘和："工业化由西向东的传播"，《商学研究》第4号，日本大学商学部，1986年。

体现在设备方面，所以仅靠引进设备即可达到引进技术的效果。但是，到了第四代工业化时期，由于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大，并且技术的"黑箱化"(black box) 或"模拟黑箱化"成分过多，所以又新生出有关技术依附和技术转移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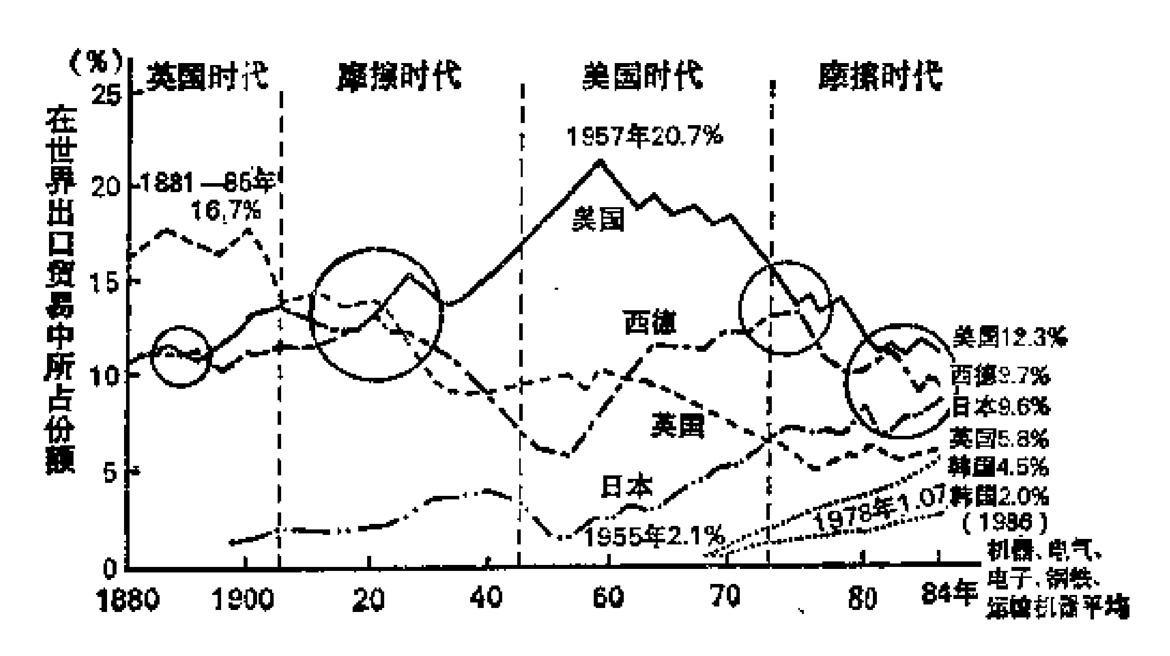
题。在第四代工业化过程中，技术的依附与独立是并存的，这一点可以见之于图中韩国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之间的比率变化。从比率变化的具体波动来看，升降并不明显；但从长期的框架之内来看，总的是呈下降趋势，这可说明是一种技术独立的征兆，但目前还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

图六　技术引进与研究开发的比率变化



第七，关于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指标（参见图七）。图中显示，第一代工业国英国在这方面是急剧下降的；与此相对照，第二代的德、美等国却呈上升趋势，表明经济摩擦的时代由此开始。第三代的日本同第一代的英国相反，但与第二代（除了4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段短时期）国家几乎是成正比的；后来摩擦逐渐加剧，进入80年代以后开始了全面摩擦的时代。第四代的情况（如韩国）还不明显，在世界总出口中仅占近2%，距离全面摩擦时代尚远，只是个别行业的产品开始加入了摩擦的行列。

图七　国际贸易摩擦



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通过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鲜经验的分析，批判地检讨了有关后发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格尔申克隆模式"和"希施曼模式"，并介绍了一种工业化的代际理论。我们这个讨论的重心，在于阐明随着历史或国际条件的变化，工业化的模式及其发展机制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上还可对其进行阶段的划分。我们以5种基准条件为依据，提出了工业化的时代问题，并将今天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盟国家、拉美新兴工业国以及中国和北朝鲜等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化纳入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第匹代工业化"过程之中。同时，我们还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进一步分析的7项具体指标。

由于第四代工业化与目前发达国家从前的工业化模式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新工业化”。这一代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先锋如台湾、韩国，如果能够彻底地上升为新的工业国家或地区，那将是世界经济史上依靠政府与外资的结合来实现工业化的最先范例。作为新工业化发展的条件，改革的推行，加上半封建因素少以及国内资本多（无论是财阀型还是中小企业型），都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形态，特别是加入新国际分工时的结构性条件，则是更加重要的。

从整个近代经济史来看，如果第二、第三代工业化没有相继出现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世界经济的大停滞和大倒退。随着每次新一代工业化的出现，随着世界范围内市场的扩大和供给能力的增加，世界经济获得了不断发展的活力和机制；同样地，今天的第四代工业化的展开，也将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工业化热潮，要想解决世界需求相对来说过于窄小的问题，就只能是出现大危机或者战争。还有，被“国家——外资——大企业”式统治的工业化机制所排除出来的“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者”三大被统治阶层，如果不能妥善地加以吸收，那么必将会发生民众革命。依靠“国家——外资——大企业”推进的第四代工业化，如果能够超越“国家——外资——财阀”的统治形式，从而实现大众化、自主化和收入平均化的话，那时才真正可以说它是“成功的”。看来，这些矛盾今后将怎样发展以及如何处理，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加果考虑到靠排除民众的主体性来寻求发展的方式是有局限的话，那么，就应该从根本上把希望寄托在民众革命的潜力之上。并且在

方法上更加积极地去寻找有利于第四代工业化成功的各种内外因素。

工业化的代际及其划分标准

	第一代工业化	第二代工业化	第三代工业化	第四代工业化
时期	18世纪末—19世纪初	19世纪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	20世纪后半叶
地区及国家	欧洲先发地区英国	欧洲中等地区、法国、德国、美国	欧洲后发地区非欧先发地区意大利、俄国、日本	非欧后发地区台湾、韩国、中国等
政治经济条件	市民革命先行工业化帝国主义化	市民革命先行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化并行	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化并行不彻底的市民革命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工业化、不彻底的市民革命
推进主体	民间企业（中小企业为主）	银行民间企业（大企业为主）	国家民间大企业	国家外资民间大企业
世界体系条件	中心型	半中心型	半外缘型	外缘型
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间国际分工的形态	消费资料工业—第一产业	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第一产业与消费资料工业	消费资料工业、生产资料工业、耐用消费资料—第一产业与消费资料工业	消费资料工业、生产资料工业、耐用消费资料、高技术—消费资料工业、生产资料工业、耐用消费资料
周期	第1周期1790年到1844—1851年	第2周期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	第3周期1890—1896年到1948年	第4周期1948年到目前进行中

（王小平译自日本《经济评论》1987年第10期。）

第三编

政治现代化进程与发展目标

15 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

[德国]汉斯－于尔根·普尔[①]

本文也可用这个题目："西方的现代化与第三世界的传统"。——说"西方"，是因为（1）欧洲的现代化综合症已经输出到西半球，即南北美洲。在西半球地区，土生土长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的模式与传统或者全部、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已被消灭；（2）东方社会在开始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时，很大程度上必须把这一进程中某些最显著的（如技术的）因素认定为一种输入物，不是从它们自身传统中生长出的。它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在下一阶段将这些输入物与自己的传统调和起来。

——说"第三世界的传统"而不说"第三世界"，是因为我试图用近乎类型学的方法论述似为20世纪所有后起工业化国家共有的某些普遍特征。而日本，许多人认为从很多方面看来几乎是"西方"的一部分，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所以它显然绝不属于"第三世界"。那些出口经济兴旺的、新近取得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有些人称为"半

边缘"或"次中心"或其他什么的，也不属于"第三世界"。它们究竟是"第四"世界，还是"第一个半"世界，可以进行讨论。此外还有中国，至少从40年代末以来就不再成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了，不过它一度可能是"第二"(即社会主义)世界中称得上独立的一员。

本文论述现代化和传统，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但并不像某些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那样用"好/坏"二分法。按简单化的理论，只有遵循某些技术成就的路子，首先是工业化的路线进行的现代化与变革，才是"进步的"，而各种传统则被认为大多是失去功用的或起妨碍作用的因素。"变革"可以按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这一点我们可能已从最近数十年来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讨论中，以及从对一些大组织、大公司、政治机构或福利机构的明显局限性所作的一切恰当的批评中了解到了。

"现代化"基本上是变革，但它并不仅仅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创新。它是经济上(当然还有技术上)、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种种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而这些交互作用往往可能是区域性的、部门性的，并且几乎总是有限的、局部的、渐进的与递增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即其各别部分的变化，大多涉及有关社会的整体，至少其后果决不能预先限定于计划中的某一个特定部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或称发展——在这里我愿意使用此词)也许还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包括有至少表明下列几点的规范性含义：

——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根据经济增长、分配，等等)；

---

① 本文系作者向"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研讨会"(1987.9.29—10.2，香港)递交的论文。作者任教于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

——扩大政治参与的潜在能力；

——增大团体与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活动的范围；

——有助于增加和巩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自主性，减少有关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依附性。

这个过程的机制、功能和因果关系往往是模糊的、间接的、"混合的"或"过渡性的"，正因为如此，为了能够理解准备作出的某些政治抉择或决策具有什么意义，考察一下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历史层面，有时也许是有用的。历史学家除了其他特长之外，还是探究各种过渡机制和号召人们谨慎、精细或清醒的专家。

在本文中，我想集中研究欧洲或西方的现代化对于更为普遍的世界性发展进程所产生的某些影响。基本观点是：在一个越来越工业化的世界中，虽然除了工业化之外，即除了使西方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那些特征适应非西方环境之外，可能别无选择，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在总体上必须遵循西方那种发展模式。理由有一点是：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西方（或欧洲）现代化进程。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多种多样，欧洲各国迈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上的各种要素构成一些有趣的混合体和组合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教训，人们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

一、西方现代化的多样性

西方关于现代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作为出发点，它们大多注目于英国的实例，认为它是一种现代化、民主化和（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综

合进程唯一的理想型式。然而，如果我们细加考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是，工业化和民主化某种程度上一度同时进行，而为调节工业化的社会后果（而不是为工业化创造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在欧洲大陆之后大约两个世纪才产生了科层化，所以看来完全是个特殊的（先驱性的）例子。毫无疑问，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英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虽然在英国的例子中有一些特征在美国一度重现，只是有某些变型（如边疆、移民、西进、联邦制、南北分歧、家庭农场主的"平等"神话等）。尽管英国是例外，可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工具至今还是循着英国或美国事例的线路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没有遵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那些属于所谓"第一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走着不同的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如果把问题加以简单化，并且按理想的型式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构成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统一性"的是，这进程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科层化、工业化、民主化都是连续出现的。三大因素中的具体成分在不同国家是各不相同的，这些成分的特殊"组合体"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多种形式。正如这些"组合体"（或发展道路）不能规定何者为规范或唯一的西方模式那样，谈论某一条脱出常规的"歧路"（"岔道"），像德国一度出现的情况，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不同的事例中和所有不同的道路上，我们发现，自晚近的专制主义时代以来，同时存在有强烈的纪律成分与强烈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解放成分，以不同方式被强调并植入其已有的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解放的历史，也是一部纪律和有纪律的组织的历史。这一点长期以来似乎被人们忽视了，其原因可能有一部分在

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广大领域中存在着盎格鲁-撒克逊偏见。

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些精心探讨：要弄清西方各国通向“现代性”的特定道路之间的差异，最好也许是用比较的方法考察国家职能和科层组织的成长。自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起，推进西欧现代化的动力是官僚专制主义（bureaucratic absolutism）、法国革命和工业化。

二、英国模式

在英国，一个几乎摧毁了传统农业、将自己从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羊毛贸易中积累了资本的强大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开始了工业化，不需要国家在此过程中积极介入。光荣革命终结了图谋建立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短暂趋势，开始了一个温和而持续的变革过程，最终导致英国的自由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国家科层机构加入这个制度是在较晚的阶段，即开始于19世纪的下半叶。“民主化”的到来，最先是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展，然后是由于工业化。君主和社会中日益缩小的封建阶层被迫越来越多地将权力让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议会尽管源出于封建制，但已转化为代表土地及其资本家阶级了，到了1832年以后的改革时期，就愈益适应工业化飞跃发展后的社会变化，适应中下层阶级扩大参与的要求。

在我们的简化模式的三大要素（科层化、工业化、民主化）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在英国是居于支配和统治地位的因素，它影响并调节了其余两个因素。在将近一个半世纪里，个人与社会的解放实质上是市场机制所给予的，政治没有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纪律和控制，其主

要成分的构成，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资本家阶级和大部分中产阶层）和工业生产（对工人阶级）的严格需要。由于专制政权建立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努力已告失败，因而既不存在最上层或官僚等级结构中的中央集权，也不存在具有欧洲大陆那样巨大力量的政治现象。欧洲大陆的那种现象也成了大陆专制主义传统的特点，曾被格哈德·厄斯特赖希等人认为是“基本纪律约束”(Fundamental disziplinierung)主要的必然结果。基本纪律约束指的是在社会秩序的底层进行自主性决策的制度化场所，如家庭、教会、行会等。不过，地方政府的惯例可以对这类场所的缺乏部分地加以弥补，但这惯例并不适用于例如宗教问题等方面［就宗教方面而言，在很长时期内，如果不属于国家教会，另一选择就是属于分裂教派——在这类问题上，1648年以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就比英国更具有“社会群性”(consociational)］。

在英国，压制不是警察国家的那种压制；压制的特征更多属于公开和直接的阶级斗争的特征，而尤为重要的是，那是出于组织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的”压制。另一方面，似乎小群体一级的社会化、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等领域在某一时间完全听凭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原则的渗透了。

在以后阶段，当国家受到激进分子、功利主义者、文官制度改革者和费边派分子的责难时，这并不是严重到为了要约束公民的私生活，而主要是为了把原先被自由共识所同意的个人权利还给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较小集体，因为工业化进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压制性纪律威胁了或侵蚀了这些权利。当人们发现，议会中的个人权益法案、地方自治的传统手段以及治安法官每季度一次的开审都不能够管理好工业化所带来

的社会后果时，他们便发动了文官制度改革。在改革的最后阶段，一种国家（科层）制度缓慢地引入英国。

三、大陆模式

欧洲大陆各社会的发展与英国不同；在这里，发展都是与科层式专制主义（不管"开明"与否）和专制主义官僚制度一起开始的。此外，用法国大革命来界定科层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对的影响力时，又产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差别。

专制主义（absolutism）凭借其科层化、权威政治、军国主义和重商主义等基本特征，无疑是纪律的伟大创造者。它设法使旧日等级秩序的中间性代表团体臣服于新的中央集权政府，臣服于它的官僚机构——该机构规定自己的职责为保障"共同福利和良好治安"。它用纪律约束"臣民"，并且根据公共秩序、纳税和服兵役的需要，创造出"臣民"这个类型，不过它认为，无需将他们完全整合。此时，"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支配着宗教、家庭和财产各方面的古老社团原则，但却有意留下某些余地让它们在地方一级或地区一级自己成立组织。纪律约束尽管压倒一切，并且广泛地作了正式规定，但不是全面的。由于正式的惩戒措施组织得很好，而且（在理想情况下）无时不在，因此，在来自上层的国家控制与压制之外，还往往导致个人的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从历史上看来，这也许是西方靠科层化手段在全国范围组织"恐怖文化"的首次全面尝试了。科层等级制度组织得越好，社会局部进行自我组织的潜力就越弱。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解放"，基本上是民族国家的解放，是

从统治者及其官僚机构与国库得到的解放（如果某些胡格诺派教徒或犹太人或某些城市经济组织能够为国库捐资，他们也可被给予若干程度的市民“解放”）。制度上对“中间团体”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增加了个人从宗教或社团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当然也为服役者、纳税人和臣民带来了更为正式、更有实质性的“平等”。然而，它没有促进代议制度，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扩大。

在几个“开明”专制的实例中（例如普鲁士或约瑟夫时的奥地利），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特征：科层制的原则与组织的“合理性”得到加强，任意授官和腐败现象遭到反对；通向仕途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较为“民主”了，即基本上靠个人才学；法治原则以及司法和政治决策的可预见性得到确立和扩大，在一个非民主的环境中出现了部分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更为重要的是，开明专制的官僚机构所接受的训练，不仅在于完成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职能，而且还在于以家长式统治方式自上而下地组织社会服务。这两项职能均未对促进人民的解放或民主化有巨大推动，但它们促进了社会总体的发展，并使纪律约束和专制制度的经济负担多少还能承受。在以后阶段，这类官僚机构在工业化的成形期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协力为工业起飞创造了经济上的先决条件，而且调节了由工业起飞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冲突。

四、法国的实例

谈到“民主化”时，我们当然需要区分大陆发展的两种类型：法国方式和普鲁士方式。在法国，还有一个因素决定性地

影响了以往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那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确立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自由民主制，其基本目标是代表并保护私人财产；另一个也是较弱的一个，则是激进民主制，其目标是建立社会平等、实现公民的全面解放。第一个传统或多或少导致了一种类似英国代议制度的议会统治；第二个传统则支持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在这两个传统中，国家作为公民共同体，被确立为所有政治问题的最高和最终的上诉受理者。从这时起，决策需要一个民主的立法过程，公民则要求参与这一过程，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并自由组织各种社团。他们还希望将国家官僚机构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并由此使之瓦解中央集权。

激进民主派要求更高。除上述几点外，该派认为，国家作为施行个人和集体自由权的前提条件，必须保证公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机会，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远为直接和持久地干预经济与社会，干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的各种过程。他们因此主张由一批委员会和政务会进行统治，其成员应该按轮换制度更替，各委员会和政务会拥有永久决策权、永久行政控制权、永久（在最佳状态时，是“开明的”、非压制性的）商讨权和说服权。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委员会同时也是统治和行政机构，是控制教育和军事机构，因此没有留下一点余地进行分权、制衡或保护必要的少数派权利，犹如自由议会统治的传统所承认的那样，而这传统，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来是更趋保守的。即使这种直接民主传统的目标和动机从那时起只能在下层社会团体中、在革命或准革命形势下产生有限的影响（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1920年俄国与德国的工人委员会、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加拉瓜的桑地诺组

织），即使他们的工具显得很脆弱，容易为组织得更好的自私自利的势力所操纵，法国大革命激进路线的倡导者们仍然应当受到称颂，因为他们首先阐明了在20世纪成了常识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施提供社会的和经济的先决条件。"福利国家"的哲学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要紧的是，自法国大革命之日起，"解放"和"民主化"的含义，在激进民主派看来和自由民主派不同。

不过，能以某种特定方式体现出每场革命的特征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是革命后的稳定过程。在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在短期内是波拿巴政治体系，更确切地说，是拿破仑通过政治和司法改革，成功地将革命的成就与传统和科层制的功效调和起来，由此创立了现代的、革命后的官僚政府的国家。从那时起，法国一直由"高级官员集团"(Grands Corps)的官僚上层治理着，他们遵守传统，通过教育和公开竞争加以确定。这种行政管理具有连续性，并且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管他们行动的合法性是由一个从上面组织或操纵民众欢呼的波拿巴提供的，还是由自由民主制的显贵议会提供的，都没有关系。官僚机构上层分子对两者一向忠诚：忠于革命的主流，而不是激进民主派的业绩；忠于经拿破仑改革与整合的专制主义官僚传统。或许法国总是存在着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偏向，喜欢在与显贵们紧密相联的经济利益和官僚上层分子的专长之间进行某些形式的审慎考虑，结果削弱了政党政治和自由议会民主制的中间群体。但是，恰恰是这一特点给整个制度带来了特有的稳定性。

在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机构化与

政治民主化两者的均衡融合——前者乞灵于专制主义，后者则产生于革命。工业化出现较晚，对于政治和社会制度及其相互作用型式的构成，没有很大的促进。那套奉行中庸之道的官僚式国家干预体制，既不过于集权，也不过于进步，是一个由专制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建立的公共传统，甚至连激进民主派也接受。官僚机构控制社会的高能量可能产生的压制效应，则因人权、公民权等革命成就得到承认而被中和。如果两方面的原则偶尔发生冲突，那冲突多半只以公开反感的形式出现（即保持尚未达到一般认为已开始敌对性的原则斗争的状态）。除了两个波拿巴时期以外，正规化的压制相对说来较少，政治参与和代议的程度较高。不过，真正有意义的参与是，一方面参与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参与基层的名流政治。有限的法团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传统和自由民主制的实践都同样喜爱这两种参与。

因此"纪律约束"在总体上始终是有限的：从专制主义继承下来的纪律成分被革命的解放过程部分地遏制了。工业生产中原有的那些纪律成分，则由于法国工业化的相对迟发和分散性，长期以来一直较为薄弱。至于科层制行政管理的合理性中所包含的纪律成分，始终是"温和的"，因为名流政治圈内的传统性敌视正规组织和自上而下施行的纪律约束。中间层次上的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并不一定要遵循与官僚政府的控制相同的原则。限制纪律约束及多种价值观的某种竞争，似乎是革命后经改革的法国官僚机构为其与革命胜利者——资产阶级和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结盟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在这种氛围中的"民主化"，对自由民主派来说，可能意味着在议会中和在官僚机构面前有效地体现了财产利益；面对激进

民主派来说，则也许意味着更多的行政控制，更多的旨在增加社会服务和减少传统性名流政治影响的国家干预。

五、普鲁士/德国的实例

在普鲁士，革命并没有成为事实。因为资产阶级较为弱小，普鲁士社会不可能产生一场革命。人们也可以论证说，或许普鲁士不需要革命，至少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是这样，因为实行干预政策的官僚专制主义体制非常灵活，足以靠改良的方式预先对付某些期望适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各种激变的最为关键性的要求。普鲁士由于没有革命，便继续由那些与地主和军人结成密切联盟的官僚统治着，而那些地主和军人，则都是先于现代和先于工业化的政治上层保守分子。毫无疑问，科层化是普鲁士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因素。1780年和1806年后的两次改革，是由官僚设计的；各届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而且，官僚在为工业化准备经济、司法和教育诸方面的前提条件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1850年宪法颁行后，控制和压制程度依然是高的，代议和参与程度则是低的。民主化显然被视为一种危险，可预计性高且正规化的普鲁士"法治"，被设计成为前议会制的和非民主的，而且希望它一直保持这个属性。

普鲁士的官僚机构，除具有专制主义官僚机构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高度干预性，注重发展，以国家为本位，并明显地偏袒或勾结统治寡头，这是法国和英国官僚机构所没有的特点。由于普鲁士是个欠发达地区，长时期来甚至没有实现领土上的联合和统一，因而官僚机构的首要任务便是在这些分

散的疆土上建立国家，并从事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除了君主和军方以外，官僚机构是代表“国家”的唯一机构。当官僚们提到“国家”时，指的即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国家中的市民(或资产阶级)社会”（卡尔·马克思），肩负着一项使命：建立国家和民族。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独裁式和官僚制手段，同时，因为起步的基点太低，而要做的事又远远多于例如法国和西班牙那些国家，所以，为了弥补这种欠发达的状况，他们采取了这些手段：严格而完善的组织、正规化的等级制度、高度的纪律、监督和无条件的服从。

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甚至渗透到那些先前专制统治留给自治的法团组织的孤立地区。各级学校下了很大的功夫，将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准则与国家的准则和目标加以协调。日常生活(包括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军事化和官僚主义化。当日耳曼各处领土上的工业化处于起步和最初阶段时，国家官僚，特别是普鲁士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替代没有或者缺少企业家干劲的资产阶级。在德国虽曾有过强大的城市手工业者的传统，但这些手工业者开始降低成为小市民阶层，所以资产阶级的阵容比在英国或法国弱小得多。“市民阶级”(bourgeois)即资本家和企业家，从未成为提出或实施某一发展理论的主角。甚至德文中表述该阶级的单词一直含义不清楚：“Bürger”并不光指市民阶级，它还指原来意义上的自治市的市民(burgher)，也指公民，还适用于专门职业者和大学培养的文职人员和国家官僚(Bildungsbürger)，这些人从总体上说来，在树立社会风气方面，比市民阶级影响更大。普鲁士在德国统一的台前台后都居于支配地位，因此它的传统传

遍了整个德国。1850年以后，国家的科层组织也成了组织工业企业、政党和压力集团时的模式，它们集合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引导德国较早地过渡到了组织形式更紧密或称为"法团"(corporate)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因为官僚与普鲁士东部保守的前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所以即使是他们提出的最富革新精神的官僚机构的发展计划也带有偏向，这妨碍了现代化的速度。普鲁士高级官僚与其西欧同类人物不同，当他们认定自己的行为与"有产阶级的利益"(米奎尔)相一致时，他们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这种联盟。

综上所述，这里简单勾勒的三种现代化类型，其特点都出自现代化进程各种不同的因素在这些类型中特定的组合，也可以说，出自诸因素中不同的"主导因素"特定的组合。在英国，主导因素是工业化，它促使产生民主化，许久以后又促使产生科层化。在法国，主导因素是科层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工业化则是以后才到来的，其影响力也较小。在普鲁士/德国，则是科层化和工业化相结合带来了现代化，民主化始终是缺乏的。

当然，历史上有过各种变化，有过属于不同类型的不同因素的各种组合，也有过各种模仿举动。美国经历了联邦制和"新国家"各种意外事件的锻炼，多少是走了英国的路。西班牙方式与法国颇为相似，特别是就"高级官员集团"而言更是如此。不过，西班牙受革命影响较弱，官僚机构上层分子不仅必须与西班牙边缘地区的资本家市民阶层联合，而且也不得不与中央落后的寡头执政者结盟，因为后者往往迫使他们在政治上"过度发展"与社会经济上"低度发展"之间作出妥协。意大利是个特殊事例，因为它有坚固的地域传统，在地区统一

后，不像德国受普鲁士模式支配那样，明显地受某一种模式支配。普鲁士方式对许多后来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中包括列宁和所谓"第三世界"的众多"发展型独裁政权"——军人或非军人政权，特别是后来的俾斯麦样式尤为吸引人，是掺有一些民粹主义成分的波拿巴主义和官僚独裁制的混合体。

六、向福利国家迈进

然而，在以往一百年中，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至少在第一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中显露出一种趋同的倾向。趋同倾向始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得到强化，劳工运动融入政治和建立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的变化过程推进了这个趋势。传统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势力不得不作出退让，与新兴的阶级、组织和官僚机构的代表或成员分享权力和影响力。科层化现象，由官僚机构控制的干预性手段以及官僚机构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家与民间官僚机构间的相互作用，都有成倍的增加，这使传统上议会对行政的控制，就如传统上其余大多数制衡手段一样，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联邦制国家，像德国和美国，鉴于功能上的原因，变得较为中央集权化；而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如法国、西班牙或英国，则被迫将部分权力勉强地转移到地方或省级政府与中央集权的最高层政府之间，处于中间一级的新的地区性实体。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惯常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现被改造成为一种新近整合但又分门别类的实体，其中，私营大公司、压力集团、杂七杂八的党派（包括劳工运动的各种派别）以及国家机构，都按同一类样板以

科层制方式组织起来，并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利益多元主义转变为社群多元主义（作为整个系统的规则，而非仅仅为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或（自由的或新）社团主义或准社团主义。这个进程通常一方面倾向于赞成组织上的有力和庞大，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赞成维持现状，墨守成规，解决枝节问题以及机构瘫痪。有时，自由官僚制的福利国家甚至似乎因为迫于形势和计划需要而变得太大了，也因为它从私人或非国家法人机构接过了许多争执案件的管辖权（有时也许无此必要），故而大大缩小了社会自主决策的范围。这种国家基本上是组织良好的形式上和功能上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从传统上说来仍被认为是合理的。与此同时，人们又指望这种国家能促进解放：政府不仅应在各种私人或法人利益的冲突中充当仲裁人，而且应是较小、较弱、组织较差的而体反对较大团体时的支持者。即使是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可能满足这类期望，还不是很清楚的。为了能成功地与大法人组织竞争或将其控制，庞大的政府也许不得不变得更庞大，而这在另一方面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它非但不会增加力量和权力，反而会加剧停滞和瘫痪状态。然而，那些大约十五年来经受第二次后凯恩斯经济停滞压力的人，现在在某些西方国家试图减少"对庞大的诅咒"，似乎没有认识到，国家除了纪律约束的职能之外，仍有必要履行这个解放职能。否则，即使是新民粹主义"小的便是美好的"那种策略，也可能（再次）完全为大利益服务。

尽管以往一百年的趋同倾向冲淡了（但并没有消除）第一世界各国间的差异，各国特有的传统及其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组合方式仍然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而那些属于现代化、现代

性及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和形态，依然是按不同方式组合而成的现象。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制都符合可以称为“最低民主”的两项要求：一个代表人民并为人民所控制的政府，在规定时间内行使明确规定的有限权力；必须具备法治、人权保证和少数派代议权。可是，上述情况并不排除民主制度的不同模式与类型的存在，而这些模式与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国各自的历史经验的组合相适应的。此一点适用于官僚组织的密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法人安排，适用于劳工运动的作用和相对影响，包括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中，其“进步的”历史性作用的停滞，适用于议会代议原则与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制原则（也包括其制度上的混合形式）之间的关系，适用于公民参与的不同形式与范围，控制的不同形式与范围，以及国家、中间团体和个人社会化过程及其与“解放”的因素和组成部分的关系所要求的不同程度“纪律约束”的不同形式与范围。因此，被视为政治与“政治人物”竞争场地、即各种决策的可能性与解决方案竞争场地的地方，其范围与容积，将在不同系列的传统与制度范围内作出不同的规定。

这就涉及最近以“自由化”或“民主化”为题所讨论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问题。民主化是相对的事物，犹如总体上的现代化。它指的是对原先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不民主”局面的一种改革。民主化过程中的重点，一般来说，除了那些本质上有助于民主的组成部分之外，应放在那些代表特定社会的传统组合中体现不够的组成部分上。例如，在很长时间内，德国有必要加强来自基层的参与；法国有必要对行政管理加以有效的控制；英国和美国则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服务和国家干预的

基本制度。在联邦制国家，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扩大民主潜力的一个要素，而在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个要素则是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重新民主化”似乎多少也是如此。像“民主化”一样，“重新民主化”总是意味着权力下放，或将权力从原先所在的地方移交原先没有的地方。这里唯一的区别是，在重新民主化起步之前，体制的特点甚至赶不上“最低民主”的基本要求，故而就“民主制度”而言，其变化是绝对的。但是，这个过程的形式可以随某些因素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这些因素包括：过去非民主政权的特异点与执政时间、其灭亡的局面，以及该政权之前民主传统或非民主传统的特点与范围。这一点，如果我们细察一下1945年以后德国和意大利的发展详情和弗朗哥以后西班牙的情况，是容易了解到的。重新民主化偶尔也可能与革命后的稳定局面同时出现，这情况如今在第三世界比在第一世界较为常见。

尽管西方现代化进程到20世纪呈现出众多趋同倾向，但我们绝不应忘记，在一个连续体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类型，而这些类型的基本要素实际上可视为西方诸现代化进程的共同特征，例如：经历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科层化、组织化、纪律和“庞大规模”的增加；理性化和“对世界认识清醒化”的增长；以及虽不一定与上述因素同时出现或相互协调的一种政治参与的普遍扩大。

七、现代化与“第三世界”传统

“第三世界”可能不是最恰当的名称。它所指的是由非西方、非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广大群体，也是类型纷杂，

正在经历着相对迟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条件下的现代化和发展同样应视为社会转变的复杂过程，不能限定其变化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新，而应再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诸方面的变化，同时，这种现代化和发展还应促进自由权和自治权，以及人民和团体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不是最不重要的，还应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对于这个涵盖面更广的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方面，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模式或许可以充当指南，但对另外一些方面，这些模式也可能毫无用处，甚至还会是有害的。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工业化与依附关系之间的两难地位，其活动空间是很狭小的。

——一方面，看来除工业化外别无他途可走。这工业化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但它在生产、生产力和效率等方面多少是按类似的道路运行的。在一个由工业化的经济与政治大系统所支配的世界里，一个欠发达国家的上层领导若欲求实现"进步"、发展，取得更高程度的经济与政治自主地位以及更高程度的"共同福利"，看来必须经历一个与第一和第二世界此前经历过的相同或至少相似的一般性进程。此项进程除其他内容外，包括技术革新、科层化、组织化、纪律约束、理性化以及对此前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如在法律问题、贸易、商业等方面)加以正规化。从长远看，似乎没有一条通向发展、自主和具有实力的路可以与国际体系完全隔绝开来。有一时期，西方一部分观察家时常认为，中国或许是个例外，因为它如此庞大、力量又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还有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所创的成就加以支持。但是，就连中国人也决定，不再继续走这条与世隔绝的道路了。

如果除工业化之外别无选择，那么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

某些因素，即有关基本的结构要求，有关工业生产与销售的组织等因素，将会（并且已经）被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及其制度方面。不过，移植所取的形式可能是各有差异的。在这里，人们所仿行的多半是欧洲大陆后来者的战略，而不是英国开路者的战略，尽管后者可能仍然被广泛载入经济学或政治学教科书中。我们所知道的实例，大多数都是“协和式（associated）”与“非协和式（dissociated）”两类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混合体，其内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包含有：较高程度的保护主义、国家干预与计划、市场机制的中止、“混合型经济”，甚至还有某些部门完全由国家管理。在这里，较有组织的工业资本主义形式，是它的最初形式，而不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属于后来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条路”所作的预示性探索几乎总是围绕着“混合型经济”展开的。

——另一方面，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在欧洲，即使是后来的现代化国家，一旦它们加速前进，也有很大的可能建立起一个多少属于本地性质的工业经济，而政府、金融界和工业界上层分子则能相对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战略。对于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国家需要依赖较发达体系的地方非常多（有许多甚至在文化上都是如此），也因为其现实局面在不止一个方面反映出数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依附他人的历史。因此，这些国家除了实现现代化之外，还不得不设法克服依附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变形，最显著的是其社会结构上的变形：在寡头集团中外国利益反对者和一小批可能更具“市民性”的本国发展者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而且上层分子在总体上都是分化得很厉害的。资产阶

级往往依附于（1）寡头统治集团；（2）外国利益；（3）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弥补其企业经营潜力的缺乏，由此国家往往获得巴林顿·摩尔所谓"保守性现代化"中特有的法人特征。

为了补偿依附关系所带来的不利，需要一种额外的动力。在多数情况下，这个额外动力的提供，或者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或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动员和扩大参与，或者由于民粹主义包罗一切类型的有更强变革精神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形成过程中的动员或扩大参与。这一来，第三世界的政治参与就可获得一种不同于革命后第一世界一般状况的意义和力量，因此又可获得不同形式的中间团体、政党、工会、压力集团、宗教团体、领导人物，当然还有革命辞令。也是在这里，本土的传统走了进来。这里就是西方现代化过程模式的渗透往往遭到遏制和阻止的地方，而遏制和阻止确实有其功用，原因不仅在于上文提到的政治"补偿"的需要，而且从更广的方面看：在第三世界的环境中，其突出的问题往往是因提倡"西化"过多而有变化过快的危险，其代价是或许仍有意义的传统结构和传统价值遭到丧失，而重新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重新发现人们相互交流、共同生活的某些传统方式，可能也意味着"进步"。

在政治领域，假如这个传统不曾带有特别的民主精神，那可能影响民主化的进程与速度，一定时间内甚至会妨碍上文所说"最低民主"诸项要求的实现。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考察一下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也可以认识到，民主化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人物在这样考察时，也会发现，不是第一世界的历史经验所提供的一切模式，也不是任何特定模式中的一切要素，都适合于他

们自己的情况，并适合于此时此刻的格局和要求。他们必须寻求自己的糅合了现代化进程不同成分的适当模式。"民主化"的形式与速度将有赖于此。即使有机会学习第一世界国家的不同经历，学习的成果也将是有限的，因为第一世界中没有哪个社会，包括最落后的普鲁士，在其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同时对付欠发达的缺点和屈从于数世纪以来的依附性资本主义与现代帝国主义种种机制的处境。

在第一和第三这两个世界中，迥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不同的现代化与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个进程的大方向在第三世界将有别于其在第一世界中已经采取过的。我们可能分析到的一切历史证据似乎都说明相反的情况。

（梅俊杰译，冯　棠校。）



16 发展的目标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

发展目标的发展

本文的前面几个部分，将不离反省与回顾，试图简要叙述历来被认为对发展关系重要的那些发展目标的发展，并讨论有关这些目标彼此关系的诸种理论。但对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本文的结论将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并强调有必要回到对那些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论题所作的经验性分析。

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宣布过在设想中为发展过程所向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了诸如国家整合、政府的效能与对社会的渗透力以及军事实力等等。但本文将集中注意于发展学说中居核心地位的其他五项目标：其中两项属于经济，两项属于政治，另外一项则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

经济学家为第三世界提出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经济增长，对这一目标的中心地位表述得最清楚的大概是阿瑟·刘易斯了，他于1955年提出："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即分析"人均产出的增加"①。强调主要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来界定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持续了约十年之久的中心议题。在60年代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确实有明显的增长，同时第三世界作为整体来说，也达到了发展机构所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5%的指标。然而，仅有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改善第三世界千百万人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到60年代后期已很明显了。正如巴西总统所说："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于是分配或公平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公平的渴求集中于两个从属目标，它们虽非必然但却常常联系在一起：（1）减少绝对贫困，即减少处于某一具体规定的物质生活最低水准（按收入或消费来规定）之下的人口比例；（2）减少不平等，即减少居民群体相互间收入与财产的差别。到70年代初，公平已明显地与增长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中心目标。

与此同时，在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但方向略有不同的发展。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

①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理查德·D·欧文出版公司，1955年），第1页。

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

从上文可知，在60和70年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朝着两个相反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上，是从聚集（即财富的创造）转到分配。在政治学上，则情况正好相反，是从分配权力以实现民主的问题转到为实现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的问题，不论这秩序是民主制的还是属于其他制度。到80年代初，政治学的焦点回到了民主制，而发展经济学这时却反过来从强调计划走向强调市场，暗示着人们更乐意于接受市场运营可能带来的偏斜收入分配。

当然，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发展研究中还有依附理论的出现，主要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的著述。这种理论不同于在北美和欧洲的发展理论，它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实际上，依附论学者认为需要打破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对欠发达国家所加的束缚，实现或许最好称之为国家自主的目标。

这样，到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

当然，学者们对上述各个目标的评价各不相同，他们致力于分析并促进不同的目标。关于各项目标的相互关系、某项目标的进展对另一项目标的进展的促进或阻碍的程度，他们也各执己见，分歧相当大。总起来看，对这些关系的看法大体

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看法认为各项目标之间具有内在相容性；第二类看法强调各项目标相互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冲突；第三类看法则注重于调和这些矛盾冲突的政策的绝对必要性。①

相容性假说

美国社会科学上的相容性学说，主要来源于卡尔·多伊彻、丹尼尔·勒纳和西里尔·布莱克等人所阐述的，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性过程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跨出传统社会的界限而走向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为一体的，一个部门或方面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变化，与其他部门的同类变化彼此相关并相互推进。在多伊彻、勒纳和布莱克等社会科学家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然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却很容易把从认定现代化为连贯性过程的概念到认定发展为连贯性过程的概念，转变到一种认定广泛接受的各项发展目标具有连贯性与相容性的概念。一个社会能够并且实际上几乎必须同时向所有这些目标前进。这些目

① 可以设想，五项发展目标中的每一项各按最简单方式与其他四项形成关系，共有10对关系。进一步探讨可以看到更复杂的景象；按照各项目标在双边关系中或为独立变项或为相依变项加以排列，则有20对关系。如对涉及每一变项级别与每一变项变化速度的关系加以区别，则可能在各对变项中出现80对关系。评价第三世界的发展，还须分别对五项目标的进展情况与达成情况加以区别。进展情况用有关该项目标的条件变化速度加以量度，达成情况则用该项目标已取得成就的水平或范围加以量度。

标不仅彼此相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互补的。这种观点的依据，自然是西欧和北美社会都已大体上跨入现代这一事实；可能还基于对西方历史略加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即西方社会通向富裕、公平、稳定、民主与自主的进步道路，一般说来是和谐的和直线式的。

这种"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假说，总的说来是错误的，而且不难批驳。它显然没有描述到1955—1985年之间第三世界的发展情况。不过，完全否定它也不对。确有一些国家可以称为"负一致"的好例子：就是说，它们进取任何一项发展目标同样均告失败。极少数国家于此五项目标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亚洲，日本显然属于此列。但是，日本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国家呢？在无疑处于发展状态的国家中，哥斯达黎加或许是在五项目标上都有巨大成绩的最明显的例子。1948年革命后，哥斯达黎加人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经历了数十年了。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他们的国家取得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进入了拉丁美洲国家中的"中上等级"。①相对说来，它的土地占有权比较平均。从60年代到70年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收入分配总的平均状况是增高了。但与此同时，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者在收入份额上所居的相对地位也降低了，如同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者的相对地位一样，这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收益（一种在民主政权下可以预期的现象）。就自主性来看，哥斯达黎加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但在60和70年代农业

---

① G·S·菲尔兹，《贫困、不公与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

出口扩大并且多样化了。总而言之，哥斯达黎加接近于成为一个向各项发展目标齐头并进且卓有成效的成功例子。

其他成功例子无疑也是存在的，但是数量不多。相容性假说，至少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还没有被事实所证实。然而，在有一种情况下，即当社会处于战争状态或面临紧迫的战争威胁时，相容性假说比在其他情况下较能成立。且不讲战争可能造成的物质破坏，战争时期一般说来是极度紧张的经济增长时期。正如艾伯特·希施曼所指出的，战争"常常是在国内进行和平的收入再分配的条件"。①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反战思想会受到严厉压制，但政治参与常常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范围。犯罪率和民间骚乱都有所减少，除非在明显濒临战败的时候，国家自主权当然是与战争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说它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年代"，或许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面临直接而持续的安全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和以色列，在同时争取实现两项或更多的发展目标方面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为成功。然而，相容说的提倡者并没有把战争当作发展性进步的动力，而且，长期的战争无助于这种进步，越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相容性假说的正确性尽管可疑，但正如罗伯特·帕肯海姆所言，它还是使人了解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许多含义，特别是经济援助政策。它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和政

---

① A·O·希施曼，《通往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的研究》（二十世纪基金会，1963年），第137页。

治民主化的三项许诺，确实给"争取进步同盟"提供了核心内容。阿瑟·施莱辛格曾说："在理论上，这些目标相互依赖。结构变化与政治民主化被视为保证更公平地分配增长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这意思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实施社会与政治改革为条件，或者至少与这改革相联系。"同盟成立五年后，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给它规定了类似的目标，包括"经济进步，……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以及民主政府"。然而到了后来，即使这个同盟最热心的倡导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并未像他们所指望的那样得到实现。施莱辛格的结论是："我们知道，这些目标在短期内很可能会相互冲突。我们也设想或希望它们终究会相互增进。不过，至少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这显然只是个幻想。"①

然而，设想这些目标具有相容性的推动力量，在美国制订拉丁美洲政策时始终是存在的。1984年中美洲问题基辛格委员会声称，"中美洲发展的各项要求是一张无缝的网"，并规定美国对中美洲的目标，其用语几乎与二十年前对争取进步同盟所用者一模一样。

消除导致暴力与内讧的气氛。

发展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序。

发展强大的自由经济体制，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加速改善中美洲最贫困者的社会条件。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争取进步同盟，一次回顾"，载于R·G·海尔曼与H·J·罗森鲍姆所编《拉丁美洲，争取新的国际任务》（纽约，威利出版公司，1975年），第67—92页。

切实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①

卡特、里根两届政府在萨尔瓦多推行的政策，具体地证明了政治民主与社会改革彼此相容的设想。两届政府都推动土地改革和尽早进行全国立法议会的选举，尽管有充分的材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民选立法机构几乎总是敌视土地改革的。1982年萨尔瓦多的议会选举，作为两届美国政府政策产物的一部分，再次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投票人选出了一个由两届美国政府支持的土地改革的反对者占优势的议会。

相容性假说有两种人类天生的倾向加以支持。第一，相信所有好事会以某种方式一齐到来，从而可以避免困难的选择，例如在民主的议会选举与有效的土地改革之间的选择。第二，相信一种界限分明的明显弊端的消除会自然导致其他主要社会弊病的消除。换句话说，人们容易把某一特定目标视为关键性的目标，把向此一目标前进当作驾驶"火车头"并带动火车向其他目标同时前进。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些非洲民族主义者和同情他们的西方人士广泛地认为，民族独立将开创一个新纪元，其他发展目标可以随之较快实现。正像恩克鲁玛所说："首先谋求政治独立，然后可以把所有东西增添进去。"

在民族独立后的世界，有三种"火车头"理论影响最大。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火车头功能，使较为公平的收入与财产分配成为可能，为发展民主制度提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

① 《总统全国两党委员会关于中美洲的报告》（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148页，及第60页以下。

件，减少社会冲突并由此加强政治秩序，以及使社会能够独立自主。这样一套设想，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量潜存于美国学术界和官方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之中。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个欠发达社会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并代之以较为平等的制度，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真正的民主、社会和谐以及真实的独立。另一方面，依附论学者则希望从国际背景上着手，以获取同样的结果，这就是果断地打断依附的锁链，使社会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一旦实现这一点，则民主、平等、具有真正发展意义的增长以及社会稳定都必然会随之而来。实际上，上述三种理论都只集中注意于社会弊端单一的一个来源——贫穷、不公正、依附关系，消除一个弊端几乎必然导致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弊端的消除。重要的是，或许所有这三种理论——自由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都认为压倒一切的弊端是在经济方面。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论证过用民主制度代替独裁制度或建立政治秩序（不管这两种情况本身是多么吸引人）可能产生消除贫困、不公平或依附地位的奇异效果。

冲突理论

到了70年代，相容性假说所显示的种种局限使人越来越懂得，好事情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齐来到的。大批新著作问世，它们用清醒而严肃的言语传达信息，同时强调有必要在各项目标中进行选择。60年代研究发展问题的著作通常在标题中用上“发展”、“立国”或“现代化”等词语，表示出一种对运动满怀希望的意思，如《传统社会的消亡》（1958年）、《发展中地

区的政治》(1960年)、《现代化政治》(1965年)、《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经济发展诸阶段》(1960年)、《立国与公民权》(1964年)、《立国论》(1963年)等。70年代的新潮标题则传送出另一种信息：《严峻的选择》(1971年)、《牺牲的金字塔》(1976年)、《抉择不易》(1976年)、《选择与分配政治》(1971年)、《危机、选择与变革》(1973年)、《发展的严酷困境》(1980年)。从这些标题可以想见，70年代的分析着意于两难处境，选择、利害交换、危机，甚至恶性循环，特别强调增长与公平、增长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到80年代中期，一个学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断语说："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常人智慧认为，除非就非常长远来看，高速发展与人权在目前是互相冲突的。"①

按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五项发展目标之间可以设想出十对相互关系。60和70年代产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著述，看到这些关系中至少有六种关系在双方之间至少是部分冲突，其中四种冲突涉及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平等的关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与国家自主的关系。另外两种冲突是民主与公平的冲突，稳定与公平的冲突。

增长与公平之间各种形式的冲突当然曾经是某一时期经济学上的主要论题。西蒙·库兹涅茨以他在5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配不均之间存在着U形曲线关系的论点，使20世纪中叶的发展经济学家集中注意于这个问题。这种以跨部门分析为基础的理论当然意味着：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

① 唐纳里："人权与发展：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载于《世界政治》，第36卷，第2期(1984年1月)，第255页。

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关系。①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不仅财富和公平之间有这种曲线关系，经济增长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也有一种明显的互否关系。"较高的工业化速度、农业生产率较快的增长，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改变收入分配，使其趋向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低收入集团。相对看来，经济发达进程的动力作用总是不利于贫困者；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收获者总是中产阶级和最高收入集团。"② 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采用这样的说法。很多有关"绿色革命"的著作强调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所带来的利益是怎样首先为富裕农民所得而不是为贫苦和无地的农民所得。有些作者看到，巴西和中国的事例集中体现了增长战略与公平战略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巴西和中国经常显得像两极对立。……巴西是当今第三世界最大而且最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发展实例，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实例……两种模式都被认为是在各自的条件下的成功者。……两种……模式都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承受了至少一代人的牺牲。"③

自由派发展模式认为，政治不稳定是与贫困相关联的。然

---

① 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45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28页；菲尔兹：《贫困、不公与发展》，第69—77页，第122页；大卫·莫拉维茨：《经济发展25年，1950—1975》(世界银行，1977年)，第38—40页。

② I·阿德尔曼："概述、总结与推荐"，国际开发署科学用于开发委员会2236号最后报告第一部分(伊文斯顿，1971年2月12日)，第6页。

③ P·L·伯格尔：《牺牲的金字塔，政治道德与社会变化》(花园城，1976年)，第151页；又见S·A·休莱特，《发展的严峻困境，20世纪的巴西》(纽约，1980年)，第215—218页。

而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关系。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进程中。曼柯·奥尔逊早期有一篇题为“作为不稳定性力量的高速增长”的文章，概括了上述诸目标彼此之间的冲突。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著作批驳了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认为贫穷是不稳定根源的假说。这些著作相反地认为，政治不稳定和内乱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发展的结果。它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单纯增长本身就破坏稳定；在其他情况下，则归咎于增长减慢或终止，因其造成期望落空（“J形曲线”假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平衡的发展如社会动员（狭义的）超前于经济发展（狭义的）被视为不稳定的根源。还有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虽然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但增长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乃是最近的原因。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作者们都致力于在经济增长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影响与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政治不稳定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性的关系。

在上述两种冲突理论中，经济增长都被看作是破坏公平与稳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上述趋向于导致不稳定以外，对民主是否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然而由此可以论证，民主制度可能比独裁制度更有能力应付和缓解这种不稳定。增长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属于另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类型。首先，有人提出，并有某种事例证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可以使一个非民主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复杂化，甚至遭到破坏。一位分析家就经济变化的两项指标论证道：“建立民主制的成功尝试，伴随着都市化和农业劳动力使用

两方面较渐进的变化，不成功的尝试则伴随着较快速度的变化。"①更彻底的是G·奥唐奈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对50年代后期S·李普塞特等人提出的、认为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体盛行相联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奥唐奈论证说，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某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而"当代南美洲较高水平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是不相联系的"。②

在某种较普遍的意义上，增长与民主的冲突被视为杰克·唐纳利所称的"自由被出卖"，③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想要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能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许多分析研究探测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一般说来，民主制国家几乎从未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权威主义国家则可能有极高的、适度的以及极低的增长率。一项对98个国家的细致分析的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④苏查特莫科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

---

① W·弗拉尼根与E·福格尔曼："民主发展的模式：一项历史的比较分析"，载于J·V·吉莱斯皮与B·A·奈斯沃尔特所编《宏观定量分析：冲突、发展与民主化》（塞奇出版公司，1971年），第487页。

② G·奥唐奈：《现代化与官僚权威主义：南美洲政治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研究所，1973年），第49—52、114页。

③ 唐纳利，"人权与发展"，第257—258页。

④ R·M·马什，"民主制度是否妨碍迟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载于《比较社会研究》1979年，第2期，第244页。

懊丧地确认：发展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非常有趣的是，关心增长与公平的冲突的分析家注目于巴西与中国，而关心增长与民主的冲突的，则往往瞄准着印度。

以增长为一方而以公平、稳定与民主为另一方的相互冲突，往往使自由派发展理论用作依据的和谐假说难以成立。依附论理论家所设想的目标和谐论也受到了批驳。其中一种批评意见涉及政治稳定与丧失自立性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这当然是根据外国投资与依附表现在政治稳定条件下蓬勃发展的事实。一项更严重的冲突涉及各种形式的依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很多研究项目探索了这个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拉丁美洲，由此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结果。一项比较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谨慎的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积极的关系。"① 然而，正如一些依附论理论家所说，这种经济增长仍然可能是畸形的，而且从更长远来看，依附性大的国家，其增长率可能比依附性小的国家为低。

西方流行的发展观往往认为平等与民主相互促进。在一定程度上，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取决于社会经济巨大不平等的消失，而民主制度一旦确立，它的运行便趋向于产生争取更大平等的运动。19世纪西欧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些假设。但是，也还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收入分配上争取更大平等的运动主要产生于较高的经济发展程度呢，还是产生于民主制度

---

① J·L·雷伊与T·韦伯斯特，"拉丁美洲的依附关系与经济增长"，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22卷，第3期，1978年9月，第432页。

的作用？冲突理论家还可以指出民主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经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程度。说得更确切些，冲突理论家可以并且的确已经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在一个社会动员程度相当低、从而政治参与实际上局限于规模相当小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很可能促使经济上更不平等。第二，虽然在较高程度的社会动员下，民主政治制度可能促使收入更为平等；但是，民主政治制度在任何发展水平上，一般都不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财富再分配。因此，特别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当土地改革之类的问题似乎更为突出，而任何民主制度又只愿让有限的一部分居民参与政治时，独裁制度很可能比民主制度更适应于扩大经济平等。

最后，激进派理论家在批驳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发展模式时提出：为了得到最低限度的平等，高度的不稳定，也就是说革命，或许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革命理论家一般是正确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一场巨大的革命动荡通常会造成收入与财产上较高程度的平等，至少在那些不受革命放逐或处死的人们中是如此。但是，到了某一时间，新型的不平等很可能又要出现，并且不一定在程度上低于革命所摧毁的那种不平等。

经济增长与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之间的四种矛盾关系是或许最好称之为“速率／水平悖论”现象的例子，那就是这样的状况：变量A的高水平与变量B的高水平相联系，但变量A的高增长率是与变量B的不增长或负增长率相联系的。就全球而言，高水平的经济财富与高程度的平等、稳定、民主、自主相联系。但是，看来经济高增长率对实现上述这些目标也有消极影响。如果这种关系在过去的确存在，人们就必须面对下面

的问题：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达到现在这样五个目标都居于高水平的美好境地的？

对这个问题，一个似乎有理的答案是：速率／水平悖论对当时的西欧发展不像现在那样适用，因为当时的经济变化速度非常慢。例如，在1870—1913年间，主要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意大利的1.4%到德国的2.8%不等。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经济年增4.3%，超过了3%。而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其平均年增长率50年代为4.8%，60年代初为5.2%，60年代末达到5.9%。当然还有许多国家达到7—10%，有几个国家还持续几年出现这个比率。因此，当前发展中国家争取空前的经济高增长率相对的成功，可能是引起速率/水平悖论的主要原因。西方得以在各项目标的成就上达到今天的高水平，或许是由于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缘故。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或许是冲突理论适用于发展目标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

调和政策

冲突理论指出了各项目标之间的一般关系：例如，增长与平等的对立关系被认为具有普遍性。有时，也有一些冲突论者看来几乎非常乐意于发现选择中的困难与痛苦，以及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种种窘境。然而，对于这类“严峻的”选择对象的精心思考自然地产生了第三种发展著作，致力于寻求可使各项发展目标互相调和的途径。简言之，假想的相容性由于认识到冲突的普遍性而被打破了，这种认识转而产生解决这些冲突的心理上与政治上的欲望。强调选择的极端重要性被强调

调和的迫切需要所代替。问题变成这样：发展中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才可希望同时走向两个或更多的发展目标？看来人们的注意力以不同方式集中于有关发展目标的选择顺序、调和各项发展目标的制度结构以及推动同时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政府战略的各项政策。

如果同时争取几项目标有困难或不可能，那么可以设想把进程分成几个阶段，先着重一个目标，再着重另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一定形式的顺序安排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政府都不能指望平均分摊力量同时追求所有五项目标，至少，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和行政机关执行上的种种规定不免使某些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不过，除此以外，还有从发展的角度提出的问题：趋向全部目标的进程是否会受到追求各项目标顺序的影响？按照设想，某些顺序可能比别的顺序更有效；相反，让某一目标早占优先，按设想可能妨碍以后趋向其他目标的进程。或者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一点：如果在时段T_1趋向目标A的进程与同一时段趋向目标B的进程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在时段T_1趋向目标A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期T_2趋向目标B的进程？反过来，在时期T_1趋向目标B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段T_2趋向目标A的进程？

关于发展顺序的论述已经写了很多。大体上看来，一致的意见似乎认为，最适当的顺序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各项政治目标而不是实现各项经济目标。D·鲁斯托把这一想法的大部分概括为：最有效的顺序是依次实现国家统一、政府权威以及政治平等。E·诺特林格尔和S·亨廷顿强调在形成大众参与政治之前发展有效政府机构的重要性。R·达尔同样强调在扩大参与政治之前需要建立进行争论的模式。总之，政治学

论著往往要求人们注意在时间上秩序应优先于民主。

相反，经济分析家对于增长或平等应当孰先孰后似乎观点各异。有些人主张，极力强调高速增长是必要的，为的是使经济馅饼扩大到一定程度，从而可能实现某种范围的平等。这当然是巴西出现“经济奇迹”时期德尔弗姆·内托明确提出的政策，别的国家也显然照搬。一位南朝鲜高级官员1975年曾经说过：“在我看来，第一阶段应先使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阶段考虑社会福利。首先要有增长和效率，然后才有平等。”① 自然也有其他一些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优先增长的战略行不通，高速增长时期固定下来的收入分配倾斜模式对继续发展是严重的障碍。或者像一位作者所说，如果“滴流”理论是正确的，那么 80 年代初巴西由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不仅仅是点滴分散，而是瀑布般洒落到穷人身上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同样，按照常理，收入不公平应当减少。实际上并非如此”。② 与此相反，这些分析家认为：应当首先进行再分配，特别是土地一类资产较为平均的分配，然后才会有高速经济增长。总的看来，这种观点只流行于学术界分析家中，而实践者则往往采用相反的顺序。

政策选择也能推动或者阻碍那些有助于调和目标的特殊制度结构的发展。例如，一个牢固的两党政治制度化多党制可能更有能力调和扩大的政治参与同政治稳定的关系，调和此两者同促进国家自主的制度手段之间的关系。限制政府方面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刺激支持民主制

---

① 韩国副总理南德佑，载于《时代》周刊第106卷，1975年10月22日，第40页。

② 唐纳利，前引书第260页。

度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尽管这种限制也可能阻碍更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的进展。在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还越来越多地出版诸如《增长与再分配》一类的著作，分析增长与平等的矛盾，并提出调和这两个目标的战略。① 这些战略中经常被提到的有：广泛的教育投资，在宽广的基础上发展人力资本；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农业优先于工业；此外经济学家还确认了一些看来不起作用的战略：累进税、扩大政治参与、生产性企业的政府所有制。在努力探讨怎样才能调和增长与平等的矛盾时，经济学家争先分析了日本、哥斯达黎加、新加坡、以色列、南朝鲜和台湾的经验，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得这个调和的。南朝鲜和台湾确实成了调和论经济学家喜欢引用的实例。它们显示了怎样避开冲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在巴西和中国之间的严峻选择。

根据以上简略讨论的提示，这种调和工作往往包括政治学家试图调和稳定与民主，或者经济学家试图调和平等与增长。但是，说明怎样使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互相调和的跨学科研究却较为罕见。桦岛郁夫指出了怎样才能调和民主、增长与平等的矛盾。我和J·纳尔逊曾经论证，认为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在下述两者之间选择其一：(1)一种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包括扩大的政治参与、较多的社会经济平等、较慢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导致军事政变和参与的"内裂"；(2)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恶性循环"，往往从军事政变开始，包括禁止政治参与、高速的经济增

① H·钱纳里等：《增长与再分配》(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协调增长与平等的工作往往被称为"战略"，这一点值得注意。

长以及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不满和反政府的参与"外裂"。桦岛郁夫认为，事实"并非必然如此"。他说：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支援性的"政治参与加强了政治稳定，进而使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然后才可能实行从享权较多者流向享权较少者的收入再分配，从而进一步加强支援性的参与。他说，日本的实例"对于发展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穷人的政治参与不一定像纳尔逊和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不管日本是否为仅有之例，它确实表明，"穷人的参与、高速增长和经济平等是能够相容的。……"① 然而问题在于：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它们能否相容呢？如果不能，为什么？

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

冲突论的理论家实际上否定了关于各项目标普遍和谐甚或全面和谐的假说。调和论的倡导者则表明，各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一定不可解决。不过，他们并没有论证过任何特定的调和政策都可以成功地普遍应用。同和谐与冲突一样，调和并不是势所必然的。某些国家通过顺序安排、结构创新和适当战略的某种结合，可以并且确实朝两个或多个目标前进了。其他国家则不是这样。在南朝鲜适用的办法拿到巴西就不起作用。在印度可行的，到尼日利亚便不可行。举例来说，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们纷纷提出"在经济增长率与(a)某一个时刻

① 桦岛郁夫："支持性的政治参与与经济增长：日本的事例"，载于《世界政治》第36卷，第3期，1984年4月，第309—333页。

的不平等程度，或者与(b)一段时间内的不平等趋势之间，看来没有明显的关系。增长快者，既有平等的又有不平等的社会，还包括已在扩大和减少不平等的社会。增长缓慢者情况与此相同。"①

这样一来，问题就成为：怎样才能解释进步，成就与调和中出现的上述差别及其他差别？为什么南朝鲜、台湾能够同时在增长、平等和稳定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日本不仅能实现这些目标，还能实现民主和国家自主？为什么巴西起先在增长、然后在民主化方面进展良好，但在平等、稳定与自主方面却没有那样好的情况？为什么从大体上看来，南美国家似乎在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摇摆不定？斯里兰卡是怎样能够做到长期调和平等与民主的？为什么那么多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为什么印度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而任何伊斯兰国家却都办不到？正像劳伦斯·哈里森所问的，怎样能够解释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之间、海地与巴巴多斯之间、阿根廷与澳大利亚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悬殊差别？② 据一位经济学家说：各国在争取增长与平等时的差别，或者两个目标都能实现，或者都不能实现，都取决于"增长的环境和所取的政治决策"。③为了解释为什么调和像和谐与冲突一样不是普遍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

---

① 莫拉维茨：前引书，第41页。

② L·E·哈里森：《欠发展是一种心理状态：拉丁美洲的事例》（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哈里森提出，拉美国家发展上的差别只能用文化条件来作解释。

③ 菲尔兹：前引书，第94页。

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上，文化是一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为这概念既容易使用而用时又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容易（也危险）。当别的原因解释不通各社会间的重大差异时，有人就喜欢将此差异归因于文化。但文化对人们试图说明的政治经济上的差异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却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常常不确切，或者同义反复，或者两种缺点都有，走到极端则装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态度说道："法国人就是那样！"另一方面，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有悖于社会科学家喜欢概括的癖性，因而不能令人满意。对于诸如经济增长率、社会动员、政治参与以及民间暴力等普遍性变项的相互关系的结果，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是说明不了的，这类解释往往只能说明某些具体文化实体所特有的个别特点。

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加以思考。在民族内部，在各地区、各种族集团和各社会阶层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通常存在着更大的文化差异，而民族和民族国家大概是分析与比较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最重要单位。然而，在民族之上还有许多范围广阔的文化族群，常常包括几个民族，而这些民族在人种、种族、语言、宗教和历史等方面往往有许多共同点。这样的文化族群至少可以指出九个（见附表）。

附表：文化与地区

文化	主要宗教	地区/国家
北欧文化	新教	西北欧、不列颠移民国家
拉丁文化	天主教	南欧、拉丁美洲
阿拉伯文化	伊斯兰教	北非、中东
斯拉夫文化	东正教	东欧、苏联
印度文化	印度教	印度
中国文化	儒教	中国、台湾、朝鲜、新加坡、越南
日本文化	儒教/佛教/神道教	日本
马来文化	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非洲文化	基督教/多神教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这九个文化族群显然涵盖不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有些民族国家可能包括反映两种或更多传统的若干集团（例如马来西亚、南非)。有些国家可能不宜单纯地归属于上述哪一族群，例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但是，全世界人口中至少有85%生活在合理地归属于上述族群之一的民族社会。这样一来，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就有其意义了。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X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而其可以得到的只有有关X国家的一项知识，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吗？在预言X国家可能实现增长、平等、民主、稳定与自主各方面的程度时，文化特征不就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吗？

属于同一文化族群的若干国家之间，显然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往往有某一国家可能严重偏离其所属的文化类型（如

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然而,就各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程度来看,一般说来在这些文化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差异。众所周知,伊斯兰、中国、非洲、拉丁以及其他各社会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是极不相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它们的发展模式上很难看出有多少趋同之处;在它们中任何一种模式同一般所说的西方模式(主要是北欧人的模式)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1962年,加纳和南朝鲜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部门规模和出口各方面看来,实际上拥有相同的经济体制。二十年后,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仅看这两个国家1962年的经济和政治变量,我们决不可能预言这样的分歧。然而,如果我们看到西非与朝鲜在文化上的不同,那么发展上的这种分歧大概就不会很令人吃惊了。

关于社会变得富裕、平等、民主、稳定和自主的这种愿望,在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中似乎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然而,这些目标是从西方的、特别是从北欧人的经验中涌现出来的。它们是西方的目标,确实正如发展概念本身之出于西方。全世界政治上与学术上的精英分子对这些目标所表现的拥护,可能只是对知识上居支配地位的西方思想表示敬意,是非西方的精英分子接受洛克、斯密、卢梭、马克思以及他们在20世纪的追随者进行思想灌输的结果。这些思想在土生土长的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与西方的模式相反,另一种文化的美好社会的典型可能是简朴的、严肃的、等级制的、非民主的、纪律严明的与尚武的。

因此,西方发达社会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稳定的、自主的,对于一个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非洲社会、儒教社会或印度教社会,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或参考群体。

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都以西方标准衡量自己，并由此发现自己缺少什么。停止改变这些社会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当然,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连续阐发"非洲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民主制度"的理论之后,这一过程已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若干时间了。然而，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说，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的是总结东亚的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权威主义的、稳定的、有经济活力的以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发展模式。南美模式可能是一种阶级分层、不平等、中速增长、政治冲突、经济渗透以及民主与非民主政权彼此交替的模式。显然，将来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一模式,任何理论家都必须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但是,拉美发展模式的构成,以及从文化和其他变项来看,为什么拉美的经验接近于上述模式的解释，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奥唐奈的官僚权威主义论是第一个接近这种模式的理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又是当前合乎需要的那种特定地区和特定文化的理论模型的一个样板。奥唐奈的理论对拉美的经验作了必要的阐发。有趣的是，把他的理论应用到拉美以外如东亚或别的地方,结果不曾见到明显的成效。

再次强调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在理论上，这两个概念从来是有区别的,但在应用上,则很少加以区分。在许多方面,这两个概念互相重叠。就非西方世界来说,不管那里的精英们怎样尽力将技术和物质变化过程与基本的价值观和规范区分开来,现代化与西化通常还是要混为一体的。不过,最近

以来，非西方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已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重申。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现代化与西化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

在5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系统研究，是撇开地区或区域研究并部分地作为其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专家认为，解释存在于特定情况，意即人们为了理解并说明某一社会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对于其历史、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有深切的了解。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者认为，经验性的概括可以提供解释，意即人们为了理解并说明某一社会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项通常怎样相互作用具有广泛的了解，进而必须将恰当的概括应用于特定事例。因此区域研究专家和比较学者各走各的路。50年代末和60年代，比较政治学研究趋于进一步分化，因为专事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学者与专门研究工业社会的学者分道扬镳了。（那些专门研究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从未完全脱离区域研究范畴。）"发展主义者"与"工业主义者"，除了少数概念（如社团主义）之外，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兴趣焦点。工业主义者在工作上还与传统性较强的研究西欧的区域研究专家相当接近。发展主义者则多

半与研究中东、拉美和东亚的那些传统的专家们不相接近，并且相互抵牾。

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端狭隘的观念，在许多问题上完全无视任何可将他们所研究的现象用比较性概括加以说明的方法，比较政治学家若退回到这种狭隘的区域主义，便将会一无所获。然而，如果发展研究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那么，这或许是比较政治学家（发展主义分支）与区域研究专家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适宜时机了。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分析文化是怎样发展的及为什么会发展，是怎样传输的，形成什么型式，怎样界定和测量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是怎样和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如果想要说明不同国家在争取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进程上的差别程度，这种分析方法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要求政治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董正华译自迈伦·韦纳和塞缪尔·P·亨廷顿合编，《了解政治发展》，1987年。王加丰校）

17 发展中的政治经济

[美国]阿尔蒙德①

这个讲演的题目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发展中有哪些选择？发展中国家指的是那些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其生产力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我首先要谈一谈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思想理论或预见，然后再谈一谈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以及现在的几种主要的时代潮流及其影响。

关于政治经济发展有三种思想理论。它们是对于在未来，现代化进程将如何发展的三种估计。这是三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列宁主义的模式。

（一）自由主义的模式：它的历史最长，最接近于启蒙运动对未来的看法。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存在于18世纪和19世纪时的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中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把已经存在于西方历史中的动力加以归纳，使其理论化。这种动力在早些时候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及比文艺复兴还早几个世纪的改良运动中都曾表现出来。

简单地说，启蒙运动以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驾驭自然，并通过使用理智来改革社会结构。

启蒙运动预言将来在物质、知识和道德方面都将取得进步。随着人们在物质、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能力的增长，人类社会将变得更加平等；在这个社会，可以实现人尽其才；政府也会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有效，更加民主；人民参政的程度也会提高。人们认为增长了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平等、参政和民主化这些因素之间逐步加大的互相作用，会给人的不断完善带来广阔的前景，而人的完善这个目标虽然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人类却世世代代都在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这种思想在实际的政治方面强调小国、或是小政府的重要性——这样的国家可以有效地制订规则，维持秩序，并允许人民在最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占有自己的财产，允许他们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还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

到了19世纪早期，人们开始发现这种启蒙运动式的自由主义的预言不太符合事实。工业革命和物质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平等和民主参政程度的增加。像库兹涅茨和格尔申克隆这样的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曲线性的，而不是直线性的。在工业化的早期，随着物质生产的增长，利益分配上的经济平等便相应地削弱了。后来直到19世纪末期，在分配工业化的利益方面才出现了较大的平等。

(二)卡尔·马克思当时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所观察到

---

① 这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于1982年10月在北京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

的，就是这个曲线的消极部分。

鉴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马克思使增长和平等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他所看到的是经济增长的利益全落到了资本家手中。因此他预见了这样一个未来：资本主义发展将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和冲突，它们会最终导致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会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模式中，物质上的富足将同平等和民主参政结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一样，是由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是根据启蒙运动发展他的思想的。他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渊源相同。他最终的价值观念是在一个民主参政的社会中公平地分配物质财富。在不同的战略中包含着同样的价值，因为马克思说——他有证据支持他的论点——经济增长和平等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经济增长产生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直到这个制度由于其本身的不公正而归于毁灭。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制度一旦被推翻，启蒙运动关于增长、平等、民主和稳定的价值观念就可以同实现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结合起来。

（三）第三个模式是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适用于世界上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地区，适用于由官僚统治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19世纪末期，一些俄国的革命者不愿意等待马克思所说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列宁认为，战争和帝国主义阶段能使人们有机会夺取政权，并开始革命统治下的经济增长进程。这个革命进程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会带来马克思所预言的富足、平等和民主稳定的同时发展。革命不会发生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而是会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进行战争而遭到瓦解。列宁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就是建立了共产党——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组织，一俟时机成熟便可夺取政权。他把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叫作"主观革命形势"。客观的革命存在于受到那些为争夺市场而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剥削中。这个"共产党——薄弱环节"的概念是列宁主义战略的中心。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革命战略家们又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如游击战的概念和农民革命潜力的概念。毛泽东还提出了不断革命进程的理论，以便现代化的进程不至落到官僚和专家的手中。我想，现在这个理论已引起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们的争论。

以上是来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有关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思想的一个简略介绍。现在我要谈一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多年中以及现在实际使用的几种政治经济战略发展。但是，在介绍不同的战略之前，我要简单地讲一讲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了解了这个理论，就可以系统地比较各国所推行的不同的战略。

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

两个政治变量是：（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这两个变量也叫作两个"P"。（因为权力——Power，参政——Participation这两个词都以字母"P"起头。）

（1）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犯罪、管理交通等。

（2）人民参政指的是社会普通成员参加政府决策的程度。

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

两个经济变量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或者是财富和福利。它们叫作两个“W”（因为财富——Wealth，福利——Welfare都以字母“W”起头）。

（1）经济的增长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其基础是工业、农业生产力以及服务部门生产力的发展。

（2）分配或福利是指人们分享物质产品的办法。现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是不一样的。如法国，在1970年，占全国人口40%的收入最低的人口，他们的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14%；而占全国人口20%的收入最高的人口，他们的收入却占国民总收入的46%。在美国，分配稍为平均一点，1972年占全国人口40%收入最低的人口，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5%；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却占国民总收入的42%。在捷克斯洛伐克，40%收入最低的人口得到28%的国民总收入，这比法国多一倍，而20%收入最高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31%。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在分配平等方面居中，它的40%收入最低的人口得到总收入的19%，20%收入最高的人口得到总收入的37%。列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对

不同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同情况加以比较的办法是可能的。

根据我提出的模式，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然而问题是如何从欠发达前进到发达、如何从这四个方面的低水平上升到高水平?这个问题就是我近几年所研究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否有可能使这四个变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进步?是否有可能同时提高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分配？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经济有两条必然的基本原理：

(1)要人民参政首先必须政府具有能力。如果没有办事的方法，参与办事也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实施决定的方法和能力，参与作出决定就没有必要。

(2)要分配就必须先有经济的增长，要有福利就必须先有财富。如果没有产品和服务用的资料，就没有什么可分配的。

各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所采取的不同战略证实了这两条原理的正确性。

下列图表——第三世界发展战略分类表（以四个政治与经济变量为基础）——是关于不同的发展战略的。每一个战略在政府能力、人民参政情况、经济增长和分配上都有不同的侧重。

(1)第一个战略叫做民众主义战略。它的政府能力低，权力不集中，经济增长也低，人民参政和平均分配的程度居中。

(2)凡采取集权主义和专家治国战略者，其政府能力和经济增长较高，参政程度和财富平均分配程度低。

(3)凡采取集权、专家治国和平均主义战略者，其政府能

政治经济变量	民主的民众主义型①	集权的专家治国型	集权专家治国平均主义型	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型	新传统型
政府能力	低	中一高	中一高	高	低
人民参政	中	低	低		低
增长	低	中一高	中一高	高	低一高
分配	中	低	中一高	高	低一高

力、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程度从中到高，人民参政程度低。

（4）凡采取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战略者，其政府能力、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程度高，关于人民参政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5）凡采取新传统战略者，其政府能力和人民参政程度低，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平均程度有低有高。

现在我首先较详细地谈谈民众主义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战略。在大多数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们也很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方案，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

① 原文为Democratic Populist，其中Populist一词很难译，作者原意指学习欧美民主、“尊重人民”的主张或政策，此处译作“民众主义”。下同。——译者

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许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根据我刚才讲的理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首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想实现人民参政，还没有生产出产品就想分配。可以回顾一下非洲的加纳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所走过的道路。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期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没有增长，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

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其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要求参政和较公平地利益分配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实际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实施。

在南亚和东南亚也是如此。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有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发展战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

1%。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第一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态。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善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人们愿意举行竞选以及英·甘地和国大党1977年的失败，说明虽然实施的效果不好，但是印度的议会制和人们对民众主义战略的信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有效的政治体系的支持。但是增长和分配的难题依然存在。

现在我谈一谈集权专家治国战略。一切取代了民众主义制度的政权都可归纳入以上图表中的后四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取消了民主参政。其中集权专家治国战略强调增强政府维持秩序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是制订有利于工业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组织劳力，并给外国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虽然在按人口计算的基础上可能会实现增长，然而收入增加的好处都落入了富人手中。巴西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趋势的发展。60年代时，巴西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2.5%，这个速度很快，因为它是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然而，全国40%最穷的人所得到的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10%降到1970年的8%。与此同时，全国5%最富的人所得到的国民收入从29%升到30%。巴西在1964年以后的军人统治下，所有的政党都被解散，然后出现了正式政府和反对党。文职的政治领导人被剥夺了权力，新闻和结社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选举则只限于选无权的立法机构的成员。因此，巴西实际上是一个由军官和官僚机构中的文职专家所统治的集权制度国家。

这个制度通过税收、投资、工资和对外经济政策，以实现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虽然下降，但收入不平等却增加了。

推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建立起一种由特权阶层、城市中产阶级以及落后的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所组成的双重社会。为了维护秩序，领导阶层建立起强制性机构来压制要求平等和参政的呼声。因此集权专家治国政权鼓励物质增长，但对于其分配却漠不关心。它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得不到现代化的好处，还镇压他们的抗议。

第三个是集权专家治国平均主义战略。它比前一个较为公平。从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压制政党，严格限制它们的活动并控制宣传工具和利益集团。政府的两个强大的机构是政治行政机构和官僚机构。这个战略的两个例子是拉丁美洲的秘鲁和亚洲的南朝鲜。它们都是军人政权，所推行的都是分配性的经济政策。在秘鲁是在社会经济的范围内推行这种政策；在南朝鲜是在有很大程度的政府干涉的市场经济范围内推行这种政策。

1968年秘鲁军人政权制定了一条比较左的思想路线，并开始实施这条路线。他们把外国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没收了大庄园，并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社。他们还要求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并分享利润。这种军人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只进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它遇到了许多重大的困难。虽然有一些改革措施现在仍然保留着，但是秘鲁目前是一个遵循着保守的经济政策的军事独裁政权。

南朝鲜的社会改革导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被赶走，这就给在美国人赞助下实

行土地改革提供了可能，其结果是于1947年大大地减少了地租。在1950年，当朝鲜人所占有的大片土地被分散后，地租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朝鲜战争导致了对于资本的进一步重新分配，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分裂和加剧了的社会动荡。

朝鲜战争之后在改进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使有文化的人由30%提高到80%，入学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也大为增加。在十年之内，由于利用大量美援和采取一种加强劳动的发展战略，南朝鲜使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从60年代初期每人100美元增加到1972年每人300美元。与此同时，如与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相比，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最平均的国家之一。

尽管南朝鲜也容许进行选举，有某些党派竞争，以及有某些言论自由，但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它所推行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军人统治下的独裁制度。大多数内阁成员和高级行政官员都是一些退役军人。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立法委员会的主席，政府公司、工厂和银行的经理等都具有军方背景。主要由于害怕北方威胁而维持下来并且得到美国援助的庞大而且有力量的南朝鲜军队，因而成了南朝鲜维护统一和进行指导的主要力量。跟秘鲁军方所不同的是，南朝鲜的军官集团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南朝鲜军队的动力似乎主要是一种由民族主义、服务忠诚、权力和恩赐所组成的混合物。南朝鲜在工业方面、在城市化方面和教育方面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稳定的政党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和谐一致的政治文化。南朝鲜曾经在推行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形势下而进行了三次实验：第一次是由李承晚统治并且持续到1961年为止，接着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第二共和国。第三次建立共和国的尝试，则被一种给

予总统以广泛权力的制度所代替，此种权力包括指定三分之一的国会成员和控制法院，并且对于总统的任期没有作出规定。

南朝鲜的统一分配性经济增长政策，是可以由以下几种因素加以解释的：早期大力推行的土地改革，通过迅速的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提高了的技术，对增加劳动强度所作的努力，提倡工业出口的战术，以及美国的忠告、支持和压力。这种性质的工业化，减少了土地的压力，并且把南朝鲜人口中不断扩大的那一部分居民带到现代化的城市——工业经济之中去。

现在我要谈谈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战略。这种战略主要应用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是像墨西哥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也在较低的程度上加以应用。共产党政权使用政党来动员人民，渗透社会并且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图表中所表示的这种国家，其战略是强调发展政府能力，以及发展一种不同于其他战略的参政形式。因为人民是被动员起来执行党的领导阶层所制订的政策，却不是人民参与制订政策，所以这是一种动员起来的或者叫做加以组织过的参政。第三世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各不相同。中国，北朝鲜和古巴都推行着全面彻底分配的政策，这种政策规定了收入的相对平等和提供服务方面的平等。中国和北朝鲜的增长率较高。从1960年到1973年，北朝鲜的平均年增长率差不多是5％，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稍低于4％。在同一时期，古巴推行激进的重新分配政策，其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1.1％。这一时期古巴增长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管理不善，没有有效的计划程序，会计工作效率不高，以及没有把物质刺激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共产党制度对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冲突有自己的看法：

过分强调平等会降低生产率，要增长就要有工资和薪金的差别以提高生产率。

非共产主义的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的情况与共产主义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墨西哥的模式可以称之为一种“遏制性”的动员制度，而坦桑尼亚则是一种“原始的动员”的实例。墨西哥的制度在卡德纳斯革命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采取了一种动员式平均主义的道路，当时革命组织党(PRI)已经形成，工会和农民组织受到了鼓励，并且吸收工人农民到党内。土地改革和工人收入的增加，减轻了当时的不平等程度。从40年代开始，动员式的平等主义的动力已经变成主要是象征性的了，而占统治地位的党则被当作是一种指派性的、有优先权的机构来使用；它严格限制其他政党的活动，压制不同意见，并且执行一种主要利于人口中享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政策。虽则从1960年到1972年按人口平均的生产增长速度是平均每年3%，然而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则主要是落到高收入集团手中去了。坦桑尼亚则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动员式的制度。领导当局建议通过一党政治和允许某种竞选的方式把坦桑尼亚改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许多经济部门都实行了国有化，包括大银行、保险公司和许多工商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合作化的村庄(叫作乌贾马[Ujamaa])之中，而官方的目标则是把全体居民都在70年代中组织到这种村庄中去。为了对贫富不均的现象进行控制，政府官员和城郊工人的工资水平须受相应的调节。

关于农村集体化的实验是使人失望的，它把坦桑尼亚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家，并且耗尽了外汇和其他储备。当前这个政权采取了鼓励私人耕种和大规模的垦殖，作为一种紧急

措施，但却并没有修改它建立农业社会主义农村的思想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合作化农村遇到了困难，其后果是使得坦桑尼亚政党组织（TANV）变得软弱无力，不能够有效地深入农村并在那里展开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部落组织取代并且破坏了坦桑尼亚政党的基层组织。坦桑尼亚已经开始向增加收入平均化程度的方面前进。可是，坦桑尼亚生产的增长速度，却随着在农村建立合作化农庄的努力而下降了，特别在最近一个阶段是如此。

图表上的最后一种战略——新传统战略，也可叫做封建战略。它主要存在于黑非洲，虽然在第三世界别的地区也有其他例子。这是一些在根本上没有变化的政权，它们的特点是低增长率，低城市化，低工业化和高文盲率。它们被称为“新传统”或者“新世袭”的国家，这是因为它们虽然存在于当今时代，却还基本上保留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在这些国家中，主要的现代化发展就是引进了现代的军事机构和技术，而这在许多情况下却使得军官集团能够夺取并且维持政权。当这种情况还未发生的时候，有些民间组织曾经通过政治组织，假手于农村中的部落和村镇机构，建立起统治权。上层人物通过恩赐与分赃制度以保持团结，而特权在城市利益集团和部落上层人物中间进行分配。每当某处的这种内部上层的团结破裂的时候，发生暴乱与不稳定便成为经常性事件。扎伊尔便是这种模式的一例，而在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则是一个变态的例子。

比较相似的是中东的石油王国和酋长国，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们有时被称为靠利息生活的世袭政权。

它们掌握着一种稀有的宝贵资源，因此它们能实现高得惊人的增长率，并推行迅速现代化的政策和常常伴之而来的注意广为分配的大众福利政策。它们取得这些成就，却没有对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实行革命性的改变。它们把传统的世袭统治形式同官僚组织结合起来，官僚组织里有一部分成员是外国专家，但越来越多的受过外国训练的本国人进入了官僚组织。

它们能够如此出色地把传统主义和现代化结合起来，其原因就是它们发了石油横财。随着这些国家中经济、文化、和平与现代化的发展，现存的传统主义和合理技术治国的趋势之间似乎必然要发生冲突。但是只要有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传统的权贵阶层就可以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期望，并把新的专家治国派的权贵们拉入统治集团。

非洲几内亚的经验表明，一个动员人民的共产党国家，如果发展水平很低，可以很容易蜕变为新传统制度。自从几内亚在1957年实现独立以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但是从1960年开始，它的增长率一直是零，而且从1965年到1972年，实际上是下降了。

最后我谈谈发展道路问题。不管长期的趋势如何，长期的历史经验证明可以从一种战略转变为另一种战略。现举例如下：

（1）从民众主义转变到集权专家治国（如尼日利亚、巴西和智利）。

（2）从集权专家治国转变到专家治国平均主义（如秘鲁，最近巴西也是如此）。

（3）从集权专家治国到动员人民式的专家治国（如尼加

拉瓜）。

（4）从新传统到动员人民式的专家治国（如埃塞俄比亚）。

（5）从民众主义到新传统（如乌干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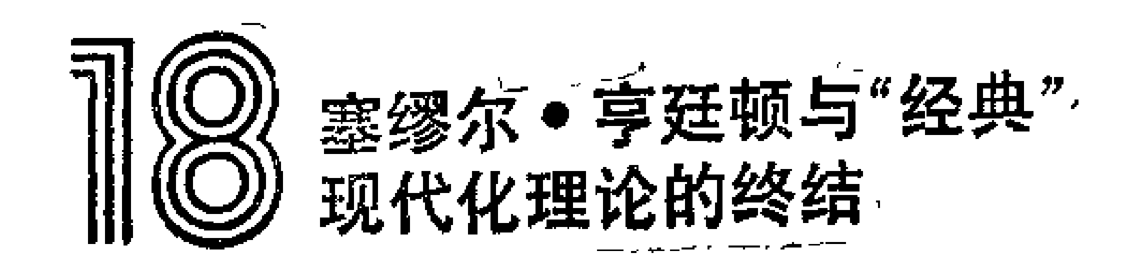
（6）从动员人民式的专家治国到新传统（如几内亚）。

选择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不容易的。要提高政府能力，就必须进行吸取资源和对人民生活作出规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常受集团和个人反对的。要组成国家，就不能缩手缩脚，就必须削弱地方上的联系和权威。经济增长要求把税收和经济产品用于投资，即为了将来的消费而推迟现在的消费。

然而第三世界人民由于受教育和电视的影响，要求更高的物质产品。所以集权政权禁止人民参政并控制分配。在第三世界中，民主政权是例外，这应该从它们的文化（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是在石油上获取的暴利（如委内瑞拉）中找到根源。

这就是我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

（林 华、张 彤译，原载《政治学参考资料》，1983年第3期。李 方校）



18 塞缪尔·亨廷顿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

[英国]科林·莱斯

“现代化”

为了说明塞缪尔·亨廷顿的贡献，首先必须概述一下“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几个要素。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从M·韦伯及T·帕森斯等人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在所谓“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关系是带有“特殊性”的，而不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如，是基于人们的特殊关系，如血缘关系等，而不是基于代表人们整个阶级的一般关系)；保证人们获得某种职位或职务的资本，是出身门第，而不是“业绩”；在各种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主观感情，而不是客观现实；角色划分是不明确的，例如王室同时又是国家机构。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现实情况均与此完全相反。此外，一般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特征的还有：劳动分工程度低、对农业的依赖、生产增长速度缓慢、地方交换网分散以及地方行政管理效能不高，这些都是与现代社会

相反的特征。

“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向现代的社会组织原则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目前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显而易见，上述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不过是以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表面和中心部分任意抽取出来的一些情况为依据的。“现代化”这一概念至多不过是一种设想，即把前者看作是一度普遍的起始状态，而把后者看作是普遍的终极状态；并用所谓现代化过程（非常虚构地）取代资本主义世界表面和中心部分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然而，对这种理论的思想本质不甚了解的政治学家却从中去寻找依据，试图据此把“政治发展”说成是“现代化总体特征的一部分”，即提出了政治等级上的现代化过程的概念。这一概念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政治发展”包括民主化、政治“动员”、建立民族国家、行政和司法的进步、世俗化、平等、系统的独立，如此等等。

根据亨廷顿本人的观点，他的理论概念本是对“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否定，因为这一概念确实无明确含义。他提议只讨论政治变迁，不讨论政治发展。假如真是这样，至少也该有一点与“现代化”理论决裂的意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政治衰败”这一概念占中心位置。他认为，政治衰败的表现是动乱、暴力、腐化和政变等情况。不过，亨廷顿在三个方面确实有所突破。

首先，他的确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变迁即革命，认为革命是第三世界当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显然，以往的著作者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那些著作者用以分析第三世界政治的概念，显然是从对美国多元政治的解释中改头换面地抽取出来的观点。根据对美国政治的解释，政治是由为使各种对抗利益之间不断趋向平衡而进行调节的许多调节器组成，这种调节是通过代表社会所有"阶层"中不同"集团"利益的竞选机器实现的。但在亨廷顿的政治概念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工人、学生、城市"中产"阶级、农民等极端不满现实的社会力量为争取国家权力而可能掀起的革命斗争。亨廷顿关于第三世界政治的观点显然首先是现实主义的。

其次，亨廷顿的著作看来是真正具有理论水平的。在以往论述"政治发展"的著作中，很难找出对大范围的、重要的政治现象的任何解释。当然，其中或多或少总有一些煞费苦心的分类系统或类型，但是合用的理论则几乎没有。与此相反，亨廷顿则对很多问题作出了解释，例如：为什么要求变革的压力有时会呈现改革的特点，有时又呈现革命的特点？为什么有的改革或革命成功了，而有的却失败了？为什么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会走向个人的、专断的、独裁的统治（即军人政治）。

以上两点突破大大增加了亨廷顿著作在学术上和在实践中的影响。但是，亨廷顿与以往正统派理论的第三点分歧，却转移了人们对他前两点贡献的注意力，因为他公开地、僵硬地把维护秩序奉为最高的政治价值。正如唐纳尔·奥布赖恩所说，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60年代后期美国其他许多主要政治科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不过亨廷顿的观点"表述得更严谨、更为明确罢了"。亨廷顿在他的著作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对人民大众的困惑、不安和矛盾的情绪感到厌

恶，而对能够驾驭、引导、必要时甚至镇压群众的一切"上层显贵"、官僚阶层或"领导"集团，却表示赞赏。

亨廷顿的观点

亨廷顿指出，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的哲人贤士认为，人们越是贫穷，就越易于使用暴力去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样，政治也就越不稳定）。于是，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的宗旨（至少在理论上）一直是寻求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条件，从而确保政治上的"稳定"。但亨廷顿却认为，统计数据表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在政治上要比稍富裕一些的国家稳定。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在"现代化"（其定义是"社会动员加经济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或者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即"政治参与"）。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性的日趋频繁，使人们产生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不曾有过的企望。经济增长首先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而这又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参与"。如果政治机构无力接受这种越来越多的"参与"要求，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动乱（示威、罢工、骚乱甚至武装斗争），或者导致腐败（这同样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

不断增长的"参与程度"是否会产生不稳定的后果，这要取决于"政体"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程度高的政体，可以使刚刚参与政治（即正式或非正式地进入社会）的公民社会化，使他们遵循现存结构所代表的政治行为轨道和接受现存规范。这就产生了"公民"政治。"公民"政治可以采取民主的形式，也可以采取不民主的形式，"立宪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

专政均属参与政体”（参见亨廷顿的著作《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的，均引自该书——译者）。换言之，参与并非必然意味着群众对政府的控制，而是意味着政府通过使人们“卷入”“政体”的机构对人们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制度化程度不高的政体则容易被进入其中的新“集团”所控制，这些集团根据自己的主张“参与”政治，实行“独裁”政治(praetorianism)，① 从而出现“富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群众示威以及军事政变”。

“独裁”政治（其一般形式是军事统治）可能会进而导致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就可能成为持续政治变迁的唯一有效的形式，因为只有能够进行革命的社会运动才能建立新的、持久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认为，革命是政治变迁的一种形式，它是由于刚刚参与政治的各种势力的大小同政治制度融合或驾驭这些力量的能力之间极不相当而造成的。

根据亨廷顿的看法，革命主要并不是针对经济问题。“革命是在一个国家内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层和政府的活动及政策进行迅速的、根本的、剧烈的改革”。“不断上升的或雄心勃勃的集团与僵硬的或巩固的制度之间的矛盾，乃是造就革命的材料”。导致革命的条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都要求摆脱现存的政治秩序，以及他们在民族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能力。但是，因为中产阶级发展的趋势是愈壮大就愈保守，并且中产阶级的目标与农民的目标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些条件很难完全

① 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中译本中，Praetorianism 一词译为“执政官式政体”。——编者

具备。革命的终点是“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制度化”。“衡量一场革命成功程度的标志是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如何”。在这方面，事实证明共产党人是最成功的革命者，因为列宁主义用卓有成效的政治组织理论武装了共产党人，因而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中群众的参与同“具有真正统治能力的政府”结合起来。

亨廷顿认为，谈到任何一项改革，重要的问题不是去评价它本身的价值，而是看它能否避免革命，避免那种可能作为革命催化剂的行动。拉丁美洲进步联盟就是建立在改革可以避免革命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亨廷顿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改革可能适得其反，特别是那些迎合城市知识分子要求的改革，反而更可能酿成革命。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由于“心理的不安定感、个人的异化感和内疚感以及对于人身安全的迫切需要”等因素，往往成为革命的阶层。亨廷顿写道：“为迎合激进的中产阶级的力量与激进性，他们不大可能减少革命倾向。对于有兴趣维护政治稳定的政府来说，对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适当反应不是改革，而是压制。”与此相反，迎合农民要求的改革却可以避免革命，因为“没有任何集团比占有土地的农民更为保守，也没有任何集团比占有土地太少或付出地租过高的农民更为革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化国家的政府稳定与否，取决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以上这些，就是关于亨廷顿主要论点的概述。下面，我们来对它进一步加以探讨。

对亨廷顿著作的评论

我们必须从两个角度去把握亨廷顿著作的意义，一是运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观点，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作为社会科学的亨廷顿著作

(一)作为社会科学理论　有一位评论家在亨廷顿著作发表六七年后，对他的观点作了一番回顾，称它为“精致的、朴实的、明晰的、可取的理论”。其实，只要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亨廷顿理论的含糊、重复、繁琐论证和混乱之处。他对自己使用的“参与”和“制度化”这两个主要概念，无一处作过充分的界定。所谓“参与”，无疑包括任何一种在思想上与政体之间的联系，而不管这种联系多么表面化，多么广泛。因此，正如我们所见，亨廷顿宣称，今日的俄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很高”。反过来，“制度化”却被定义为“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与稳定的过程”。作者对这一过程也未作专门的阐述，而是提出了衡量“任何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四条“标准”或四种验证方法：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整体性、独立性和连贯性。根据亨廷顿的意思，适应性可以用某一组织与程序的“年龄”来衡量。“一个已经存在一百年的组织，再继续存在一百年的可能性要比一个刚刚存在一年的组织再继续存在一年的可能性大一百倍”。只要稍加思考即可发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亨廷顿也许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又加了一条衡量标准，即一个组织或程序对各种挑战的应付能力。这样就可以解释：虽然沙皇制度成功地通过了年龄的考验，却未能成功地应付1917年的“挑战”。但是，此例中的“挑战”乃是一场革命，也就是

“参与的爆发”。因此，亨廷顿的理论似乎要表明：当参与的规模大到“政体”的制度化不足以应付的程度时，革命就会发生；而革命的发生正是政体应付不了挑战的证明。这就是循环论证。但亨廷顿又提出了一种衡量适应性的标准，即制度（组织或程序）能否放弃接受挑战的功能而改换其他功能以求生存的能力。但是这也是循环论证：某一制度具有适应性的证明是其改换功能以求生存；而没有生命力的证明则是它不能改变功能以至灭亡。亨廷顿说，在寻找其他手段以取代专制制度方面，英国的君主制成功了，而沙皇和法国的君主制则失败了；这里，失败的证明又是革命的成功，作者同样又在进行循环推论。

衡量制度化的其他几个标准（整体性、自主性和相关性）也同样费解。

（二）论据　对亨廷顿著作的非科学性所作的批评，其所以不彻底、不深入，部分原因也许在于这部著作列举了大量事实。有人评论说：“他的论证极为全面，其经验知识犹如百科全书，广博得使人眼花缭乱。”同这些评论家一样，大多数读者也对亨廷顿的才学顶礼膜拜。

但是，十分清楚，重要的不是论据的数量，而是论据的质量，是对这些论据的利用。对第三世界任何部分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发现，亨廷顿在利用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方面仍有很多漏洞。例如，当他想说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愈长，它就愈能长时间地享有与独立俱来的政权”这条规律时，曾指出：“坦非民盟（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及其前身有长达三十二年谋求独立的历史”；但是，坦非民盟的前身（坦噶尼喀非洲协会）在转变为坦非民盟之前，很难说一直在“为

独立而战”。

（三）唯科学主义方法　当然，从其他许多有关政治学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出论据不够的毛病。对亨廷顿的这种批评之所以更为贴切，是因为他使用证据时，过多采用了唯科学主义方法。

当引证相关性资料时，这种方法有时似乎还有助于掩饰观点的循环性。例如，“民众的启蒙越快，推翻政府的事件就越经常”这一说法，就是以小学就读人数的变化与“不稳定”之间所谓的正相关为依据的。

有时，亨廷顿引证的资料丝毫也不能证实某些貌似规律的结论。例如，他写道：“缅甸和埃塞俄比亚50年代的人均收入同等低下，但相比之下，后者较前者相对稳定些。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埃塞俄比亚识字人口低于5%，而缅甸识字人口为45%。同样，当古巴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时，该国识字人口比重在拉丁美洲各国中居第四位。在印度，唯一选举出共产党政府的一个邦即喀拉拉邦，其识字人口所占比重也居全国首位。十分明显，共产主义所吸引的对象通常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文盲。”

在这些例子中，论证的数量方法确实有数据作参考；但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又没有这种可资参考的数据，作者却硬在那里虚构相关性。例如他认为，“一般说来，失业者、离群索居者以及在其他方面愤怒不满的人，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行为导致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总的来看，亨廷顿使用的方法是鼓吹多于探讨。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背景，就会清楚地回忆起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与19世纪中叶他们的继承者的科学探索所作的区分。马

克思写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213页）

作为意识形态的亨廷顿著作

有待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亨廷顿的著作在逻辑上如此不通，在方法上也如此不当，论据又如此不足，何以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亨廷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惑人。

首先，如前所述，他割断了"现代化"理论先前与美国多元论之间的联系；其次，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搬用了一些重要术语，而同时又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同多元论的决裂，决不仅仅意味着抛弃早期现代化论著中关于民主理想的含义。对亨廷顿来说，第三世界社会并不是由为了影响政府"决策"而不断改组的竞争集团组成的；"现代"体系也不同于"前现代"或"正在现代化"的体系。在所有政治体系中，关键是统治，或者按亨廷顿的说法，是"权力"。"权力是必须加以动员、发展和组织的力量。它必须得到建立。"因此，亨廷顿迫不及待地在第三世界寻找在功能上相当于"利益结合体"及"利益聚集体"的东西。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也曾这样做过。亨廷顿认为，在任何地方，主要的现实问题都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的政权；而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问题正是缺少这样的政权。即使那些对亨廷顿的观点持犹豫态度的人，也可以看出：同多元论模式相比，亨廷顿的政治模式更适用于第三世界冲突的现实。

亨廷顿还有这样一个见解："真正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革命，就连官僚主义化了的共产党也同样反对革命。"亨廷顿在其著作中通过两方面的论述发展了这种思想。首先，他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劳动阶级求解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注意到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中一个较为狭窄的方面"），并且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亨廷顿把列宁和后来实际上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抬高到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迁的理论，已被事态发展证明是错误的；而列宁主义作为政治行动的理论，则是正确的。……列宁为建立政治秩序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列宁主义中，政党不仅是制度化的，而且被奉为神明。"在亨廷顿的美国读者中，很少有人能理解这种区别，也不知亨廷顿本人是否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

其次，由于亨廷顿把列宁主义简单地认为是最新的和有效的权威学说，他就能够接受以往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明显忽略的社会、阶级和革命运动的概念，认为三者是第三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现象。实际上，亨廷顿似乎还把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搬用来论述第三世界的现实，但他却抽掉了这些概念本来包含的革命理论。此外，亨廷顿的著作还表明了他在不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作任何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如何塞进一些马克思主义概念。

亨廷顿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似乎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的一些概念。他对于"流氓无产者"的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词是直接从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来的，但是在亨廷顿著作中却仅用来指新移民中的城市贫民，这就使"流氓无产者"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同马克思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亨廷顿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缩小为仅仅是"经济群体"的概念，这就使讨论脱离了阶级过去和现在赖以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脱离了帝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亨廷顿仅仅是通过"群众威胁现存秩序"的观点把"阶级"概念引进现代化思想的。至于群众威胁秩序的能力，他已从"政体"的"制度化"方面，实际上也就是从"政权"削弱、转化或压制这一威胁的能力方面作了阐述。

关于亨廷顿引用"革命"概念，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的概念是历史的，包含了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内容。马克思认为，革命总是一个具体的转变过程，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政权总是通过革命，从一个由某一生产方式（例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演进到一个由新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但是，亨廷顿却认为"革命"仅仅是指"迅速的、彻底的、剧烈的改革"。

结论

亨廷顿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使"现代化"思想顿时恢复了元气。他提供了一种粗陋的、但却是内容丰富的现象学，来阐明阶级、群体、权力斗争、革命、腐败、军国主义等现象。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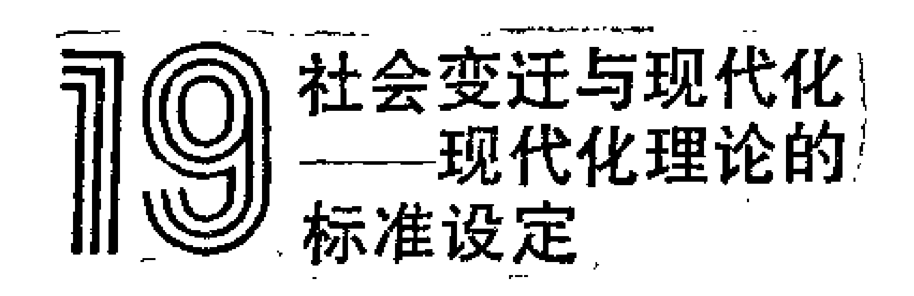
来这些都是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搬来的重要内容，但他却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概念都可以被亨廷顿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纳入与历史无关的、毫无确定性的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构想。亨廷顿的著作作为科学理论，是虚伪的；作为一种宣传则是粗陋的，虽然未必无效，尤其是在大多数美国政治科学院系频繁来往的知识界。而作为重建意识形态的模式，亨廷顿的著作却是开拓性的，它戏剧性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灵活性”。亨廷顿的模式必然要对70年代资产阶级关于发展问题的观点产生深远影响。

（李彬摘译自阿拉维与夏宁合编，《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版。昇　军校）

第四编

东亚发展模式与工业化战略





19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的标准设定

[日本]十时严周

一、序言

“现代化”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从有关现代化的论文中不难看出，现代化的概念十分混乱。

现代化作为常识性的日常用语使用时，不论人们赋予它何种含义都无关紧要。但是，当我们用它来表示社会自身变迁的某种必然趋势、规律或一种变动的理想状态时，就不能把它仅仅作为常识性用语。因为，从研究社会变迁规律的各门科学的角度看，这是关系到科学研究对象的重要问题。

现代化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混乱的基本原因在于，人们把对“现代化”过程规律的探讨与“实现现代化”的规范性方向的探讨混为一谈。人们常常不去解释现代化过程的普遍规律，而是首先设定“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概念，然后根据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的和理想的规范，从常识出发，断定一切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演进过程，甚至断定

将来所有社会也将如此变迁。和进化论者一样，他们首先将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原理作为大前提，在此前提之下解释迄今为止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变迁的秩序问题。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设定一种理想状态，然后不是去搞清这种价值标准的客观依据，而是主观地将个人理想的观测与断断续续的经验贯穿起来；目前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论战正是处于这种前科学的浑沌状态。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首先提出一个对现代化诸过程进行经验性和实证性分析的角度，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纵观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最后涉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以此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标准。

二、现代化的诸过程①

当我们把现代化作为社会变迁问题加以研究时，必须把它看作起始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变迁过程。然后还要设定现代化起点在历史长河中的特定位置。

许多辞典都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作为现代化的标志。② 一般认为，产生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领域里的“产业革命”，政治领域里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现代思想”的形成，是现代化在世界史上的起始点。③ 但是，这种观点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

① 参见拙作《现代化过程——关于现代化跨文化研究的假说》，载《法学研究》第37卷第7号，1964年。

② 福武直等编：《社会学辞典》，有斐阁，1958年，第179页。

③ 江口朴郎：“世界史中的现代化问题(1)”，《思想》第473期，1963年，第76页。

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等术语的运用标准因人而异，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用不很明确的其他同位概念来解释现代化概念，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其二是即使对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一般性定义，但是除了西方国家及若干非西方国家外，其他国家并没有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连续过渡。目前许多低发展国家显然没有经历这种连续变迁。因此，坚持这种观点无异于将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排除在现代化现象之外。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设定关于现代化起点的跨文化标准。

当人们寻找跨文化的、具有可比性的关于现代化起点的明确标准时，关注工业化概念是很得当的。虽然工业化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如果我们将“一系列机械装置构成了制造业的典型生产方式”① 看作工业化的本质内容时，就可以将整个世界史中同一机械、同一生产技术的采用和操作设定为这种可比的明确标准。然后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标准，对每一个向工业化过渡的社会分别下定义。例如，按照传统说法，世界史上最早向工业化过渡的是1825—1830年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从原有手工装置向机械化大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西方各国向工业化过渡的时间彼此略有不同。按照同一标准，我国向工业化过渡的起始点当在江户时代幕府以及西南雄藩引进西洋军事工业时期。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长崎设立浦浴铁厂，随后我国最早的 6 马力蒸汽锤开始起动。“它的马力虽小，却标志着使用蒸汽机并拥有一

① 见拙作《工业化过程中的文化动态——试论日本工业化过程》，载《法学研究》第36卷第4号，1963年，第23—25页。

系列工业机械体系的正规工厂的出现。"① 以此作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该工厂的工作母机能够生产出其他工作母机，而这些新机器又能在其他地方制造出新型号的工作母机，如此不断更新换代。它意味着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已经根植于我国。到明治维新以前，"幕府的长崎铁厂已拥有总计达29马力的蒸汽机，横须贺铁厂拥有180马力的蒸汽机。"②

将向工业化过渡和现代化起点二者合一，有以下有利之处。它为我们具体分析每一个社会在受到同一机械力以及机器生产方式即同一要素的影响后的社会变动过程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对引进的机械技术如何影响各个社会的分析把握社会变化。我们不仅能从概念上区分在机器制造生产方式这一世界史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共同变化过程和输入国个别的生活方式差异所带来的特殊变化过程，而且能对这两者进行统一分析。这将成为我们进行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统一的方法论的基础。

把向工业化过渡设定为各个社会现代化诸过程的起点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深刻地分析在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所产生的各种变化，来展开对现代化诸过程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找出了跨文化的、具有一定共同性的倾向，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所代表的是哪一领域的哪一种倾向。找到了明显的个别变化过程，我们就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以实证方式研究它是在何种状态下出现的何种个别变化。如同站在历史主义

① 山崎俊雄：《技术史——日本现代史大系》，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年，第8页。

② 石井金之助，同①，第49页。

立场对社会进化论予以猛烈批判的波亚斯学派的实证调查研究一样，它必须以严密的“实证性”作为唯一依据。

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变化，原则上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分析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引进必然出现的一系列共同变化；第二，分析个别文化对机器生产方式导入的反应和抵抗机制。

第一种研究方法的焦点在于分析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机器生产方式过渡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变化。比方说，引进机器制造生产方式需要筹集大量必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出的大量商品又需要开拓广阔市场，因而有必要根本改变以往的生产、分配、消费等各种制度，并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秩序。以机器为中心的新生产技术的采用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机构的形成，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诸如人口集中城市、城市化现象、社会分工形态即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随着整个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人们的观点、思维方式和感觉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成了所有向工业化过渡的社会中出现的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连锁发生的多少具有普遍意义的变化。

第二种研究方法不是研究普遍的共同变化，而是侧重于个别的和独特的变化方面。在引进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机器生产方式和出现各种相应变化时，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个别文化决不仅仅表现为被动的适应。面对共同的外来影响，个别文化会作出不同形式的反应。我们必须以文化机制为杠杆，对未来的变化过程进行个别研究。

人们在分析过去的以工业化为起点的社会变迁过程时，曾经分别运用过这两种研究方法。重视共同性和普遍性变化

的研究，偏重于关于普遍变化的理论体系构成；而重视个别的和独特性变化的研究，则越来越偏重于对个别变化特殊性的强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社会科学倾向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历史科学则倾向于个性的表述和研究。它们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倾向。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对于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研究都是必不可缺的，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性。因为，只有统一把握工业化发展中出现的普遍变化倾向和个别变化倾向，才能客观地解决现代化理论内在的各种矛盾。

当然，要想从力学角度统一把握工业化进程的普遍变化的作用力和个别变化的作用力决非易事。首先要准备一套分析框架，系统而全面地把握采用机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和传统文化对变化的控制力在社会的某一侧面又是如何相互抵触或融洽的。只有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社会各个侧面的变动进行明确的实证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们需要从技术、经济结构、人口动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价值体系诸方面，对导入新的生产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原有制约力所产生的显著的个别变化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

三、日本现代化过程概述

我们将日本现代化过程的起点设定于幕府末期引进西方军事工业时期。明治时期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在于旧有制约力发挥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力。当时我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虽然仅限于极小范围，但是从战国末期到整个德川时期一

直延续不绝，即使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幕府统治体系之下，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没有完全绝迹。特别是在江户中期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通过长崎的荷兰商馆以及其他途径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幕府末期与西方各国全面接触时，由于已经具备了许多常识性的知识，得以避免彼此间的格格不入。自德川中期以后，人们不仅学到了西方的知识，而且养成了我国对待西方文化的独特姿态。以新井白石为首的幕末知识阶层将东方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物质文化相提并论。这种二分法的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下来。人们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中的技术技艺的实用性表示强烈关心和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对东方传统的、特别是我国独特的人伦之道具有的自豪感。

明治维新以后，我国与欧美各国的接触全面、迅猛地展开。人们从久经培育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理论和价值观自主地进行选择和取舍。人们在多年培育起来的西方文化中集中地吸取了技术的和物质的精髓。明治维新时期，政府领导阶层最关心的是维护新的统一国家和国内秩序。为此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实现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政策。这不仅是在整个德川时代积累起来的内在因素的要求，也是当时欧美各国推行殖民主义过程中所带来的强大外界压力施行压迫的结果。为了确保高度的生产能力和军事力量，有必要在开国进取和文明开化的旗帜下首先引进西方产业技术和军事技术。

因此，明治政府最初作出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为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筹集庞大的财政资金，然后利用这些资金创建官办工厂，以生产机械制造设备。政府创立了机械技术生产方式，用以生产兵器，造船，制造机械，从事建筑，制造毛纺织品，

印刷，以及制造纸张等政府直接需要的物品，同时又引进了制丝、纺织以及其他振兴民间产业的各项技术。明治政府还“铺设铁路，开创电信业务，经营工厂，开采矿山，向所有可能的领域发展国营工业，从而开创了日本产业史上被称为‘工部省时代’的新阶段”。① 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机械制造生产方式过渡，构成了本时期日本社会的中心课题。

开发新产业、经营大型工厂需要筹集巨额资本。具体的集资方式是从富商和富农手中筹借资金（御用金）和发行不兑换纸币等财政手段。借款担保由地租收入充当。明治6年修改了地租收入条例，使占全部租税收入80%的地租收入成为后来筹集资金的重大财源。普及机械制造生产方式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确保必要的劳动力人口，政府实施了交通、居住、贸易自由政策（明治1年），废除了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明治2年），废除了永远禁止买卖土地令（明治5年）。这一系列改革不断地影响着社会其他侧面，并与当时对外来思想的介绍批评一通，对原有的理论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作用。

但是，果断地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和传播外界情报，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理论和原有的价值观，而且事实上最终也没能改变。正相反，它有助于这些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例如忠与孝、恩与情等等特定的价值观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结构中以领导层和被领导层之间的相互亲近性为交接点的特殊关系也发挥了作用。领导层对传统价值观取向的依赖性和被领导层对传统价值观取向的执著

① 山崎俊雄，《技术史——日本现代史大系》，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年，第21页。

性相结合，使明治时代前期与上一历史阶段保持了高度的连贯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明治前期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和魂洋才”为基础、以技术为核心的变化过程。机器生产方式作为建立在传统的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新一统国家的有力武器而被有组织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与此同时，机械技术以外的西方文化，特别是与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相抵触的观念，则遭到了强有力的和有意识的抵制。在这种意义上，明治初期价值观念范畴中的锁国主义与德川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它得到为政者的强烈保护。这样，吸收西方技术与密切结合传统的价值规范在互不矛盾的情况下并存下来，并为政府领导层所接受，这正是明治初期的实际状况。

到了明治10年下半年，工部省被撤销，民间产业发展活跃。原有商业资本的金融活动、以金禄公债为核心的铁路、纺织等新兴民间企业得到普及，旧幕府时代不曾有的新会社制度普及全国。还要提到的是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和产业体制的基础，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建立起来，发展方向也得以确定，完成了所谓“起飞阶段”①。这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史的定论。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其他方面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在人口动态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完全可信的确切资料，但从下表中仍可看到明治中晚期到大正初期之间的显著变化。

新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人口动态，而且带来了资

---

① 东畑精一：“经济主体形成史”，见《经济主体性讲座》第3卷，中央公论社，第12页。

表一　明治年间经济与教育的发展状况

年次		各产业人口数			人均国民收入	学龄儿童就学率
		第1产业	第2产业	第3产业		
明治11	1878	82%	5%	13%	100	41%
16	83	79	8	13	125	53
21	88	76	9	15	140	47
26	93	73	11	16	210	55
31	98	70	13	17	285	69
36	03	66	15	19	285	93
41	06	63	17	20	310	98
大正 2	1913	59	18	23	370	98
7	18	55	20	25	385	99
9	20	54	21	25	385	99

参看森田优三："日本人口"，载《经济主体性讲座》第6卷，第179页，中央公论社。

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方面的基本变化。明治初期工业化的主力是当时的政府；到了明治中期以后，企业家作为新工业的主力登上了舞台。所谓"工业巨头"时代，正是在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之后出现的。在劳动力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资本理论的渗透，明治中期前后出现了所谓"原始劳动关系"状态下的雇佣劳动。① 在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原有家族、地域社会和阶级阶层结构受到了新的冲击。大家知道，明治中期以后实行了颁布宪法（明治22年）、开设国会（明治23年）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但是，在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和惯例并没有

① 参见隅谷三喜男，《日本工资劳动史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55年。

仅仅表现为被动的适应。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变化的内容就可发现，后者具有广泛的制约力。例如虽然政治制度中有了代议制和其他形态的变化，但在实质上却保持着与上一时期强有力的连续关系。在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进入新社会结构上层的人，大多来自旧士族阶级，① 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出原有家族、地域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调整过程中所发挥的广泛的制约作用。从当时政府的官僚制度以及企业经营组织来看，在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官僚制度和组织制度时，原有制约力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以古河市兵卫经营的矿山为例，初期的上层管理组织设立了第一负责人、第一副负责人、第二负责人、第二副负责人、第三负责人、第三副负责人、第一代理人、第一代理后补人等等与职能本身几乎无关的身份性荣誉称号，矿山依靠这一套官僚制度从事经营。明治中期以后，古河的资本急剧膨胀，靠市兵卫一人已经难以维持。市兵卫死后，于明治37年开设了古河矿业公司，但新公司却将原来的身份本位官僚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② 尽管工业技术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我们仍能看出现实分工形态中集团成员之间按身份的高低所发挥的制约力。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扩展，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明治初期以后政府权力的严格统制一直延续着。在提倡“文明开化”的同时，政府又通过学校教育制度和其他手段强化宣传特定的价值观念，为维持原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付出

---

① 参见菅野和太郎：《日本公司企业发展史研究》，岩波书店，1931年，第516—616页。

② 星野芳郎："工业技术的发展"，载《经济主体性讲座》第6卷，第89页。

了巨大努力，对此我们是记忆犹新的。明治中期以后得以强化的有组织的思想管理工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决压制，就构成了这段历史中的一页。

到了大正、昭和年间，日本现代化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冲破了原有制约力，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影响。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出现的新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还没有能够系统而充分地说明这一显著质变的确切资料，但这一时期领薪居民的稳定的生活，他们的独特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以及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正自由主义的出现，足以使我们推断出这一时期的质变方向。自明治初期全面工业化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年。由于内部的渐变和同一时期国际关系上的外界影响，大正末期原有的制约作用发生了显著质变。这一时期社会领导层的交替是在两代人之间进行的，这一点至关重要。①

昭和前期，由于各种变化过程受到国家统制力量的作用，因而成为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最为剧烈和全面的社会变化，当然应该首推战争的失败和战后的经济复兴。

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在于：在占领状态下向全国强制推行民主主义观念和向所有产业推行革命性的技术革新。在特殊的战败环境下，围绕民主主义观念展开的斗争，是在微妙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民主主义观念，一方面由国民迅速地加以接受，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迟缓的抵抗。但是从我们经历的事实看，认为放弃了全部原有思想而向外来

① 间宏，《日本经营系谱》，日本能率协会，1963年，第1 0页。

思想全面过渡的观点，以及认为原有思想几乎没有变化而外来思想的引进不过是表面现象的观点，都是不妥的。特别是现在正处于新旧两代交替时期，新一代接受了战后新的教育和培养，拥有新的价值观。这对于日本现代化今后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透过新旧两代价值观的断层，我们可以预测出原有制约力中某种不连贯性的出现。例如在劳务管理方面，最近年轻工人阶层的管理已经成为有待进行深人集中调查研究的重要问题。战后，特别是1950年外资法公布以来，政府积极奖励与外国技术的合作，这是我国技术革新的开端。在今天，新技术的普及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业结构的变化方向将决定我国劳务管理的未来状态，因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①

四、结束语

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大多集中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在研究日本现代化时，往往首先设定一个特定的理想状态，并把对这一状态的适应过程称为日本的现代化。这些理想状态大体是追踪过去不到一百五十年间西方社会的变化轨迹面得出的。有些人甚至更为极端地主张生活领域的全盘西化就是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以赶超西方全部社会变化作为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主要出自两个潜在的前提。第一，同以往的进化论一样，认为

---

① 参照森五郎：《战后日本的劳务管理——性质与结构特质》，钻石社，1961年。

人类社会将遵循西方文化的全部演进轨迹而发生变化。第二，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法则，变化是“有价值”的，因而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变化。以这些潜在意识为前提的观点，特别是将所有社会的现代化与世界史中的西方文化并列起来的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进化论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天真的民族主义的延续。

为此，我们有必要像曾经彻底批判进化论的虚妄性的历史学派那样，以严谨的、实证的和经验的调查研究为依据，详尽地探讨这些潜在的前提条件。历史学派曾经怀疑所有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一定的进化阶段变化的观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认为向工业化过渡和过渡后的变化具有某种规律性的观点。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设定一个对“社会的必然变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的标准，而且特别强调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性变化和个别的、独特性变化。在分析日本现代化过程时，我们纵观了每一变化发生的社会领域和时期，从而为今后更为详尽的实证调查提供了基本线索。

在生产技术变化过程中，一旦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过渡，就会出现超越各种文化差异的高度普遍性。在以效率原理为绝对规范对生产技术加以选择时，原有的制约力完全丧失了发挥作用的余地。社会生产技术的准则是追求高效率的技术。尽管在现实中只能依靠欧美各国现有的各种技术，但这个追求却与西化现象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从原则上讲，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并不决定于这种技术是否存在于西方，它的唯一的根据是出自自然科学原理的效率准则。这一特点在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结构、人口动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上是否存在呢？很难说关于这些现象的现有理论也具有

与自然科学同等的普遍性。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跨文化的实证性比较研究，以克服现有理论的文化地域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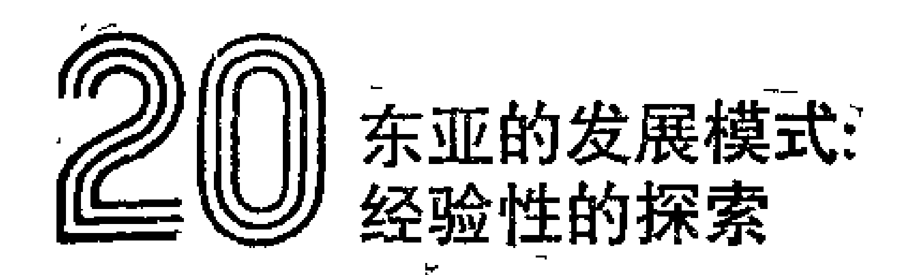
除了这种努力外，任何想使这些社会现象按特定方向变化的尝试无论是否正确，都是不符合发展方向的必然规律的。

最后还要提出，按照特定的方向发展，即按西方文化过去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引导其他个别的文化变化，究竟是否“具有价值”呢？按照当今的科学知识，很难作出什么具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的判断。根据服务于生产目的的手段之优劣，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有价值或没有价值，但是很难说“生产”相对于“非生产”是有价值的。因此，在对现代化方向作出价值判断时，不仅要探讨关于客观事实的法则，还有赖于对超越科学认识的价值领域作出特定判断。

不论众多国家好恶如何，全面工业化已经发展成一种大趋势。各个国家都通过彼此不同的原有制约力对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实现现代化就要引导与工业化俱来的国内外影响力的作用方向，使之趋于理想状态。它促使人们更多地探索事物的法则，同时也将受到来自价值领域的相对多样化的制约。

要从目前现代化理论的混乱状态中摆脱出来，必须区分“现代化”与“实现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过程。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现代化这一社会变迁的诸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详尽地分析和评判不同的反应方式，从而解决现代化的方向问题。

（李国庆译自《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纪要》第4号，1964年。）



20 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

[台湾]萧新煌

从70年代以来，东亚的发展经历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界所注意的一个焦点，尤其是那些对发展研究感兴趣的团体。巨大的注意力集中于叙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历，包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不言而喻，日本的经济活力自60年代以来就已在发展和现代化专家中获得了声誉。此外，发达世界及发展中世界的实践家和决策者们，同样更急于在东亚成功经历的背后找到构成其活力的各种要素，以便与之抗衡或竞争。许多著作首先从经济业绩方面介绍了以上所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

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惊人经济成就较为近期的研究，可以在各种经济刊物和不同的国际或地区会议的文献中找到。撇开用于评价或比较的各种指标不谈，看来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绩没有什么争议。人们多次尝试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怎样成功的，并在较小的范围内解释其原因。①所有这些言论中有一个非常有趣之处，就是

学者们和实践家们都同样急于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某种方式传输到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方。新近的两个会议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是由纽约州卡内基伦理和国际事务会社于1984年9月25—2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发展模式与加勒比海地区主动精神”讨论会；另一个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主办的，于1984年12月13—15日在拉霍拉召开的“拉美和东亚发展的政治经济”专题讨论会。

上述两次会议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意图，就是对于东亚发展模式，如果不是全盘照搬的话，也要确定采纳某些特点的可能性，以便将这些特点运用于发展工作遇到困难和亟需援助的加勒比海地区或拉丁美洲。得到最大关注的各项政策效果和制度因素，显然被看作是使东亚发展模式获得成功的重要变项，不过这一点并不排除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看看两次会议上所发表的那些论文的标题，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政府的作用最广泛地被称为领导东亚发展工作的关键力量，由此产生各种具体政策，以鼓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政策、工业战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政策以及劳工政策。会上有许多好的论述，分析出成功的政策因素，可供拉美或加勒比海地区的决策者们加以利用。

这样的政策讨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具有真实性。在讨论政府的特定政策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时，也清楚地注意到原因和效果的问题。总的说来，宏观政治、经济过程的讨

---

① 罗伯特·韦德和戈登·怀特合编的《东亚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见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特刊，第15卷第2期，1984年；并见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东亚优势》（纽约，1982年）。

论，始终是围绕着政府的具体行动和总的成绩。会上共同认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决不能按照冈纳尔·米达尔在1960年指称南亚的那种意义，描述为“软性的”。① 这些政府对东亚经济和市场领域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成效，已逐渐被发展问题专家们看清了。一个新的词语可以用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发展型国家或地区”。它可以有其他称呼，但不是“软性的”、“消极的”或“最低姿态的”。②

在台湾和南朝鲜，政府对农业部门的相对控制是千真万确的。③新加坡决不是一个消极型国家，甚至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也不能称为软性的行政机体。最惊人的成就表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各项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政策中，这些政策被认为是在一二十年内确实革新了六千多万人（包括其中最贫穷者）的生活的迅速工业化的原动力。④I·M·D·利特尔所持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可以归因于良好的政策和人民”的看法，大体上得到了从事世界发展研究的严肃的观察家们和学者们的同意。⑤ 但如上所述，“良

---

① 冈纳尔·米达尔：《亚洲戏剧：对各国贫困的研究》（纽约，1968年）。

② 米克·摩尔：“台湾和南朝鲜的农业：政府是无所作为的吗？”见前引罗伯特·韦德和戈登合编的《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第57—64页；以及罗伯特·韦德：“南朝鲜的农业发展：消极型国家的神话”，见《太平洋观点》1983年5月号，第11—28页。

③ 萧新煌：《台湾和南朝鲜政府的农业战略：宏观社会学的评价》（台北，1980年）；萧新煌：《再次参观东亚的土地改革：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成分》，见约翰·泰西托里和苏珊·伍尔夫森合编的《东亚发展模式研究》，第149—159页。

④ I·M·D·利特尔：“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迅速的劳动密集性发展的经验和原因，以及模仿的可能性”，见《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报告》11—1，1979年。

⑤ 见前引I·M·D·利特尔所著文。

好的政策"只限于国内政策，而"人民因素"也只是作为"人力资源"而提到的。东亚各地政府在战后年代被迫应付的更广泛的全球性政治—经济背景，或多或少地被看成是特定的，而不加以认真的分析。这就在世界体系的动力同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之间留下了一个分析的真空。对于人的因素主要作为静态的人类天赋问题来考虑，又过于简单化了。它很少洞察到东亚人民如何并为何能够真正被动员起来遵从各种发展政策的问题。在东亚发展活力背后的各种文化—心理力量，至今未曾得到深入的探讨，尽管有许多文章把这些力量作为某种尚未解释的残余因素而加以提及。甚至那些企图从社会文化观点来解释东亚成功经历的严肃的文化学家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作了过分理论性的考察而没有得到经验性评价的支持，或者是由于他们的只把社区或村庄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狭窄眼界，结果没有拿出十分令人信服的东西。彼得·伯格提倡一种经济—文化观点，试图把驱使东亚人民行动的各种文化力量纳入关于这个地区自6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动力的分析，结果获得了成效。① 不过，还非常需要做许多切实可靠的经验性实证工作。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可以指望给探索东亚发展模式的重要任务定调子的一连串经验性问题，将其运用于全球性经济活力与国内政策制订之间，并用以沟通受文化约束的社会行为范式与国家一级的经济活力之间的隔阂。我不想作出任何经验性的结论；而只想指出什么是已认识的和什么是尚未认

---

① 彼得·L·伯格，"有东亚发展模式吗？"《经济新闻》（台北），1984年9月，第17—23页；以及彼得·L·伯格，"加勒比海地区能学习东亚吗？"《加勒比海评论》第13卷第2期，1984年2月，第6—9页。

识的，以便使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富有成果。

全球性政治—经济背景

有一点真正的共识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活力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制造品出口的迅速繁荣的结果。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和出口中令人难忘的成就，说明它们靠制订各种最可行的发展战略，包括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增殖产品更好出路的政策，从而克服了有限自然资源的约束。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各个工业先进国家的市场经历过高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是容易接受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而利用有效的世界市场的各种途径，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先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然后是出口导向工业化(EOI)，这个顺序特别值得注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6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工业化战略的重要转变，当时世界经济特别有利于贸易和出口。在某种意义上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受惠于有利的时机，它们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工业化起飞。

日本是跻身于工业化世界的第一个亚洲"后进国"，最初专门搞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香港接着按照日本的步子跟上去。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压力而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时，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开始了它们的出口扩张，还是大量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品。这个"四小龙"或"四人帮"从历史形成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转移中，十

分幸运地得益于世界经济的时机；并且，作为“后到的后来者”，它们确实靠填补“后来者”日本所留下的空缺而适时地“打进了这个市场”。

以上的分析显然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怎样获得成功的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见解，但还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世界经济的时机问题，即这一时机怎样有利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二是为什么工业化偏偏在东亚获得成功。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尚未广泛讨论，只有一些零星的论述可供参考。

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承认，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有它自己的动力规律或时机。但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世界市场的时机以及它们确有能力从结合于其中而“获益”的问题，应该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尤其从经验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在这里，了解一下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动力规律（用沃勒斯坦的术语，即“周期性节奏”）可能是有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在世界体系正在进行扩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得到巨大的全面经济增长的时候进入世界市场的。美国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单一中心的核心而出现，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进入的战后世界体系最独特的特征。只有一个霸权核心国的控制和核心大国之间缺少重大的竞争，才把东亚的“依附”地位同拉丁美洲的“依附”地位区别开来。美国市场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品的经济需要，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为美国的东亚盟友诸如日本、台湾、南朝鲜，以至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香港和新加坡等的活动建立了一个“外在界

限"。只要不打破这个外在界限(即只要搞资本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这些盟友便可自由地寻求那些能被东亚民族主义者们视为"民族利益"和"自主权"的东西，即使这些活动到将来可能会破坏美国国内的工业利益或劳工利益。

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结合进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时机确实是机会难得的。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前提：在战后年代从尝试过程中出现的美国霸权的性质，对这些边缘国家和地区可能格外开放，使其摆脱依附论学者在拉美所见到的那种典型的依附地位。因此，必须实证地考察美国在东亚所起作用的真正性质。

另一个有关的实证性问题是，为什么东亚能够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那里得到这样的自由以追求其利益？地缘政治的补偿在此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遏制政策中，把东亚看作是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一个堡垒，这个事实帮助我们理解该地区一些资本主义倾向的政府，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从美国得到的多方面的支持。如上所述，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在界限，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是反对共产主义，在发展方面是奉行资本主义。一旦建立了这个外部联系，一种交易过程就发生了。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看来把这个联系当作机会和"施惠",并不看作不可逃脱的死亡陷阱，尽管事实上它们仍然是依附美国的。

正如高棣民所指出的，东亚执行统治的上层分子把全球性经济看作一种挑战，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资源贫乏，人口过剩，处于不安全的形势中，并且不能自力更生。① 他们还认识

① 高棣民为萧新煌编的《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1985年)所作的序言。

到，给予出现于这个地区的美国势力以政治支持，可以从战后的政治现实中得到好处。完全忽视东亚各国各地区及其精英们老谋深算的能力，是不可理解的，假使这些有限的选择在当时对他们原是可以达到的话。

另外，对东亚执行统治的上层分子计算他们自己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中的处境的方法，也需要认真地作一番实证性的研究。他们在应付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时所作的妥协必须用书面加以说明。由这样的妥协可能引起的政府机构和地方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内部的潜在冲突，以及这些机构和人员在消除冲突上最终达到的解决办法，也很值得加以注意。换句话说，我并非提倡"全面专制"(tyrany of the whole)的研究方法，像托尼·史密斯在他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中所作的那样。[①] 相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处境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框架来进行考察，通过这个框架，这些国家和地区及其外部联系的演进情况可以得到更好的鉴别。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联系必须认真处理，这样的认识已逐渐得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研究者们的注意。战后世界经济时机的独特性、新出现的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的补偿，这种种因素一起组成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

指出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政治—经济观点的重要性，并不是给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需要按照这一方法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不过，这种独特的世界体系的时机，确实是东

---

① 托尼·史密斯，"发展文献的低度发展：依附论问题"，见《世界政治》1979年，第31期，第247—288页。

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历史性要素。

国家结构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简要论述的，政府在东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业已得到充分的注意。不管用什么词语描述这些东亚的政府，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政府的性质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都起到积极的和领导的作用。东亚各政府无论是在同美国的外部联系上还是同地方上层分子的内部联系上，相对说来是“自主的”和“坚强的”。上文的讨论约略涉及到东亚诸政府得以在美国霸权面前享有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权的原因。外在界限受到了东亚诸政府谨慎而灵巧的尊重，反过来又利用来自美国的外部资本甚至军事支持，这些政府取得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和更大的力量用以促进某些经济部门或扶持某些阶级或社会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外依附并没有减弱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在事实上提高了国家对国内各阶级和上层分子的自主权。

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考察到战后时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性质。应该注意到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战前都有同样的殖民地历史，而殖民地历史对殖民地独立后的国家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从以前的殖民列强(日本和英国)继承来的和为统治本地人民而创立的“过分发展的”政府官僚作风，可能是导致平民大众顺从政府统制的一份遗产。

此外，东方的(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即把国家看作不止是一种政治控制力量的观念，也渗透到了东亚人民的道德态度之中；这种观念甚至持续到近些年。儒家有关

国家的道德定义，强调领导者或国家当局的仁政。东亚传统长期以来一直使人民社会化而尊重“权威”，而这种“权威”在现代的代表就是国家官僚体制。具有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那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自然能够更自主地动员各种资源，而不会太多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反对。

当然，不能幼稚地断言这种政治文化是使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强盛和活跃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有利的世界经济条件和美国的支持，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许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不能得到这样的自主权和力量。此外，在台湾和南朝鲜，如果没有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地主阶级潜在的反对工业化的力量，同时在香港和新加坡，如果没有当地企业家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许不能以如此组织良好的方式来动员各种资源以求得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

在以上分析中，我力图避免简化法的危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例子，其国家结构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仅用世界体系的简化法或支配阶级关系的简化法来解释。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在历史上一直相互作用着，这样的相互作用导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其独特的相对自主的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对国家结构和阶级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府在60年代追求资本主义工业化，因而产生了某些新的阶级。人们已经看到，自70年代中期起，新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给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增加了压

力。变化不已的政府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和联合行动，可能是我们今后实证性研究的又一个成果累累的领域。这种政府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的性质与发展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未来调整其资本主义发展管理的方式。

关于东亚那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四十年间如何成功地处理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及资产以保证其“民族生存”的问题，显然已写得很多了。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实证性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文化因素

东亚成功经历中的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主题已有一些有趣而富于启发性的讨论，尽管都只是一般性的和理论性的论述。然而，相当大一部分文献集中于日本的公司文化及其对企业或组织的管理和行为的影响上，很少有人在经验的高度上真正把文化问题同宏观的区域性经济活力联系起来。

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各种文化因素，诸如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及和谐（只列举一小部分），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

重要的意义。

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

即使我们心里怀有这一想法，并认为它是可以获得赞同的，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实证性问题。首先，简单地说文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应当同经济发展有某种关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如果把能够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某种"比较优势"的东亚文化特定品质或因素描绘出来，却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如彼得·伯格所指出的，把文化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在这里是有用的。① 换句话说，现代亚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文化根源还有待于发掘。在前些年，有个非常流行的名称叫"后儒教"，后来伯格称为"世俗儒教"，它的含义是：普通人民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实践的儒家伦理可能是解释东亚经济活力的重要变项。来源于儒家的关于工作、家庭和组织权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与我们的讨论最有关系。在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正组织一批学者研究传统的社会文化行为在现代东亚的影响，而且他们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在上述来源于"世俗儒教"的社会因素上。

研究这些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如何表现在战后东亚社会的两种方法，是集中研究两个重要领域：家庭和劳动组织。其他重要的文化特征包括佛教、民间宗教和基督教。

---

① 见前引彼得·L·伯格所著文。

第二个实证性的问题是，为求理解和正确评价作为复杂的文化和经济相互关系的一部分的那种谨慎的"文化论点"，文化因素不应解释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本身的社会行为。相反，应把文化因素看作社会高度上的一系列有秩序、制度化的文化上的布置。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能把文化行为同宏观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另外，不要渴望在这些文化领域中找到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过可以期望在这里寻找东亚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支撑，文化因素不能单独起作用。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不是鉴定文化特征本身，而是鉴定这些文化因素能够使经济活动具有生气和活力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森岛通夫论述日本儒家伦理观对日本资本主义所起作用的著作与此有关。① 他指出了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的历史过程中被利用的方式，并指出那种意识形态(儒教)的内容对于帮助指导日常经济活动的各种可能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看来低估了似乎恒定不变的东亚文化因素在容许这个地区过去几十年爆发性经济增长上的"契机"功能。它们只注意到，"文化提供一种价值观的背景，用以加强对权威的尊敬，促进教育和奖赏勤奋。"② 它确实是一个背景，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背景，因为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媒介物，而是一个真正的、能动的契机。无疑，必须有更多的思考，使这样一种见解更为有理，并在实证上更见正确。

---

①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② 见前引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所著书。

第三个实证性问题是微观（文化行为）和宏观（国家的决策）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又要涉及“正确政策”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是政府为了提供可能而合理的“机会”而提出的，也被人民，特别是企业家阶级，作为这样的机会而加以接受。由于受到政府战略的鼓舞，企业家阶级当时愿意努力工作，以使这些政策获得成功。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能计算到，他们在既定的外部和内部结构面前没有许多的选择，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另一方面，倘若没有人民的集体服从，那政策就可能不成为“正确的”。人民愿意遵从政府的政策，可能是由于前面所列举的文化因素的原因。对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投机碰运气也许不是完美的解释。但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够十分肯定地认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同此种未说明的机会因素绝对无关吗？

最后要提到一点是东亚人民在现代对“民族生存”问题所显示的共同情感。东亚人常把民族的生存看作他们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遇到现代西方社会提出挑战的时候。西方人，特别是在现代，一般没有体验到这种民族情感，这种情感在东亚是文化自尊感与政治自卑感的混合物。这些态度也可能对推动人民在民族思想指导下朝着民族富强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具有某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结论

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的，今日世界最令人激动的地区是东亚，近几十年来东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是

有目共睹的。难怪有如此之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现象上。社会科学家们为理解东亚取得偌大成功的原因所作的努力，同样令人激动。

我已试行对近年来东亚发展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实证性概述。这里所提到的主要有三点：东亚在战后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经济体系和它的结构变化，特别是东亚结合进战后美国控制的世界体系的时机，这和美国在战后行使其霸权的方式一样确实是独特的；地缘政治的补偿，它给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依附的范围内提供某些纵横捭阖的余地，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和世界政治经济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由世界经济的时机和美国对这个地区施行控制的独特性质所造成的各种约束下，这个地区的国家结构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同发展中世界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战略转移是很平稳的。此外，通过工业化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些相对自主和坚实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这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成功，而且发展工作也没有遇到地方统治阶级的激烈反对。

最受赞扬的"正确"政策是由于有效地动员了地方和国外资源而有可能实施的。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大量地得利于某些作为"比较优势"而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使得经济能在恰当的时刻起飞。必须正确评价文化因素在东亚发展过程中的"契机"功能。

人类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探求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更是如此。正如中国一句古语所说，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无不决定于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按照大家

的描绘，事实上也可能包括有同样的三个成分，然而是独特的成分：世界体系的时机，地缘政治的补偿，以及文化因素。虽然这像是具有宿命论色彩，但若对东亚发展历史作个现实主义的总的观察，却可能迫使我们正好有这样的感觉。至于这三个成分相互关系的程度及其重要性的先后次序如何，则是有待于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们加以解决的一项严肃的任务。

（尹保云译自彼得·伯格编：《探索东亚发展模式》英文版，1988年。）

21 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

[美国]彼得·伯格

长久以来，我研究的重心始终是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问题。一个艺术收藏家很自然的会向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登山者也一定会向往喜马拉雅山。同样的理由，研究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会将注意力放在东亚。可以说，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理由让人对这个地方发生兴趣，譬如说它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它拥有丰富的文明和历史；它的自然之美以及人们的活力等等。我对这些都很欣赏，对其宗教和哲学的传统更有心想去了解。但对这些我都不认为自己是专家。因此，我今晚只能以我的专长，来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那就是东亚或特别是台湾，能不能作为一个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学习的发展模型？以及在这个模型里文化因素是不是很重要？

研究“现代化”的新焦点

不管是好是坏，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正值西方支配全球的时期。因此西方科学家想解释当今我们所谓“现代化”(一个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过程的集合体）的现象时，就很自然的以欧洲和北美作为他们探讨的范畴。二次大战后，欧洲帝国瓦解，导致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产生，这些社会里的社会学家也很自然地再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展，并把它依然当作是过去“西方案例”的扩张，西方的经验仍然是他们了解现代化的唯一“范式”。我指的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现代化理论。我们倒也不该过分指责他们是“种族中心主义”。毕竟，现代化的确曾是西方的产物，也的确是从西方扩张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但是，我的论点是，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再适宜了。

用一个自然科学的“比拟”，当一个化学家想了解某种化学反应时，就得进行“控制的实验”。社会科学家当然无法用社会去做实验，但是有时候，历史却也能够给他同样的“实验逻辑”。如果想探讨当代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大的实验室里，有三个试管正在冒着泡，每一个试管虽都有类似的“反应”(都可以说是“现代化”)，但里头却都有显著不同的元素。一个是高度发展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一个是在苏联和东欧的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主义。这两者的比较固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我要谈的主题。第三个就是战后在东亚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我个人以为，这个试管对了解现代化，绝对是

关键性的，它可以说是一个"控制的实验"。它不仅事关了解东亚的问题，同时，更牵涉到可以用亚洲的经验去了解其他地方（包括西方）所发生的一切。

我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个地域里成功的五个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即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包括逐渐展露头角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几个国家。这些地方惊人的经济表现，已经激起全世界各地人们的注目。虽然并不让每个人都那么喜欢（想想美国的汽车和钢铁工业！），这种经济成就也促使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里的人去讨论所谓"东亚的发展模式"。一年前，我与一批非洲学者讨论非洲的发展问题，当他们知道我刚从东亚回来的时候，他们马上要谈论的就是关于东亚的问题。这个月底，我将参加一个由美国政府新闻总署主办的有关加勒比海发展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加勒比海可以向亚洲学什么？"实用的问题我稍后会再谈到。让我先说说核心的理论性问题。

寻求文化与经济的关联

我认为，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比较，着实是很突出、独特的，或许我们说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例子"。我无法在此一一评述其特性，下面只说几个特征。经济特征不只是包括高成长率持续了好几年，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它也随着收入不均减轻而下降的情形。在这点上，台湾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子。经济学家称之为"反库兹涅茨效应"(anti-Kuznets effects)。因为库兹涅茨的理论是认为高成长率通常总是带来收入不均的提高，到了

后期才会趋于平缓。这些地方几乎全部人民在物质生活上都获得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同时，在这些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在模式发展过程上的高度主动的作用。东亚当然有资本主义，但却不是放任的资本主义（香港可能是例外）。其经济计划也都特别着重于出口的导向。最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低度发展"的福利国家（即便日本也不例外），并且有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储蓄率（这两者可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事实）。

然而，即便是死硬派的经济学家，也不至于以为这些经济特征是在真空里存在的。它们与若干独特的文化、社会特征息息相关。容我列举几项：如有非常强的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高度的集体团结感存在于家庭和家庭以外的一些群体中，对教育赋予相当高的声誉，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强的动机；有着严厉甚而可说是近乎残忍的考选规范和制度（虽然在设计上还是较公平的），完全建立在"成绩表现"主义之上，并且从早年就开始用这套考试办法去择定社会的精英分子。我想没有人会质疑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多少也是"东亚模式"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有时候就干脆称之为"人力资源"）。但值得质疑的是，这些社会文化特征与前述的经济特征之间，其因果关联的程度到底如何？在目前我们还无法真正知道答案是什么，因此设法去探索这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事。

对现代化的假设遇到考验

让我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控制的实验。各派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一直假定"个人主义"的兴起曾是"现代化反应"的

一部分。如果把范畴限在西方，这并没有什么大错误。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最早的孕育阶段。有理由说，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以滋长现代化的许多成分和元素，譬如说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产生。相反的，当现代性一旦产生后，它会逐渐侵蚀传统中比较集体取向的社区和制度，把个人完全交给他自己，因而助长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和社会心理的现象。不少古典社会学理论就是拿这种转变作为其关切的重心，如德国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法国涂尔干的机械性结团和有机性结团。换言之，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说明了其与个人主义的互惠关系；亦即西方文明孕育了适宜现代性特有的个人主义，现代化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个人主义，并且还相当成功的把个人主义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少现代化理论（如美国的帕森斯）就纷纷假定个人主义（帕氏称之为自我取向）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而且还是其整合的一部分。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东亚模式，却使得这种假设变得很模糊不清。没错，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也常成功地"销"到这个地区，这还常使得一些保守的亚洲人感到恼怒。不过，在东亚，即使是在最现代化的部门里，仍然可以目睹一种集体团结和纪律的价值，最近有关日本企业和工业管理的讨论已使这个特性显得尤其突出。东亚是否已经创造出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呢？如果是，那么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不可避免和内生的，而必须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再作诠释。如果有人能够有所结论，这就不只是对过去的再诠释而已，它更可以说明未来变迁的一些可能性。依循这种比较逻辑，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西

方工业资本主义中的一些经济、社会及文化特质，可以在拿来“解体”之后，再加以不同方式的“重组”(是好是坏，则见仁见智)。依现有的证据来看，我们还无法得出这种结论。有关东亚社会里年轻人朝向个人主义的证据仍然不足，也无法让人完全信服。东亚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控制实验”，在这里面，过去我们对现代性的假设将受到考验。

反思韦伯的文化根源观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纪初让韦伯最为关切的问题，此时又再度现出其意义。这个问题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文化的关系。韦伯的伟大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可作为探索这种关系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即便是那些完全不同意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具有宗教根源的看法的人，也不得不依此为反对立论的根据。韦伯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著作的结论是，亚洲的文化及宗教传统远远不合宜于现代化。我想有人在今天会很简单地说韦伯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韦伯能死后复生，站在台北市的办公大楼上看看窗外，一定也会说：“嗯，我是错了。”但是，光是去论断韦伯错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顶多是让一些韦伯的追随者失望罢了。更有意义的问题该是“为什么他会错？他忽视了什么？”更明确地说，亚洲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有其文化的根基，尤其是宗教和伦理的根源？假如是的话，它们又是什么呢？即使说韦伯的一些答案是不对的，但韦伯提出来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很重要。这也是萧新煌教授和我本人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讨论的研究计划为什么要命名为“亚洲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原因。我要强调

的是，我们并非要跟韦伯媲美和相提并论。

此外，我要坦白的说，目前我们对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许多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工作，才有可能提供一些经验上可支持的解答。但我仍然乐意提出一些探索的方向。

那些传统怎样影响现代？

几年来，所谓的"后儒家思想假说"相当流行。简单地说，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或称之为后儒家伦理，因为其中的一些道德价值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有差距）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探讨儒家教育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分布，固然对这个假说的概念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用了一个有趣的名词，叫作"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于传统中国"满大人"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目前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在从事中国企业家的研究时，就持这种看法。

我深深相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这个假说是会被肯定的。实在很难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譬如说对人世间的积极态度、讲究纪律和自求多福的生活方式，对权威、节俭的重视，以及对稳定家庭生活的强烈关切等等，竟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我也很怀疑儒家思想是唯一主要的文化和宗教因

素，其他的因素也该加以探讨。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在于东亚的佛教。可以这么说，当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到中国时，曾有很大的转变。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为"否定世界"的性格，一变而为"肯定世界"的性格。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人心灵的成就，此时的佛教在面对社会实体时，其本质与印度人的心灵赫然正是两种对立的极端。确切地说，"接受世界"的涵义在印度大乘佛教中是可以找到一些的，但一直将救赎置于今生今世的却只有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大乘佛教的国家。这点最强烈的表现在惯常所说的"涅槃"(Nirvana)和"生灭"(Samsara)是合而为一的，或者说是佛，即法身(Dharmakaya)，就是我们实际可知的"今世"。我认为对于其他的东亚文化传统也应再加探究，以检视人对自然、对世俗的工作及其生活目标等的态度，是否也受到这些传统的影响(有意或无意的)。在这点上，我指涉的是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教。但我无法在此加以分析。

究竟是调和还是错乱？

在追寻亚洲现代性的"精神"时，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民俗宗教。有关这方面，我有个小故事。我上次来台湾时(1982年)，曾和中研院民族所的李亦园教授谈论"新儒家的假说"。他对此一假说表示怀疑，他的看法是中国的民俗宗教至少也与儒家一样重要。这使我有点迷惑，也许是我对此完全不懂。但数周后我恍然大悟，正像我的老师阿尔弗雷德·舒茨所谓的"原来如此经验"(Aha Experience)。不过这时

我已在新加坡了。一个当地的人类学家陪我在城里游览。我们来到一座庙，并与一个年轻的“灵媒”(Medium)交谈。他的俗世职业是电工。“降灵”时是在他家里的房间内。他很高兴为我们解说一些事物。房间中央是一个多层的架子，上面摆了许多神像。架子顶端中央设的是观音神像。其他的神像则依序往下排列。这个灵媒谈及神像时的神态，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总会说：“那某某很差，所以将他‘降级’，从第三层下移到第四层。如果他再不好好表现，就要把它撵走。不过呢，这一尊神对地方上颇有帮助，所以就把它放在观音旁边。”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年轻灵媒谈论神祇的方式，那声调简直就像是公司老板对职员讲话一般。这个小神庙看起来是一种“玄妙”的组织系统。

这些暗示另一个极为不同的假设，让我暂时称它为“李氏假设”。这个“大传统”，包括儒家和大乘佛教，都深深地根植于人民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底层里（包括认知和情绪的层次）。果若如此，是否我们寻找的“今世观”，如积极和实用主义等的根源，就是在这些“底层”里，而不是在上述的“大传统”里。附带的说，这个思考方向也许可以应用到其他文明上。尤其是人类学家应能同意这个看法。“高文化”终究也只是社会里每个人所共有的潜在模式和基调的不同展现而已。

东亚经验能够移植吗？

其他国家，不论是第三世界或西方国家，能否学习东亚的经验？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无论如何总是可以从不同的社会学到一点东西。但问题是在呈现一个整合的发展策略时，东亚

真的能提供一个"模式"吗？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对经济成就中的文化因素赋予较大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可能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说台湾的经济成功是因为在台湾居住的是中华民族，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受中华文化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做了此项假设，就必须探讨中华文化模式在塑造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我们可称之为"文化论"。第二个假设是认为台湾的经济成功，文化因素只占少部分，最重要的还是特殊的经济政策及条件，与他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因素无关，这也许可称之为"制度论"。不用说，这两项假设对台湾经济模式的"可输出性"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如果"制度论"是对的，那么这个模式就可能输出。但如果"文化论"是对的，那这种输出的可能性就很值得怀疑。所以说，要阿拉伯或拉丁美洲果用台湾的财经和贸易政策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建议他们采用孔夫子的理论就没有道理了。

让我在此承认一点，我不仅无法确定哪个假设是对的，同时我自己也仍在两者之间徘徊。由于我自身的专业是社会科学(特别是倾向于韦伯的社会学)，所以我会比较偏向"文化论"。但是我的道德和政治态度却驱使我去同意"制度论"的假设。毕竟那还是比较乐观的一种。在为此问题困扰了这些年后，我心想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

政治社会变项意义如何？

深入探讨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只是使那些希望学习东亚经验的人感兴趣，例如，希望能把牙买加变成"另

一个台湾"的发展计划设计者，或是那些相信日本人保持了维持高生产力机密的一些美国经理级人员。对东亚本身也更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本地有识之士要考虑到未来的时候。没有人会对这些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加以怀疑.但是这些成就能持续到未来吗？如果可以，又能持续多久呢？

明显地，这将受到一些与前述两个假设无关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譬如说：这个区域仍然可以继续免于战乱吗？其他种类的问题，例如：国际经济体系会继续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吗？西方政府的贸易政策又将是如何？等等。而且还有另一层考虑：如果像文化论所强调的，文化因素的确非常重要，则这些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非常关心该如何去维持其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对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不会是大麻烦：他近来努力于把儒家伦理的课程引进新加坡的学校，就反映了这种关心。在这点上，同样会有相当重要的研究问题，例如：在这地区里教育制度的合宜性以及该如何进行使个人的态度适应的方式。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教育制度已有许多争辩：它的"唯才主义"(Meritocratic)规范会不会太严厉？考试制度是不是真能选出日本将来所需的精英——具有创新及独立的心智——或者它只是一再产生另一代尊重权威、努力工作、跟从团体的从众者？某些证据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更具个人主义性格，而比其长辈较少具备集体取向的性格(特别是日本，我不清楚台湾的资料)。但这是态度的大变动吗？或只是所有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个过渡现象呢？

虽是文化也该视为变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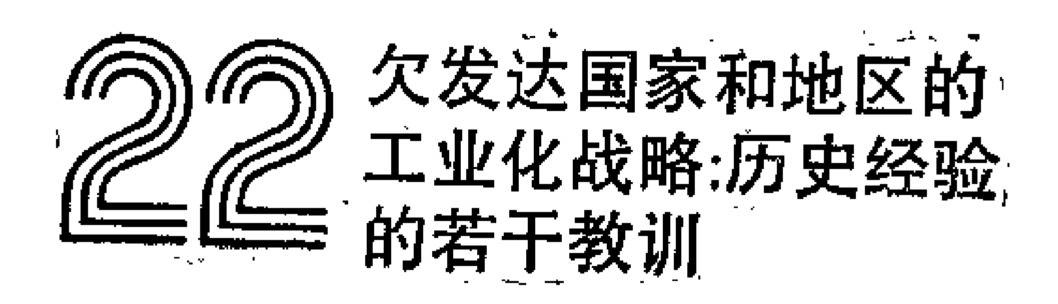
最后让我回到我对这些问题的预感上来。我刚刚提过，答案可能在这两个假设之间找到。经济学家常使用"比较利益"这个名词，认为如果一个地方只生产橘子，它可能在一段长时期内都会相当穷；不过如果（无论是什么时间、什么理由）世界突然需要大量的橘子，那么这个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有了一个比较利益存在。也许，文化的因素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在运作着。因此，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二次大战后东亚经济奇迹一旦发生时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保证这种"比较利益"就一定会持续到未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的特质也是会改变的（虽然某些人类学家并不乐意这么认为），文化特质通常会适应新情境而自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计划性的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经由教育政策）。因此，我的确认为把文化视为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是一种错误。

* * *

即使不是结语，在此我也须作一个结束了。我提出来的和注意到的问题远比我已经回答的还多，我想这也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吧！科学从未能给我们一个"确定"，所给的只是"可能"而已。这或许和一般人所期待的并不相同。

但是我也希望我前面所说的已足以澄清我的看法——东亚是当今世界上最富趣味的地方。在这里，非常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性实验正在进行着。其结果如何，对这里，对其他地方，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自己是满怀兴趣的观察者，不但心向往之，并且也多所赞叹。

（萧新煌译。原载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1984年12月。）



22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战略：历史经验的若干教训

[英国]休伯特·施米茨①

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历史，大多归入两个题目来考察：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和出口导向工业化（EOI）。一些最有影响的作者和政策顾问正在迅速地趋向于主张把这些经验看作发展经济学上已成定论的章节。定论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已经不起作用（或只在早期阶段起作用），而自由政策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则卓有成效，因此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应该走这条路。我们的论点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确导致了实质上的（固定不变的）无效率和许多外汇问题，但从动态的观点来看，那些分析无论出于概念的理由或出于经验的理由，都还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其次，我们认为，所谓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优势，不应那么着重地归因于采用了更"合理的"市场导向政策，还应归因于各种周期性和历史性因素的结合，以及归因于强有力的、有选择的国家干预。本文结尾时还将对80年代工业化战略作出若干反思。

一、摆脱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站得住脚还是为时尚早？

经济学上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保护政策的争论已有相当长久和突出的历史了。在早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著作中，进口替代工业化被看作为阻止盈余资金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由于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经济上的分工，来自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利益在分配上据说是不均匀的。迅速工业化至少在暂时的保护条件下被认为是一条出路。另有一类经济学上的争论较为集中于内部能动因素，比如通过实践和开阔眼界进行学习。② 这种思想在近期的分析工作中再次流行起来，它强调进口替代工业化必须包含有相当程度的本地资本商品生产，但这里有一些突出的历史先例，最著名的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他借此建立一条防线，以对付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看来，发展生产力意味着建立国内紧密相连的经济循环系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生的经济必须加以保护使其免遭世界经济的伤害；他认为一个坚强的民族国家有必要实行暂时的隔离，对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所持的政治上的论点，则归结于追求更大的自给自足和独立地位。

但是看来大多数初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特别在拉丁美

① 作者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② 在汉斯·辛格的早期评论中，关于工业化的两种论点都存在，即对外贸易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从工业化中显示出来的强盛的内部推动力。

洲，并不是得益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基本原理。经济著作中共同的论点是，早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不是自觉采取政策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加的。1914—1945年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最为经常地被人们引来解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出现。由于来自出口初级产品的收入下降，或者由于国家在战时不能提供工业产品，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中间时期的萧条使工业品继续进口有困难，甚至不可能。这种情况鼓励了强大的工业化浪潮的说法，好像确有道理，而且当然也与依附理论毫不矛盾；不过也有一些不是属于依附论传统上的分析和研究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不幸的是，这种论断记述不多，一般不会超过一两个段落。更加发人深思的是，经济史学家认为难以支持这种外力强加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观点；实际上，有些人对这种理论在实证上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我们的观点不是反对当中心国家处于危机时边缘国家的工业化便向前迈进的说法，而是要求承认，本世纪前半期的这种关系远不清楚。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国家工业战略的国际背景，又因为中心国家的经济状态目前正经受着本世纪第二次较大的经济危机（尽管与第一次不同），这是知识地图上留下的一个令人不快的空白。

5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进口替代，较多的是一些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关税、进口限额和多种汇率上限制制成品的进口，但是这些措施的用途并非总是针对工业化，而常常是应付国际收支困难的一种手段。凡经采取的措施及其结果，都曾受到详细的考察，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这几十年。数据表明，在工业化的程度上取得了巨

大的进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制造业的比重提高了，而在整个国内供给中，进口的比重大大降低了 但是很占优势的结论是一个清醒的结论，甚至在拉美经济委员会结构派的所在地也是如此，他们迄今为止一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主要的鼓吹者。批评意见是从许多国家和区域的研究工作中产生的，而这些研究工作的主要结果，则是由希施曼、布鲁顿、巴厄尔、萨克利夫、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登格斯和尼克森等人在其论著中概括起来的。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抨击来自李特尔、西托夫斯基和斯科特的比较研究，其要旨值得加以回顾。主要论点是保护政策太过分了，而且由于对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种种曲解，导致了毫无成效的资源分配。说得更为明确些，他们的批评针对着如下几点：

(1)政府干预引起的内在问题。过分的行政控制导致办事官僚化、腐败、朝令夕改和拖拉，这就挫伤了生产的个人积极性。

(2)对出口的偏见。进口限制的存在导致汇率高于自由贸易制度下可能流行的汇率，从而减少了来自出口的相对收入。

(3)对农业的偏见。对地方工业的保护提高了国内市场上与农产品有关的制成品的价格，同时过分提高的汇率又减少了农产品出口所换得的国内货币收入。

(4)装备能力利用不足。由于进口控制不能同等地适用于资本货物，又由于安装机器的贷款相对说来是便宜的，所以工厂装备过量。此外，产品市场的保护政策使得能量利用率即使很低也有可能获取优厚利润。

(5)劳动力利用不足。由于汇率过高，对资本货物进口

限制较松，以及财务上种种津贴条件三者综合的结果，所以能够相对便宜地获得资本货物，由此造成一种不利于劳动就业的偏向。

(6)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口强度。尽管消费品的进口大大减少，可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进口的加强是以增加设备和原料的进口为代价的，其结果——出乎意外——更加严重地依赖于国外供给，重新开始了外汇危机。

(7)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减速。尽管工业最初能够比国内对制造品的需求增长得更快，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很快就丧失进口替代的可能性。而后增长率只能靠国内需求或出口的增长来维持了；可是到那时候，工业的结构和无效率就会妨碍占领出口市场的活动。

从上述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政府干预应予减弱，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应予鼓励，关税和限额应大大降低，以及汇率应该下降。凡是国内工业遭受不利的地方（即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的地方)，应当给予津贴，而不是保护对外竞争。这样的政策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符合比较利益，并为外向政策铺平道路。简单地说，这就是关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尽管大多数观察家可以同意下述研究中大部分经验主义性的结论，却并不一定要求赞成这些政策主张。的确，那些可以自由地结合于依附论学派的分析家们，争论的不是减少国家干预，而是增加更属根本性的国家的干预。

政策上的不同立足点源于一种分析，即将国家看成是内生性的，并把扭曲而无效率的生产结构视为殖民化的后遗症和新殖民时期出现的社会阶级构成与经济控制机制的后果。出自各种依附论著作的主要观点是：

（1）进口替代工业化接受了需求模式和基本的收入分配方式（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作为规定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认为有必要彻底改变消费模式和分配类型。

（2）进口替代工业化鼓励外国的经济渗透，特别是在关税壁垒背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建立，由此导致了许多本地生产者被淘汰，形成了垄断性的工业结构。

（3）进口替代工业化意味着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却不适合于本地条件，因而导致了跨国公司内部调拨定价、专利权使用偿付等等形式的严重资本外流。

（4）进口替代工业化造成了本地资产阶级在同国际资本结盟（或从属）的情况下受保护的资金积累。

（5）进口替代工业化总的后果是经济和社会超国界的整合和国内的离散。

因此，解决办法不能靠更多地依赖市场势力，而要靠更彻底地改进国家或地区工业政策，包括进一步控制外国企业、加强对进口技术的检查，改革税收和奖励制度，以及收入的再分配。换句话说，这是一些可能需要更多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政策，目的在于另一类的内向战略。

尽管从这些批评产生的政策结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这些分析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正如尼克森所说，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大部分经验主义结论可以结合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依附论观点。尽管有这些差异，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在整个意识形态和分析工作范围内，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大为失望。

从经济角度来看，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归结为工业的低效率，并反映在产品的高成本上。由于效率是一个相

对的概念，因此任何活动的成绩必须根据某种可替换的事物来加以确定。最明白的对照点是所谈及的进口产品的成本。在这种意义上说，表明国内价格可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名义上的保护比率，可以是衡量本地厂家无效率的一个基本尺度。较有意义的指标是有效保护率，尽管计算较难，它表明保护政策下增值的比率高于非保护政策下的增值。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了保护的程度大大高于当今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程度。由于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保护政策的大部分实际上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者所利用的（就是说，不全是多余的），所以表一以有效保护率为尺度，提供了无效率量值的概貌。①

表一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平均有效保护率(ERP)

国家或地区	年　份	ERP
阿根廷	1958	162*
	1977	38
巴　西	1966	118*
	1967	66
	1980/81	46
智　利	1961	100
	1967	217

① 利用有效保护率当作效率指标，在概念上和经验上不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指标的理由仅仅是实用主义的，第一，保护率在许多国家都可行，而且可作合理的比较；第二，目的仅仅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增值与世界市场的增值相背离的范围大小提供给出一些序列。但是，应当指出，产生有效保护概念的那些人的最初目的，是表明关于资源分配在价格体系信号上的偏向，而不是制定一个衡量无效率的尺度。

哥伦比亚	1969	28
	1979	44
哥斯达黎加	1968	2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1	124
埃　及	1956	55
	1966/67	42
萨尔瓦多	1968	44
加　纳	1968/70	143
危地马拉	1968	31
洪都拉斯	1968	59
印　度	1961	313*
	1968/69	125
印度尼西亚	1971	101
伊　朗	1967	75
以色列	1958	46
	1968	71
象牙海岸	1970/72	72
牙买加	1978	50
肯尼亚	1967	92
南朝鲜	1968	－1
马来西亚	1963	－8
	1970	38
墨西哥	1960	37*
	1970	49
尼加拉瓜	1968	53
尼日利亚	1968	99

续表二

巴基斯坦	1963	271*
	9170/71	181
新加坡	1967	6
菲律宾	1965	63
	1974	59
南　非	1963/64	17
斯里兰卡	1970	118
苏　丹	1971	179
台　湾	1966	44
坦桑尼亚	1966	116
泰　国	1969	16
乌拉圭	1968	384
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年平均	1966—72	72

资料来源：（1）大多数数据来自D·纳夫里利欣和I·阿利哈尼：《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保护水平和政策——注解文献和数据库摘要》，世界银行经济分析部国际贸易科，1982年油印本。

（2）加星号的数据摘自I·利特尔、T·西托夫斯基和M·斯科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1970年。

表一所显示的这种证据现在广泛应用，而且确属重要。不过，这类指标至多只能提供一幅关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上静态的无效率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从动态的观点来研究这种工业成绩的工作做得多么少。大多数报道使我们想起在实干中学习经验和外国经济对于工业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估价中，这些考虑却又消失殆尽，这在某个学科中是

不足为奇的，因而这学科由于定量困难，常常导致忽视全部问题。说到底，在解决动态变化上我们的概念工具是薄弱的，更不用说为了衡量的目的而运用概念的问题了。克吕格尔提出的关于动态因素是否应当预期在部门一级或国家一级显现出来的疑问，成了对于概念性问题的一项提示。

"按照认定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用以引发初生工业的战略的看法，重要的是指出，初生工业理论本身，在说明动态因素的来源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如果这样的动力因素对于特定的工业（如吹制玻璃器皿业或电子工业）来说是特别有用的，那么在某一时期内应当接受初生工业保护的工业，其数量应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因素和动态成本下降是与整个工业部门形成规模大小密切相关，那么在各种工业活动中，推动生产的各种诱导因素大体上应当是一致的，因为不管迅速增长的是什么工业，同样的动态效益都会增长。"

李斯特的生产力论既包含有初生工业论点，又包含有初期经济论点。① 最近论及动态因素的研究文章主要是有关某种特殊工业乃至某种特殊公司的。厄贝尔已经对现存的经验性证据作了评论。结论是，有关初期企业和初期工业的专门知识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工业成熟的道路，不论是在初生时期上还是在成本大小上，都没有出现过共同的特征。不过，论据侧

① 森哈斯强调李斯特的著作同现今发展问题的相关性，他用后一种方法对李斯特的观点作了解释，并且对于暂时而完全地（也不是选择性地）脱离世界经济进行了论证；这个过程中所花费的代价为众所公认，但被视为构筑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而不可避免的。相反，韦斯特法尔则认为，那仅仅是在选择基础上为初生工业保护政策举出的一个经验性实例。

遍说明，相对延长成熟期和初生期相应的高耗费，是较为普遍的。当公司或工业在其不同的条件下建立起来之后，似乎会出现某种模式。较为成功的研究者往往来自拥有较长的工业化经历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历至少可以回溯到本世纪20年代(比如阿根廷、巴西或印度)。低进步率的证据，很多都取自本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工业化的那些经济体系(比如孟加拉国、泰国或坦桑尼亚)。但是，厄贝尔警告说，不要对三十年的工业发展作太多的区分，因为实例研究的数量很少，又因为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实例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代表不同经济类型的经验。

在宏观上评价动态成效(dynamic efficiency)更有疑难，但却同样重要。它所要求的，不仅是研究过程中的进展，而且还不时要求外部因素和各种联系的发展。这一来，从微观经济上看来一组成效很小的活动(从单个考虑)，通过发展联系和外部因素，可能产生宏观经济上的有效结果；相反，微观经济上的有效活动可能产生宏观经济上的相对无效率。动态效率的概念还提示，工业化的进行开辟了生产活动的新领域，从而本地的劳动力可以按照生产效率水平受到雇佣，而这种生产效率，由于已经存在或出现各种联系和外部因素，相对来说是高的。例如，能米茨把小规模制造业中逐步增长的潜力与一项本地的工业技术基础设施相联系，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有机器制造厂、备件和旧设备供应以及能够修理或复制零件的小型工程公司。对这种有关外部因素的论点提供的证据，仅仅是提示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当然，一般来说，外部因素的证据是关系轻微的和非系统化的。正如库珀和霍夫曼所作的结论："经验性知识的缺乏使我们很难说国家应该怎样

和在何处进行干预。现在这些外部因素的争论是工业技术保护主义问题的一部分，但是，要说出保护的范围，采取何种形式，以及针对哪些特定类型的技术，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动态效率的问题使我们迅速注意到技术保护或技术能力的进口替代问题。这问题几乎已经成了最近十五年来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厄贝尔对于考察培植本地技术能力的进展情况（或缺乏进展情况）的不同方法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再评价。技术能力的一个部分是本地的资本货物部门。这一部门的扩展工作业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部门增长率比整个工业增长率更快。取得进口替代的程度一直有巨大的差异。在顶端的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按向下顺序），它们的国内供应的比率已达75%到90%以上，类似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比率；但是在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不到三分之一的资本货物属于国内来源。①

就消费品来说，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可以通过限制最终产品的进口来实现，但是，如果仅仅是仿制以前进口的（往往是不适用的）机器和设备，那么资本货物国内供应率的提高将是本地技术能力的一种有限的（虽然不是无意义的）表征，不过仿造进口的设计历来占有优势。对个别公司来说，从国外引进经过多次试用的设计，比投资培育本地的设计能力总是

---

① 在新近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根据资本货物生产所取得的发展水平，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组。最发达的一组包括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巴西、印度、南朝鲜、墨西哥、新加坡和南斯拉夫），它们的资本货物部门不仅生产广泛的标准设备，而且开始制造技术性复杂的设备。中间的一组包括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标准资本设备的生产正在进行。第三组包括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的资本货物领域还处于胚胎状态。发展的不平衡突出地见于这样的事实，即第一组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整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部资本货物产量中占了85%以上。

较为容易和较为便宜的。因此人们广泛地注意到发展针对进口技术的政策，它体现在机器上、图纸上(如设计图纸)，还有人员(如工程师)等方面。人们有广泛的一致看法，凡是技术引进不加限制的地方，本地的研究、设计和方案执行的能力就发展得较为缓慢。人们又一致认为，由于有关国家必然会重新从事各种发明，所以杜绝一切技术进口是荒唐可笑的。非常有价值的本地技术活动，其方式是学习进口的技术、移植它并加以改造。需要严肃论证的是，保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以及需要何种辅助政策。

在这种条件下，一般认为从日本有选择的技术进口（往往目的在于回头制造)，结合大量的和战略应用的本地研究与发展的成功政策，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不过，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行政策取得的教训较难说清；作为例子，可以将印度与巴西比较一下。印度长期实行保护本地技术成就的政策，而巴西则较多依赖跨国公司带进来的技术，或依赖于不断签发特许证。印度大概已经获得了较多的进口替代的技术诀窍(know-how)和原理（know-why)，但是它的整个工业成绩还赶不上巴西。

最重要的是，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工作正迅速发展。在本质上，关于本土技术能力的新近出版和正待出版的著作，只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过时的认识，即认为在设计和评价工业化战略时，对动态因素必须给予较多的考虑，特别是对内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完全可以想见，这最终将导致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较为合格的评价，而这种工业化迄今一直往往被称为是失败的。下文我们还要讨论在什么范围内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推进出口战略的显著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出口导向工业化(EOI)的成功：是“正确”政策的成果吗？

当判定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的结论得势时，另一种显示一切成功迹象的工业化出现了。在本世纪60年代转而强调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最为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它们很快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同时它们的成绩记录成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业化争论的主题。

文献中并不一律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个名称应用于同样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名单包含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巴西和略少提到的墨西哥；① 这是本节一般探讨的几个国家和地区。1975年，它们共计占有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制成品出口的62%。前五个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65—1978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达到8%—11%；② 其制成品出口的年增长在20%—40%之间。③ 这种发展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在这个期间，制造业的就业率每年提高了4%—8%，④ 导致了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地方（和某些年份）形成劳动力短缺和实际工资提高。

---

① 某些研究也包括了印度和南欧一些国家，最广泛的论述也包括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② 根据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项目表》，第2版，1980年。

③ 计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手册，1981年附录；技术数据统计，日内瓦，1982年；又据利特尔、西托夫斯基和斯科特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7章附录；及帕克：“出口导向工业化，南朝鲜经验1960—1978”，见E·李编《出口导向工业化和发展》，日内瓦，1981年。

④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劳动统计年鉴》，1973年和1982年。

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绩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都是激动人心的。①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成功。主要的解释(来自主流经济学)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政策，即自由化进口，采用“现实的”汇率以及鼓励出口；最重要的是它们设法使要素价格保持适当，以便它们的经济能顺应比较优势而发展；信赖市场力量和整合于世界经济产生了优于保护政策和优于隔绝世界经济的成果。例如，泰勒把巴西的繁荣归因于“在价格体系上实行合理化或自由化经济政策的一般倾向”。韦斯特法尔断言：“南朝鲜为遵照比较优势行事并获得传统经济学所预言的利益的一种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差不多属于典型性的例子。”利特尔在评价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竞争可能性时断言：“主要的经验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政策做到了为出口商提供了近乎自由贸易的条件，这些政策是发展特别快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所作的这种解释已经受到了攻击。比内腓尔德强烈地反对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标定为“新古典主义寓言的体现”，并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现是对一系列国际情况的反响，即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了通往发达国家市场的相对有利的途径，急剧地增添了接触国际金融的渠道，以及跨国公司日益增多地重新布置自己的生产于边缘地区。他认为这些因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但并没有决

① 哈夫里利欣和阿利哈尼指出，1970至1979年间，有十二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出口上能够取得类似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那样的增长率，但是没有取得同样高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定哪些国家和地区将赢得这些机会。其观点是，这部分地取决于位置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部分地取决于一个坚强的（压制性的）、具有国际信誉的政权的存在；也部分地取决于早期进口替代政策所产生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存在。最后，政府对工业发展的控制在促进动态增长方面，据认为是范围广泛和具有决定意义的。

本文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加强了论证，在另一些方面则作了限制。让我们逐个加以分析。在何种程度上出口的扩大可以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地区分布决策呢？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工厂（仅仅与资本相反）从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转移加速了，因为在发达国家获利的可能性降低了；发达国家间加强了竞争（特别是日本作为主要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欧洲和北美提高了工资；以及在生产基地对劳动力增加了保持控制的困难。由于运输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任务的日益分散，实际上的再布局工作就变简单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许多简单的任务，因此只受过很少训练的工人能够达到高度的生产率。同时有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驯顺而廉价的劳动力，又以免税或补贴基础设施的方式给予慷慨的鼓励，最后是设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区，在这种情况下，对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来说，重新分布生产地点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潮流。

这并不能说是外国资本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市场缺乏兴趣。争论在于国外市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增加出口量，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外国子公司或同外国制造商或贸易商订立转包合同的本地生产厂家实现的。关于国际转包合同

的范围，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性的资料，只可得到外国股份制企业某些说明出口比例的记录。纳亚尔从各种资料中收集信息，结果表明，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货物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是：香港，10%（1972年）；南朝鲜，15%以上（1971年）；台湾，20%以上（1971年）；新加坡，接近70%（1970年）；巴西，43%（1969年）；墨西哥，25—30%（1970年）。后来拉尔所作类似的统计表明了跨国公司更为重要的作用：南朝鲜，31%（1974年）；新加坡，84%（1975年）；巴西，51%（1973年）；墨西哥，34%（197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在机器、电器和电子设备方面的出口往往是最高的（一般来说，超过60%），而在传统的出口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方面是低的，但是正好在后一类出口商品方面，大家知道本地的生产厂家获得国际转包合同是较为普遍的。

因此，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资本控制的世界市场生产地点，其等次和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部门之间是各不相同的，不过显然形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扩展出口格局的一部分。① 出口的制成品被允许进入欧洲和北美的市场，而没有遭受重大阻碍，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还处于战后的繁荣之中（这种繁荣很快就会结束）。它们大部分采用了特别的“增值关税”，这对低工资国家和地区来说，可以使农业减少一部分生产程序。它们的确切规定国与国彼此不同，但

① 在这种情况下，还值得谈及爱尔兰共和国作为晚近在外向政策下进行工业化的研究实例的经验。奥马利指出，明显成功的工业增长大部分是由于爱尔兰从全世界有限数量流动性的出口导向外国工业投资中成功地吸引了相当不均衡的份额，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或设置在国内的工业，大部分仍然限制于狭小的活动范围，这些活动对移民所设入境限制是较低的；事实上，这些本地工业显示出相对衰落的迹象。

是如果原料来源于输入国，它们都准许制成品免除部分关税进入全国市场。就美国来说，按这类关税规定(项目807.00和806.30)，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货物，在1966年到1979年期间，每年增多29.5%。最大份额来自墨西哥，其次是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7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它们在这种关税规定下的出口，增长得比其向美国的全部制成品出口还要快。最后，那时有利于出口促进政策的市场条件，标示得最明显的也许是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展；国际贸易的增长率在1967年至 1973 年期间高达每年18%。① 这的确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获得最大成功的时期。

由于容易取得资金融通，国际环境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就更为有利，跨国金融市场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蒸蒸日上，它们专门从事发行国国境外的货币借贷，一般谓之"欧洲美元"市场。② 在60年代，货币供应主要受到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刺激（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巨额军费和有关国外开支所引起的），到 70 年代则受石油输出国外贸顺差的影响：私人跨国银行成了反复周转这种"石油美元"的主要渠道。在1966年到1978年之间，来自这些银行的信用贷款扩大得极为迅速(超过50倍)，到70年代末，一半以上的贷款贷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借主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中墨西哥、巴西、南朝鲜和菲律宾在1980年占了对跨国银行整个累积债务50%以上。

---

① 也许值得说明一下，这些增长率是以名义价格为基础的；真正的提高量较此为低，但仍然是历史上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上升比率。

② "欧洲美元"这个名称不十分准确。市场并不限于欧洲，交易也不仅仅以美元支付。比如"跨国货币市场"这个名称可能更精确。

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使那些得到巨额信贷的国家和地区得以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经济政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保持远过于不获此类贷款时所能达到的进口水平。德尔和劳伦斯曾经指出，那些保持进口量的国家和地区也保持了投资和产量两方面的高增长率。巴西提供了一个通过"负债增长"(debt-led growth)战略能够保持高增长率的经济范例。

在70年代，一些最穷的国家不能仿效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榜样并通过国外私人资本流通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因此它们的进口能力下降了。据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所示，70年代最穷国家的人均增长，同其60年代的成就相比(或同7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就相比)，下降得很多；最令人不安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穷国家的演变情况，在那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事实上每年下降 0.4%。尽管有许多因素导致这种衰退，但对其进口能力所加的各种压制起着主要作用，而较大的国外资金融通则是可以帮助取得较好成就的，尤其在工业方面。

有利的国外条件只能部分地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在国内因素中，分析起来政府所起的实际作用是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看来除了香港以及可能还有新加坡之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似乎并不是像它们所显示的那种自由性质的市场导向经济。以南朝鲜为例，进口限制是有选择地减少，并逐渐地显示出政府认识到自由化必须反映出发展中的本地生产厂家的竞争力量。对国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过去是(现在继续是)广泛的；工业政策使人深切地联想到日本在长期目标的基础上不顾现行价格所显示的短期效率所制订

的主要决策。一般而言，在资源分配上，政府起到了积极的和中心的作用。的确，

> 政府凭着对投资加以严密而谨慎的控制和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出口决策，可以有能力建立一系列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新古典主义注意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它掩盖了控制资本市场作为政府指导经济活动手段的重要性(韦德：《南朝鲜的灌溉和农业政策》，1982年，第146—147页)。

达塔-乔都里认为，政府以上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可投资资源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配权。吕德-纽拉特在一篇论文中进一步表明了贸易战线上所发生的情况，强调南朝鲜出口导向发展的成功，既没有实行引人注目的全面的进口自由化，也不是与此相伴而行；并认为市场力量并没有被赋予自由分配资源的权力。相反，南朝鲜有一种双管齐下的进口政策：为出口制造品而输入的自由政策和对国内市场的高度限制政策。此外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即以满意的出口成绩为条件，通过进入(受保护的，因而是有利的)国内市场来"联结"国内和出口市场。大体上说，结论是"南朝鲜的进口体制在近二十年中一直是高水平'管理'的"。

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政府起到了一种积极的、有选择的干涉主义的作用，但这个问题探索得较少。在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家，政府的干预也许不完全像南朝鲜那样具有战略性，但是仍然很广泛。因此我们很难同意巴拉萨的结论："这

些采用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提供了奖励制度上的主动性和稳定性，尽可能减少价格的不合理变化，并依靠市场机制以求得高效率的资源分配和迅速的经济增长。”伊万斯和阿里扎德的论文明确地阐释了不同于政府控制的市场决定因素价格的问题，他们特别批评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新古典主义的工资决定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了排除不利于市场决定工资的政府干预，同时又脱离由资本和政府实行的对劳动力的政治控制。总之，他们断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于由开明的市场导向经济政策所指导的那只无形的手的依赖，比对新古典主义解释中所描绘的依赖少得多。

让我们继续分析有助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成绩的内部因素。巴西实例的分析可以显示重要的内部循环特征。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量急遽增长之前的一些年份，巴西的工业能力严重地利用不足。“在制造业领域闲置生产能力的存在，并不是生产增长出现的原因，而是使繁荣得以出现的唯一最为重要的条件”（马兰和博内利），直至70年代早期，生产量较之资本贮存最能以更快的比率增长，只有到这时候，制造业投资才得以明显加快，以适应压在生产能力上的连续不断的内部和外部需求。对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评价中，很少考虑到内部经济循环，所以难以判断自由化实施与周期中的情况好转同时存在是否是普遍现象。但是，如果闲置能力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条件下正像一般所论证的那样是个重复出现的特征，那么这种能力的利用必然帮助了当时那些试图在出口旗帜下加速增长的经济制度。

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进口替代工业化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成为成功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前提

条件，以及因此这两种选择放在同等地位上到底有多大道理。就出口增长是由于外向加工所取得的这一点而论，在此以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可能并不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各种生产设备曾经在全球重新配置，根据这个便利条件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但是，按照上述观察，出口的扩大只有一部分采取了这种形式，随之而来的考虑是关于更加"本地化"的制造品的出口。

问题是，要提出证据，用以证明根据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培育出外部因素和技术知识，而没有这个保护便无法得到这样的成果，此事本来是难办到的。但是，一部分成功的出口者是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它们的进口替代政策是相对成功的，即它们所建立的工业结构不仅限于生产本地消费品，这种情况可能并非出于偶然。最有名的实例是巴西。巴西也有相当数量毫无成效的生产厂家，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条件下所获得的纵向整合的程度却正如巴厄尔所断言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互为主顾的各种工业的同时增长中所显现出来的景象，是一种显著的均衡增长……许多互相补充的工业同时发展，并起到自我强化因素的作用。"

就南朝鲜来说，先于出口扩大阶段的富有意义深远的工业化，其重要性也已得到了强调。根据达塔-乔都里所说，"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有适当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支持的制造工业结构，是从日本人手里继承下来的。"尽管朝鲜战争导致了相当大的破坏，但它没有破坏积累所得的工业经验、技术知识以及在20年代至40年代发展起来的企业精神。这种论点修改一下也可适用于台湾和香港。尽管台湾没有与南朝鲜同等程度的早期工业化，但那里有相当大量拥有技术和企业才

干的人员从中国大陆流入。新加坡是个例外，但它大量依靠外国资本，从而使它的情况同上面所述具有一致性。

这些有关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明确说明了为出口制成品取得成功而积累工业经验的重要性，但还不足以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例作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一个前提条件。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到出口繁荣开始的时候）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像拉丁美洲实行同类政策的国家那样"深入"。后者已经深入进展到生产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而前者则在扩大出口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显然，我们的问题不是容易回答的。由于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推行综合战略，在某些部门鼓励出口，而在另一些部门推广进口替代，遂使问题更为复杂：举例来说，南朝鲜和巴西在70年代都是通过保护措施建立其资本货物工业而取得了显著进展的。这引起了对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作为实际可行的选择方案有多大意义的疑问。当然有人一定很想知道，利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宣称"鼓励出口胜过进口替代"有多大的意义或合理性。

总之，我们的意图不是争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成绩，尽管值得记住关于这些成功历史的许多记述往往使人忘记某些这种增长（特别是来自出口加工业的增长）培育生出了一种工业，这种工业本身的存在是不稳定的，同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没有多少联系，而且导致知识技能的传输也很微小。而我们所考虑的主要是解释这些显著增长的经验。毫无疑问，部分进口限制的取消、外汇汇率的调整以及各种出口鼓励的规定，促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功。但是，某

一领域的自由化不能作为对市场力量依赖的增强标志。此外，由于具有大循环性质的国内的和特别是国际的有利发展，政策变化导致了迅速而惊人的结果。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在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间各不相同，但是可以指望本文能够帮助调整关于这种动态增长的解释上的平衡。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变成样板经济，它们"合理的"经济政策是人们劝告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仿效的。

三、80年代的工业化战略

上文我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成功不能主要地归因于出口导向政策的变化。在对过去时期的分析中，我们对周期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的强调，其本身就是怀疑把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推广至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有人接受了占上风的新古典主义观点，我们仍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要保持住出口扩大的成功有严重的障碍，其他国家和地区想尽力赶上它们则更有困难。第一个问题在于结构上的谬误，在少数国家中起作用的东西，若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就不起作用了。克莱因在一项细致的模拟实验中，分析了在所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广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其后果将是维持不住向工业国的市场渗透。"

另一些障碍在于80年代世界经济种种已起变化的情况。卡普林斯基的文章分析了这些障碍怎样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增长的前景：第一，发达国家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十分

强烈地排斥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成品。第二，以微电子为基础的各种新技术日益破坏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者的比较优势。第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债台高筑，作为外来资金供给来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可能导致削减工业生产能力(de-industrialisation)，这样就威胁到任何工业战略长远的生存活力。主要的论点是，普遍遵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是不适宜的。这一观点在辛格对工业化国际环境的分析中引起共鸣。他指出“以邻为壑的竞争性通货紧缩”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主要障碍。由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企图通过紧缩经济来获取国际收支平衡，它们就相互推进赤字，而最终结果是紧缩通货恶性循环，这样便降低了进口能力和减少了国际贸易。

由于这些原因，欠发达国家不大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外部的工业增长动力。这意味着需要更加强调内向战略，尽管这对所有国家并不是同样地有强制性或同样地行得通。首先，我们必须区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潜力也受到不断变化的国际势力的影响，但它们有较大的能力通过转移市场目标或部门重点以事应付。其次，经济规模也起作用；小型经济比大型经济更应该从事贸易和工业发展的专门化。撇开规模不谈，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确实需要保持或提高其外汇收入，以便为必要的进口调度资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业政策必须服从于渗透国际市场以销售制造品的驱使。当然，强调敌对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反对争取出口，而是要求承认付出的代价日益增高，而追求更内向的战略可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 在未来的十年中，南美的一些国家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其内部动力，依赖内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依赖世界市场力量，以导致经济扩张。它们将需要更大的进口替代，更多的内部技术发展，以及他们之间更多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辛格："第三世界的工业化，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业战略和政策"，1983年，第25页）。

当然，这种战略过去一直在试行。我们在上文业已概括了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厄贝尔着重分析了即使在相对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本地技术发展一直受到限制的原因；瓦伊特索斯也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工业和技术合作或整合上所做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今后要作得更好的问题，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或经济上的。例如，拿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下的技术选择问题来说。有许多事例表明，可以有若干可供选择的工业投资类型（即所谓合适的技术正在经常遭到排斥，不是因为它们不可实行，而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主导利益，而这利益是要求通过同外国公司的联系以取得积累的）。因此，要求更大的内部导向和自力更生一定不要使我们迷失方向，看不清在实践中运作不当的种种危险；这种内部导向和自力更生并不是积极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而是以"民族发展"为代价来建立它们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谋求狭隘利益的一种烟幕。

重新探讨内向工业化的实例和使这些政策切实可行的政治条件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产生选择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怀特的贡献十分重要，他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强有力的政府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增长，而且着重分析了在工业增长和经济高精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强有力的政府要求有目标地实现工业化，常常成为"经济非理性和政治集权主义的堡垒"。

不幸的是，每一种变革都从人们现在所在位置开始，而各种选择则受到过去传统的重大束缚。确实，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规定出普遍适用的战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制定工业化战略时不得不论及的那些问题，从情理上说来是清楚的：这种战略会培育出配套的工业，有希望凭其同国际经济的联系长期保持活力吗？它会加速技术和资本的国内积累吗？以及它会同压制并不太强的政治结构彼此相容吗？

（唐显凯译自《发展研究杂志》英文版，第21卷第1期，1984年版。冯　棠校）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影响的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

[德国]乌尔里希·门泽尔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一概念的提出而加强了关于发展理论的研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词，根据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工业增长的速度、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或者根据社会发展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识字水平、收入分配、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等等，应用于接近工业社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迄今为止，这一术语仍无一致公认的定义。这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各自提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以及由此所确定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所以分别打上研究者所采用的特殊方法的印记。不过，每张清单上至少都有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四个国家和地区。即使所提解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不谋而合，即所列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二十年里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工业化。虽然人们讨论时对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东北三省注意较少，但这两个国家和地区肯定达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部分标准。即使承认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处条件特殊，例如无农业问题和占有国际金融中心和服务业中心的重要地位，一项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是，东亚显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集中地区。除了首先要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现象的一般问题外，还要解释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一现象以如此集中的形式出现于东亚。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论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制度迥然有异，发展战略也各不相同。一方面，南朝鲜和台湾可视为紧密整合于世界市场并给私人企业以广阔天地从而实现工业化的范例。另一方面，就北朝鲜和过去称为满洲的地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和世界市场严重隔绝，面代之以国内资源和技能的使用（"自力更生"）以及由国家实施的经济计划。因此南北朝鲜自然地被视为在各自的背景下赶上工业化上的"典型例子"。

若把该地区其他国家囊括进去加以比较，那么这个特殊问题可以表述得更为清楚。这里有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老挝）和资本主义国家（东南亚联盟国家）；有密切结合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印尼）和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国家（缅甸）。上述国家不管哪一种类型，都看不出有类似的工业化过程。所以，不管实施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采取与世界市场联系或脱钩的战略，其本身都不能为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提供恰如其分的解释。不过，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在过去，它们都是殖民地；在目前，它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出口专业化和跨国公司的渗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除外）。批判的发展理论的支持者们一般都把上面两个现象视为

阻碍发展和越来越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的考察，可以提出如下理论问题：

（1）如何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一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从下列三种观点中择取其一。新古典派作者的解释是：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导向于世界市场；其次，依托于一项适当的经济政策，充分利用相对的国际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鉴于自身缺乏自然资源，缺少资本，国内市场狭小，但有大量相对有技术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所以认为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供应出口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乃是显而易见的、唯一可能成功的战略。本地区没有而又必需的生产要素是进口的。这样，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基本上可以归因于用密集劳动加工进口原料和半制成品与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单位劳动工资低而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两者的结合。依此论证，这里就明显地有一个同过去的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性决裂了。

与此相反，依附论者——或外国资本主义理论派的学者则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认为上述战略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任何真实意义上的迎头赶上的观点。依此说法，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的工业化，只不过是国际分工转移的表现。现在看来，这种分工不再仅仅是用原料交换制成品，而且也是制成品之间的交换，这些制成品在生产中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工资支出增长和环境限制，结果使劳动密集的、特别是污染严重的精加工工序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其唯一目的则是将这些产品重新出口返销到这些工业国家。此项加工的代理者主要是跨国公

司，它们在利用不同地区的国际优势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然而，由于这种制造过程是不完整的，且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经济特区（工业区或自由生产区），所以唯一的结果是工业飞地的出现，这种飞地就像昔日的种植园和矿山一样，不能整合于国内经济体系。结果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工业化；一旦国际气候变化，或精加工转移到其他国家，这里的工业化就会萎缩下去。这便导致边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像工业国家那样有内在关联和自我持续增长力的经济。依此说法，昔日殖民地区的正式依附关系只是简单地代之以非正式的依附关系，构成于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种种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并构成于类似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所以，这解释的根据是一种对过去的殖民地时代有历史延续性的信念。

对比之下，第三种观点则倾向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否认宗主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与著名的列宁主义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耗尽它的潜在能量。相反，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被认为是第三世界早期资本化的明显表现。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统治印度的积极方面，因为他认为，这统治可摧毁亚洲专制主义的基础。依此推理，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最后还有跨国公司，都被认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为它导致资本主义植入第三世界。所以，这种观点也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但和前面所述的观点不同，它欢迎这种延续性。

（2）关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论争导出第二个也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证

明一个按照罗斯托和勒纳①所说的连续现代化的过程，如今扩展到了过去的殖民地区域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从根本上怀疑欠发达国家有可能迎头赶上的依附论者所提出的论点被驳倒了呢？现代化理论家和增长阶段论者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还在继续遭受经济停滞或越来越重的贫困化，而没有按照发展西方民主的意义出现政治现代化的迹象呢？另一方面，依附论的支持者也面临着认识论上的问题：一种自称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在它被视为不可信之前，到底能容纳多少例外呢？沃勒斯坦用"半外围"②这个术语对原先的范例所作的延伸（他将其看作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关键部分），确实必须看作是挽救旧理论同时又吸收最新研讨成果的一项尝试。

这里所提到的一切解释工作和全球性理论必须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象特别集中于东亚？说到底，在整个第三世界可以看到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资本输入以及跨国公司的影响，而在其他任何地区，却不见这些因素导致类似的增长率和有效的工业化。

（3）这就把我们引导到下面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发现东亚存在而它处完全或多半不存在的特殊条件，由此弄清帝国主义影响延续与否的问题？特殊条件之一，无疑是这样的事实，即就南朝鲜和台湾（还有北朝鲜和满洲）来说，我们讲的是旧时日本帝国的核心地区——即从1895年起就遭受日本为时最长和最强大统治的地区。相比之下，其

---

① W·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与前景》（伦敦，1978年）；D·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伊利诺伊州格伦科，1958年）。

② I·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论文集》（剑桥，1979年）。

邻近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东盟国家，则有一段欧洲国家或美国的殖民史，只在1941年以后很短一段时间经受过日本统治。

第二个特殊条件是：东亚地区从1945年初以来就成为东西方冲突的一个主要场所。两个超级大国深入干预这个地区的事务，附庸国家所受影响如何？自从60年代以来，两种制度的全球性冲突已从军事方面转入经济方面，这里产生新的依附国家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个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向这里提供大量资本和专家咨询，从而为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动力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新近插手于其从前的势力范围，可以解释为它在美国支持下承担了代理人的角色，为的是减轻美国的经济负担。

最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高水平的教育，人民受到强烈的激发，勇于进取，具有上进的机动性，用米达尔的话来说，达到了“强大状态”，还有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儒家传统。本文对此不作具体深入的论述，但它依然是我们进行全面评估时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将联系南朝鲜的具体例子，对上述一些问题进行考察，有时兼及其他事例。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

1895—1945年这段时间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标准的帝国主义列强为期长得多的扩张活动相比，具有多大的典型性呢？在19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间，日本本身还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猎物。从1854年起，它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只是在明治维

新期间利用了国内的政治资源，并因其孤立的和经济上不那么使人感兴趣的地理政治位置，日本才有可能避免了其邻国中国的命运。① 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是个后来者，又遭受自然资源缺乏之苦。直到进入本世纪，它一直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和它确信为工业化取得原料基地所必需的那些地区进行战斗；另一方面，要和那些老牌的列强作斗争，那些老牌列强或者不信任新来者，或者是争夺尚可殖民的地区的劲敌。这一特殊情况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个特征：首先，军事扩张总是先于经济掠夺（贸易紧跟国旗）；第二，日本不像其他殖民列强，它不把自己限制于榨取掠夺物、商业渗透或者至多发展边缘飞地；相反，它作出巨大努力，有计划地迫使依附地区承担其派定的费用。虽然在殖民地也进行私人活动、追逐私人利益，但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组织的"合资经营"的长期发展计划，其中或由军队、或由政府局部地或全部地掌管的企业，作为财阀的伙伴从事经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依附地区有目的而又迅速有效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排除在外的。

在朝鲜，自1910年设置总督之后，由于内政部门和警察制度的设置，一套基本的行政和政治体系便建立起来了。1918年完成的全国地籍和土地普查，标志着为农业建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走了第一步，也是增加稻米产量的长远计划的基础。东洋拓植公司代表了日本政府，其活动后来扩展到了满洲、华北和蒙古。它和传统的朝鲜地主在一起，成了该地区最

---

① 参见F·V·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对约1600年至约1918年东亚发展的重新理解》（剑桥，1977年）；J·哈里迪，《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纽约，1975年）。

大的土地所有者。虽然有计划安置日本农民所得成绩有限，只得雇佣朝鲜佃农来代替，但在农业上用于将耕地从450万公顷扩至500万公顷(1938年)的投资，以及用于修建灌溉工程和生产商业肥料的投资，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10—1935年间，稻米产量从2500万公石(1公石＝1市石——译者)上升到3200万公石，到1940年，增至3900万公石；同时，稻米出口从400万公石(1915—1916年)上升到1400万公石(1930—1936年)。由于增产部分都被出口到日本，所以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由于30年代日本国内稻米供应开始改善，日本稻米生产者遭到来自朝鲜、台湾稻米出口的竞争压力，所以在朝鲜就中止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从那时起，要增加稻米出口，只有以牺牲国内消费为代价才能达到，而这就导致稻米供应的迅速恶化，并导致转向生产低质量的谷物。

在矿业上，第一步是有系统的地质勘探。到1923年，已发现115种矿物和粘土，但工业化本身，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直到30年代日本出现新的工业繁荣、需要增加原料进口(例如煤和铁矿石)时方才发展起来。此外，30年代日本的扩充军备计划需要大量的轻重金属，用以制造飞机和装甲板，并供化学品生产使用，而朝鲜正好能供应这些原料。在1929—1940年间，朝鲜的工业产值从3.5亿日元增加到18亿日元。其中重工业占55%，化学工业(人造肥料和炸药)占37%。1940年前后，国民生产总值中矿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早已超过农业，而1910年时农业比重还占近90%，1933年时也还占67%之多。

由于原先有了基础设施，才有这个发展的可能；而这些基础设施，用殖民眼光看来，是惊人地完美的。到1940年，朝鲜

已修建了5670公里铁路（当时满洲铁路的长度约为此数的二倍），大部分由北向南，由此把满洲和朝鲜南部港口连为一体，有助于向日本运送货物，此外，还有许多公路、港口、通讯网，以及建造在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站，向满洲提供能源。

1919年初，朝鲜部分地受到十月革命和威尔逊"十四点"纲领的促动，掀起了反对日本统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此后在2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了较为"自由"的制度，只是在30年代初期朝鲜经济转入军工生产轨道时，才加强了压制手段。禁止朝鲜人进行一切形式的政治和新闻活动，使朝鲜人"日本化"的努力有时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不仅用日语作为官方语言，而且强迫朝鲜人接受日本名字，甚至在家里也禁止说朝鲜语。虽然从日本大规模移民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殖民政权确实实行了一种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包括为日本人保留几乎每一个负责职位。这种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每况愈下的生活条件造成3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外流。除了在日本的矿山和兵工厂有70万强迫劳动的朝鲜人之外，还有约330万朝鲜人移居满洲、中国本部、西伯利亚和日本，而朝鲜的总人口为2500万。

朝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以适应生产和出口农产和矿产原料及重工业中间产品的，而1933年以后满洲国① 的工业化则侧重于重工业。日本把当地的铁矿、煤矿、冶炼、金属加工以及发动机和机动车制造的发展连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满洲国按其分担的任务，向华北和朝鲜输送机器。安置日本农民到大部分属于蛮荒的地区去的计划遭到了失败，因为需要大量人力去当兵和到兵工厂当工人，从而限制了可能移居者的

---

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译者

数量。另外，日本农民对移居满洲国也缺乏热情。

在台湾，日本人的活动集中于建立以农业为主的基础设施，借此生产稻米和甘蔗，以满足日本的需要。在华北，日本人占领的时间最短，投资活动相应较少：这里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原料如羊毛和棉花，此外还有煤。

在1940—1942年间，日元集团达到了有效程度的最高峰，它要求所有成员国遵循一项由战争经济的需要指导的长远计划。目的是使整个日元集团在内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自给自足。日本国内原料稀少，因而按照自己的需要指导此项分工。指导工作包括制造工业和决策中心两方面。朝鲜除了提供强制劳工之外，还从南部提供稻米，从北部提供煤、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在朝鲜设立的制造工业，只有能源集中型的化学工业和金属加工业。设立这些工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北部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满洲国的贡献在于提供大豆、羊毛、重工业原料以及精选的机器和机动车产品。华北主要提供煤和日本纺织工业所需要的羊毛和棉花。日元集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口以弥补不足的主要产品，是石油、橡胶和棉花。在日本统治扩张至南亚之前，美国继续是这些产品最重要的供应者。

整个体系是由一个铁路线、港口和联运站构成的稠密网络支持的(虽然战争后期清楚地表明，这条锁链的最后环节即与日本本身的联系实际上是脆弱的)。三个依附地区的进出口，几乎毫不例外地用来满足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集团的需要。只有帝国中心才能和第三国进行贸易。

如果我们编制一张日本帝国主义对依附地区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那么应该指出，虽然增长率十分引人注目，但依附经

济的片面发展和专业化的发展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独自生存，因为与日本或其他日元集团成员国的投入—产出关系对于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再有一点，由于种族隔离的种种规定，对土著劳工的教育成效可能很有限，因为管理和工程方面的技术性职位大部分为日本人所占据。不过，应该强调的是，1945年以后在改变了的政治环境下，那些原为日本利益而建设的铁路、港口、矿山等等就有可能转化为朝鲜和中国的积极的资产。在那之后，它们便有了自己所能支配的工业，并确实还具有重工业的生产能力，这在第三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满洲和北朝鲜，至今仍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农业的发展也有一段非典型的殖民地经历，其中日本人的利益集中于生产稻米、大豆、羊毛和棉花上，换句话说，集中于粮食和纺织品原料上，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构成满足当地人民需要的基础。如果日本当时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古巴，只种植供世界市场出售的甘蔗，那么，这张资产负债表将是另一个样子了。从日本的遗产这一点来说，50年代台湾的发展是同农业和出口农产品加工工业相联系的，北朝鲜和满洲的重工业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展，两者看来都不是纯粹的巧合。1945年以后各个地区采取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由此清楚地显示出和殖民地时代有延续性的迹象。

东亚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

东亚发展成为东西方冲突的场地，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场战争原来是如日方升的强国日本同老牌强国美国间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恶战。日本作为一个工业

上的后来者和经济上较弱的国家，力求建立一个完全供自己利用的经济范围，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安全。而经济上的超级强国美国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维持在1899年的门户开放原则中业已清楚表明的一种无形渗透的政策。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役之后，战争的优势转到美国一边。不过，日本在太平洋岛屿上的顽强抵抗表明，要占领日本本土，非牺牲大量美国人的生命不可。若采用尽可能地调动物质资源而不是人力资源来进行这场战争的战略，则有赖于苏联的军事支持，虽然这在政治上说来是不可取的。《雅尔塔协定》秘密附件规定的苏联加入亚洲战争的代价是将1905年以前属于沙俄的满洲土地和权利仍归苏联。苏联的推进也将威胁到把朝鲜并入其势力范围。这一来，苏联将成为东亚的一个主要强国。中国成了超级大国分别交易的牺牲品，据估计将通过一项中苏条约以追认方式取得其同意。作为形势发展的结果，战后日本的地位早在战时就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中心论题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最后将由哪一方掌管中国，所以这个讨论格外热烈。本来早有可能预测到，中国的真空不会由美国的盟友蒋介石来填补，而是由和苏联结盟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底，这一前景业已导致人们考虑到日本的未来地位以及这两个敌对国家重新接近的可能性。问题是一个被打垮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不复有日元集团）都必定衰弱下来了。所以，从逻辑上说来，不但必须给予日本以重建援助，而且还应按照美国人对于世界规模自由经济秩序的想法，给予日本一块地盘，以便日本能够取得原料和销售其制成品。

1945年6月原子弹试验成功意味着东亚政府特征的根本

性变化。①美国用空投原子弹的办法，能够迫使日本迅速投降了。意味更深的是，现在美国可以甩开苏联的帮助了。另一方面，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出兵满洲，成功地夺得了战略优势。大国之间的谈判产生了沿北纬38°分裂朝鲜的临时协议。东亚地区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地理前线和未来的势力范围，就这样在一周时间内奠定了。

美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和日本签订了停火协议，同时，尽管谈判时有英国人出席，美国却在事实上单独占领了日本，并由此决定日本的未来。苏联占领了满洲和分界线以北的朝鲜，从而重新取得了沙皇在1905年失去的地位。

谁应对后来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冲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在保守派和修正派史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生动的争论。美国首先决定反对在朝鲜的长期军事占领，并在事实上试图在日本实行高度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并瓦解财阀，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然而，早在1947年5月，就做出了不拆除设备和索取赔款的决定。到1948年4月，整肃财阀也停止了。不过，在1948年，美苏军队都履行协议从朝鲜撤走。当内战之火在中国再度燃起时，局势表明共产党很可能获得胜利（虽然苏联对国民党几乎支持到最后）。此事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最后导致美国重新制订其东亚政策。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决定用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入侵台湾。这个决定确立了到今天仍然有效的东亚军事因素。1951年9月8日，不

---

① 参见G·阿尔佩洛维奇：《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纽约，1965年）。

顾苏联的抗议和亚洲的强烈反对，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同一天签订了美日军事条约(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译者)。1954年9月1日和1954年12月2日，美国分别和南朝鲜及台湾签订了类似的军事条约，构成了美军继续驻在东亚和对韩、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基础。苏联和中国及北朝鲜签订了类似的协定。①

出口战略的实施

1953年夏，在双方遭受大量伤亡之后，朝鲜战争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停下来了，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领土状态。不过，战争使南方至少在财政和军事上严重依赖其保护者。结果，1948年重新取得的主权又成了问题。不仅美国军队留驻在南朝鲜，而且现在南朝鲜的军队也是靠美国的援助建立和装备起来的。此外，美国为使这个国家的经济保持活力，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从1945年起，大约有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4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流入南朝鲜。在1953—1960年间，援助并转运的物资平均达到南朝鲜国民生产总值的10%。②

由于有了这些捐助，就有可能重建战争期间遭毁坏的、后来大部分收归国有的旧日本工厂，所以到1957年，南朝鲜的经济已接近于殖民时代的最高水平。不过与此同时，基本消费品

---

① U·门泽尔，《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对集中发展计划的贡献》(奥普拉登，1978年)，第245页；《北朝鲜经济、结构和发展》(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4年)。

② 全面的叙述见E·S·梅森等编：《韩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0年)，U·门泽尔：《仿效欧洲——东亚迅速发展国家中南朝鲜和台湾的集中发展》(慕尼黑，1986年)。

的进口替代政策开始耗尽其潜力。1958年以后，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60年，人均收入的增长按不变价值计算大约为负2%。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徘徊在12%的水平上下，人均收入低于100美元。这使南朝鲜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些趋向，美国顾问越来越怀疑单靠进口替代战略的前景；这种战略在其他国家也明显地进入了死胡同。

这时李承晚政府和美国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鉴于李承晚想用美国的援助按照日本模式发动基层工业化——换句话说，进入进口替代政策的第二阶段，美国政府便向他施加压力，迫其将南朝鲜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这其中有几点考虑。首先，50年代北朝鲜经济增长率高于南朝鲜，但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那种方式是不能接受的。第二，实行更多趋向出口的工业化，有希望重新达到飞速增长，从而可能使南朝鲜经济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这样便可减轻美国预算的负担。第三，南朝鲜经济的开放也可使日本经济受益，这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全球性目标的一个方面。美国强迫南朝鲜经济按其自身意愿改变方向所用的杠杆，是大量削减财政援助。

美国的战略遭到李承晚的反对，李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目标。对他来说，与日本保持距离几乎和统一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有一种认为美国在幕后操纵的草率论点也许难于证实，但是5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到 1960—1961 年发展成为政治危机，最终完全按照美国的条件加以解决，却是确凿无疑的。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潜在反对于1960年4月 19 日爆发成为学生暴动。由于美国军队始终不动，李承晚被迫于1960年4月27日辞职下台。接着的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占了多数，张勉当选为总统。虽然新政府早在1960年9月就向美国靠拢，答应进行经

济改革，努力实现和日本关系正常化，但1961年5月16日大约250名军官在朴正熙领导下举行起义时，美国没有作出任何阻止的行动。直接诱因是从1960年11月起迅猛发展的一个南北统一运动，这运动已征集五百万人的签名，号召朝鲜南北两方在联合国的保证下实行中立化。5月初，宣布在月底召开一次大规模的统一代表大会。当时展望的前景是，中立化可使经济重新结合于西方，以日本为取向，而这就是当时美国军队不去阻止起义的原因。不管怎样，由曾在日军服役和曾在日本军事学校受训的军官组成的朴正熙军政府，看来是满足美国利益的最好保证。朴正熙为他的所谓"革命"提出的主要理由，实际上是以经济需要为依据的。

虽然反对共产主义继续被用来使政治压迫和社会军事化披上合法外衣，但两种制度的竞争现在已转移到经济领域上来了。第一项措施是1962年1月颁布的一个五年计划，但因这个计划仍反映了李承晚的广泛工业化的思想，所以立刻遭到美国的批评。

新的统治者们自执政第一年起就面临经济困境。1963年和1964年粮食收成欠佳，政府和美国经过几次艰难的谈判之后，被迫开始执行一项稳定方案，以求得到美国输送其所急需的谷物。直到1965年，方才可以说南朝鲜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有了转折点。就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继续向南朝鲜增大压力，以促其实现和日本关系正常化，并允许日本资本进入南朝鲜经济。由于日益卷入越南战争，美国人不得不设法取得其盟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以减轻其在亚洲其他地方的财政负担。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打算使南朝鲜像台湾那样，能在经济上有活力，开始推行那种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由此取得唯一的

成功机会。这一进程将由日本资本越来越多地进行援助——它不仅意味着日本的愿望直接得到接纳，而且也意味着给日本一个遵循美国政治和经济目标而扮演代理人角色的机会。同时，美国有意让南朝鲜直接加入越南战争。美国为南朝鲜参加战争而支付补偿，南朝鲜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来为其工业化提供资金。60年代日本经济上升，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因此日本人对南朝鲜（和台湾）经济发生兴趣。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的提高，因此只有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地理上方便的近邻南朝鲜和台湾，希望由此消除困难。虽然南朝鲜和台湾两地存在着源于过去殖民地时代的对日本的政治对立，人们都认为这是个障碍，但在美国的斡旋下，这个障碍克服了。朴正熙政府既然是过去和日本的合作者组成的，那么它就是日本在南朝鲜最合适的伙伴了。

1965年6月和7月，南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几个协定，乍看起来似乎意在解决一切问题。1965年6月22日，南朝鲜和日本缔结了关系正常化条约，而且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得到批准。直接后果是日本承诺提供数额达8亿美元之巨的资本援助，其中3亿美元是赠款（实际上是赔偿的一种形式），2亿美元是国家贷款，3亿美元是私人贷款。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信贷和其他商业信贷也订了协议。另外一些协议（包括和台湾签订的一项）规定了自由生产区，并允许日本直接向南朝鲜投资。1965年7月29日，朴正熙同意美国要求派南朝鲜军队去越南。这批部队于10月出发。从1966年到1973年，有5万南朝鲜军队在越南活动，由美国向南朝鲜支付了10亿美元。南朝鲜的经济政策，是在美国经济顾问的指导下制订的，它坚定不移地实施了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第二个五年

计划(1967—1971年)和所有以后的计划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专家工作的结果。到1980年，从日本、美国和世界银行输入这个国家的长期贷款和直接投资达到了大约190亿美元。

接着就是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大约在1965年以后，南朝鲜经济主要以制造工业(特别是出口工业)为基础，而农业则相对地受到忽视。为了保证低生活费用和低工资，甚至压低农产品价格。在1962年到1982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8.3%，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为16%。这和国民生产总值构成和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是同时并行的。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43.7%，而第一产业则降至18%。1982年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670美元。重要的一点是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从来没有中断过。不同于早期的是，70年代的工业向生产高价值的消费品(娱乐用的电子产品和汽车)和生产性物品(船舶、钢铁、人造化肥和水泥)方向转移。同时，由于利用了出口部门带来的联系，因而加强了国内经济的一体化。

如果官方宣传的说法或为数众多的国际商业刊物的评论可信的话，那么，无疑这是一项显然从日本模式中得到启发的发展战略的胜利。不过，也有许多理由足以提出某种程度的怀疑：

(1)强化出口运动并没有成功地阻止进口的更迅速增长，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除了需要进口必不可少的资本货物外，还需要大量进口原料和半制成品。所以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其货款数值。特别是石油(能源和纤维工业所需要的)代价不均衡的提高，不断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后果。

(2)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国贷款已导致大量的

和日益沉重的债务。

（3）南朝鲜的出口战略不断地从两方面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例如，世界纺织品协定和造船工业补贴所表明的主要消费国家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正在把这一战略推向危险境地。其他低工资国家也构成越来越剧烈的竞争，例如近几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中国可对同等劳动生产率水平付给更低的工资。

（4）许多大胆地建立和规划的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由于世界性衰退而被迫开工不足，造成单位成本增高。当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导致世界超级油轮市场崩溃时，事实强烈地表明，一种完全导向世界市场的经济是多么脆弱不可靠(因为南朝鲜专长于制造超级油轮)。

（5）因为农业增长尽管从国际标准来看相当可观，但还是大大低于工业的增长，所以各社会、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看来在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

（6）实际工资和农业收入虽有增长，但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相比，那增长是缓慢的。考虑到业已成为现实的工业潜力，这情况可能大大地限制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7）不过，最重要的异议是，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出，社会冲突的潜势正在日益增长。工业化取得无可非议的成功，而人民大众受益极小，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由于政府的现代化意识使人民期望甚高，然而得到满足又极小，所以这个对照更为鲜明。此外，各社会集团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是如此，这增强了反对派鼓动各部分人民的能力。最重要的情况大概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缺少参与政治和参加工会的机会，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形式

上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以及"黄色"工会的存在，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政府规定的低工资、长工作日、工作中完全没有法律保护、禁止罢工和独立工会，而这些正是给南朝鲜的出口工业以巨大的当地优势的因素。放松压制性的政治制度可能在国内方面动摇出口战略。官方的阐述和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所作的有利于官方的调查，自然地说明这个制度是令人遗憾的，但又是60年代以来经济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

结论

草拟一张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在东亚所起作用的资产负债表，其出发点也许应是本文开始时所作的观察：如果把日本过去规划的大东亚共荣圈分为内圈和外圈，前者包括1932年以前臣服日本的地区，后者包括1942年以前被征服的地区，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基本上只有内圈（北、南朝鲜、满洲和台湾）呈现出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特点——另外那两个国家和地区可略而不论。相比之下，外圈（大致相当于华东、华南和今天的东盟国家）仍表现出许多欠发达的征象。

上文阐述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意味着内圈经受到一种深远的现代化动力，这动力尽管有其消极的方面，但在结束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有可能转化为发展的潜力。外圈或完全地或部分地没有这种动力，因为日本在这里的正式统治只持续了一段短时间，其性质是趋向于掠夺而不是有计划地殖民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欧洲殖民主义一直是只导致在飞地上实行局部现代化的决定力量。

中国和朝鲜的社会动荡导致资本和企业及专业人才逃至

各自的非社会主义地区。这大概可以部分地说明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历史。台湾和南朝鲜在东西方之间和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利益之间所居的突出地位造成了国际资本和顾问人员群集于此，这是为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战略提供资金和加以实行的主要先决条件。

所以，总括起来说，台湾和南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应把目前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地位归因于双重的外部介入。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它们有可能抓住民族独立所带来的机会，有可能从工业化国家取得资源。所以，这些事例说明，前殖民地原则上有可能迎头赶上，也表明受限制的政治主权和大量引进资本不应从本质上与发展的障碍划上等号。

即使这并不意味着依附理论完全被驳倒，这些事例也确实说明，依附论宣称要为发达和欠发达的原因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解释的说法就不一定能有立足之地了。至少在东亚，国际形势是如此，允许朝鲜和台湾迎头赶上看来是符合中心大国的利益的。朝鲜和台湾的传统制度是坚强而有效的，足以把这种新的非正式渗透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足以利用一项根据世界市场发展国内经济的战略所提供的机会。然而，由于这些特殊条件在第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很难找到，因此就不能下结论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一种世界动向。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事物的外露部分，而是整个事物的全貌。

（钟伟云译。本文由罗伯特·奈特译成英文，经W·J·蒙森和J·澳斯特哈默收入其合编的《帝国主义与后帝国主义》，1986年。）